

——對華評論二零一三——二零一四年精華選

拆不毀的十字架



郭寶勝 牧師 著

美國華思出版社

拆不毀的十字架

——對華評論 2013-2014 年精華選

郭寶勝 牧師 著

拆不毀的十字架

——對華評論 2013-2014 年精華選

郭寶勝 牧師 著

Chai Bu Hui De Shi Zi Jia (Chinese version)

September 2014 published by Chinese Law & Religion Publishing House

1300 Pennsylvania Ave NW, Ste 700, Washington, DC 20007USA

© 2014 by (Baosheng Guo) 郭宝胜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the author.

ISBN-13: 978-0692298565 ISBN-10: 0692298568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拆不毀的十字架——對華評論 2013-2014 年精華選》

作者：郭寶勝

華恩出版社 代理出版 2014 年 9 月

美國·華盛頓特區·賓西法尼亞大街西北 1300 號郵編：20007

作者版權所有© 2014 郭寶勝

ISBN-13: 978-0692298565

ISBN-10: 0692298568

目 录

第一篇 強拆教堂及十字架事件	…… 1
一、教堂中國化與拆十字架	……3
二、強拆十字架與所謂的“基督教中國化”	……7
三、嚴重迫害官辦教會是宗教政策“文革”化的標誌	……10
四、一場以溫州為試點的全國性逼迫已經開始	……14
五、“中國宗教戰爭”的真實涵義	……19
六、中國正在開展新的“非基督教運動”	…… 25
七、基督教中國化的實質是非基督教化	……31
八、捍衛十字架—贊溫州基督徒的非暴力抗爭	……35
九、移除十字架是阻止福音的公開化——兼議十字架的實體性和屬靈性	……40
十、打壓基督教再升級，該怎麼辦？	……47
十一、遏制宗教政策進一步惡化是基督徒的責任	……51
十二、就溫州三江堂被強拆致中國政府公開信(中英文)	……54
十三、就浙江強拆十字架暴行致中國政府抗議書	……58
十四、對王怡牧師微博言論的兩點反思	……60
十五、十字架討厭的地方	……62
第二篇 基督教教案與信仰維權	……65
一、2013年中國基督教十大受迫害教案	……67
二、基督教教案與推進中國宗教自由與法治	……73
三、律師介入基督教案的重要性	……76

四、宗教歧視下的選擇性執法——剖析恩雨書房教案	……79
五、逼迫北京晨光基督教書店為那般？	……81
六、必須將毆打守望教會信徒的惡警繩之以法	……84
七、南樂教案與晚清教案	……86
八、關注宗教當局對基層三自會的迫害	……90
九、從張少傑牧師案看社會公義的擔當	……93
十、就南樂教案致國家宗教局與全國兩會的公開信（中英文）	……96
十一、“反邪教協會”是踐踏宗教自由的工具	……101
十二、正教和所謂“邪教”的法律權利都要維護	……105
十三、警惕以“邪教”名義大規模迫害基督教	……109
十四、教會教產權利的聖經依據	……112
十五、教產權利是信仰自由的必備內涵	……115
十六、耶穌在逼迫中誕生——聖誕節紀念受迫害的中國信徒	……119
第三篇 剖析三自會及其基督教統戰	……121
一、警惕中共對美國的基督教統戰	……123
二、評所謂“第二屆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	……139
三、誰是美國基督教界的羅德曼？	……141
四、對臺灣基督教統戰的險惡用心	……144
五、捍衛公義——評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牧函	……147
六、在臺灣立法院“防範宗教統戰”公聽會上的證詞（中英文）	……149
七、家庭教會信徒不是基督徒嗎？	……168
八、玷汙信仰的兩岸基督教論壇	……170
九、《服貿協議》與臺灣信仰自由的危機	……172
十、評中共官方教會在WCC大會上的表演	……175
十一、認識一個全面的吳耀宗——評《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書	……177
十二、吳耀宗之子講真話的特別意義	……182
十三、中國宗教政策會轉向開禁嗎？——兼議華人基督教界的統戰明星	……186

第四篇 基督教界時評與時政評論	……189
一、2013 年中國基督教界十大事件	……191
二、六四 25 周年與中國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195
三、《宗教自由普度共識》的重大意義	……198
四、林獻羔牧師留給我們什麼？	……201
五、追思林伯，將真理的旌旗揚起來	……204
六、中國家庭教會簽署《首爾承諾》的重大意義	……206
七、抵制反憲政逆流是基督徒的責任	……208
八、愚昧的反基督教思維該休止——評《較量無聲》及其他	……210
九、當下紅衛兵道歉信的信仰意義	……213
十、必須保障被囚禁人員的信仰權利	……215
十一、請收刀入鞘——譴責中共暴力對待維權公民	……218
十二、鎮壓網絡言論自由 再演重慶唱紅打黑	……221
十三、郭飛雄陶醉於自己的勇敢嗎？	……223
十四、緊急呼籲溫州基督徒探訪錢雲會等受害者	……226
十五、烏克蘭教會在國家劇變中的角色	……228

第一篇 强拆教堂及十字架事件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詩篇：29:10）

一、教堂中國化與拆十字架

自年初以來席卷浙江大地的強拆十字架風暴毫無停止的跡象，海內外人士也一直苦苦探究中國政府強拆十字架的真正目的。隨著宗教當局於8月5日“紀念三自愛國會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的召開，中共當局進行強拆十字架運動的真實目的，似乎才浮出水面。而所謂的“基督教教堂建築中國化”，就是浮出水面的目的之一。

這次兩會大會高調推出了“基督教中國化”的主題，此主題顯然成為習近平時代對待基督教政策的大政方針，也是基督教界配合“中國夢”的宗教戰略。此政策也比江澤民時代“宗教要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更加地強勢。強力改造基督教為黨所用主要從三方面進行：1. 當局明確地提出了要建立中國特色神學思想，也即丁光訓等提出的“因愛稱義”為核心的所謂的神學思想建設（另文闡述）；2. 文化上要基督教要徹底摒除西方文化的痕跡，用中國文化來改造基督教；3. 政治上使基督教成為服務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倫理道德性團體，共建和諧社會、共圓中國夢。

而第二部分有關中國文化改造基督教，就牽涉到基督教建築的中國化問題。在最近幾期的三自會機關刊物《天風》上，連續推出了《關於中國基督教教堂建築中國化問題的探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教堂》、《關於我國基督教教堂建築設計的若干淺見》等系列文章，這些文章也被浙江兩會網站在第一時間發布。這些文章的主題就是基督教中國化政策，如何實施在中國的教堂文化中。從這些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強拆十字架運動，不過是當局既定宗教政策自今年年初的實施而已。

其中《關於中國基督教教堂建築中國化問題的探討》一文作者就是中國基督教協會總幹事關保平，此職位一般都有統戰部、宗教局的人直接擔當，他的發言代表了中共宗教當局立場和政策。根據吳耀宗兒子吳宗素的回憶錄《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我所知道的父親吳耀宗》，歷屆三自會總幹事和基督教協會總幹事基本上都是共產黨員，如李儲文等。關保平在文中寫到：“從表面上看，教堂的建築風格反映的僅僅是表現形式，但是在深層次上，反映的是神學思想。因為我們相信基督教是洋教，所以我們才執著於建洋教堂。如果中國基督教真的是中國的，就必須與中

國文化結合，而教堂建築風格是文化的外在表現。”

關保平在文中認為目前哥特式（被拆毀的溫州三江堂式樣）教堂“是殖民主義時期的教會記憶”“俯瞰全城的教堂高度反映了教會凌駕於社會和教會，要在社會中掌王權、坐首位的思想”。他認為：“廣東汕頭的得石堂、北京的缸瓦市堂、陝西三原的基督教堂、安徽宿州的福音堂、上海的鴻德堂等教堂建築都是採用了中國傳統建築風格，或者是中西合璧的建築風格。誰能說它們像佛教寺廟或者不像基督教堂？”這些教堂雖然大部分是外國宣教士所建，但都採用寺廟風格，中國基督徒並不喜歡這些教堂風格。但是照關保平的意思，當大多數教堂風格象以上教堂，才符合基督教中國化，他說：

“基督教只有中國化才能夠成為中國基督教，才能夠在中國大地生根。基督教在中國只有紮根於中國文化傳統，才能獲得適合中國人的對福音的表達方式和信仰方式。當中國建築風格成為中國基督教堂建築主流風格的時候，我們才能說‘這是中國基督教’，因為外在形式表達了內在思想觀念的改變”。

從基督教協會總幹事的這番言論來看，鏟除高聳入雲的十字架、矮化教堂的雄奇突兀、使大部分教堂風格成為寺廟、道觀或其他中國傳統建築風格，似乎已經成為了中國宗教當局基督教中國化戰略的一部分。

在《天風》發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教堂》一文認為：“似乎在中國，只能允許存在一種教堂模式：即十九世紀外國傳教士所帶來的哥特復興式樣式。我不知道，在我們中國，為什麼在今天還要不惜工本、大興土木建造哥特復興式教堂？”作者認為尖塔、突兀十字架的哥特樣式是西方殖民主義文化體現，中國人應該建中國特色的教堂。

《天風》第三篇文章《關於我國基督教堂建築設計的若干淺見》中指出：“我們的教會在觀念上要避免‘只有照搬某種形式才是教堂建築’的想法。教堂建築的設計應該從實際出發。。。。。。建造更多與時代環境相協調相平衡的中國式教堂。今天如果孤立討論十字架的大小、位置是不全面的，應將其放置在教堂建築的整體性之中來探討”。

從《天風》系列文章可以看出這是在為基督教堂中國化作宣傳，也無非是在為強拆教堂和十字架作辯護。從今年的各種現象來看，基督教中國化和基督教堂中國化政策，其實是自習近平上位、自提出“中國夢”以來，就是被宗教當局擬定好的既定方針。根據這個方針，當局以基督教最為興盛的浙江省為試點，借“三改一拆”來實施基督教堂中國化，並可能在今後整改出眾多中國特色教堂。這個判斷也可以

從浙江省眾多行政指令得到印證。

2013 年 12 月，浙江玉環縣政府下發《沙門鎮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場所違法建築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裏面提到：“著力解決部分宗教建築外觀不符合有關規定的問題，對未經審批或違反審批限定擅自搭建的宗教建築外立面或宗教景觀進行整改”。建築的整改是按照“有關規定”進行的，這個規定估計是事先擬定好的有關基督教建築中國化及拆除教堂塔頂十字架的規定。

2014 年 3 月 28 日上午，浙江省、縣領導的推進“三改一拆”涉及宗教違法建築處置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記錄第二部分主要工作內容中指出：“建立長效工作機制。盡快研究制定宗教活動場所選址、建築規模、外觀形態、建築風格等的規範和技術標準，要符合宗教傳統也要體現民族特色，還要與周邊環境相協調”。當局始終認為，突兀的十字架與周邊環境不協調，根不能體現民族特色，所以要拆除。而要代之以體現民族特色的某種外觀形態。

在 2014 年 6 月 13 日浙江省基督教兩會《關於成立協助各地基督教活動場所辦證及建築設計規範化工作小組的通知》中又重申：“成立‘場所建築設計規範化指導小組’是為了協助政府部門制定有關建築設計規範，幫助各地教會在新建教堂建築設計過程中，讓教堂的建築物更好融入浙江的人文環境，倡導教堂建築中國化，以其贏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從該浙江省兩會通知中可以看出三點意思：一，浙江各教堂建築要按照規範進行建設，各教堂建築要中國化；二，設立兩會內部的指導小組來負責該事；三，基督教活動場所不僅要登記、辦證而且要被整改，符合規範化管理。

在最新一篇浙江省三自會副主席孫彰道的文章《基督徒也要遵紀守法》中寫到：

“對於涉及十字架超高超規的問題，我們要認識到十字架是信仰的標誌，但是並沒有規定十字架越高越好，越大越好，放在一個合適的位置，只要美觀、莊重就可以的”。“主動參與整改，啟用教會中從事建築設計領域工作的基督徒參與整改方案的設計”。“整改方案更加符合信仰要求，信教群眾理解得了，也符合政府有關部門的整改要求”。

從以上的政府宗教部門指令和官辦教會領導層發言中，我們看到基督教堂的中國化和建設中國特色的教堂，及其相應的十字架及教堂外觀的整改，完全是共產黨中央、政府宗教部門、基督教官辦教會高層等已達成一致的既定政策和實施方案。由於如此的政策和方案，便出現了目前為止浙江 230 多處十字架被拆除的罕有的踐

踏宗教自由的現象。這些被拆的十字架，大多是在哥特式教堂的頂端、在塔頂、在突兀的高層、在天空中張揚著雄奇的姿態。中共鏟除它們之後，要進一步進行教堂建築中國化的行動。也許今後官辦教會教堂，外觀上與廟宇、道觀類似，也不奇怪。

從基督教中國化到基督教堂中國化，中共當局改造、闖割基督教的醜惡行徑真是罄竹難書，而改造、馴化的目的，無非是要逐漸地朝滅亡基督教的終極目的邁進。這個與神作對的敵基督政權，晝日思念的無非就是徹底地消滅基督教。但耶穌基督已經在十字架上得勝，魔鬼撒旦現在的一切作為都不過垂死掙紮、回光返照。主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近了，到那時一切魔鬼撒旦、敵基督政權都要受到公義的最後審判，正如啟示錄 20:10：“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二、強拆十字架與所謂的“基督教中國化”

在自今年開始的浙江強拆教堂及十字架運動愈演愈烈之際，2014年8月5日，中國政府基督教兩會紀念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在上海開幕。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高峰指出：三自會“將承擔起新的時代使命，堅持走中國化道路，從更深層次上推進基督教中國化進程”。三自會主席傅先偉提出：“中國教會將繼續探索基督教中國化，使基督教紮根於中國文化、民族和社會的土壤之中。。。。推進基督教中國化，中國教會需要黨政宗教事務部門的指導與支持”。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在會上也對推進基督教中國化進程提出了建議（註1）。

無疑，這次大會也是為目前中共基督教政策定調的會議，是確定今後中共對待基督教大政方針的會議。這個大政方針簡單來說，就是基督教中國化。何謂基督教中國化？目前強調基督教中國化標誌著中共對基督教是放鬆還是收緊呢？而發生在浙江的強拆十字架運動與“基督教中國化”有什麼關係呢？

基督教中國化就是中國基督教三自運動興起時提出的“本色化”“當地化”“處境化”等原則，最初的本色化是因為不少信徒和教會在民族主義影響下決心擺脫外國宣教機構的控制、自立教會、實現中國教會由中國基督教徒自治、自養、自傳。但很快這一運動被中國共產黨所操縱，成為中共全面控制、改造基督教會，貫徹中共宗教政策的一大工具。所謂的“本色化”“中國化”就成為切斷中國教會與普世基督教會聯系、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所謂的中國文化來全面改造基督教的過程。

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學者在《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一文中所寫的：“所謂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就是使基督教完全擺脫西方色彩，徹底中國化。一方面建立自治、自養、自傳教會，一方面建立起“藉著出於本土環境的文化範疇將基督教的道理表達出來”（李景雄：《本色神學——舊耕抑新墾》）的本色神學。基督教的本色化不僅要與中國文化相結合，還要與中國社會相結合”。而所謂中國社會，就是指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

正如耶穌基督是出生於特定的民族、地區和文化，而使猶太文化中誕生的耶穌基督成為中國文化、尤其是社會主義文化裏的耶穌基督是非常荒唐的一樣，基督教的特色決定了它不能被某個民族民族化、某個國家國家化。也正是這個特色，又使基督教成為普世的而非單一民族國家的宗教信仰。而基督教中國化實質使基督教切斷與普世信仰的聯系、失去基督教之為基督教的特色、成為黨國的獨立宗教王國，基督教中國化完全是在改造、馴化、閹割基督教，其最終目的是要促使基督教消亡。

從中共建政以來，它就一直在推動“基督教中國化”的進程，今次大會再次強調中國化主題，說明中共當局要下大力氣、全面地改造、閹割基督教。不僅從神學教義、敬拜禮儀、組織結構，而且也要從基督教標誌、建築等外在形式上著手，摒除當局不喜悅的特色、強加眾多利於其意識形態和統治的特色。這一切，趙天恩牧師在很早就《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一書中揭示出來了：

“雖然中共一直宣稱，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其目的仍是要促進宗教之消逝。例如在基督教方面，籍著‘三自會’的成立，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對中國教會進行徹底的改造。即使在實施‘修正主義路線’時期，對宗教採取溫和的策略，也只是考慮到宗教之‘統戰’價值，及能為‘社會主義建設’帶來好處。但宗教信徒仍需要接受改造，以致他們的宗教信仰，能逐漸為共產主義所取代”（註2）。

聯系到今年的強拆十字架運動，其實這也是從中央到地方的中共宗教當局實施“基督教中國化”政策的一部分。自強拆事件發生後，很多消息說這只是浙江一地、夏寶龍一人的政策，中央實際上不知情或者不願意。近日又傳出統戰部高官到浙江調研、明令禁止強拆十架。其實夏寶龍如果沒有高層的默許，他是輕易不會在基督教這個非常敏感的事情上下手的。而這次基督教兩會高調強調“基督教中國化”的主題，也明白無誤地說明了：不僅從教義、而且從建築設計上，全面地改造、馴化乃至閹割基督教是中共宗教當局自上而下的昨天、今天、明天的既定國策。

正是在這個“基督教中國化”的方針指導下，才出現了浙江官方文件中“警惕十字架背後的政治問題”“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等命令，而關於基督教建築方面，在2014年3月28日，浙江省、縣領導推進“三改一拆”涉及宗教違法建築處置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記錄第二部分主要工作內容中指出：“建立長效工作機制。盡快研究制定宗教活動場所選址、建築規模、外觀形態、建築風格等的規範和技術標準，要符合宗教傳統也要體現民族特色，還要與周邊環境相協調”。

而在2014年5月2日對華援助協會新聞網一則新聞中，溫州一信徒對記者說浙江民宗部門一文件三內容：一. 整改十字架；二. 必拆基督教私設教會點等違法建築；三. 建立長效機制、下一步的基督教場所的建築技術標準，要符合中國民族的

文化特色。

在強拆十字架的同時，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強調：“以紅色殿堂占領農村文化陣地”。“‘文化禮堂不只是一個建築，應該是一個建築群，一個組合’。陳一新強調，農村現在缺的是思想、文化，溫州各級黨委政府要以紅色文化去引領老百姓去構建真正的農村精神家園，讓老百姓在這個家園裏得到熏陶、得到教育、得到啟迪、得到成長”（註 3）

這些文件及新聞顯示官方有意要使基督教建築(教堂及十字架)具有中國特色，也即實現基督教建築的中國化。把教堂的十字架拆除，教堂就可能與一般的樓堂館所區別不大，與中國社會和環境就不會構成沖突。再把教堂名字改為“文化禮堂”，就直接實現了基督教的文化化、紅色化。可見，拆十字架已經成為基督教中國化的重要步驟。

總之，跟梁燕城等政協委員基督徒的一廂情願或者塗脂抹粉的說法——中央已經勒令浙江停止強拆十字架相反，最近召開的宗教當局和全國基督教兩會紀念三自會 60 周年暨基督教中國化大會明白無誤的告訴世人：中國宗教部門對待基督教的政策已經高調地突出為——基督教中國化——簡單來說，就是在不能阻擋基督教於國門之外的情況下，將基督教改造、閹割、馴化，不僅從教義、而且從建築設計等等方面使基督教中國特色化、社會主義化、共產黨化。而近來愈演愈烈的強拆教堂及十字架運動，也無非是基督教中國化、尤其是基督教宗教建築中國化的重要內容。

對於這樣的形勢，作為基督徒首先要識破撒旦的詭計、認清仇敵的陰謀，然後在上帝大能的幫助下，剛強壯膽，正如以弗所書 6:11-13：“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註 1：見中國基督教網站 <http://www.ccctspm.org> 《紀念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六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在滬召開》一文

註 2：見趙天恩、莊婉芳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 1949-1997》一書 94 頁

註 3：見 2014 年 6 月 5 日中新網新聞：《溫州市委書記：以紅色殿堂占領農村文化陣地》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4/06-05/6249594.shtml>

三、嚴重迫害官辦教會是宗教政策“文革”化的標誌

根據溫州傳道人的統計，截至 2014 年 6 月 27 日，浙江、溫州教堂接到拆除通知，教堂附屬建築、十字架被拆或被覆蓋，初步統計有 131 處，但內部數據可能是這個數據的三四倍。這些被強拆的教堂及其十字架，大都是三自會名下教會的。如此大規模地強拆官辦教會的教堂及十字架行徑，在中共建政歷史上，除了“文革”時期外，都是聞所未聞的。因此海內外的有識之士，面對這一波的強拆，發出了疑問：中國政府是否開始將“統戰”為主的宗教政策改變為“消滅宗教”為主的“文革”時宗教政策呢？

另外，在這次浙江、溫州教堂及十字架被拆事件中，不少人質疑為什麼要為官方教會維權？而且這些替官辦教會吶喊的，恰恰是些家庭教會出身的基督徒及援助機構，家庭教會人士為什麼要關注官辦教會的教堂及十字架呢？

其實這些問題實質是如何對中國當局目前的宗教政策有一個合理的判斷。從強拆官辦教會教堂十字架和其他跡象來看，目前的這一波宗教迫害的確與以前的迫害不同，以往對基督教的迫害主要以打壓家庭教會為特征，對三自會名下教會幾乎不動。但現在不僅打壓家庭教會，而且大規模打壓三自會名下教會，如此形勢不僅意味著中共當局對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的整體仇視，也意味著中共宗教政策正從利用、控制和江澤民時代的“與社會主義相適應”，開始轉向為壓制、禁錮乃至逐漸消除宗教的政策。這種形勢非常類似於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共一改自 1949 年建政以來對基督教的統戰政策（即打壓家庭教會、扶植三自會），而直接採取消滅宗教的政策（不僅消滅家庭教會，也消滅三自會）。

根據吳宗素先生《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我所知道的父親吳耀宗》一文記載，當中共完成了組建三自會、無情鎮壓了不參與三自會的家庭教會後，三自會和中共的蜜月也開始結束了。該文根據吳耀宗日記提到：“父親 60 年 3 月 12 日的日記提到和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及副部長張執一見面。李指出：宗教起源於對自然的無知及社會的壓迫。此兩條件若不存在，宗教亦消滅；現在宗教影響日益減少，宗教工作者要有心理準備，適應目前的環境和形勢。這番話明白無誤地傳達了中共計劃

提前消滅宗教的企圖，事先對父親通風報信”（註1）。

1964年，代表中共立場的理論刊物《紅旗》雜誌發表了《正確認識和處理宗教問題》的文章中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應該積極領導群眾進行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還應當緊密結合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依靠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馬克思主義和無神論的宣傳教育，促進宗教消亡”（註2）。

1964年浙江省省長周建人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強調“宗教也是迷信”“宗教有建築物，有神職人員、教士等等，這是它的物質宣傳工具。有基督教的地區，自由教堂聳立著，這是迷信的標誌”。他的結論是迷信很有害，必須破除它，“等待它自行消滅是不行的”（註3）。

1964年12月召開三屆人大，27日大會閉幕集體攝影後，毛澤東與前排的常務委員逐一握手。同吳耀宗握手時，毛詢問了吳耀宗的健康，表示關心，又語重心長地說：“你的那個上帝現在不太靈了”。最高統帥一言九鼎，短短幾個字卻有極大的份量，暗示基督教在中國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現在快要壽終正寢了。（註4）

毛對三自會重要締造者吳耀宗的話音剛落，“文化大革命”就於1966年爆發了，紅衛兵們以“破四舊”的名義拆毀、占領幾乎所有三自會下屬教堂，拆毀除了醫院紅十字之外的所有十字架，抓捕、拷問幾乎所有三自會神職人員，吳耀宗也被批鬥多年。1967年1月，三自會的領導機關中共統戰部被解散、宗教事務局也被關閉，“文革小組”領導之一江青宣布要把宗教永遠送到歷史博物館（註5）。

以古知今、以過往鑒別當下，我們不難發現，當中共不僅迫害家庭教會，而且開始大規模地迫害三自會官辦教會時，明顯意味著中共當局宗教政策的演變，也意味著中共正在朝“文革式”的“消滅宗教”方向邁進。大規模迫害官辦教會，是當局拋棄“統戰”理論的標誌，是它開始鎮壓宗教本身的標誌，當然也是它開歷史倒車，妄圖“紅衛兵”當政、復辟“文革”的標誌。

因此，當今年以來大規模迫害官辦教會的現象愈演愈烈時，家庭教會人士應該意識到這是對基督教整體的迫害、是中共宗教政策“文革化”的標誌，也因此應該挺身而出，為受迫害的教會維權、發聲、呼籲，並采取有效辦法遏制當局宗教政策“文革化”趨勢。對家庭教會來說，這不僅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權宜考量，也是聯合起來共同抵抗侵犯宗教自由的邪惡勢力的內在必需。

當下中國當局宗教政策之所以有“文革化”的轉向，其實有內在的原因。趙天恩牧師在《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一書中認為中國政府對待基督教的政策，受四個關鍵性因素影響：一是中國官方正統思想及中國政府控制宗教的傳統；二是192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接納的社會進化論的宗教觀；三是馬列主義宗教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是帝國主義對殖民地進行文化、經濟、政治侵略的利器；四是中國共產黨的統戰策略與毛澤東的矛盾論（註6）。

這四個因素中，第 2、3 因素實際上一直在起作用。共產主義者始終認為宗教是落後意識，是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逐步消亡的，而如果政治需要，也可以人為使它消亡，也即消滅宗教是共產主義者的內在目標。這也是中共宗教政策的大前提。至於統戰的需要，乃是根據毛澤東的矛盾論而來，即聯合次要矛盾的對象，來打擊主要矛盾的對象，等消滅了主要矛盾後，再瓦解次要矛盾。對於基督教，在中共建政初期，覺得有必要聯合基督教界愛國人士，來反帝反封建，並打擊家庭教會。而在反帝反封建反家庭教會任務完成後，基督教界愛國人士（三自會）又成為瓦解對象。

另如中共統戰臺灣基督教界，積極拉攏臺灣召會中的一些領袖，來打擊臺灣基督教界的臺獨勢力。但是，當國內家庭教會對其構成嚴重威脅時，它就不惜與臺灣召會惡化關係，悍然宣布召會就是邪教。國內矛盾遠緊迫於它在臺灣島內的矛盾。

統戰論也表現在改革開放初期及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文革”結束後，中共認為宗教界也是進行經濟建設和擴大對外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它以團結信教群眾，統戰聯合基督徒成為宗教政策的根本。江澤民在 1993 年提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理論，就是“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滅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發展宗教”，而是規範管理，使宗教在適應黨的政策和法律的情況下有序發展。這個“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宗教政策在江澤民、胡錦濤執政的 10 多年裏貫徹下來。在這個階段，對家庭教會的逼迫是很嚴重的，但大規模地打壓三自會的行動倒是沒發生。

自習近平上臺後，提出“改革開放後 30 年不能否定前 30 年”，明顯否定了以往中共有關“文革”的決議。習政權對內殘酷鎮壓、對外擴張尋釁，大樹個人崇拜、渲染西方對華威脅，似乎要倒退到紅衛兵當權的“文革”時代。在宗教領域，由於新疆、西藏問題的核心是宗教問題，所以宗教矛盾不再成為人民內部矛盾，而成為明顯的敵我矛盾。於是，西藏、新疆的合法宗教寺院、學校被大肆關閉、拆毀，禁止眾多維族人封齋。針對基督教，也開始拋棄“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指導方針，認為基督教是西方帶有明顯政治意圖的侵略工具，無論三自還是家庭教會，都是潛在或明顯的意識形態敵對勢力，甚至是威脅穩定的重要社會團體。正是這些考量，使中共又一次地回到馬列主義最原教旨的對宗教的理解上。於是，使宗教消亡、壓制並最後鏟除宗教本身，也即宗教政策的全面“文革化”，已經成為當今宗教政策

的一個重要趨勢。今年以來，當局以“邪教罪”來對付家庭教會，以圖最好禁絕所謂的非法教會；又以拆除教堂和十字架來對付三自會，限制和掌控教產來最終弱化和消除三自會名下諸教會。

理解了這個趨勢，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我們應該在這次浙江強拆官辦教會教堂及十架的大逼迫中挺身而出，因為這事關基督教整體，也事關整個國家的命運和走向。在這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關鍵時刻，捍衛信仰自由權利、譴責中共暴行、遏制宗教政策的進一步惡化，的確應該成為海內外基督徒的共同責任。儘管這不是容易的，但我們堅信：“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詩篇29:10-11）

註1：見邢福增主編《大時代的宗教信仰》584頁

註2：見邢福增主編《大時代的宗教信仰》591頁

註3：見趙天恩、莊婉芳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163頁

註4：見邢福增主編《大時代的宗教信仰》591頁

註5：見趙天恩、莊婉芳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201頁

註6：見趙天恩、莊婉芳著《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27頁

四、一場以溫州為試點的全國性逼迫已經開始

種種跡象表明，被譽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溫州教會被強拆十字架和教堂的逼迫正在全浙江省蔓延，更有跡象表明，此一逼迫的決策並非止於浙江省，而是北京共產黨中央有意展開的對基督教的新一輪全國性逼迫。事實上，根據網絡消息，除了浙江全境很多教會收到需要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的通知外，東北各省、安徽、河南等省份的教堂也收到了類似的通知。從全國的此種局面和溫州作為中國基督教象征性城市受到的逼迫來看，2014年開始的這場對全中國基督教和基督徒的迫害和壓制，已經以拆除十字架和教堂、侵犯教產權利的方式，無法避免地開始了。

4月3日，溫州永嘉縣甌北鎮的三江教堂及其屋頂的十字架，面臨強拆。但由於3000多名基督徒同心合意的禱告和維權，政府暫時妥協。事前被捕的三江教會陳道真執事被取保候審，三江教會領袖們與政府達成協議：主堂不拆，十字架暫時不拆，雙方都同意後再整改十字架。教堂附屬樓要自行拆兩層。但是溫州永嘉政府同時又抓捕了3個政府規劃局的人，似乎政府要打算坐實教堂是違章建築的罪名。三江堂現場稍後傳來幾次武警來強拆的消息，雖後來被證為不實，但這些跡象為三江事件留下了變數，局勢並沒有告一段落。與此同時，溫州全地、浙江全境風聲鶴唳、狼煙四起，更大的逼迫隨著三江事件已經在浙江全境乃至全國蔓延。

首先，隸屬溫州的瑞安、樂清、蒼南等地教會，都接到當地政府部門的口頭或書面通知，要求拆除十字架或教堂，如蒼南縣靈溪鎮滬山教堂十字架、瑞安市區沙河聚會處十字架。一位溫州基督徒在網上說：“我目前知道瑞安已有9所教會接到拆十字架與教堂的通告。三自教會背景5所，家庭教會背景4所”。網絡微信群中一位溫州藤橋信徒發出禱告文字：“（請發藤橋各信徒）寶貴十字架，寶貴教產，警醒祈禱，警醒半小時：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這需要我們一同守望，弟兄遭難，我們豈能袖手？何況我們也受威脅。為了三江，為了隸馬，為了橫山，暫定4月9-11日，每天早上6:30-7:00在藤橋福音堂內，一同向神仰望，呼籲也期待你一起。請轉發，請代禱。記得，就明早開始”。

可見，除三江堂外，更多更嚴重的強拆教堂事件在溫州蔓延著。溫州的形勢已

經非常危急了。溫州被譽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由於溫州是外國宣教士很早就紮根的地方，信徒一直為持守信仰而抗爭不止，也由於這邊民間經濟發達，民間基督教勢力有足夠大的經濟基礎。故溫州教堂林立、教會神學院到處都有。溫州也被稱為“信仰特區”“信仰飛地”甚至被認為是“信仰租界”。溫州無疑成為中國基督教發展的象征、是中國基督教興旺自由和大復興的標誌。而摧毀這個標誌，對摧毀整個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具有戰略意義。“擒賊先擒王”，當局就是憑著這個魔鬼邏輯開始以溫州為試點，逐漸向全中國基督教磨刀霍霍的。

從浙江全境來看，強拆十字架和教堂的行動從今年年初就開始了，2月27日，杭州余杭區黃湖鎮黃湖基督教教堂門頂上的十字架被拆除，當地政府派人並動用專用起重機拆除；同日，浙江舟山市定海區白泉鎮白泉基督教教堂得到當地政府方面的緊急通知，要求在2月28日、3月1日一定要把十字架拿下來，否則責任自負。浙江當局同時要求全省各教堂將矗立於屋頂的十字架移到教堂內，掛在牆上，成為“上改下”及“大改小”，但不能立在教堂頂上。

由於全世界基督徒的反對，浙江當局年初拆除十字架一度暫停。但是進入4月份後，浙江全境強拆教會十字架和教堂的行動愈演愈烈。杭州、舟山、臺州、奉化、蕭山、寧波、麗水、海寧等地教會都傳來被要求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的消息。如4月8日浙江麗水地區龍泉市八都鎮教會接到鎮政府通知，說八都教會的十字架太顯眼了，要求教會拆掉，且市委書記也指示下來說：必須要拆！網上有一緊急代禱通知：“今天將有縣民宗局領導來滄山教堂查看十字架，請弟兄姊妹切切為此事禱告，求神恩待祝福這些領導，使他們能按照國家法律法規辦事，不要有基督信仰的歧視的行為。切切”。而一浙江網友在網上寫到：“全省所有宗教場所不能亮燈，國道、省道及高速公路兩旁十字架分期拆除放在建築立面上”。永嘉網友寫到：“今天，永嘉管宗教的人員很‘辛苦’，下班時間了，還親到各教堂要求關十字架的燈，說省拆違領導在永嘉，被看到讓他們很為難。21世紀了，能進步點嗎？”

以上可見，這股拆除、挪移十字架和拆教堂的歪風已經席卷到整個浙江全境。浙江這個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全國基督教最為興旺的省份，到處呈現出基督教被打壓、受控制、遭逼迫的現象。而且有更多的消息證明，浙江之所以作為迫害基督教的“試點省份”，是因為如此可以警告其他追隨浙江的地方，也可以把打壓“最具難點”的浙江的經驗推廣到全國。

表面上，浙江省今年以來迫害基督教的行動，是浙江省“三改一拆”運動的持續。根據浙江省人民政府2013年2月21日發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關於在全省開展“三改一拆”三年行動的通知》（文號：浙政發〔2013〕12號）中指出的：“省

政府決定，自 2013 年至 2015 年在全省深入開展舊住宅區、舊廠區、城中村改造和拆除違法建築(簡稱“三改一拆”)三年行動”(註 1)“三改一拆”行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制訂方案、明確目標。第二階段：落實措施、全面推進。第三階段：總結表彰、鞏固成果。2014 年正是第二階段。

在 4 月 3 日溫州《樂清日報》文章《“三改一拆” 打響攻堅戰》(註 2)一文中寫到：“去年，我市‘三改一拆’工作在溫州‘三區兩市’中排名末位，今年一季度全市拆違進度不理想。市長林曉峰說，把 4 月份作為‘三改一拆’攻堅月，打好‘三改一拆’攻堅戰、主動仗和翻身仗”。樂清市長林曉峰強調，“三改一拆”工作要抓重點、抓難點、抓示範。所謂的抓難點，就是“依法穩妥有力地推進宗教違法建築拆除”。

根據浙江瑞安市《關於做好‘三改一拆’涉及宗教和民間信仰違法建築調查甄別統計工作的通知》和浙江玉環縣《沙門鎮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場所違法建築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註 3)，浙江當局的確把宗教建築的拆除當做最為重要的拆除工作。兩文件顯示，浙江民族宗教部門，配合“三改一拆”行動，制定了一個“七必拆”或“七先拆”的違法建築細目。根據《沙門鎮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場所違法建築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這“七必拆”指的是：

- 一是未經審批登記的基督教私設聚會點及其他非法宗教活動場所必拆；
- 二是對依法登記活動場所未經審批搭建的違章建築及規劃審批超面積部分必拆；
- 三是違法違規占用農耕地的小廟小庵必拆；
- 四是影響公共安全和重大建設的小廟小庵必拆；
- 五是嚴重影響村莊規劃或美麗鄉村建設的小廟小庵必拆；
- 六是交通幹線兩側的小廟小庵必拆；
- 七是借教斂財的小廟小庵等非法活動場所必拆。

這“七必拆”在浙江另外一些市政府的文件中寫為“七先拆”。無論如何，宗教建築在拆違中列為最重要的，而基督教私設聚會點（也即家庭教會場所）在宗教建築中被列為首位。不僅若此，在《沙門鎮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場所違法建築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中特別提到：“倡導節能理念，要求所有宗教活動場所建築景觀和宗教標誌物平時一律不得亮燈”。為什麼各級政府、黨委還有娛樂場所的燈晚上不節能，偏偏要叫教堂等去“節能”滅燈呢？

這些當局的通知、方案等文件似乎給中共強拆基督教教堂和十字架以合法的理由，而且這些文件表面上也給世人一種只事關拆除違章建築、無關乎宗教信仰的感覺。所以當溫州三江堂事件發生後，當局操縱其媒體和網絡五毛，大肆宣傳這只是拆違、不是有意針對基督教；任何宗教建築違章，都要拆除。有些基督徒也上當，質疑溫州基督徒為什麼不順服掌權者。

實際上既然僅僅事關拆違，但為什麼“七必拆”的規定卻是由浙江省民族宗教部門制定的呢？又為什麼基督教私設聚會點在“七必拆”內首當其沖呢？另外既然是拆除違章建築，為什麼對教堂頂端的十字架那麼在意呢？為什麼大多數顯眼的十字架都要卸下而且晚上也要關閉十字架的燈呢？為什麼很多並非違章建築的教堂屋頂的十字架也要被拆除、挪移，這跟“三改一拆”有什麼關係？！

其實，當局“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只不過通過“三改一拆”的名義，行打壓基督教之實；籍拆除違章建築的名義，實施打壓基督教影響力、控制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維穩戰略。

正如浙江基督徒作家咎愛宗在年初《致習近平關於浙江拆除部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緊急呼籲》中指出的，這些行動完全是浙江省委書記及高層打壓基督教的措施：

“2014年1月8日，在舟山視察工作的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夏寶龍路過舟山白泉鎮基督教堂（《浙江日報》報道證實夏寶龍當天在舟山定海），說白泉教堂十字架太醒目，太張揚，要把十字架拿下了”。夏寶龍曾任浙江政法委書記，在其任內發生過政府動員千名武警強拆蕭山黨山教會教堂事件。他一向把基督教視為西方意識形態和敵對勢力對中國的滲透工具，他對基督教的仇視和敵視是一貫的。他及浙江高層對基督教在浙江的蓬勃發展早已寢食不安、籌劃鎮壓由來已久。這次他們借“三改一拆”行動，開始對基督教大開殺戒。

不僅如此，眾所周知，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2002 年調任浙江任省委書記時，夏寶龍隔年就調任至浙江做其副手，兩人一同工作 4 年時間。夏寶龍的所作所為，習近平不僅都知道，而且相互都有默契。這個默契就是以浙江（尤其是溫州）為試點，壓制基督教，然後把壓制模式推向全國。

自習近平上臺後，權力高度集中、大搞個人崇拜。意識形態上急劇往左轉，不走西方的“邪路”，高舉毛澤東旗幟，儼然開創“沒有薄熙來的薄熙來時代”。習縱容極左軍方拍攝《較量無聲》，該片煽動中國人仇視美國和西方文明，大有與整個西方國家決一死戰的姿態。該片在伴隨國內基督徒敬拜畫面的解說詞說道：“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滲透，在主流價值觀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逐漸形成蔓延之勢。相關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基督教徒總量，已悄然逼近一億人。”

前國家宗教局長葉小文在最近的《習近平決心激活傳統文化以解困局》一文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中心議題是弘揚中華傳統美德。習近平強調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中我們看到，共產黨中央排斥西方文化及其宗教和普世原則、宣傳有利於其統治的傳統文化已成為當前意識形態的主題。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央、浙江、溫州等當局已經達成一致，借所謂“三改一拆”、違章建築為幌子，通過鏟除信仰的物理空間、破壞教會教產權利，來達到對整個浙江和全中國的方興未艾的基督教的控制、打壓和整肅。使基督教的發展，始終處於“非法化、隱蔽化、地下化、分散化、控制化”（註 4）的弱勢狀態。

一場以中國基督教的象征城市溫州為試點、全國性的對基督教的逼迫已經拉開序幕。詩篇 29:10：“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溫州、浙江乃至全國的基督徒們，不要被仇敵和魔鬼撒旦的攻擊嚇破膽，因為神與我們同在。逼迫帶來教會的復興、更大的逼迫帶來更大的復興。一切正如溫州基督徒在《十字架，十字架——就浙江教堂被強拆事件致主內全球基督徒肢體代禱信》中所寫到的：“這不是一場關於物質的爭執，而是屬靈的爭戰。文革逼迫使得溫州教會教產全面被封或被毀，然而卻迎來溫州基督徒的空前復興。我們有理由相信：那只是一個序幕！主恩浩瀚！今天將進入另一個階段！經上說，“若有人毀壞這殿，神必要毀壞那人”。這殿就是聖徒團契。這是我們的立場！”

註 1：《浙江省人民政府關於在全省開展“三改一拆”三年行動的通知》

見：http://www.zj.gov.cn/art/2013/3/13/art_13012_77021.html

註 2 《“三改一拆” 打響攻堅戰》 見《中國樂清網》

http://www.yueqing.gov.cn/xxgk/dzdt_1/mryx/201404/t20140403_707552.html

註 3 《沙門鎮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場所違法建築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

http://www.yuhuan.gov.cn/yggc/shamen/zcwj/201312/t20131218_70014.html

註 4. 《五化——我對當下中國家庭教會宗教政策的理解》

<http://kan.weibo.com/con/3543089432846963? from=text>

五、“中國宗教戰爭”的真實涵義

戰略學者趙楚在東網發表文章《正在上演的中國宗教戰爭》(以下簡稱《正》),該文富有洞察力的指出目前強拆教堂及十架的“大規模平毀行動是出自新領導班子的意誌”,該文也合理地預測到:“當局會更加嚴厲和蠻橫,而本來一貫政治上低調的基督徒們必然會滋生更廣泛與自覺的現實政治關切。這與當初在東歐和南非發生的情況也是一樣的,並沒什麼中國特色或宗教特色”。但是,該文還有眾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必要指出來以提升國人對宗教問題尤其是中國基督教問題的辨別和認識。

首先,該文題目“中國宗教戰爭”,讓人以為中國開始了宗教之間的戰爭,或者是基督教與佛教等其他宗教、教派之間的戰爭,或者是共產主義作為準宗教與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之間的戰爭。該文一開始就以中世紀天主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戰爭(十字軍東征等)、近代天主教與基督教新教之間的戰爭(30年戰爭等)為例進行論述,給人的感覺也是在討論中國宗教之間戰爭。但是,從後面的大段論述中我們看到,作者所要闡述的是中共政權對基督教、伊斯蘭教、藏傳佛教等諸宗教的迫害、壓制及形成的“宗教戰爭”。

其實目前中國並不存在類似十字軍東征、30年戰爭等的宗教戰爭,因為中國各宗教、教派之間並沒有發生過、近期內也不會發生大規模的沖突和戰爭。例如基督教與天主教之間、穆斯林與藏傳佛教之間、基督教與打著基督教旗號的新興宗教團體之間,大都相安無事、無宗教戰爭的可能。各宗教內部,也不會像現在伊拉克伊斯蘭教信徒(穆斯林)中遜尼派和什葉派一樣發生沖突和戰爭。目前中國發生宗教戰爭的唯一模式,就是共產黨政教合一的準宗教,與其他宗教之間的戰爭。

從宗教學的角度來看,共產黨的確像極了掌握了政權的一種宗教組織(如果說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宗教,那麼共產黨員為什麼不得有其他宗教信仰?),共產主義者雖然號稱無神論,但其學說不止於世俗的政治理論,它還勾畫了地上天國和個人獲得終極意義的美好藍圖,它給世界和人類的起源和終結、歷史和宇宙的規律等終極問題給出了答案,而且共產黨的組織結構及行為方式,也符合某些宗教組織的特

征（在本人所寫的《駁劉亞洲“黨性基督論”——中共配做宇宙基督嗎？》一文中對此有詳述，在此不贅述）。

為了維持在宗教解釋和精神領域的霸權，共產主義作為一種自古以來少有的強勢宗教的特性之一，就是它與所有其他宗教天生為敵、並竭力抵制其他宗教在人類精神領域的影響力，並以鏟除其他宗教為終極使命。因此，如果目前中國存在宗教戰爭的話，那就是共產主義這種把持了政權的宗教與其他宗教之間的戰爭。具體而言，就是中共與藏傳佛教、新疆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傳統宗教和法輪功等新興宗教之間的戰爭。

可見，所謂“中國宗教戰爭”的真實涵義乃是共產黨與中國其他宗教的沖突，這種沖突不僅是中共維護其政權穩定所導致的，也是維護其教義真理地位、宗教霸權或者意識形態安全所引發的。就此“中國宗教戰爭”涵義，《正》文卻語焉不詳，實為一憾。這一缺憾，也導致該文無法解釋目前受迫害的教會大多是一直以來接受當局直接監管的教會。

《正》文沒有註意到，這次被強拆教堂和十字架的教會，大多是依附於政權的基督教三自會名下的教會。眾所周知，三自會是中共在奪取政權後扶植起來的體制內教會、合法教會、國家教會，三自會的領導是中共中央統戰部，而統戰部的領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三自會在文革期間也被消滅，改革開放後與家庭教會（即地下教會、官方所謂的非合法教會）一起成長起來。這些教會大體上都對中共政權言聽計從、俯首帖耳，從 1980 年代以來的 30 年，他們一直“把身家性命像 1949 之後的 30 年那樣重新托付給宗教局與走馬燈一樣的書記市長”（見《正》文）。顯然，大多數被拆教堂和十字架的教會是改革開放後 30 年中一直受當局直接監管的教會，而當局對他們的迫害和壓制，顯然不主要是接受監管與否的問題，而是另有他因。

所謂宗教戰爭，更多的是教義之爭，並不牽涉政治和經濟利益。共產黨組織與其他宗教的沖突，就體現出這個特點。例如在 1920 年代中共還沒有掌握中國政權時，就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直接指揮下，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當時的基督教對中共毫無威脅，但在共產主義者看來，基督教是他們教義之爭的頭號敵人。又例如在文革爆發前，中共已經徹底地將中國諸宗教控制在自己政權魔爪下，這些宗教對政權毫無威脅性，但中共變本加厲，以消滅宗教的政策將各宗教送入“歷史博物館”中，並將宗教局、統戰部都統統關閉。

這種教義之爭，就表現在當局對浙江三自會的迫害上。這是因為就是接受監管、依附政權的三自會，也包含大量基督教的元素，如高高矗立在公共空間的十字架、如聖經等。這些元素成為了紅衛兵出身的新領導班子們嫉恨的對象，成為與“宇宙

真理教”爭奪中國人精神和靈魂領域的象征，這就是為什麼浙江當局專拆十字架、而且在其內部文件中一再告誡基層幹部要註意“十字架背後的政治目的”的深層原因，這顯然是一場針對基督教本身的戰爭。一切大有復辟文革、消滅宗教的跡象。

可見，目前強拆事件的本質並不是宗教組織接受政權監管與否，而是對基督教作為一種宗教的整體遏制和打壓，是共產主義者對基督教及其背後的西方價值觀的意識形態之戰，是新時代的共產主義者們的“非基督教運動”，是共產黨政教合一的準宗教與基督教的宗教戰爭。

所以目前的宗教戰爭，還不是如《正》一文所總結的諸種宗教是否接受中共當局直接監管的問題，而是共產主義政教合一的準宗教自誕生以來的對其他宗教的仇視和滅絕原則在新形勢下的爆發。就是這些宗教接受了政權監管，毫無威脅政權政治利益的動機和可能，也由於其教義和宗教實力，隨時會與欲保持宗教和意識形態霸權、精神和思想絕對真理地位的共產黨發生沖突。

總之，正如學者趙楚所言，目前中國的確在上演一場“宗教戰爭”。但這個宗教戰爭，不是中國諸宗教之間的戰爭，而是共產主義政教合一的準宗教與中國其他宗教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的起源，不僅因為這些宗教組織的發展威脅到共產政權的政治穩定，更為深層和根本的原因，卻是這些宗教組織與共產主義者們的宗教沖突：即教義、宗教影響力、宗教感召力之爭。面對這場戰爭，諸宗教捍衛自身宗教權利、並聯手結束中共政教合一的專制獨裁，建立一個政教分立、諸宗教享有平等法律權利和自由的社會，的確是唯一的出路。

附：正在上演的中國宗教戰爭 趙楚

最近在大陸很多地方，都在發生政府強行拆毀基督教禮拜設施的事件。這件事的奇怪之處在於，這些教堂和禮拜場所絕大多數都不是自來就有的，而是近 30 年來陸續建成的，當其逐步建設成型，當地的政府實際上是眼開眼閉，寧願不管的，否則，以大陸現行的管制體制，這些設施根本不可能建設起來。換言之，今日的全國範圍的望十字架而興師的大規模平毀行動是出自新領導班子的意誌，因此，這些設施今日的強行拆毀與教眾的堅定維護對抗就成了觀察中國社會和政治政策的一個指標性對象。

宗教信仰在歷史上引起的社會劇烈沖突是常見的，中世紀基督教歐洲國家與新興的伊斯蘭力量的十字軍戰爭固然早已為人所知，在歐洲自中世紀向近代化民族國

家轉化的過程中，不同基督信仰族群的衝突也是無比慘烈的，30年戰爭才為這一沖突大致劃下句號。無論在歐洲國家內部，還是在伊斯蘭信仰族群的內部，因為宗教派別不同而導致致命對抗可以說至今仍在中東各種熱點問題上餘燼復燃。拋開對宗教和信仰真理的價值討論不談（因為一旦涉及此點，則很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和分歧），宗教及國家相關政策在歷史與社會發展中狀況本身也包含著嚴肅的社會與治理研究意義。

中國大陸近30年來宗教信仰熱情的復興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曾經在1949之後被汗名化和嚴厲制裁的宗教界首先因為改革開放政策的需要而重新贏得正面形象，因為執政黨歷史上三大戰略法寶之一為統一戰線政策，宗教界本是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之一。在中國環境下，宗教又與新疆、寧夏、西藏和青海等地的民族聚居地區政策相關，因此，對宗教壓制採取紓緩的政策，可以說是在這些地區推行管制的前提之一。

就內地地區來說，特別是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及中產階級色彩的人群中，基督教為代表的信仰擴張迅猛，這直接地由於一個原因，那就是，在布爾什維克的信仰代用品徹底失敗之後，社會需要在一個萬花筒般劇烈變動的世界尋找心靈的歸宿，以便依托這種歸宿重建足以令個人安身立命的倫理生活。質言之，基督教信仰的擴張雖有外部交流擴大，外部宗教的傳教努力重新找到接口的原因，但其內生條件卻是主要和首要的。這些年來，對各種家庭教會與非官方控制的信仰團體屢加打壓，但絲毫未能削弱信仰的熱情。這便是明證。

30年來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實際上對中國大陸本身的舊有政治與權力結構也造成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其剛性的結構未變，但實際上，這些結構已經做出了適應時代的巨大修改。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術語本身就表明，當局已經承認，曾支付難以計算的鮮血代價建立布爾什維克信仰政教合一國家已經失敗；而奉行幾達30年的“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戰略則等於宣布，國家的權力雖然仍竭力保持專政的狀態，但已經退縮到經濟生活的領域，因而把曾經盡力把持和包辦的心靈與精神生活領域還給了社會與個人。這也是一心忙於各種發展項目的地方政府對宗教浪潮眼開眼閉的原因。

細心的觀察者會發現，在過去30年大部分時間裏，一般來說，雖然政府理論上反對各種不受官方控制宗教發展，但事實上對此並未採取類似先進的強力對抗政策。就在經濟高速發展，社會各階層經濟利益上升的時期裏，經濟發展，宗教也發展，權力也忙著搞錢，大家相安無事，直到現在。所以，要分析和理解今日的宗教強力打壓政策，必須考慮當前中國社會嚴重和綜合性的社會危機。這種危機首先是

經濟層面的，即國家經濟大局與金融等核心經濟領域的崩潰危機，地方財政與行政能力的崩潰危機，因為各種經濟與發展議題引發的大規模社會對抗，以及由此點燃的全社會性的反抗危機，等等。總之，當地方政府違背歷來做法，不計代價強行對宗教開戰，這背後折射的實際上最高當局對大局的判斷與基本政治意圖。

由於總體經濟資源與效率的枯竭，令當局恐慌的是政權本身的基本安全，特別是在西藏和新疆這樣的宗教與民族可以幾乎合一的地區出現大的問題之後，宗教信仰本身成了可能威脅政權安全的一大因素。最近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不過把這一問題以更突出的方式顯現出來。現實中的宗教信仰，特別是基督教信眾與宗教人士往往都表現出對現實政治及社會問題相當審慎的態度，盡管如此，基督教還是成為本次打擊的優先對象，可見新一輪的宗教打壓與具體的宗教信仰的社會行動並無直接的關係，而是出自其他的考量。

這些考量的最根本要點是：第一，當社會危機前景越來越明晰，基於信仰的人群所體現的群體認同感和召感力是可能轉化為社會抗爭的大規模力量框架的，這在蘇東及南非的轉變中教會的作用裏已有強大證據，在本次各地信眾保護教堂的無聲對峙中也已經可以看出端倪；其二，長期以來，基督教教會為代表的信仰系統拒絕接受官方管控，這使得一切基於權力直接控制的政權當局感到潛在的社會對抗的意誌。這也正是歷來大陸當局所絕對不能容忍的，此前的沖突和摩擦也主要為圍繞此點進行。所謂君子無罪，懷璧其罪，這些潛在的社會與政治能量，正是基督教招致不妥協打壓的基本原因。這一點猶有更深層的社會意義。

選擇打擊十字架，還有個技術性的因素也必須列入考慮，那就是，其他主要宗教都牽涉複雜的民族地區局勢問題，只有基督教信眾主要地生活於內地的現行行政區域內，加之如上所述，他們又在政治上較為低調，因此，他們被選擇為首要的打擊對象可能較少引發複雜的政治對抗局勢。這不代表對其他宗教就不會採取同等的打擊措施。事實上，這些年來，圍繞寺廟和伊斯蘭習俗等問題，西部省區已經陸續採取了許多壓制性的措施。

總之，應對現實社會總危機的思路是既定的，既然不能在政治上徹底拋棄過去，以憲政和民主構架重建政策思維與體系，由此建設宗教與社會寬容的新體制，則回到過去，重建一元化和一體化的新版本斯大林體制就在邏輯上成了唯一選項和不得不做的選擇。在此過程中，拒絕接受官方直接監管的宗教信仰活動與現實的曖昧和平狀態也就自然走到了其終點。所以，從目前不宣而戰的新宗教戰爭中，我們看到，信眾與當局的對抗與其說是信仰與世俗世界的對抗，倒不如更準確地說，實質上是兩種生活方式的根本抉擇——通過鬥爭選擇一個可以自由從事信仰活動、也容忍他

人有不同信仰方式、把心靈與精神生活還給人們自己的世界，還是就此告別自由的信仰，把身家性命像 1949 之後的 30 年那樣重新托付給宗教局與走馬燈一樣的書記市長。

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的中國 21 世紀版宗教戰爭，也註定會像歷史上的那些宗教沖突一樣，除非自由信仰的一方獲勝，社會因為基礎政治條件的變化而能在制度上支持宗教的多元和寬容，否則永無妥協之可能。以此我們也可以初步預測這一沖突的未來走勢，那就是，當局會更加嚴厲和蠻橫，而本來一貫政治上低調的基督徒們必然會滋生更廣泛與自覺的現實政治關切。這與當初在東歐和南非發生的情況也是一樣的，並沒什麼中國特色或宗教特色。

六、中國正在開展新的“非基督教運動”

眾所周知，1922 年到 1927 年的以上海為中心、在全中國開展的“非基督教運動”是一次全國範圍內反對、攻擊基督教及其文化的社會運動，這次運動粗魯地遏制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野蠻地破壞了基督教文明及其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傳播，為共產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占據知識分子和青年精英頭腦打下了厚實的宗教和思想基礎，也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拓展、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和奪取政權奠定了意識形態根基。

正如近年的史料所披露的，非基督教運動完全是蘇俄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一手策劃、組織的，根本不是人們以為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受進化論和科學觀念影響後自發的反宗教運動。共產政權要想在中國立足，意識形態上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鏟除基督教對國人的影響。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是共產主義染指中國、並要占據中國的第一步。1949 年共產政權在中國的建立與 1920 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之間，其實有著內在的聯系。中共建政後，對基督教鎮壓、閹割也一直不斷，登峰造極是在 1960 年代的文革期間，宣布徹底消滅宗教，將基督教送入歷史博物館。改革開放後，基督教在官方控制、壓制但不徹底消滅的政策下開始迅猛發展起來。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在“非基督教運動”將近百年之後的今天，中共政權似乎在全國範圍內正在發動一場新的“非基督教運動”。自 2014 年以來，中共當局以浙江尤其是溫州地區為試點，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的打壓基督教運動：拆三自會教堂、拆十字架、基督教堂被改名、家庭教會聚會點被關閉，成員被逮捕拘留，公務員被調查信仰狀況、共產黨員簽署不信教承諾書、網上禁止買賣基督教用品、網絡五毛攻擊基督教名人、禦用文人累次提基督教對國家安全的危害。。。。。。對比 1920 年代的反基督教運動，研究和反思當下迫害現象背後的根源和動機，不能不得出中共當局正在開展一場類似 1920 年代“非基督教運動”的新運動的結論。

首先，我們看到這次運動和 1920 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運動一樣，是共產主義者們有意發動的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的運動。

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運動在臺面上的人物形形色色，有學者、有學生、有販夫走卒，還有李石曾、陳獨秀、李大釗、汪精衛、朱執信、蔡元培、戴季陶、吳稚暉等名人參與，轟轟烈烈、異常熱鬧。但實際上背後發動運動的，卻是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香港基督教學者邢福增主編、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於2011年出版的《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一書中，學者張化根據《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一書中共產國際代表利金的報告寫到：“1922年5月20日，共產國際在華全權代表利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報告說：整個非基督教運動……的基本力量確實是我們的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組成的專門委員會，來對這場運動進行實際領導，它制定了詳細的運動計劃……所有運動都是根據遠東書記處總的指示和我的指示共同開展的”（見《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書23-24頁）

而在近代史學者陶飛亞的論文《共產國際代表與中國非基督教運動》中直接指出：爆發於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非基督教運動，是在俄共（布）與共產國際遠東局、青年國際的直接指導下，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並領導，也包括國民黨等組織成員參與的政治鬥爭。俄共及共產國際將不斷發展的基督教及其事業，以及在中國青年中滋長的親美思想，視為中國人走俄國革命道路的障礙。因此，發動非基督教運動旨在打擊西方在華宗教勢力，削弱西方影響，喚起中國青年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在青年中擴大共產黨的影響。他們通過反對基督教教會實現反帝目標的策略在實踐中獲得一定成效。

可見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是被有意煽動起來、反基督教及英美國家普世價值、為共產主義培養幹部和奪權鋪路的運動。1922年3月9日，運動中由中共扶持在上海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組織，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京大學正式成立，這兩個組織成為非基督教運動第一階段的指揮樞紐中心。1924年8月，“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共產黨員唐公憲擔任執行主席。這個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策動了聖誕節期間的“非基督教周”活動，發動了危害甚烈的奪回教會學校教育權運動。以上足見19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的組織性、目的性和計劃性。

相比百年前的反基督教運動，今次的運動，也完全是共產黨政權尤其是其中的極左勢力發動的，預謀性、目的性和計劃性雖隱藏極深，但也露出眾多馬腳。

中共極左刊物《環球視野》總第430期發表論文《基督教對中華民族安全的巨大危害性》，這篇劍拔弩張的論文視基督教為中華民族和中共政權的敵人，其中寫道：要從戰略上高度重視基督教擴張對我國宗教事務、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潛在

影響；要以適當方式開展基督教批判；要發揮民間信仰在抵禦境外宗教勢力滲透中的積極作用。。。。。

2013 年底，中共軍方拍攝《較量無聲》，在極左思維的軍方眼裏，基督教是美國在 5 條戰線上顛覆中國的重頭戲，而將近 1 億的基督徒成為顛覆中共的敵對勢力，中共極左派如臨大敵，大有徹底剿滅這 1 億基督徒的念頭。

2014 年 5 月 6 日，中國發布了首部國家安全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其中指出“宗教滲透威脅社會主義信仰認同”“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宗教滲透的方式更加多樣、範圍更加廣泛、手段更加隱蔽，公開與秘密並舉，具有很強的煽動性和欺騙性”。

2014 年 4 月 25 日，研究中國宗教問題的知名學者楊鳳崗在接受外媒採訪時說，到 2025 年時中國的基督教新教信眾有可能達到 1.6 億人左右，到 2030 年時中國基督教徒的總數將超過 2.47 億人，成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國家。楊教授的言論遭到中國政府第一時間的回應，前宗教局局長葉小文在接受中國《環球時報》採訪時說，楊鳳崗的說法是不科學的，他預測的數字顯然存在誇大；預測中國未來會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完全沒有意義。

從以上當局的言論可以看出近一、二年，由於基督教的迅猛發展，也由於中共對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霸權的重視，天生就與基督教敵對的共產主義者們，開始將矛頭對準基督教。遏制和打壓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成為習近平為首的新領導之共識。

在這樣的預謀下，浙江及溫州的基督教（無論是家庭教會還是掛在三自下的有教堂教會）似乎已經成為全國打壓基督教的試點。浙江各地近年來基督教發展非常迅速、一間間教堂拔地而起，而被譽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溫州，也是中國基督教最為復興和發展最為迅速的排頭兵。打擊浙江及溫州，就可起到強烈的“斬首”效應。而打壓的方式，不是 1920 年代中共在野時那樣直接和暴露，而是以拆違和借助“三改一拆”運動，通過鏟除信仰的物理空間、破壞教會教產權利，消滅基督教重要標誌十字架的方式，達到對浙江和全中國方興未艾的基督教的控制、打壓和整肅。

在“三改一拆”運動進行中，浙江在各城市下發眾多有關拆移宗教建築的文件，將拆除違章教堂和“基督教私設聚會點”建築列為“七必拆”首位，也有移除、整改十字架（熄滅十字架燈、掩蓋十字架等）的眾多指令。

2014 年 3 月 28 日上午，浙江省、縣領導進行浙江省推進“三改一拆”涉及宗

教違法建築處置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根據披露的會議記錄，裏面提到要“糾正宗教發展過快、場所過多、活動過熱”現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後的政治問題、抵禦意識形態的滲透”；“掌控意識形態主導權”“要培養獅子型領導”。這次會議非常重要，終於向各級幹部坦白講明了“三改一拆”背後的真實目的。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央、浙江、溫州等當局各級組織有目的、有計劃地通過“三改一拆”的名義，行打壓基督教之實；籍拆除違章建築的名義，實施打壓基督教影響力、控制基督教發展的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運動。可見，從目的性、計劃性、預謀性等方面看，今次打壓基督教的運動，的確與 1920 年代中共發動的非基督教運動非常相似。

另一方面，從 2014 年開始的這次打壓基督教運動與 1920 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相似性還在於它們都是直接、全面地針對基督教及其文化而來，反基督教、非基督教已經不分三自會、家庭教會了，而且把目標直接定為基督教的標誌——十字架。

1920 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中，在中國共產黨及其共青團的煽動下，上海學生成立的“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稱基督教充當各國資本家經濟掠奪的先鋒和走狗，提出“現代基督教及教會，是我們的死敵，非決一死戰不可”！李石曾、陳獨秀、李大釗、汪精衛、蔡元培、戴季陶等為數 77 人的學者名流發表宣言通電全國，指出：“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便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長沙學生疾呼“福音書多印一章，中國人多死一個，禮拜堂多建一座，無產階級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宗教末日到了”。接著開展收回教會學校教育權運動，不少教堂和教會學校被搗毀設施、宣教士被圍攻。在國共合作的北伐軍所向披靡的個別地方出現了強占教堂、趕走牧師，教堂、教會學校及醫院成為駐軍之所的現象。1922 年來華傳教士達 8,300 人，非基運動後，1928 年降至 3,150 人。

與非基督教運動類似，2014 年開始的這場運動，很明顯的一個特點，就是對十字架過意不去。在浙江各地，無論家庭教會還是三自教會的十字架，很多已經被拆除，沒有被拆除的也被遮蓋或者熄燈。估計已經有近百個十字架被所謂整改。十字架是基督教唯一也是最重要的外標誌，專門針對十字架的迫害，在義和團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才似乎發生過，此暴行再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這次運動就是以打壓迫害基督教為目的。

2014 年迫害基督教運動另外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迫害對象不分三自會和家庭教會，只要是基督教就打壓；不管你在體制內還是在體制外，只要是基督徒就要被整肅。淘寶網上基督教書籍被停止交易，三自會的聖經據說暫停印刷，上海、浙江

一些公職人員正在被進行宗教信仰調查，所有共產黨員被要求填寫不信教承諾書。該承諾書表示黨員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要在信仰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有其他宗教信仰。經過調查後，可能對公職人員基督徒有更大規模的迫害。

根據對華援助新聞網《浙江、溫州教堂及十字架教案涉拆清單》，截至 5 月 18 日，浙江、溫州教堂接到拆除通知，教堂附屬建築、十字架被拆或被覆蓋，初步統計有六十多處（還有很多無法統計）。這裏面包括三江堂在內的大部分教堂是三自會名下的教堂及十字架。

為什麼三自會名下的教堂也要被打壓呢？眾所周知，三自會是政府教會、體制內教會，政府一向扶持、袒護三自會，甚至聯手三自會打壓體制外的家庭教會。但這次政府首先大開殺戒的卻是三自會，這讓人們震驚和不解。其實三自會盡管是體制內教會，但也保留大量基督教元素，尤其是基層三自會和三自教堂裏面的信眾，不乏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要鎮壓基督教，也必然先從顯眼的三自會開始。這也揭示了 2014 年開始的打壓基督教運動，已經不再是體制內、體制外的問題了，問題已經是共產主義官方意識形態與整個基督教的矛盾問題。打壓家庭教會，原因是家庭教會是非法社團；但打壓三自會，的確是沖著基督教而來的。這個狀況有點象文化大革命中消滅基督教時期，當時不僅三自會，連宗教局、統戰部都被消滅殆盡了。

2014 年的這次反基督教運動，也的確引起了三自會內部的震動和反抗，三自會內部的有識之士也看明白這次是沖著整個基督教而來的，再不奮起抵抗，可能三自會、整個統戰系統都沒有了。全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金陵神學院副院長陳逸魯牧師在強拆開始之初，就寫文章《從現代管理看浙江政府強拆三江十字架的思考》指斥浙江政府“采用急於求成、強硬解決的手段，不符合現代管理的原則和智慧，勢必造成內傷，有損黨政形象，有損黨群感情，有損社會穩定，得不償失，是個失敗的施政例子”。溫州鹿城區兩會也發布宣言若強拆繼續，退出三自。

更加罕見的是，5 月 12 日，中國官辦教會總會——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對最近發生的強拆教堂和十字架事件發布聲明，在《對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涉及教堂、十字架等問題的答復》一文中，兩會對並不違章的十字架的拆移表達了不滿：“近日，浙江省各地又出現了教堂的十字架陸續被拆除或移位的情況，令人不安。眾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標誌之一，凝聚著信徒樸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沒有超越當初建造時的設計標準、也不存在安全隱患而被隨意地強行拆除或移位，我們認為這樣做是極不妥當的，應當立即停止！”兩會對強拆十字架的不滿反應出體制內宗教部門的分裂，表面上是全國基督教機構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實際是中央掌管基督教部門內部的分裂。是要維護自己群眾基礎和自身存在價值的三自會成員，

與徹底反基督教的官員的矛盾和分裂。基督教兩會如果這次不為信眾說話，就會失去信眾基礎，而且兩會已經感到事態這樣發展下去，似乎要回到文革——把兩會、統戰部都給端了——自身難保，這也是統戰部下三自會體系最不願看到的。

可見，從三自會內部罕見的反抗這次打壓基督教運動，直接說明了這次運動不分體制內外、專門反基督教、非基督教的本質。這點與 1920 年代的非基督運動非常相似。

當然，由於時代和共產黨執政掌權的階段不同，當今的這場非基督教運動與 1920 年代的也有很多不同。如眼下當局沒有調動媒體進行如同對待法輪功式的輿論轟炸、還沒有動員禦用文人和民眾進行大規模的基督教批判，除了政權機關外，也沒有組織其他社會組織、發動大學生、學者名流進行反基督教活動。現在沒有不等於將來沒有，發動和組織 1920 年和今天的反基督教運動的政黨是同一個政黨，它隨時有可能將眼下的反基督教運動在地域和深度廣度上擴大。

當下，從浙江溫州開始的以拆移十字架、拆毀教堂、關閉聚會點、抓捕教會帶領人等為特征的非基督教運動，正在全國蔓延。基督徒一定要奮起抗爭，再不抗爭，結局就是默默地等死。正如 1920 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由於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清黨，掃除共產黨及激進派而偃旗息鼓一樣，對付眼前的這場非基督教運動，也要中國基督徒及民眾拿出非暴力抗爭的勇氣，與邪惡力量不惜一戰，如此才能制止中共對基督教愈來愈嚴重的打壓、迫害和侮辱。願上帝制止惡魔在中國的暴行，願上帝的公義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七、基督教中國化的實質是非基督教化

2014年8月12日23點多，浙江杭州百年教堂鼓樓堂十字架被當局強暴拆除。這是中國基督教兩會召開紀念三自60周年及基督教中國化大會後被拆除的首座教堂十字架，這說明大會確定的基督教政策是認同拆十字架運動的，宗教當局（統戰部、宗教局）和官辦教會高層（三自會、基督教協會高層）對浙江省拆十字架的既定政策不僅會繼續支持下去，而且讓其成為基督教中國化戰略的一部分。

近年來，中國宗教當局有意組織多次研討會、高調宣傳“基督教中國化”和建設“中國特色教堂”主題，欲把這些主題作為今後管制基督教的大政方針。基督教中國化其實是三自會自發起以來自治、自養、自傳等所謂的“本色化”“處境化”主題的延續，這些主題的前提就是認為基督教是“洋教”“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要使基督教適合中國人，就必須擺脫外國差會、教會對中國教會的影響、擺脫西方文化對中國教會及信徒的影響，使基督教不是改造、征服中國社會和文化，而是徹底地適應和服務於中國文化與社會。

儘管除了文革時“促使宗教消亡”的政策外，當局一直強調諸宗教要與中國特色、政治環境相一致，絕不能唱反調。但相對於江澤民時代（1993年）提出的“基督教要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宗教政策，“基督教中國化”的提法更加反映出國家意誌的強勢。“相適應”是對基督教等宗教還算尊重的提法，使基督教能夠在確定自身本質的情況下，與中國政權和文化和諧相處；但“中國化”就是以中國政權和文化為主，以中國（或中共）的標準來改造、修理基督教，使其不得與政權和中國文化產生絲毫沖突，任何有礙中國化的基督教自身特色，都會被當做“洋教傳統”“西方特色”而鏟除，基督教自身本質的流失也是“中國化”的應有之義。

顯然，“基督教中國化”相比於“與中國社會相適應”，更加強硬、保守和左傾；“基督教中國化”雖然比“消滅基督教”的文革式政策和口號稍好一些，但其實已經在朝“文革”時“促使宗教消亡”的方向邁進，這也顯示了習近平等紅二代的愚拙和強勢。基督教中國化的過程其實也就是基督教逐漸喪失其內在本質和獨有特色的過程。

我們可以從最近幾年中共宗教學者和官員對基督教中國化的有關論述中印證這個判斷。被基督教協會總幹事關保平推薦的禦用學者李平晔在《基督教中國化之淺見》一文中寫到：“基督教的中國化，除了本地化、本色化之外，還有處境化的問題。所謂處境化，就是要把握和回應時代的問題，與所處的社會和時代相適應。。。。。。基督教必須通過本色化、處境化來洗清自己的殖民主義痕跡、帝國主義色彩，還基督教本來面貌。這是基督教被中國人民心理認同的前提。。。。。。基督教中國化是可能而且必須的，但中國社會基督化、中國文化福音化則是既無可能，也無必要。‘中華歸主’也只是一個夢想”。

在紀念三自會 60 周年大會前，宗教當局就召開了一個“基督教中國化”座談。其中指出：“對中國教會而言，基督教中國化既是基督教自身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在新的歷史時期社會對基督教的處境化要求。它能提升基督教對所處的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認同和適應，同時反過來又能讓社會增加對一個外來宗教的理解和接納，有利於社會和諧以及在‘共圓中國夢’中做出基督教的貢獻，也有利於基督教更好地為主做見證”。

8 月初三自會 60 周年及基督教中國化大會結束後，中國基督教兩會網站 (<http://www.ccctspm.org>) 以《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主要論點摘錄》一文闡述了主要觀點。其中總幹事關保平牧師指出：中國教會長久以來一直處於“半自我、半寄生”的狀態，並未完全擺脫洋教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基督教要中國化，就要改變這一點，要完善自我意識，成為一個獨立存在的主體，要改變洋教的存在方式，從改造社會到服務社會。

北京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張誌剛教授指出：“基督教中國化”可為應對重大現實問題做出積極貢獻。若把基督教建設成富有中國倫理特色的道德型、奉獻型宗教，這既可順應世界宗教的發展趨向，又能適應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唐曉峰博士：基督教中國化有其必要性、緊迫性，這種必要性並非來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傳播，而是其如何在社會中更合理、和諧地存在，更良性地發展，以及更適當地融入中國文化、中華民族。

廣州市基督教協會總幹事吳忠武牧師：在社會政治層面，基督教要適應中國特色的政教關係，樹立正確的民族國家意識，在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上明確自己的立場。在思想文化層面，基督教要適應符合社會要求的文化關係模式。

金陵協和神學院文革牧師：丁主教冷靜地分析了基督教的社會維度，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國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結構性地位。丁主教提出以“服務社會”為核心的

神學理念是基督教中國化的核心理念。

國家宗教局某司副司長劉金光：倡導構建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和諧神學是基督教中國化的關鍵所在。上海市浦東新區基督教兩會辦公室副主任許磊：“中國夢”表述作為當代社會發展特征，可作為基督教中國化思考的切入點。

從以上這些代表性的言論可以看出，被當局高調推出的“基督教中國化”的內容，實質是強勢地用中共的“中國夢”“和諧社會”等馬列主義的後嗣理論、用中國傳統的儒道佛來解構、改造和修理基督教，從文化上而言，要徹底淡化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特色、淡化基督教的宗教性，而要改造成具東方文化特色、倫理道德性、社會服務性的某種倫理社會團體。從政治上而言，繼續服服帖帖地為中共政權服務、共建“和諧社會”和“中國夢”，絲毫不能有以西方文化及價值觀來改造社會和文化的野心，絕對不能與中共各級政權及其意識形態產生絲毫沖突。

毋庸置疑，這樣的中國化實際上是在消解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摒除基督教的社會影響力和文化改造力，一言以蔽之，基督教中國化就是非基督教化，是在閹割基督教、變相消滅基督教。

正如華人牧師龔天明在其文章《基督教需要‘中國化’嗎？》一文中指出的：“我們絕不容許人隨便寫幾篇文章，向異教徒出賣基督教，還美其名曰‘基督教中國化’，我們不願看到中國基督教變成了四不像，變成似儒似佛似道，混而不明。我們要效法使徒保羅在異教重重包圍的惡劣環境中求發展，努力傳揚別人沒有、我們才有的主耶穌死在十字架，又再復活，要救萬民的福音”。

也如著名基督教學者安希孟在《基督教“中國化”隨想》中寫到的：基督教生於地中海開放商業文化背景中，實同自我封閉、自視甚高、自以為是、畫地為牢、閉門稱霸的小農意識迥不相侔。基督教“中國化”與中國的“世界化”是一個兩難選擇。我們不幸把“中國特色”硬套在“基督教神學與教會”上，似乎封閉僵化、拒絕外部輿論乃“民族化”的題中之義。。。。。。“本土化”、“處境化”、“中國化”的神學強調從“實際國情”出發，其實包含著對基督教真正信仰的曲解和篡改，包含著對現實的不恰當的妥協、默許與遷就，從根本上把信仰與非信仰，宗教與非宗教混淆起來。“國情”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依據。基督教並不因國情而改變其信仰真諦。

約翰福音 1:5：“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自習近平等新中國領導層上臺後，國際關係、對內施政都更趨於強硬，對基督教的“中國化”政策就是這種強硬和頑固的凸顯。基督教中國化是他們一上臺就制定的政策，而這次官方基督

教兩會的大會，像中共的其他大會一樣，只不過是這個中央既定政策的宣傳、推廣而已。正如今年以來的強拆十字架事件並沒有終止的跡象一樣，基督教中國化會被他們一直推行到底、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落淚。而強拆十字架，實際上就是基督教中國化政策的一部分，是在為建設中國特色教堂投石問路、掃清路障。至於基督教中國化與“建設中國特色教堂”的更詳細分析，需要另文闡述。切望讀者繼續為中國基督教會及信徒禱告、施以援手。

八、捍衛十架—贊溫州基督徒的非暴力抗爭

使徒行傳 5：29：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次浙江（尤其是溫州）全境強拆教堂及十字架的迫害基督教颶風中，溫州基督徒不懼強暴、不順從瀆神的凱撒、堅決捍衛信仰權利，進行了一系列符合聖經的非暴力抗爭，雖然爭戰還在繼續，但卻已經在中國譜寫了一曲公義、壯美的基督徒抗爭凱歌，值得海內外華人和人權人士們聲援與效法。

從今年年初開始，浙江省就出現眾多教堂被勒令拆除、十字架被勒令拆移現象。由於遭到海內外基督徒網絡上下一致的反對，拆移行動一度中斷。但從4月份開始，浙江尤其是溫州數十個教堂均收到通知，要求配合“三改一拆”運動，自行拆除違章建築、整改十字架。尤其是溫州市永嘉縣甌北鎮的三江教堂及其屋頂十字架，因氣勢宏偉，被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指“太耀眼”而成為違章建築，4月3日，地方當局下達通知稱，該教堂屬違法建築，欲強行拆除。面對這一系列的政府逼迫和威脅，溫州基督徒沒有膽怯，反而採取一系列自發的抗爭行動，在海內外形成了巨大影響，也迫使當局作出了一些讓步。

抗爭行動主要分兩個方面，一是在網絡、海內外媒體發布公告書、聯名信等文字形式的多種輿論傳播和網絡信息交流；二是地面上的、在要被拆除的教堂裏面的聚會、晝夜守護行動。

4月初，一些收到地方政府通知要求拆除違章建築的教堂發布《長執會告知》，積極應對政府的無理強拆。如溫州基督教會瑞安市光明堂長執會發布《光明堂長執會告知》，其中指出：“得知位於十八家工業區的企業均未收到拆除通知，但此區域的幾間教堂都有收到”“但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本著公正、合理的態度來處理，堅決不同意選擇性執法，就各處教會要求被拆十字架的事件來看，若是出於針對基督教信仰迫害的，或是宗教歧視的，我們將堅決捍衛自己的信仰”。《長執會告知》形式也被很多教會採納，向政府和全社會宣告教會的立場。

4月初，溫州各教會被勒令要拆除教堂和十字架時，一群自發組織起來的溫州牧者、基督徒，聯絡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溫州基督徒，在第一時間發布了《十字架，

十字架——就浙江教堂被強拆事件致主內全球基督徒肢體代禱信》。該代禱信情詞迫切，指出“這不是一場關於物質的爭執，而是屬靈的爭戰。文革逼迫使得溫州教會教產全面被封或被毀，然而卻迎來溫州基督徒的空前復興。我們有理由相信：那只是一個序幕！主恩浩瀚！今天將進入另一個階段！經上說，‘若有人毀壞這殿，神必要毀壞那人’。這殿就是聖徒團契。這是我們的立場！”。此信經推特、微信、微博、網站等社交媒體傳播海內外，致使海外媒體、各華人教會及信徒開始高度關注浙江強拆事件。

4月6日，溫州基督徒在網上發布《溫州基督徒關於政府“強拆十字架及教堂”的聯合聲明》並征集簽名，該《聯合聲明》指出：“我們相信聖徒相通，眾信徒在耶穌基督裏連合一體。保護十字架和教堂建築免於拆除是所有基督教不同宗派、不同傳統、不同地區教會共同的責任和義務”。此聲明發布後，全世界各地溫州基督徒和非溫州基督徒紛紛簽名，簽署者眾多。4月8日，從公布的首批簽署名單看，簽署者已經達1000多人，以教會牧師、長老等教牧為主。溫州鹿城教會、蒼南教會、永強教會、甌海教會、永嘉教會、樂清教會、瑞安教會、平陽教會、洞頭教會的大批牧者積極簽名，溫州散居在山西、山東、安徽、雲南、青海、新疆等全中國各地的教會牧者也簽名支持，溫州散居在全世界的意大利華人教會、法國華人教會、西班牙馬德里教會、匈牙利布達佩斯教會、葡萄牙華人教會、瑞士日內瓦法語福音復興教會、美國華人教會等積極參與簽名。非溫州人的海內外華人教會也積極參與簽名。

與此同時，溫州基督徒發起“十萬基督徒簽名護教”《聯合聲明》簽名征集活動。在動員令中寫到：“眾同工已起草並發布了一份聲明，首輪千名教牧簽名已完成。為了加重聲明力度，呼籲政府終止這一不正當的、針對基督教的拆十字架和教堂建築行動。現開始征集第二輪“十萬基督徒簽名”活動。懇請各大牧區同工全力推廣和落實征集簽名活動。鼓勵教會領袖當眾宣讀文本聲明，通報相關信息，在主日或其他聚會活動中，將此事項列入聚會程序，代禱事項中。邀請全會眾簽署”。十萬基督徒簽名護教行動正在展開中，相信它的實現會給肆意妄為的當局更大的壓力。

浙江強拆不僅涉及三自會名下的教堂，眾多家庭教會也被涉及。4月中，溫州家庭教會發布《溫州市各教會三日一餐禁食禱告》函，指出在4月21日到23日，溫州市各教會三日一餐為“拆十字架及教堂”事件而禁食禱告，本周的星期一至星期三，三天中每天有一餐是禁食，（早、中、晚任何一餐都可），並希望弟兄姐妹切切為教會及當前的環境禱告，盼望眾肢體行動起來，互相轉告。“求神的靈感動政

府，使政教分清，教產歸還教會”。 “為浙江省關於拆十字架、拆教堂禱告，求神除去抵擋真理的靈，保衛他的教會”。聯合就是力量，這次家庭教會和三自會名下的註冊教會聯手抗強拆，展現了“文革”以後少有的溫州教會合一的圖景和力量，令人鼓舞。

與此同時，溫州三自會名下的眾多教會，以退出三自體系的倡議，來給宗教當局和行政當局給予警示，糾正他們的非法行徑。一位溫州基督教協會委員在名為《致溫州牧者的諫言》倡議書中寫到如果強拆進行，三自會名下教會應該立即啟動退出兩會。網上也出現《是時候說再見了：退出基督教兩會倡議書》，此倡議書指出：“是時候了，與無力捍衛基督信仰、保護廣大信眾權益的官僚組織斷絕關係”。

除了網上發布這些聲明、倡議書、公告函、代禱信等文字外，網絡也起到了組織聯絡、呼籲信徒前往將被拆教堂聚會的功能。網絡上也不斷出現文章鼓勵信徒積極地參與抗爭，排除了一些錯誤觀念、辨明了“有形十架”和“無形十架”、“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等重大關係，為溫州基督徒們捍衛信仰的行動添加了力量。網絡傳播也帶來眾多世界級媒體對浙江拆移十字架事件的報道和關注。

這次溫州基督徒的抗爭中，比網絡更顯重要的是地面的聚會和教堂裏的守望。一次次政府預定的強拆日子，都因基督徒在教堂裏的全體聚集而不斷取消；一次次當局的強拆圖謀，都在數千名基督徒的禱告、贊美聲中化為烏有。其中溫州三江堂基督徒非暴力的“保衛戰”令全世界矚目。

4月3日，地方當局下達通知稱三江堂屬違法建築，要求信徒疏散，準備強拆。一時整個溫州各教會基督徒紛紛前往三江堂，在教堂前面、裏面跪著禱告、唱贊美詩歌，信徒越來越多，誓與教堂共存亡。4月4日一整天，溫州將近3000名基督徒前往三江教堂，在教堂內外禱告、贊美上帝。而先前到達三江堂現場的各教會領袖也召開緊急會議，達成以下共識：

一、十字架不拆、不改。

二、主堂不許拆。

三、第一、第二點任何教會無權妥協，副堂根據教會特殊情況酌情處理。

四、任何教會第一、二點被觸碰，所有教會一起出來。

五、不設立組織，由信徒自發來處理此事，通過微信群發聚集，任何人都是組織者。

六、若有溫州地區教堂或十字架被拆，全體教會到市政府前聚會！

由於信徒們的堅定抗爭態度，由於越來越多的基督徒來到三江堂，由於海內外媒體的強烈關注，當時政府有些妥協，揚言十字架和主堂不拆，後面附屬樓要拆 2 層。但自 4 月 5 日起，各種跡象表明當局一直還試圖拆三江堂。因此在長達二、三周的時間裏，信徒們白天在教堂裏聚會、晚上住在教堂裏，要與教堂共存亡。

4 月 21 日下午，當局對三江教堂附近實施交通管制，在交通要道距教堂一公裏處設卡，不準車輛進入。教堂附近有防爆警察、保安隨時待命。多輛工程作業車、大巴警車停靠在旁，便衣警察分散在人群中。但溫州信徒 1000 多人來到三江堂聲援，信徒們打著傘，穿著雨衣，自帶幹糧。教堂內教徒們進行敬拜禱告會，戶外唱詩、禱告。很多信徒們坐在三江堂的大門口形成人牆，阻擋強拆人員進入。22 日，有約 3000 人來到三江教堂聲援，他們唱讚美詩、講道，互相鼓勵。氣勢磅礴、顯示出愛與公義的強大。當局看此局勢，暫不敢強拆。

目前，三江堂每天每夜的聚會仍在繼續，眾多牧者登臺講道、信徒死守教堂。溫州信徒也在網上發布“新八榮八恥”：

“以高舉十架為榮，以整改十架為恥。以合力護教為榮，以門戶之見為恥。以三江講道為榮，以紙上談神為恥。以板凳守夜為榮，以觀望低調為恥。以八方支援為榮，以搪塞借口為恥。以平凡信徒為榮，以無為領導為恥。以轉發信息為榮，以視而不見為恥。以去三江為榮，以待家中為恥”。

除三江堂外，樂清前潘教堂也抗爭成功。4 月 11 日，溫州樂清前潘教會接到拆除教堂通知，政府強拆人員連續幾天前來教堂尋機強拆，但前潘教會信徒及附近教會信徒連續聚會 10 天左右，使當局無機可乘。會眾晝夜聚會、敬拜讚美，成為最有效的阻止強拆方法。

這這些聚會抗爭中，基督徒們約定“非暴力、多唱詩、常禱告”的原則，使故意生事的當局便衣、特務束手無策。儘管當局要強拆教堂的頑固目的依然沒變，儘管參與抗爭和維權的眾多基督徒被威脅查賬、被威脅開除公職、被公安喝茶、傳喚甚至行政拘留、刑事拘留，但溫州信徒的鬥誌依然不減，因為神與他們同在，神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神給他們力量戰勝一切的仇敵。“順服神、不順服人是應當的”，相信溫州基督徒們的非暴力抗爭，因得著屬天的幫助，必然得勝。

溫州基督徒的抗爭也引來不少基督徒的非議，基督徒僅僅禱告就行了，用得著採取行動為公義抗爭嗎？其實，神創造人類作為神的代理和管家，人必須付諸行動、在全地彰顯神的屬性並履行神的使命。禱告也是行動，但除了禱告，神的使命更需要有眾多人類行動來回應。神是愛，神也是公義。真正的愛是要使不義改變為義。

愛要有力量有行動。一個基督徒必須積極行動起來，捍衛自己的信仰權利。雅各書 2：17：“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基督教的英文是 Protestant（也被稱為新教、抗羅宗），就是抗議的意思，基督教本身就是反抗政教合一的天主教專制的產物。基督徒對黑暗權勢的抗爭和對社會的關懷精神是不能丟失的，否則就很難與最初的宗教改革時期的基督徒精神來相稱。

在基督徒的非暴力抗爭方面，加拿大和臺灣的基督長老教會，走在中國教會的前面。他們開發的城鄉宣教運動(URM——Urban Rural Mission)，以一種體驗式培訓的方式訓練基督徒成為社會事件中的抗爭者。URM 的精神就是強調基督徒的愛要有公義、有行動、有力量。身受逼迫的基督徒必須積極行動起來，以非暴力為手段組織人民，爭取權利。URM 的成員成為臺灣大多數街頭抗議運動的組織者、參與者，在推進臺灣的人權、民主事業過程中，正在做著積極的貢獻。URM 提出了非暴力抗爭的六大精神，對深受迫害的中國基督徒和基督教會非常有益：

1. 對抗邪惡的勇氣：沒有這個勇氣和膽量就沒必要成為社會活動組織者。
2. 為義受苦的勇氣：要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
3. 創造性的少數：必須有一批人要先於大眾站出來，主動組織、策劃。
4. 相互成為資源的結盟：社會活動必須是互為肢體、凡事團隊的精神。
5. 愛與非暴力
6. 爭取被壓者的尊嚴。

通過這次浙江抗拆除教堂及十字架的基督徒行動，我們欣喜地看到，中國基督徒非暴力抗爭的勇氣讓世人震驚、而非暴力抗爭的智慧和方法也層出不窮，中國基督徒們的非暴力抗爭逐漸成熟起來，它必然為維護中國公民的信仰權利、為促進中國人權運動做出巨大的貢獻。一切正如聖經所言，阿摩司書 5:24：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

九、移除十字架是阻止福音的公開化

——兼議十字架的實體性和屬靈性

《聖經》馬太福音：5：14—16：“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鬥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鑄造山上之城、謀求福音的公開化、社會化和主流化，是改革開放後從地下走到地上、從邊緣進入中心、從末流匯入主流的中國基督徒的共同異象。而這一異像，必然與無神論共產主義政權的意識形態及權力結構產生巨大的沖突。

自 2014 年年初以來，以浙江（尤其是溫州）為代表，當局以“三改一拆”、清理違章建築的名義，開始了大規模的拆除教堂、移除十字架的行動。溫州三江堂等數十個教堂，都收到地方政府的通知，限期拆除教堂、移除和整改十字架。浙江全境的三自教堂和各家庭教會都人人自危、四面楚歌。在這些行動中，我們發現當局對十字架特別敏感，有多個政府文件顯示，地方政府對待所謂的違章教堂不僅規定要拆教堂，而且特別提到要拆除十字架；對沒有違章的教堂，對教堂頂部的十字架也被勒令移除、整改，決不能放在教堂頂部，要摘除下來後放在教堂裏面或教堂圍牆下。於是溫州出現不少沒有了十字架的教堂和十字架被戴“黑頭套”的蒙面教堂。當局也以節能的名義，強令所有教堂的十字架在夜間必須關燈。例如浙江最有影響的杭州崇一堂，原本夜間明亮的十字架今年已被熄燈。

無神論政權的如此行動，表面被人們揣測為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的個人行為，他巡視時發現浙江教堂林立、十字架處處高聳，於是說：這是共產黨的天下還是基督教的天下。實質上，這是共產黨中央對日益壯大的中國基督教的新一輪逼迫行動。中國基督教從“文革大革命”的沈睡、隱蔽中蘇醒後，一日千裏，經過短短 30 多年的發展，人數已經接近一億，基督徒在文化、商業、慈善關懷、維權公義等社會諸領域正發揮著積極的影響力，尤其是以北京守望教會為代表的家庭教會，以“山上之城”為異像，謀求教會的公開化、合法化和福音對主流社會的更大影響力。對

這一現況寢食不安的無神論政權，出於維護自己意識形態霸權的考慮，必然地要對基督教日益壯大和公開的發展趨勢做出回應。

徹底鏟除基督教 發動如鎮壓法輪功一樣的運動，當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當局肯定會遏制基督教的發展，阻礙福音公開化的進程。鏟除基督教是不可能的，但轄制它，使它隱蔽化，控制在一定限度內，不對主流社會產生影響，這一點似乎可以做到。神州大地上林立的教堂、戶外高聳的十字架，最直接地標誌著福音的公開化、社會化，而這正是當局要遏制的。為什麼當局對外在有形的十字架特別在意呢？為什麼一定要移除有形的十字架呢？這是因為外在的十字架作為基督教最核心的標誌，最能在公共領域產生影響力，亮麗、高高矗立的十字架，不用任何言語就把基督信仰崇高地張揚了出來。當局為了阻止福音的公開化、社會化、主流化，對外在的、實體的十字架下毒手，也就木已成舟。

顯然，這次以溫州為試點的全國性逼迫行動，遏制基督教發展、阻礙福音的公開化是行動的目的，鏟除教產和移除十字架是手段，違章只不過是借口。但在這次大逼迫中，主內也有一股不小的勢力在說：有形實體的十字架並不重要，關鍵是內心、屬靈的十字架，沒必要在乎有形實體的十字架如何放置。問題是這樣嗎？

眾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最重要的外在標誌，也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如哥林多前書 2:2：“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十字架的外在標誌直接來源於耶穌基督被釘死的那個真真實實的十字架——羅馬政府的特殊刑具，耶穌曾背著它上死難之地，也被釘在上面受死。這個真實存在過的物理性的十字架，後來成為基督教的符號和標誌；這個真實存在過的十字架，也很快成為耶穌基督對罪人救贖宏恩的象征，這個象征性的十字架後來即成為屬靈的十字架、心中的十字架。

聖經中記載十字架有 80 多處，其中實體的十字架和屬靈的十字架幾乎平分秋色、各占一半。四福音書中出現的大多是物理性、真實存在過的那個十字架。如馬太福音 27:35：“他們既將他釘在十字架上，就拈鬮分他的衣服”。在保羅書信中，開始大量出現屬靈十字架，如加拉太書 6:14：“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信徒釘十字架，並不是指釘死在耶穌受死的的那個實體十字架上，而是指信徒被耶穌基督所救贖、罪得赦免。

實體的十字架和屬靈的十字架同樣重要，不可偏廢。實體十字架是基礎、是源頭，在時間發生上來說是在先的。先有了實體的十字架，再經過屬靈的歸納和提升，才升華為屬靈的十字架。屬靈十字架是從實體的、物理性的十字架基礎上演化、屬

靈化出來的。否定或者不重視實體的十字架，單強調屬靈十字架，就會犯柏拉圖 Plato 的錯誤。柏拉圖認為先有理念 Idea 世界，然後再派出現象世界，先有概念和理念，再有具體事物。具體事物是派生的、不完美的。套用中國名家的說法，先有了“馬”這個概念，再派生出一個個具體的馬，如黑馬、白馬等等。馬先於白馬、馬非白馬。而我們知道柏拉圖的錯誤是將理念與實體脫離、理念變成沒有根基的純精神存在物。單強調屬靈十字架，也同樣犯了這個錯誤，沒有實體的十字架，實際上也就無法靈化為屬靈的十字架。

單強調“屬靈的、無形的十字架”，也有可能再犯諾斯替派 Gnosticism 的錯誤，也即否定道能成為肉身、否定物理世界和肉體，一切在非物質性的靈中打轉。難道耶穌釘死在屬靈的十字架上嗎？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難道不是發生在時空中的真事嗎？十字架既有屬靈性、更有物理時空性。丟掉了物理時空性，也就否定了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必要性和真實性。

論到浙江這次拆移十字架事件，事件一開始，主內強調“屬靈的十字架”的一股力量一直阻止我們為外在的、實體的十字架去辯護、去捍衛。實際上，只有心中而沒有外在的、實體的十字架，那有關部門的目的就達到了，後者真的希望中國基督徒都變成地下基督徒、啞巴基督徒；中國教會沒有任何外在標誌、毫無外在影響力。把基督教對社會的影響力降低到零，這是有關部門的政策目標。而那些單單強調“屬靈的、無形的十字架”的肢體，不在意地上的、人類社會中的十字架，顯然無意中幫助有關部門促成了政策目標！

我們所信的，難道只是個靈，歷史上難道沒有真實存在過？消除信仰的一切形式，肯定會墮入信仰的虛無主義。基督教從反抗天主教的形式主義中出來，但還是保留了聖餐、洗禮兩大形式，我們沒有聽說過僅僅吃屬靈的聖餐、僅僅受屬靈的洗的教訓。對十字架這個聖經上明顯的基督教的標誌，既有屬靈的重大意義，更有它作為形式、外在標誌的教訓和傳統之傳承。基督教反對敬拜有形式的一切偶像，但是保留了實體十字架作為我們信仰的記號、標誌、對主的紀念，如同保留了聖餐和洗禮。雖無聖經直接明說，但如“三位一體 Trinity”一樣是普世教會的準則與傳承。

其實這次有關“有形十架”的爭論性質與當年對北京守望教會主動去民政部門去註冊的爭論是一樣的，對後者他們說：上帝認可的家庭教會事實存在就好，為什麼要去註冊呢？聖經裏也沒有講教會必須要註冊的。事實上，一方面，守望是爭家庭教會在中國的公開化、合法化，“實體十架”是在彰顯福音的公開化主流化。另一方面，守望教會不僅強調教會的屬靈性，更注重教會的地方性。教會在地上、

在一個國家，也是個社會團體，擁有教產、在國家獨立註冊，都是應當的。而“實體十架”不僅強調十字架的屬靈性，也強調有形實體十字架在我們信仰及基督教會中的重要地位，二者缺一不可。

反對北京守望教會獨立註冊和反對捍衛實體十架是同一思維。近日確證北京守望教會金天明牧師也聯名支持《溫州基督徒反對強拆教堂和十字架的聲明》。可見金牧師也和溫州肢體們同感一靈，深感基督教會的地方性、物理性、教會教產、有形十架實際上與教會的屬靈性、宇宙性、屬靈的十字架都是同樣重要的。尤其在目前中國，前者對教會更具有時代的迫切性。

正如北京守望教會長老孫毅在《作山上的城》一文中寫到的：“不過在很多情況下，我們也強調‘山上之城’外向方面的含義，即我們異象中公開化的方面。它涉及教會在成長到一定規模或身量的時候，特別是將自己在這個社會中‘公開化’出來，又不加入官方的‘三自’愛國會時，必然會遇到政教關係的沖突。我們現在正處於這種政教關係的沖突之中”。（見《杏花》2013年秋冬合刊）基督信仰的公開化、主流化，必然引起黑暗勢力的幹擾和破壞。

總之，這次發生的浙江的移除十字架行動，本質是在阻止基督信仰和福音的公開化、社會化、主流化。面對逼迫，我們不應該退縮，我們更應該將基督信仰在中國的公開化、主流化進程進行到底，有神與我們同在，我們就得勝有余。正如以弗所書 5：8—11：“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裏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

打壓基督教再升級，該怎麼辦？

自2014年4月28日全球關注的溫州三江堂被當局蠻橫粗暴地強拆後，對整個中國基督教的打壓，明顯地升級。一方面，由於最大目標三江堂被消滅，所以浙江各地的小教堂、教會接連遭殃、無一幸免。另一方面，打壓開始迅速地從三自名下教會轉向家庭教會，而且有向北京等更加敏感的大城市擴展的趨勢。

根據媒體報道，2014年5月6日下午四點半，溫州樂清雁蕩白溪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據稱該教會並沒有違章且手續齊全。到5月7日，溫州蒼南縣一天主教堂和一安息日會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浙江海寧一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浙江杭州市喬司禮拜堂的十字架被拆，浙江平陽桃源天主堂的十字架被“蒙頭”。5月8日下午溫州市瑤溪街道河濱禮拜堂被拆毀，夷為平地。此外，溫州鹿城區藤橋鎮的下安山、呈岸、林山、仁地等教堂的附屬建築及十字架，近期也會被強拆。由於抗爭最持久

的三江堂被夷為平地，那麼厄運和噩耗似乎必然要與浙江眾多三自名下教堂及其十字架聯系在一起了。

三江堂被毀後，當局即將魔爪伸向了溫州家庭教會。溫州伯大尼教會是溫州非三自的城市教會中有較高知名度的教會。但在 5 月 5 日，該教會接到一份名為《溫州市鹿城區民族宗教事務局責令停止活動通知書》，其中寫到：南匯街道獻華一棟六樓的住戶擅自設立宗教活動場所，違反了《國家宗教事務條例》和《浙江省宗教事務條例》，因此責令立即停止宗教活動，清除建築物內的宗教設施並解散參與活動人員。通知書還要求“活動負責人”持身份證件到宗教局“接受談話處理”。不僅溫州伯大尼教會，其他多家溫州基督教家庭教會也收到類似通知。

除針對教堂與聚會點外，據媒體可靠消息，溫州正展開排查公務員信教情況，以為下一步打壓宗教自由做提前統計預備。這一切情況都說明政府打壓基督教整體的行動已經開始了新階段，那就是打壓了三自名下教會的象征三江堂後，對家庭教會及其敬拜場所開始打壓；對教會聚會的信徒打壓後，對體制內不一定參加聚會的信徒也開始打壓。對三自是拆教堂和十字架，對家庭教會是取締聚會點。形式雖不同，但實質都是通過剝奪教產和教會物理空間來危害信仰權利、幹預信徒正常信仰生活、遏制甚至要泯滅基督教的發展。

在溫州家庭受到迫害的同時，當局對北京乃至全國有象征意義的北京守望教會的打壓，也開始升級。根據中國數字時代 (China Digital Times) 4 月 16 日報道，中國國信辦最近發出通知：各網清理刪除《戶外敬拜三周年之際 北京守望教會 告會眾書》一文及相關評論。這是近年來少有的針對基督教會的舉措。

5 月 4 日是主日聚會日子，也是北京守望教會 2014 年戶外敬拜的第 16 個主日，有 30 位弟兄姊妹因參加戶外敬拜被帶走。其中三位弟兄姊妹陳佑偉、蘭小方弟兄和代麗櫻姊妹，被帶到海澱分局的看守所，三個人都是行政拘留 5 天，警方已通知家屬。這是守望教會戶外敬拜以來第一次對參加戶外敬拜者施以行政拘留，明顯顯示當局對守望教會的打壓升級；也顯示自 4 月 28 日強拆溫州三江教堂後，政府全國性對基督教的逼迫已經從三自會波及到溫州及北京的家庭教會。在這種打壓升級的背景下，當局對守望教會領導層的軟禁、喝茶等非刑事措施，是否會演變為刑事拘留甚至起訴判刑呢？最新消息說守望教會參加戶外敬拜的信徒正被所在單位、學校進行新一輪調查，守望弟兄姊妹已經做好進拘留所、看守所甚至監獄的準備。守望的前景讓人擔憂。而如果守望事件刑事化，那麼中國其他家庭教會，是否也要面臨各種刑事處分呢？

面對三江堂被毀後當局對三自、家庭教會的進一步打壓；對浙江、北京乃至全國基督徒的迫害，我們作為與受迫害者同感一靈的肢體，該如何應對呢？

首先作為基督徒，必須行動起來為受迫害者吶喊。禱告是我們的本分，我們要求上帝來保守中國基督徒們免除魔鬼撒旦的侵害，但是僅僅禱告是不夠的，神也願意讓我們這些地上的管家，在地上為他“打美好的勝仗”。“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對耶穌基督的愛、對信仰的忠貞不渝，必須要用行為表現出來。基督徒們應該通過微博、微信或其他媒體發出抵抗逼迫、譴責迫害的聲音，牧者要通過講道、組織代禱會、聯名信甚至地面抗議等等方式，發出抵抗當局新一輪大逼迫的最強音，只有表達我們寧死不屈的徹底決心，中共當局的新一輪大逼迫才不會得逞。

其次我們必須懂得聯手教內、教外人士，以團結產生的力量，來共同維護宗教自由權利。宗教自由是個法律權利，是個法律概念，它不是宗教概念。宗教自由其實一點也不涉及宗教具體的內容。雖然各宗教、各教派在教義上有諸多不同，但在宗教自由這個法律權利的享有和捍衛上卻是一致的，即任何宗教和教派，都應該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利。同時，對某個宗教或教派宗教自由權利的呼籲，並不表示認同其教義。“我”雖不認同“你”的教義，但我應該來捍衛“你”的信仰權利。因為信仰權利不僅是普世人權，人人該享有，而且它並不關涉教義，不涉及對自己信仰是否認信、執著和背叛的問題。

在目前形勢下，三自、家庭等其他派別，已經到了聯手維護宗教權利的時候了，這不僅因為今天你不維護他人的權利，明天你自己的權利就會受到侵害（那些在三江堂受迫害時觀望的家庭教會成員，很快自己也成為了受迫害者），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捍衛宗教自由權利上聯手互助，才能產生聯合起來的巨大力量，才能制止仇敵的攻擊。當局的狡詐就在於他充分利用基督教內各派互不支援、互相隔離的現狀，各個擊破、全面瓦解。

在目前整個基督教界受到逼迫、教會受到也許是“文革”之後最嚴重的一場逼迫危險時刻，教內各教派不僅應該在捍衛宗教自由權利時聯起手來，甚至我們也可以聯合教外人士或其他宗教，來共同維護宗教自由這個法律權利。只有當中國各類信徒充分意識到宗教自由權利無涉教義、並且需要聯手來捍衛時，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才有徹底改善的可能性。

在強調行動、強調聯手的情況下，各類具體的應對措施倒是很多。具體而言，在國內，我們可以主動聯系律師、進行法律維權，或者組建維權律師團，主動就教堂被拆、聚會點被取消進行法律維權，我們也可以組織基督教界各派、諸教會間的聯合行動、發表聲明、組織代禱會等等。我們也可以聯絡統戰系統和三自體系裏面

的開明人士，就新一輪對基督教的大逼迫發聲。我們也可以組織國內學術界、宗教界，召開研討會，為中國宗教自由發聲。

至於在安全的海外，我們應該制造更大的效應，來引起全世界媒體、政界要人、宗教團體對目前發生在中國的新一輪大逼迫進行關注和發聲。如聯系聯合國人權、宗教自由機構、聯系各國國會、聯系普世基督教機構為此次迫害作證、發聲，也可聯絡世界各地溫州等地華人基督徒，組織代禱會，或到領事館抗議。也可聯絡臺灣、香港諸教會、機構，為目前中國形勢以各種方式來做出回應、發出呼籲。

聖殿被毀，曾是以色列人的浩劫，是整個猶太民族的歷史恥辱。但如今也成為中國基督徒的重大羞辱。我們必須行動起來，才能洗刷掉這個羞辱，遏制迫害的進一步蔓延。讓我們謹記聖殿被毀後以色列先知耶利米在詩篇 137 篇中所寫的：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因為在那裏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記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耶和華啊、求你記念這仇”。

十、打壓基督教再升級，該怎麼辦？

自2014年4月28日全球關注的溫州三江堂被當局蠻橫粗暴地強拆後，對整個中國基督教的打壓，明顯地升級。一方面，由於最大目標三江堂被消滅，所以浙江各地的小教堂、教會接連遭殃、無一幸免。另一方面，打壓開始迅速地從三自名下教會轉向家庭教會，而且有向北京等更加敏感的大城市擴展的趨勢。

根據媒體報道，2014年5月6日下午四點半，溫州樂清雁蕩白溪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據稱該教會並沒有違章且手續齊全。到5月7日，溫州蒼南縣一天主教堂和一安息日會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浙江海寧一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浙江杭州市喬司禮拜堂的十字架被拆，浙江平陽桃源天主堂的十字架被“蒙頭”。5月8日下午溫州市瑤溪街道河濱禮拜堂被拆毀，夷為平地。此外，溫州鹿城區藤橋鎮的下安山、呈岸、林山、仁地等教堂的附屬建築及十字架，近期也會被強拆。由於抗爭最持久的三自名下溫州三江堂被夷為平地，那麼厄運和噩耗似乎必然要與浙江眾多三自名下教堂及其十字架聯系在一起了。

三江堂被毀後，當局當即將魔爪伸向了溫州家庭教會。溫州伯大尼教會是溫州非三自的城市教會中有較高知名度的教會。但在5月5日，該教會接到一份名為《溫州市鹿城區民族宗教事務局責令停止活動通知書》，其中寫到：南匯街道獻華一棟六樓的住戶擅自設立宗教活動場所，違反了《國家宗教事務條例》和《浙江省宗教事務條例》，因此責令立即停止宗教活動，清除建築物內的宗教設施並解散參與活動人員。通知書還要求“活動負責人”持身份證件到宗教局“接受談話處理”。不僅溫州伯大尼教會，其他多家溫州基督教家庭教會也收到類似通知。

除針對教堂與聚會點外，據媒體可靠消息，溫州正展開排查公務員信教情況，以為下一步打壓宗教自由做提前統計預備。這一切情況都說明政府打壓基督教整體的行動已經開始了新階段，那就是打壓了三自名下教會的象征三江堂後，對家庭教會及其敬拜場所開始打壓，對教會聚會的信徒打壓後，對體制內的信徒也開始打壓。對三自是拆教堂和十字架，對家庭教會是取締聚會點，就是不讓聚會。形式雖不同，但實質都是通過剝奪教產和教會物理空間來危害信仰權利、幹預信徒正常信仰生活、

遏制甚至要泯滅基督教的發展。

在溫州家庭受到迫害的同時，當局對北京乃至全國有象征意義的北京守望教會的打壓，也開始升級。根據中國數字時代 (China Digital Times) 4 月 16 日報道，中國國信辦最近發出通知：各網清理刪除《戶外敬拜三周年之際 北京守望教會 告會眾書》一文及相關評論。這是近年來少有的針對基督教會的舉措。

5 月 4 日是主日聚會日子，也是北京守望教會 2014 年戶外敬拜的第 16 個主日，有 30 位弟兄姊妹因參加戶外敬拜被帶走。其中三位弟兄姊妹陳佑偉、蘭小方弟兄和代麗櫻姊妹，被帶到海澱分局的看守所，三個人都是行政拘留 5 天，警方已通知家屬。這是守望教會戶外敬拜以來第一次對參加戶外敬拜者施以行政拘留，明顯顯示當局對守望教會的打壓升級；也顯示自 4 月 28 日強拆溫州三江教堂後，政府全國性對基督教的逼迫已經從三自會波及到溫州及北京的家庭教會。在這種打壓升級的背景下，當局對守望教會領導層的軟禁、喝茶等非刑事措施，是否會演變為刑事拘留甚至起訴判刑呢？最新消息說守望教會參加戶外敬拜的信徒正被所在單位、學校進行新一輪調查，守望弟兄姊妹已經做好進拘留所、看守所甚至監獄的準備。守望的前景讓人擔憂。而如果守望事件刑事化，那麼中國其他家庭教會，也是否要面臨各種刑事處分呢？

面對三江堂被毀後當局對三自、家庭教會的進一步打壓；對浙江、北京乃至全國基督教會的全國範圍內迫害，我們作為與受迫害者同感一靈的肢體，該如何應對呢？

首先作為基督徒，必須行動起來為受迫害者吶喊。禱告是我們的本分，我們要求上帝來保守中國基督徒們免除魔鬼撒旦的侵害，但是僅僅禱告是不夠的，神也願意讓我們這些地上的管家，在地上為他“打美好的勝仗”。“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對耶穌基督的愛、對信仰的忠貞不渝，必須要用行為表現出來。基督徒們應該通過微博、微信或其他媒體發出抵抗逼迫、譴責迫害的聲音，牧者要通過講道、組織代禱會、聯名信甚至地面抗議等等方式，發出抵抗當局新一輪大逼迫的最強音，只有表達我們寧死不屈的徹底、無畏決心，中共當局的新一輪大逼迫才不會得逞。

其次我們必須懂得聯手教內、教外人士，以團結產生的力量，來共同維護宗教自由權利。宗教自由是個法律權利，是個法律概念，它不是宗教概念。宗教自由其實一點也不涉及宗教具體的內容。雖然各宗教、各教派在教義上有諸多不同，但在宗教自由這個法律權利的享有和捍衛上卻是一致的，即任何宗教和教派，都應該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利。同時，對某個宗教或教派宗教自由權利的呼籲，並不表示認同其教義。“我”雖不認同“你”的教義，但我應該來捍衛“你”的信仰權利。因為

信仰權利不僅是普世人權，人人該享有，而且它並不關涉教義，不涉及對自己信仰是否認信、執著和背叛的問題。

在目前形勢下，中國基督教內的三自、家庭等其他派別，已經到了聯手維護宗教權利的時候了，這不僅因為今天你不維護他人的權利，明天你自己的權利就會受到侵害（那些在三江堂受迫害是觀望的家庭教會成員，很快自己也成為了受迫害者），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捍衛宗教自由權利上聯手互助，才能產生聯合起來的巨大力量，才能制止仇敵的攻擊。當局的狡詐就在於他充分利用基督教內各派別互不支援、互相隔離的現狀，各個擊破、全面瓦解。

在目前整個基督教界受到逼迫、教會受到也許是“文革”之後最嚴重的一場逼迫危險時刻，教內各教派不僅應該在捍衛宗教自由權利時聯起手來，甚至我們也可以聯合教外人士或其他宗教，來共同維護宗教自由這個法律權利。只有當中國的各類信徒充分意識到宗教自由權利無涉教義、並且需要聯手來捍衛時，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才能有徹底改善的可能性。

在強調行動、強調聯手的情況下，各類具體的應對措施倒是很多。具體而言，在國內，我們可以主動聯系律師、進行法律維權，或者組建維權律師團，主動就教堂被拆、聚會點被取消進行法律維權，我們也可以組織基督教界各派、諸教會間的聯合行動、發表聲明、組織代禱會等等。我們也可以聯絡統戰系統和三自體系裏面的開明人士，就新一輪對基督教的大逼迫發聲。我們也可以組織國內學術界、宗教界，召開研討會，為中國宗教自由發聲。

至於在安全的海外，我們應該制造更大的效應，來引起全世界媒體、政界要人、宗教團體對目前發生在中國的新一輪大逼迫進行關注和發聲。如聯系聯合國人權、宗教自由機構、聯系各國國會、聯系普世基督教機構為此次迫害作證、發聲，也可聯絡世界各地溫州等地華人基督徒，組織代禱會，或到領事館抗議。也可聯絡臺灣、香港諸教會、機構，為目前中國形勢以各種方式來做出回應、發出呼籲。

聖殿被毀，曾是以色列人的浩劫，是整個猶太民族的歷史恥辱。但如今也成為中國基督徒的重大羞辱。我們必須行動起來，才能洗刷掉這個羞辱，遏制迫害的進一步蔓延。讓我們謹記聖殿被毀後以色列先知耶利米在詩篇 137 篇中所寫的：

詩篇 137:1-7：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因為在那裏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記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

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耶路撒冷遭難的日子、以東人說拆毀、拆毀、直拆到根基。耶和華啊、求你記念這仇。

十一、遏制宗教政策進一步惡化是基督徒的責任

7月28日美國國務院公布2013年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由於中國政府嚴重侵犯宗教自由，被美國政府列為特別關注國家。同時，主管民主、人權、與勞工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湯姆·馬利諾夫斯基說：美國註意到也非常關切中國境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事件，人民有表達言論的權利與信仰自由，盡管美中關係復雜且廣泛，美國還是會繼續堅定支持這個價值觀。

可見，今年以來的浙江強拆教堂和十字架事件不僅引起媒體，而且也引起西方國家政界的廣泛關注和一致譴責。同時，國際社會和海內外華人基督徒，都希望中國政府能夠立即停止如此暴行，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浙江當局並無停止迫害的任何跡象。根據3月28日強拆行動的指導性會議“浙江省‘三改一拆’涉及宗教違法建築處置工作實施方案電視電話會議”內容，這次行動分為三個階段：

- (一) 調查摸底、制定計劃階段（2013年12月——2014年2月）
- (二) 全面實施整治階段（2014年3月——2014年9月）
- (三) 總結驗收鞏固階段（2014年10月——2014年12月）

由此看來，按照當局的計劃，強拆行動要到2014年年底才會結束。所以單方面期望政府能自動停止強拆行動完全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是地方當局的執意作惡、“按既定方針辦”，另一方面是當過紅衛兵的習近平繼續向極左路線邁進、對內持續高壓、對外尋釁滋事，一副誓與西方國家及其思想文化決戰到底的派頭。地方與中央的意圖都說明，強拆十字架行動絕不會停止，而且也不會止於浙江省，有可能向全國蔓延。

面對急劇惡化甚至有“文革化”傾向的宗教政策，作為海內外的基督徒，絕對不應該坐以待斃，而應該奮起抗爭、採用多種方法遏制宗教政策的進一步惡化。而且從以往的經驗看，信徒們的抗爭的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中共當局的宗教政策。

根據趙天恩牧師《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一書和本人的體會，影響當局宗教政策的因素除了馬列主義原教旨的宗教觀、無神論、毛澤東統戰理論和政治形勢外，宗教政策的制定也考慮到信徒的抗拒程度。例如由於農村家庭教會信徒從改革開放以來持續地依法維權、與政權抗爭，政權在一段時間內對農村家庭教會只能採取默認的態度。1990年代，城市家庭教會興起後，由於城市家庭教會信徒依法維權、採用戶外敬拜等多種抗爭方式，政權在一段時間內對小規模的城市家庭教會，也採取默認的態度。根據趙牧師《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一書，中國基督徒在1990年代後越來越意識到抗爭不抗爭，都會受到逼迫；而如果抗爭的話，還有勝算的可能，所以中國基督徒開始勇敢地捍衛自己的信仰權利，學習法律運用法律蔚然成風。

浙江強拆事件發生後，有基督徒說，上帝通過這件事讓我們看到溫州教會自己的醜陋，反思溫州教會自己的罪錯。但是，也許上帝還通過這件事，讓信徒以行動來證明自己信仰的純潔熱忱、護教的堅貞不渝，以此逼迫來考驗信徒到底愛不愛主。就像主耶穌基督在受難前問三次問彼得的問題：“彼得，你愛我嗎？”對神的忠貞不渝，就表現在面對逼迫的時候，敢不敢捍衛自己的信仰。正如後來的彼得所說的：“順服神而不順服人”，敢於對踐踏信仰者說不；也如歷代殉道者一樣，對神說我寧願死，也要捍衛真道。

如此的抗爭精神，在溫州這次強拆事件中已經出現，如堅守三江堂一個月的信徒，如三個留下遺書準備殉道的溫州傳道人，如在各教堂被拆十字架時由於攔阻暴行而慘遭毒打的眾多弟兄姊妹們。當這樣的殉道精神和抗爭精神，大規模地在浙江乃至全國出現的時候，中國政府就要考慮強拆行為的成本。成本足夠大的時候，它也許就會退縮。最近有國內家庭教會傳道人談到政府對教會的打壓，他說政府對一個教會的打壓——搜查、抓人、拆十字架等等，每次的行動，都要聯合其他很多部門進行，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要花大量的時間，要花大量的金錢。而且政府負責人和執行者大部分心中都明白幹這些事是不光彩的，他們的內心道德壓力也非常巨大。尤其是這些逼迫行動被司法控告、被海外媒體乃至海外機構報道、聲討，政府逼迫者的所受壓力就會更大。

就中央習近平而言，他是想做毛澤東第二，但時移境遷，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文革時的中國，市場經濟、海外交流、信息技術等，都使民眾的素質和維權意識比文革時的中國老百姓高很多。習近平的權威和魔力都與毛澤東無法相比，而習面臨的各種政治經濟外交問題，都會讓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如同他在釣魚島、南海等問題上的退縮一樣，他想如毛澤東那樣徹底地消滅基督教，完全掌控基督教，肯定不會心想事成。他將遇到巨大的攔阻、付出巨大的成本完全是必然的。這一切

正如聖經詩篇 1:6：“因為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以上可見，從中央到地方的逼迫者其實並不可怕，它們完全有退縮和止步的可能。而基督徒面對他們最關鍵要做的，就是進一步加大對逼迫者的各種壓力，直至他們因為承受不了道義、物質形式等方面的壓力而放棄施暴和逼迫。海內外華人基督徒，應該採取多種形式，如積極在各類媒體上發布強拆信息、集體穿抗拆文化衫、禱告會、靜坐、聯名信（聯合三自內的同情者、基督徒名人等等）、到各級政府機關集體請願、上訪，海外溫州基督徒和其他華人基督徒，可以開禱告會、研討會、到中國政府駐外領事館遞公開信等方式表達抗議，也可以到基督教普世機構、聯合國等全球性組織處進行請願活動。通過這些活動，給逼迫者以足夠大的壓力，迫使他們在承受不了的時候放棄對基督教的逼迫、放棄進一步惡化宗教政策的圖謀。

縱容邪惡就是罪。面對邪惡的甚囂塵上、瘋狂猖獗，作為神的兒女，絕不能消極坐等、坐以待斃。而要拿出行動的勇氣和力量，與邪惡者一搏。遏制邪惡的進一步蔓延、遏制中共宗教政策的進一步惡化，是我們基督徒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正如聖經 詩篇 18:27-30：“困苦の百姓、你必拯救。高傲の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點著我的燈。耶和華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著你冲入敵軍、借著我的神跳過牆垣。至於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華的話是煉淨的。凡投靠他的、他便作他們的盾牌”。

十二、就溫州三江堂被強拆致中國政府公開信（中英文）

2014年4月28日整整一天，中國政府不顧當地基督徒一個多月來的持守和維權、不顧全世界基督徒的反對，悍然對被譽為“中國耶路撒冷”的溫州市區雄偉壯觀、具標誌意義的三江教堂強行拆毀、夷為平地，那高聳奪目的十字架最終坍塌在廢墟裏。目睹此一慘案，全世界基督徒無不悲慟欲絕、痛哭流涕。此一暴行舉世震驚、人神共憤，是對中國基督徒信仰權利的粗暴踐踏，是對他們正常信仰生活的無理幹預，也是對全世界基督徒信仰情感的嚴重侮辱。此一暴行挑戰人類文明和道德倫理的底線，是典型的反人類、反文明、反普世價值的瘋狂舉動。此一暴行已經受到全世界民眾強烈的譴責。

與此一暴行相當的，是2001年3月塔利班政權摧毀阿富汗巴米揚（Bamiyan）大佛、引全球公憤。塔利班踐踏宗教自由價值、挑戰整個人類文明、威脅人類的生存和權利。同樣，中共政權拆毀三江教堂，無疑不僅向基督教宣戰，也向全人類宣戰。塔利班在摧毀大佛半年後，就與本拉登一起發動了對美國的911攻擊。我們不僅要問，摧毀三江教堂的中共政權，在半年後要給世界、全人類帶來什麼？拆毀三江堂與摧毀巴米揚大佛的性質同樣惡劣，應該引起全世界人民和國家首腦的強烈關注與高度警覺。

不僅如此，如同“文革”中以溫州為試點展開全國“消滅宗教”運動，今次的逼迫也以福音興旺的溫州開刀，然後向浙江全境和全國鋪開。教堂被毀、十字架被移、牧者和信徒被捕，狼煙四起、哀鴻遍野，一場全國性反基督教的運動正在進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一日千裏，從地下走到地上、從邊緣走向中心、從支流走向主流，已成為大趨勢。但自來到中國就發動過“非基”運動的共產政權，竭力遏制基督信仰公開化、主流化、社會化進程，企圖埋葬福音於地下。這次全國性的迫害既是對中國基督徒“山上之城”異像的沈重打擊，也是對全球關注中國福音宣教的愛心人士的野蠻拒斥。鑒於此，我們作為關注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基督徒，就三江堂被毀向中國政府提出以下四點強烈要求：

1. 立即停止這次以強拆教堂和十字架為特征的對基督教的全國性迫害運動，摒

除對基督教和世界文明的敵視態度和抵制行為；

2. 追究強拆溫州三江教堂的責任者的法律責任，對該教會及信徒的損失進行賠償；

3. 請尊重《溫州基督徒關於政府‘強拆十字架及教堂’的聯合聲明》，停止在溫州、浙江和全國的一切形式的侵犯信仰權利的行徑；

4. 厘清政教關係、徹底解決三自會和家庭教會的獨立性、合法性、公開性問題。兌現中國憲法承諾的每個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

對華援助協會

中國家庭教會海外牧者聯禱會

主後2014年4月29日

An open lett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forced demolition of Sanjiang Church

For the entire day of April 28, 2014,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spite a month-long guard and defense of their rights by the local Christians and despite the objections from Christians around the world, brazenly demolished Sanjiang Church, an imposing and magnificent landmark in Wenzhou, known as the “Jerusalem of China.” The government razed the church to rubble and that lofty and “conspicuous” cross finally fell into the debris. Seeing such a scene, Christians worldwide are all crying in sadness and sorrow. Such an act of brutality shocks the whole world and both men and God are indignant. This is a rude trampling of the rights to faith of the Chinese Christians and is an unreasonable interference in their otherwise normal religious life. It is also a serious insult on the religious feelings of the Christians worldwide. Such an act of brutality challenges the bottomline of civilization of mankind and ethics, and it is a typical frenzied anti-humanity, anti-civilization, and anti-universal-value act. This act of brutality has already been strongly denounced by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Equivalent to this act of brutality i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amiyan Buddha [statues] in Afghanistan by the Taliban regime in March 2001, which aroused the indignation of the public. The Taliban tramples on the value of religious freedom, challenges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entire human race, and threatens the existence and rights of humanity. Likewi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destroyed Sanjiang Church and doubtlessly, this is a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Christianity and humanity. Half a year after the Taliban destroyed the Buddha statue, they and Bin Laden launched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against America. We would like to ask this question: What will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bring to the world and the humanity half a year after it destroyed Sanjiang Church? Demolishing Sanjiang Church is just as vicious as destroying the Bamiyan Buddha in its nature, and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heads of states worldwide should pay intense attention to this, and they should be highly vigilant.

Things don't end there. Lik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the authorities unfolded the campaign of "wiping out religions," by taking Wenzhou as a test ground, this time, they started their persecution in Wenzhou again, where the Gospel is flourishing, and then the persecution will spread to the rest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Churches are destroyed; crosses are removed; pastors and worshippers are arrested. War alarms are raised everywhere and throngs of famished and homeless people roam the countryside. A nationwide anti-Christian campaign is being waged.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ristianity has seen a rapid development. They came from underground and became open. Once a marginal entity, they've come to the center of our life. From a tributary, Christianity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and is now the main trend of life in China. However, the Communist regime that launched "non-Christianity" campaigns as soon as it came to power in China is trying its best to contain the Christian belief that is becoming open and mainstream in the society. The regime attempts to bury the Gospel underground. This nationwide persecution is not only a heavy blow to the vision of the City Upon a Hill of Chinese Christians, but also a barbaric rejection of people with a loving heart who are spreading the Gospel in China and whom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Given this, as Christians who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we hereby put forward four strong demand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destruction of Sanjiang Church:

1. Stop the nationwide persecution campaign against Christianity characterized by the forced demolition of the churches and the their crosses; abandon your hostile attitude

and resistance against Christianity and world civilization;

2. Investigate the legal liabilities of the people responsible for the forced demolition of Sanjiang Church and pay a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f the church and its worshippers.

3. Please respect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Wenzhou Christians regarding the Government’s Forced Demolition of the Cross and the Church” and stop all forms of actions of violating people’s rights to religious beliefs in Wenzhou, Zhejiang and the rest of China.

4.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tate and thoroughly solve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independence, legitimacy and openness of TSPM churches and house churches so as to honor the promise i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at every citizen has the right to religious belief and freedom.

China Aid Association

Joint Meetings of Overseas Pastors of House Churches of China

April 29, 2014

十三、就浙江強拆十字架暴行致中國政府抗議書

《聖經》哥林多前書 2:2: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十字架代表耶穌基督的救恩，是基督教與其他宗教辨別的外在標誌。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浙江等地區，毫無法律依據和法律文件支持，野蠻拆除十字架、毆打抓捕阻止強拆十字架的信徒，並阻止律師和海內外媒體介入教案。截止 2014 年 9 月，有近 360 多個十字架被拆除。7 月 21 日凌晨，政府為拆除溫州平陽救恩堂十字架，動用 600 多警力粗暴毆打手無寸鐵的信徒，造成數十人受傷、多人住院、更多人被拘留逮捕的“平陽血案”。

以上令人發指的暴行嚴重傷害了中國乃至全世界基督徒的宗教情感、粗暴地踐踏了基督徒的信仰權利、也是對基督教占主流的西方社會及其文明的挑釁和對抗。作為海外華人基督徒，我們對中國政府踐踏基督徒信仰權利的如此野蠻行徑，表達強烈地譴責和抗議，並希望中國政府能懸崖勒馬、停止迫害。

種種跡象表明，以浙江省為主的、打著“三改一拆”名義的強拆十字架運動，完全是針對基督教而來。根據披露出來的 3 月 28 日浙江省推進“三改一拆”涉及宗教違法建築處置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記錄顯示，“三改一拆”的目的是要“糾正宗教發展過快、場所過多、活動過熱”現象；“要看清十字架背後的政治問題、抵禦意識形態的滲透”。可見，這是一場專門針對十字架及基督教的蓄意迫害，政府有意將十字架背後的福音和基督教看為西方文化的侵略、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顯然，拆十字架，就是為了阻止福音的公開化、社會化和基督教的迅猛發展、社會影響。

8 月 5 日，中國宗教當局召開大會，確定了“基督教中國化”的新政策方針。而基督教中國化，實際上是強勢地以黨的標準來改造、修正和閹割基督教，其中所謂的教堂中國化，就是導致眾多十字架被拆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們反對中國政府任何人為地改造、閹割基督教的政策。

總之，作為海外華人基督徒，我們本著同感一靈的肢體關係，對浙江強拆十字架事件表示強烈地關注，我們也強烈呼籲國際社會、美國教會界能關注此事，呼籲

海內外華人教會能挺身而出，援助受害者、譴責施暴者。在此我們對迫害信仰權利、發動強拆十字架運動的中國政府，提出以下的幾點要求：

1. 立即在全國範圍內停止強拆十字架的暴行；
2. 所有被強拆的十字架都要歸回原位，賠償因強拆十字架而造成的所有損失；
3. 立即釋放所有因保衛十字架而被抓捕的信徒及教牧人員；
4. 立即停止“十字架背後政治問題”“基督教中國化”等有悖常理的謬論及其實踐。

紐約部分華人基督徒 中國家庭教會海外牧者聯禱會

主後 2014 年 9 月 9 日

十四、對王怡牧師微博言論的兩點反思

4月4日，著名的成都秋雨之福家庭教會王怡牧師在他的微博中，針對目前正在發生的溫州三江堂等教堂被政府要強拆事件寫到：「作為家庭教會的牧師，我想對溫州的弟兄姊妹們說：放棄看得見的教產，捍衛看不見的教產吧。不求保衛你們的教堂，但求徹底脫離三自體系。拆教堂的時候不要抵抗。以基督為教會唯一的元首，奉主名在任何地方聚集吧。你們就是神的殿，從此與三自會、宗教局和統戰部割袍斷義，連一塊石頭都不留在一塊石頭上」。

此言論一出，立即引起軒然大波。顯然，王怡牧師對溫州教會的態度與當年他強烈支持北京守望教會爭取教產權益的態度是迥然有別的。就此我們反思兩點：

1：他認為被拆教堂的溫州教會是三自，所以該拆，甚至應該象舊約聖殿被拆毀的「一塊石頭不留在石頭上」（參馬太福音 19:44）。其實溫州是中國宗教「特區」，溫州三自和家庭錯綜複雜，與內地三自家庭經緯分明的情況大不一樣。溫州大多數掛三自牌子的教會，實是自治的教會。最關鍵的，這次對溫州、浙江教會動手，只是對全國基督教（包括三自和家庭）動手的先聲。而且浙江政府文件上把基督教私設聚會點作為「三改一拆」運動中「七必拆」之首。可見不僅家庭、三自均在打壓之列，而且家庭教會——基督教私設聚會點更在打壓之首，所以這次的打壓也固然是對家庭教會的打壓，這次的抗爭，固然也是對家庭教會權益的捍衛。因此，各地家庭教會在主內同來聲援溫州教會，也是非常恰當的。其實目前的情形跟當年守望教會本質上是一樣的，就是政府通過打壓教產來控制信仰、企圖通過控制物理空間來控制靈魂。

2：「放棄看得見的教產，捍衛看不見的教產」，「你們就是神的殿」——這些言論恰恰是不少人當年指責守望教會為教產抗爭的論調，估計也是不少人指責秋雨之福為教產抗爭的論調。看來人是最容易遺忘——仇敵的攻擊很快成為自己效法的樣式。而這些論調，無非是強調理念（Idea）高於現象世界、靈高於肉的現代版柏拉圖主義。一味地強調教產、聖殿的屬靈性，而抹殺牠們的地方性、物理性，會成為初代教會影響甚鉅的唯獨強調靈、忽視物質肉體、不承認屬天的道會成為肉身的諾

斯底派。正如約翰二書 7：「因為世上有很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再建立起來」（約翰福音 2:19）。舊約的聖殿成為新約中的三日復活的耶穌身體——教會。新約教會有兩面性缺一不可：教會的屬靈性、宇宙性和合一性，與教會的物理性、地方性和眾多性。不能只強調前者，無視後者；也不能只強調後者，忽視前者。王怡牧師的言論，似乎是單單注重前者，而忘記了後者，這是不整全的。

我在新浪微博上也對某些「屬靈」基督徒寫了一段話：「致某些『屬靈』的基督徒：你們是天使，你們是靈，你們沒有肉體，你們不生活在三維空間，所以你們不需要有形的教堂，更不需要有形的十字架。你們只有屬靈的十字架、你們只有屬靈的、無形的教會。你們不必生活在這個地上，就像道成肉身前的耶穌基督一樣。你們是沒有物質形式的靈界存在物，只知道教會和十字架的屬靈性、宇宙性，卻忘記了耶穌再來之前地上教會的物理性、時空性、地方性，你們忘記了道一定要成為肉身的真理，更忘記了耶穌基督的復活和我們將來的復活也包括身體的復活。你們這些沒有肉體的靈界存在物，沒必要在地上、用電腦等不屬靈的物體發言了，更不必維護地上教會的權益。因為你們是『屬靈』的」。

言語雖然有些過激，但也說明了教會在耶穌基督再來之前、在地上必然是有肉體的人的聚集，不是天使的聚集、單單靈的聚集。地上的教會的確確需要三維空間來容納一個個有肉身的人。這個三維空間就是教產，它與我們的敬拜、信仰本身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維護信仰權利必然與維護教產權利聯繫在一起的。這一點也可見我前段時間就南樂教案所寫的文章《教會教產權利的聖經依據》。

王怡牧師等許多「屬靈」基督徒的言論似乎指出教堂、教產無關乎信仰、或者無關乎信仰本質，他們來拆，該放棄就放棄、那裡聚會都行，甚至不要空間都行。而我們從官方文件（浙江瑞安市《關於做好『三改一拆』涉及宗教和民間信仰違法建築調查甄別統計工作的通知》和浙江玉環縣《沙門鎮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場所違法建築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中看到，官方極力澄清「三改一拆」「七必拆」是針對違章建築而無涉信仰，而如果我們認為教產無關乎信仰、可以隨意丟棄，那麼不是正中官方詭計嗎？我們也在這兩個文件中驚奇地發現政府「七必拆」的規定居然是民族宗教局製定的，看來實際上政府明白拆教堂大大關涉宗教信仰。如此看來，似乎官方比某些「屬靈」基督徒更明智啊。

十五、十字架討厭的地方

《聖經》加拉太書 5:11: “弟兄們，我若仍舊傳割禮，為什麼還受逼迫呢。若是這樣，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這段經文講偉大的使徒保羅面對猶太人對基督徒的信仰逼迫，面對猶太傳統勢力對基督教的仇視和迫害，依然堅守信仰的純正、依然放膽傳揚基督福音，即使屢遭迫害也不休止。猶太人所恨惡的就是保羅所傳揚的，猶太人所恨惡的不是別的，恰恰就是“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當時而言，十字架是與割禮是相對立的。割禮是猶太人靠律法得救、靠行為得救、靠民族得救的標誌，而十字架所代表的，恰恰是反律法主義、反行為主義、反民族主義，是一條唯獨信心、唯獨恩典、唯獨耶穌基督的救恩之路。正是十字架所代表的耶穌基督救恩的唯一性、恩典性，才使十字架成為大多數猶太人討厭恨惡的對象。

今天的中國，十字架同樣成為了令中國各級政府討厭恨惡的對象。今年以來，浙江各地強拆教堂及其十字架的迫害行動愈演愈烈，4月28日溫州三江大教堂被夷為平地後，其他的小教堂無一幸免。但6、7月份的最新局勢表明，浙江政府開始專拆十字架，甚至放出話來：“只要拆除十字架，教堂可以保留”。專拆十字架，已經變成席卷浙江大地的瘟疫。

7月21日，浙江省溫州市地方政府出動六百多警力，強拆平陽縣水頭鎮一基督教堂十字架，守護十字架的眾多信徒奮起抵抗，雙方發生爭執。十多名信徒被打傷，其中五人傷重入院。當地信徒表示，傷者有年輕人，也有老年人，大部分是頭部受傷、骨折，也有被打致大量吐血。這是當局第三次試圖強拆該教會的十字架。一個並不很大的教堂頂的十字架，為何竟勞師動眾、動用600多警力來鏟除呢？而信徒方面，寧可被打傷流血，也為何要誓死保衛這個十字架呢？

與此同時，溫州平陽有至少3位傳道人寫下遺書，準備與十字架共存亡。詹應勝傳道在他的遺書上寫道：“作為個人，我求主給我殉道的心誌，最好就在拆我們教堂十字架的時候，我並不是要為六噸多的物質十字架殉道，而是作為一個基督徒，面對不公義的時候，良心催逼我以個人的力量盡自己的本分。但願我能更多體會‘基督呼召我原是要為祂去死’的意思。”。溫州傳道人張制：“我堅決反對政府

強拆十字架，對於政府若繼續一意孤行強拆十字架，如果上帝賜我有如此榮耀的機會，我願意為著信仰的緣故，為著守護我們的十字架，走上為主殉道之路”。溫州傳道人葉萬淨：“我對妻子和兩個女兒說，如果我真為此事件死了，你們不要太難過，為義受逼迫是有福的！”。到底是什麼力量，使這些傳道人願意為十字架殉道呢？

這次浙江政府蓄謀已久、興師動眾的鏟除十字架大逼迫，起因就在於他們眼中“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是基督福音及其公開化、社會化。這個討厭的地方不僅在於在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看來，十字架意味著這是“共產黨的天下還是基督教的天下”，也意味著“十字架背後的政治目的”（見 2014 年 3 月 28 日浙江各級政府電視電話會議記錄），按照當局的理解，這個目的就是以西方普世價值來顛覆中共意識形態、滲透和占領中國人的思想精神，簡言之，十字架代表著基督教作為西方國家意識形態滲透工具；而公共空間裏的十字架，意味著西方意識形態及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和擴張。而這些意義，恰恰就是中國政府最為討厭十字架的地方。

正如在加拉太書中，“十字架討厭的地方”正是猶太人所逼迫、保羅所要持守的核心一樣，作為中國基督徒，他們堅守的，也恰恰是中國當局所要嫉恨的。無論當局怎麼樣扭曲十字架的意義，在信徒眼裏，十字架就是我們信仰的根本標誌，是耶穌基督得勝魔鬼撒旦的象征，是信徒得到救恩的道路標誌，是公義慈愛的三位一體上帝的榮美樣式。拆毀、棄絕十字架，是對基督徒的上帝、救恩、信仰本身的挑戰和侮辱。所以，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應該有從天而來的巨大力量，來維護十字架的尊嚴。十字架“令人討厭”，當局仇視、摧殘十字架，但我們要尊崇、保護、捍衛十字架。

保羅明知傳福音，傳十字架 會遭受逼迫，他仍然在傳，正如提摩太後書 3:11-12：“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難。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從這一切苦難中、主都把我救出來了。不但如此、凡立誌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今天的中國基督徒，雖然在捍衛十字架的過程中，肯定要遭受迫害和鎮壓，但我們必須要為信仰而戰。這次浙江強拆教堂及十字架以來，湧現出眾多可歌可泣的衛道、殉道聖徒。從三江堂長達一個月的保衛戰到這次平陽的信徒以死抗爭捍衛十字架，到眾多基督徒、傳道人聯署簽名信、通過各種媒體傳遞抗議和請願，都可以看到中國基督徒抗議精神正在迅猛的滋長著，為了福音的緣故，相信更多的基督徒會義無反顧地投入反抗和阻止強拆的洪流中。

馬太福音 5:10-12：“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

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但願今天的中國基督徒，繼續堅守聖道，堅持十字架的道路，即使忍受各樣的逼迫也在所不惜。願上帝祝福那些還在繼續抗爭的基督徒們。

第二篇 基督教教案與信仰維權

“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

——約翰福音 1:5

一、2013 年中國基督教十大受迫害教案

2013 年是中國家庭教會繼續受到無神論共產政權打壓的一年，毫無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會讓家庭教會合法化和公開化，相反，它持續地對信徒進行騷擾、逼迫甚至抓捕和判刑。與此同時，中國的“合法教會”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也由於教產、信仰活動與政權發生眾多摩擦，基層三自會牧師、信徒和教會受迫害案例不斷湧現，讓世人看到連三自會都處境艱難，更何況家庭教會呢？以下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的 2013 年一年內發生的比較有影響的基督教教會及信徒受迫害案例：

1、黑龍江伊春孫文先牧師被毆打、教會受逼迫

2013 年 2 月 19 日（正月初十）晚，黑龍江伊春友好區家庭教會友好教會孫文先牧師在教會被前來騷擾的兩名當地警察毆打，報警無警察前來，孫牧師心臟病發作住院。住院期間被二十四小時全天監控，連病房裏都是監控的人。接著當地民警、社區、街長四處明察暗訪尋找孫牧師的“反黨證據”，檢查教會的財務狀況。伊春市國保也同時進入伊春市的其他各個林業局區，檢查當地教會的賬目，調查詢問信徒，禁止伊春之外的人員進入伊春的教會。伊春市的教會同工被跟蹤，家人也被威脅恐嚇。據信此次迫害是因為友好教會堅持家庭教會路線，並因教產與當地政權發生摩擦導致的。另外，孫牧師積極參與社會關懷活動，參與守望教會戶外敬拜和六四周年簽名，也成為被當局打擊報復的原因。北京長老聯禱會為孫牧師受迫害發出聯禱呼籲。事件受到海外媒體的廣泛關注。

2、河南兩家庭教會受衝擊；美國牧師及宣教士遭軟禁調查

2013 年 4 月 20 日，基督教逼迫大省河南南陽一家庭教會培訓會遭到警方衝擊，參與該培訓會的著名美國教會領袖包德寧（Rev. Dennis Balcombe）被軟禁調查一天後釋放。原定三天的培靈會，參加者來自溫州、湖北、河南等地，有 70 人左右。早上開課不久，國保、警察、宗教局數十人衝擊進來，沒有出示任何證件，就打開

各種器材拍攝。一位弟兄拍攝他們執法過程的數碼相機被強制扣下，參會的每個人被強制摁手印和掌印，作問詢筆錄，簽字畫押。與會者還包括來自省內外以及香港復興國際事工的包德寧牧師和兩位女同工。在他與當地教會領袖離開時，包牧師和他的同工仍被軟禁。包牧師失蹤後，各方對他的安全非常關注。美國國務院官員專門致電對華援助協會傅希秋牧師，詢問其下落，希望提供協助。不久得到消息，包德寧牧師被當地宗教和公安部門調查一天後，歸還個人物品得以釋放。

2013年6月5日，河南省信陽家庭教會20多弟兄姊妹聚會，由張義南牧師請美國的瑪麗和高陽夫婦分享《聖經》真理。聚會中遭到信陽公安局、宗教局、派出所、河南省安全廳十幾人的聯合沖擊，張義南和美國夫婦遭到抓捕。張義南牧師是中國家庭教會史學者。而這兩位美國夫婦從1995年起就在中國做慈善事工，在兩所大學任外教並在大連、貴州、遵義等地作宣教士。當局還以傳喚為名，下達了取締教會的通知書，扣押了教會的奉獻箱和電腦、光碟，包括張義南講道多年的和合本《聖經》，也被拿走。當局讓張牧師去三自教堂聚會。張義南拒絕參加三自。這是繼2010年7月28日之後，又一次大規模沖擊張義南牧師所在的教會。

3、海南眾多家庭教會遭政府取締

5月26日海南省三亞市和散那教會主日聚會的時候，宗教局和居委會大約七八個人來，發了一張公告，題目是《紅旗街社區關於自行解散不規範和非法宗教聚會點的公告》，要求信徒到三亞市已經登記的場所聚會。當地社區居委會給房東施加壓力不讓教會繼續租房子，限15天之內必須搬走。該教會的負責人，還被限制去香港參加特會，說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

26日當天，三亞市的新居教會、以琳教會和伯特利教會三個家庭聚會點也被當地政府所威脅和逼迫。兩周以前，三亞的蒙愛教會、和興教會等三個家庭教會的聚會點也被關閉。海南海口的家庭教會有七八個教會已被取締。海南省保亭縣也有教會被取締。這是在一個省內發生的家庭教會被短時間內取締的大規模迫害教案。

4、山西太原恩雨書房兩基督徒以非法經營罪被判重刑

2013年6月17日，山西太原恩雨書房教案一審宣判，以非法經營罪判處任拉成弟兄五年，並處罰金一萬五千元，以同樣罪名判處李文習弟兄有期徒刑兩年，並處罰金六千元。此教案表面上看是因為恩雨書房“非法經營”贊美詩歌本及福音書（經山西省新聞出版局鑒定，查扣的《贊美詩歌》等4557冊和《盼望》等4308張

光碟均屬非法出版)，實際上是山西當局對基督教的蓄意迫害和直接歧視，是為了懲罰任拉成弟兄向山西大學生等民眾宣教、李文習弟兄開基督教書店傳播基督教文化而實施的。兩弟兄不服，向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朱久虎律師和夏鈞律師作為上訴辯護律師。他們還就原辦案公安機關把書店非法罰沒的正版基督教書籍（也是所謂定罪證據）私下作為廢品處理而大量流失在太原圖書批發、零售市場一事，向太原市中級人民檢察院和上級法院控告，但被拒絕受理。2013 年 12 月 12 日，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不公開開庭審理，作出了維持一審的荒謬判決。

5、河南開封、鄭州、安陽市三自會教產受侵害、引發抗議

2013 年 6 月 13 日早上，為抗議 2000 畝教產被國營林場占用長達 40 年、部分土地被當地職院占用 10 年、今年部分土地又被城市道路建設占用，且市政府長期不作為，河南開封市基督教兩會組織當地六個基督教堂的牧師及同工 700 多人，在開封市北郊進行維權活動，要求市政府落實之前的決議，歸還被占的教產。

6 月中旬，位於鄭州市西三環的孫莊基督教堂，因孫莊村委會突然宣布要進行改造，剛重建不到一年的孫莊基督教堂面臨被強拆。教堂被停水停電，教堂門口還被堆滿泥土，信徒只好守在教堂裏面，以防拆遷隊把教堂強制拆遷。信徒們在網絡上呼籲、向宗教當局陳情，抗議當局對教會教產權利的肆意侵害。

10 月 28 日，河南省安陽市，大批基督徒在市政府門前聚集，抗議教會地產被侵占。基督徒們手持印有十字架標記的圖片，秩序井然地在市政府前廣場道路上站成一排，表達訴求。

6、守望教會持續受迫害、戶外敬拜信徒被毆打

2013 年 8 月 4 日周日上午，北京守望教會的基督徒金韶華和其他信徒在中關村進行戶外敬拜時，慘遭多名國保和便衣人員採取卡脖子、拳打腳踢、擰胳膊、踢胸口等手段暴力毆打，在金韶華及眾信徒被拘禁在派出所及鐵籠內期間，金韶華曾多次要求到醫院就診，救護車兩度到派出所，但都被警方驅離。金韶華在遭迫害過程中多次呼喊：“公安打人”“宗教自由”，警察置若罔聞。這起事件是守望教會自戶外敬拜以來，警察表現極為惡劣和野蠻的一次，應該遭到中國所有基督徒和公義人士的譴責。北京守望教會因被當局剝奪教產無法舉行室內正常敬拜的情況下，不得不於 2011 年 4 月 10 日開始進行戶外敬拜，唱詩讀經、敬拜上帝，每周堅持不歇，至今已逾兩年多。兩年多來，北京公安部門仍然扣押守望教會已經付款幾千萬的房

產不予交付使用，其實質已形同搶劫；而每次的戶外聚會，守望教會信徒都被警察圍追堵截，凡去中關村平臺敬拜的信徒一律被強行抓到派出所，審問後釋放，期間夾有暴力對待。守望教會基督徒因為堅持戶外聚會而被公司、單位解聘，被房東解除租約，被談話、騷擾者非常之多；兩年多來，守望教會的金天明牧師、李小白牧師、曉峰牧師等幾位牧師，24小時被軟禁在家，住家門口都有保安、警察監控。

7、河南平頂山葉縣教案二審庭審、維權律師呼籲信仰無罪

2013年9月27日，在河南平頂山葉縣所謂“呼喊派”邪教教案二審開庭。此案源於2012年4月14日，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動員了上百人的警力，以“呼喊派”邪教名義，對葉縣任店鎮大營村基督徒聚會處（也稱“地方召會”、“小群”）的家庭聚會點進行了圍捕，當場抓走了52人。之後，葉縣檢察院對其中7位基督徒批准逮捕，葉縣法院一審判決韓海等7人犯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並被判3年到7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案件二審原定於2013年7月4日開庭，但又延期到9月27日。在二審庭審中，李貴生律師、趙永林律師等10多位律師據理力爭，勇敢無畏地為七名基督徒被告作無罪辯護，並指出此案所謂的邪教認定毫無憑據，進一步闡明了世俗政權、司法機關制定和審判邪教罪是非常荒謬的，並強烈批評二審法庭在審判程序上的不公正。維權律師並打出“信仰無罪”的橫幅。海外對華援助協會網站也發布多篇評論和新聞捍衛葉縣基督徒的信仰權利。此案二審除少數信徒取保候審外，其他的都被維持原判。

8、河南南樂教案駭人聽聞、基層三自會也自身難保

2013年11月16日上午，由於教產糾紛和主持當地社會公義，河南南樂縣三自會主席張少傑牧師在南樂縣基督教會和政府部門的人交談，突然進來十幾個警察，把張少傑牧師強行綁走，至今沒有下落。他教會的20多名信徒也在當天被抓，張牧師的辦公室和家庭被查抄。事發後，夏鈞等維權律師組成律師團前往當地，但受到當地政府部門的毆打、圍攻和無理阻撓，無法與當事人見面。對於公安機關踐踏法律的野蠻行徑，當地檢察院也不受理。當地政府還雇傭眾多男女流氓，野蠻地圍攻、毆打和圍困前去南樂參訪的媒體記者、前去參與信仰活動的三自會牧師、各地信徒和維權律師。多名律師被毆打、深圳傳道人曹楠被毆打還被當地公安行政拘留，當地政府還持續地抓捕信徒。

南樂地方政府迫害教會的行徑引起世界媒體的關注和海內外信徒的譴責。對華

援助協會發起《就南樂教案致國家宗教局和全國兩會的公開信》簽名活動，南樂當地信徒也前往上海全國兩會投訴，上海多名基督徒和維權律師到河南省公安廳控告南樂地方當局踐踏法律的暴行。此案至今還在持續中。

9、陝西子洲家庭教會信徒與政府講理反遭嚴酷迫害

2013年12月9日，陝西省延安市寶塔區基督徒封天棟出租屋裏，來了六個便衣警察，將其反扣在地上。其中有個女的自稱是國保隊長，把家裏翻得亂七八糟，最後強制把人帶走，並拿走了家裏的電腦等物品，沒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續。

此案要從2012年1月13日說起，那時基督徒公民劉星星等來到陝西省子洲縣何家集鎮過洞村的公民薛玉霞家裏，過基督徒正常的信仰生活，被子洲縣公安局以“涉嫌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為名實施刑事拘留。2月13日，陝西榆林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決定對劉星星和薛玉霞兩人勞動教養一年六個月。薛玉霞是公民封天棟的妻子，抓她的時候封天棟不在家，封天棟從此不敢回家。2013年11月12日，封天棟參加了信仰與法律的普法知識培訓，他講述了自己的遭遇。於11月15日早上，在親友和教會弟兄姊妹的鼓勵下決定到派出所了解情況，15日封天棟一行約40人到達派出所，封天棟、姜毛、張寶林等6人進入派出所所長辦公室與劉曉峰（二級警督，警號：037967）溝通，但劉所長卻擅離職守翻牆跑到派出所外面。

由於劉曉峰所長肆意將此事擴大，當地在子洲縣縣委副書記、代縣長葉慶隆的支持下成立了“1115專案小組”，利用榆林地區冬季嚴打整治“百日會戰”之機，對子洲家庭教會進行大肆迫害。不久後，子洲家庭教會的三名基督徒封天棟、張寶林及姜毛被指涉嫌聚眾沖擊國家機關，先後於11月及12月被捕。警方並通知其中一名信徒的代理律師，稱將向檢察院提請逮捕，估計在元旦後就會收到逮捕通知書。據了解，被捕信徒的家屬可能受到當局威脅，部分人不敢講述受害者遭遇，更不敢接受媒體採訪。對華援助協會等海外基督徒援助機構、媒體對陝西當局以所謂“非法沖擊國家機關”等罪名打壓基督徒表示憤慨，呼呼各地基督徒及國際社會關注子洲教案，同時將繼續跟進事態發展。

10、中國家庭教會聯合會張明選等牧師及其教會受持續迫害

2013年3月6日，中國家庭教會聯合會的副會長、山東省的戰剛牧師，抵達黑龍江省伊春市，探望被當地政府官員打傷的孫文先牧師，被國保、宗教局等人員扣

押在賓館，反復遭審訊、威脅之後，於次日獲釋後離境。

2013年7月4日，是中國基督家庭教會聯合會成立八周年，該聯合會成立不久就遭政府取締，八年來它受到政府宗教、公安等部門長期打壓，四十多次被公安、宗教部門抓打趕追和取締，公安還常年對他們教會進行網絡攻擊。但他們在各種逼迫中都能靠主得勝，積極地在艱難困境中進行維護信徒信仰權利的活動。

2013年7月24日，中國家庭教會副會長戰剛牧師帶領的山東膠州兄弟教會的聚會場地，因房東受到當局壓力，不再續租，逼迫搬遷。

2013年9月26日，中國家庭教會聯合會會長張明選牧師向河南唐河縣法院遞交行政起訴狀，狀告唐河縣公安局、社旗縣公安局侵犯其基本人權自由，無故拒絕給其辦護照、禁止其出國。8月5日，張牧師到唐河縣公安局申辦護照，並繳納各種相關費用。但第二天，他得到對方不發護照的通知。張明選牧師遂去詢問；對方稱，他的戶口在社旗縣管轄時，在網上公布的不準出境名單中有他的名字，要他找到社旗縣公安局消掉名字後才能辦理。

2013年12月14日，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聯合會會長張明選牧師在北京傳道及探望了被官方長期打壓的守望教會牧師金天明後，被十多名北京國保軟禁在其下榻的酒店，並被強迫離開北京。

二、基督教教案與推進中國宗教自由與法治

對華援助協會於 2014 年 1 月 28 日召開中國宗教自由與法治研討會，議題之一就是總結 2013 年發生的諸多教案、維權律師等社會各界的維權過程，並探討這些教案對推動中國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意義。

回顧 2013 年，中國發生了諸多影響海內外的基督教教案，如山西太原恩雨書房“非法經營罪”教案、河南平頂山葉縣“呼喊派”教案、河南南樂基層三自會教案、陝西子洲家庭教會與政府講理反遭迫害教案等等。這些教案受到了國內基督徒維權律師、海內外基督徒的熱忱幫助，對營救受迫害的當事人、推進中國宗教自由和法治進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當一件教案發生時，維權律師和海內外基督徒介入教案的一般模式是：微博推特等媒體告知迫害案例的發生——維權律師介入——維權律師與當事人見面——海內外媒體呼籲營救、眾肢體禱告呼籲——維權律師參加一審——維權律師在媒體公布各種法律文書——律師參加二審——媒體和眾肢體同時呼籲。如此模式在諸多教案中被自發運用，海內外基督徒積極參與其中，海內外輿論和維權律師被充分調動起來。此模式不僅為個案的公正處理，也正在為中國的宗教自由與法治進程，做著有益的嘗試。

就宗教自由而言，基督教教案無一不提醒世人關注中國的宗教不自由、尤其是基督教不自由的狀況，每一個教案的發生，都是對當局對外散布中國有宗教自由的謊言的揭穿，也都是呼籲海內外各界力量關注中國宗教自由的契機。宗教自由不是抽象的，它包括聚會敬拜的自由、宗教書籍音響的出版自由、宗教法人主體註冊的自由、教產權利、政不干涉宗教、各個教派法律上的合法性等等宗教自由權利。

在太原恩雨書房教案中，基督徒書籍、音響的出版自由受到了海內外的關注，在中國只有官方的出版機構才能出版基督教書籍，而基督徒為了聚會便利自己印制的讚美詩也被定為“非法經營”，如此的不自由應該受到舉世的譴責。

還如在河南平頂山葉縣“呼喊派”教案中，基督徒維權律師們對國家政權定義

邪教罪、審判邪教罪的違憲行為進行了一次有力地提醒、糾正和控告。國家不能制定邪教罪，政權無權干涉宗教的正邪問題，這是邁向宗教自由的關鍵一步。當局定葉縣基督徒為邪教的依據，一是《刑法》第 300 條文及其司法解釋（註 1），二是兩份專業鑒定：河南平頂山市國內安全保衛和反恐怖支隊的鑒定書和河南省新聞出版局出具的鑒定書。維權律師李貴生律師在法庭上大膽指出：葉縣教徒是否是邪教，不應由不懂宗教的檢察院和法庭而判定，宗教之正邪，應該有宗教專業人士來確定。這一大膽辯護，有力地質疑和否定了邪教罪，因為現行《刑法》第 300 條中的邪教罪的鑒定，完全是由公安部門等國家政權機關濫用職權確定的。根據現代國家政教分離的憲政原則，政府和法院沒有屬靈的權柄判定宗教的正邪。宗教及教派是否符合正統、是否是異端，完全是宗教內部、教派之間的事情。

另如在河南南樂基層三自會教案中，張少傑牧師等信徒為維護教會教產權利，多次上訪北京。當局為此惱怒不已，以擾亂社會秩序等罪名抓捕教會牧者及信徒。海內外信徒的網絡呼籲、維權律師的挺身而出，都是在肯定基督教會應該有教產權利。但在目前中國，不僅家庭教會毫無教產權利的保障，連三自會的教產權利也名存實亡。南樂教案再次將中國基督教會教產權利的匱乏公之於眾。

就基督教教案對推進中國法治進程而言，維權律師們功不可沒。他們在充分運用和尊重現有法律、尤其是《刑事訴訟法》情況下，要求司法機關也切實遵守現有法律的規定，執法者不能犯法。每一件基督教教案，就是做不到實質和結果的正義，也要做到程序和訴訟過程的正義。例如在太原、葉縣、南樂、陝西子洲等教案中，維權律師把維護當事人接見律師的權利當做重中之重。

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36 條規定：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第 37 條規定：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在南樂教案中，夏鈞等維權律師前往當地看守所、公安局，依法要求會見當事人。但當地司法機關公然踐踏現行法律，剝奪當事人會見律師權利，夏鈞律師不得白天打燈籠尋找張少傑牧師，舉世嘩然。在海內外基督徒、媒體、維權律師的壓力之下，2014 年 1 月 15 日，劉衛國律師終於在看守所會見了當事人張少傑牧師。這一成果應該歸功於維權律師們捍衛法治的不懈努力。

在太原 3.28 恩雨書房教案中，出現一審偵查機關違法倒賣被扣押做證物的圖

書事件，面對這一明顯違法刑事訴訟法的瀆職行為，任拉成弟兄的辯護律師向太原法院正式提起了行政訴訟。控告兩被告：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和太原市文化市場行政綜合執法大隊行政違法。

面對中國險惡的法治壞境，在每一起教案中，維權律師們都不得不採取眾多合法但非常規的方法來捍衛法治。例如在葉縣教案和南樂教案中，組成人數眾多的律師團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形成聲勢以應對當地囂張的違法勢力。律師團的出現對維權律師們捍衛法治是有效和有益的。維權律師們也采用及時公布各種法律文書、拒絕出庭、到各司法機關上級部門控告該機關、聯合海內外媒體、聯合當地基督徒等等有效的方法，來推動司法當局切實履行現行法律，切實保證司法公正和程序正義。

在 2013 年，伴隨著眾多海內外矚目的基督教教案，湧現出了一大批關心中國家庭教會和中國宗教自由的基督徒肢體，更湧現出一批鬥誌昂揚、業務精湛、執著於推動中國宗教自由和法治進程的維權律師們，儘管越來越險惡的中國政治、宗教、法治環境致使他們的努力屢次遭到打壓和迫害，但他們屢敗屢戰、越挫越勇，美好的未來在等待他們。我們相信他們在公義和慈愛的上帝護佑下，他們的每一滴汗水、每一次的擔當，都不是白白付出的，都會對中國的宗教自由和法治進程的形成有效地推動和有益的貢獻。

展望 2014 年，相信基督教教案維權，會在推動中國宗教自由和法治進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加顯著的成績。一切正如《聖經》希伯來書 10:35：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

註 1：中國《刑法》第 300 條規定：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1999 年 10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 1079 次會議、1999 年 10 月 8 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委員會第九屆第 47 次會議通過）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1999 年 10 月 30 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指出：“刑法第三百條中的‘邪教組織’，是指冒用宗教、氣功或者其他名義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說等手段蠱惑、蒙騙他人，發展、控制成員，危害社會的非法組織”。

三、律師介入基督教案的重要性

海外媒體認為今年 10 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專題討論依法治國，《聯合早報》8 月 31 日報道稱 這是中共首次在中央全會上針對法治建設進行專題討論，中國人乃至國際社會都在期待中共能“依法治國”、“依法治黨”。雖然法律在中共政權眼裏並不值錢，但是“依法治國”這塊遮羞布它還是不願意扔掉。中共政權管理社會並與國際社會交往中，也確實感到法律的重要性，這些因素都促成了中國法律目前還沒有徹底走到盡頭，還有可以運用的價值和地步。而維權律師們的不歇努力的根源，就在於他們還是認為中國法律也有一些可以拿來維權的精神和條款。而就眾多教案而言，由於律師的介入，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及其他法律權利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如在今年發生的曹縣教案中，由於維權律師的參與，很多被抓的信徒被取保候審。2014 年 6 月 25 日，山東曹縣警方抓捕了 20 多名基督徒，誣以“反黨邪教”罪名刑拘。情勢危急，在受害者家屬的同意下，“百年輪回——曹州教案律師關註團”成立，律師團成員：李貴生，趙永林，王朝嶧，付永剛，劉書慶，劉連賀，張海，荊高傳，王學明，劉金濱，嶽金福，鄭湘，陳建剛等。律師團很快奔赴曹縣辦案，在律師們依照現行法律的、非常專業的據理力爭下，截止到 2014 年 7 月 23 日，警方通知取保的有：唐照汝、張慧玉、閆喜明、蘇全剛、劉思省、姚發義、陳麗圓等 7 位信徒。陳建剛律師在《曹縣教案進展通報》中寫道：“我們贊賞曹縣警方對部分當事人及時取保候審，以免擴大違法程度，加劇對無辜者的侵害。但是信仰無罪，我們絕不接受以承認所信基督教是邪教、以自己認罪，‘脫離邪教’為條件的取保候審”。

8 月初，湖南邵陽當局羈押了 13 名教會領袖及信徒。邵陽教案爆發後近 20 名維權律師迅速趕往湖南邵陽，為各自的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律師們和被抓的基督徒家屬去當地公安部門交涉。律師們用法律條款指控當地公安濫用公共權力，以莫須有的罪名進行宗教迫害。如果任意抓捕具有正常信仰和進行正常宗教活動的基督徒，將來上庭時警方和公訴方將會鬧出笑話，甚至會被受害人及其家屬提出刑事控

告。律師們的努力沒有白費，截止 8 月 27 日為止，邵陽教案所有被捕基督徒都被釋放。

另在最近發生的以迫害廣州良人教會和基督教幼兒園為特征的柳州教案中，5 名基督徒被捕後，8 位維權律師組成維權律師團，趕赴柳州。雖然至今沒有爭取到取保候審，但爭取到了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 36 條規定律師會見當事人權利。使當事人能在獄中權利有一定保障。

由於律師的介入，9 月 5 日，柳州魚峰區教育局張姓局長到幼兒園送達撤銷行政處罰決定書，撤銷理由是“案情發生重大變化”。幼兒園委托的律師曾就此致電法院，查詢正被行政訴訟的魚峰區教育局案受理情況，法官解釋是政法委書記命令教育局撤銷行政處罰決定，原因是如果開庭審理，教育局沒有處罰幼兒園的有力證據，必輸無疑，於是教育局撤銷行政處罰。可見法律在此起到了威懾作用。

但到 9 月 12 日，教育局再次發出《行政處罰通知書》，處罰內容與前一份大致相同。對於教育局撤銷對幼兒園的行政處罰決定後，再作處罰決定。柳州案代理律師聞宇說，處罰決定書曾寫有“幼兒園有權要求舉行聽證會”：“通過聽證會才能作最後的決定，上一次他們沒有舉行聽證會就作最後的決定，這是違法的，所以律師去法院起訴，他們就趕緊把處罰決定撤下，但是他們馬不停蹄，剛剛撤銷沒幾天，他們又跑過來要處罰，這回他們說會舉行聽證會，我們肯定會要求舉行聽證會”。可見，由於運用法律武器，起碼贏得了舉行聽證會的權利。

另在溫州平陽教案中，當地公安非常害怕律師介入教案，採用各種手段阻止當事人委托代理律師。8 月 27 日，當代理律師王宇等陸續到達平陽時，平陽縣公安局拒絕接待律師。後來，被抓捕的信徒謝作忠竟然從看守所打出電話給多位律師，就一個要求，要求律師回去，不要過問平陽迫害基督徒的案件。顯然，這是受公安的脅迫所致。但這也說明了當地公安是如何畏懼律師的介入。

由於神學觀念和眾多歷史原因，基督徒受迫害後大都不願意訴諸法律，這在這次浙江拆十字架事件中表現的非常突出。根據目前的形勢，基督徒們在受迫害時，第一時間想到的首先應該是法律武器。在王紅傑律師《法律去哪兒了——就拆教堂、拆十字架系列事件致溫州弟兄的一封信》中寫到：“遇到打擊，要麼東躲西藏，要麼以患難為榮譽，不去主張自己的權利，這就是回避法律。又或者花錢找關係疏通關係換得一時平安，這就是勾兌法律”。“用法就是自己的權益被侵犯，要使用法律武器積極維護自己的權益，尤其要勇敢的監督政府，對於政府的任何違法行政行為，要遵守法律的程序進行追究。目前溫州開始聘請律師採取法律手段維權，這也是非常好的開始”。

今年 9 月 5 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 60 周年大會上強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憲政的根本是限制政府的權力，是政權遵守法律。法律之於當局，雖然是一塊遮羞布，但還是有可以運用起來維護公民權益的地方，這就是所謂的“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受迫害的基督徒們應該運用法律武器、積極邀請維權律師介入教案、來申張權利、謀取公義。

這一切，正如王紅傑律師在《法律去哪兒了 ——就拆教堂、拆十字架系列事件致溫州弟兄的一封信》中寫到的：“現在溫州的弟兄該怎麼辦？第一要緊的，就是採取法律的思維和法律的手段，對這些問題做法律的梳理，看看我們哪些合法，那些不合法，有哪些補救措施；對於歷史遺留問題、地方特色問題，我們也要有策略性的做法。對於政府的合法行政要配合，對於不合法的要堅決維權。十字架與我們同在！十字架與法律同在！我們與法律同在！”

四、宗教歧視下的選擇性執法——剖析恩雨書房教案

山西省是佛教大省，以五臺山和雲岡石窟為標誌，佛教寺院和佛教徒遍及山西。按照宗教平等和自由的原則，山西基督教與佛教本應享有同等的權利。但是在信奉馬列主義的山西當局看來，基督教由於其外來性和所謂的“西方性”，不僅不能與佛教相提並論，反倒成了歧視和打壓的對象。這在最近的太原恩雨書房教案和稍早時發生的忻州百年福音堂被強拆事件中充分表現了出來。

2011 年，山西著名教堂忻州基督教百年福音堂被強行拆毀，在原地大規模興建五臺山普壽寺佛學院和佛教休養勝地。此舉除引起當地基督徒抗議外，由石衡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何光滬（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劉秀明（美國普度大學健康及人類科學學院教授）等基督徒學者發起聯名信，呼籲政府停止破壞歷史文物和基督教教產。

今年 6 月 17 日，山西太原恩雨書房教案一審宣判，以非法經營罪判處任拉成弟兄五年，並處罰金一萬五千元，以同樣罪名判處李文習弟兄有期徒刑兩年，並處罰金六千元。此教案表面上看是因為恩雨書房“非法經營”贊美詩歌本及福音書（經山西省新聞出版局鑒定，查扣的《贊美詩歌》等 4557 冊和《盼望》等 4308 張光碟均屬非法出版），實際上是山西當局對基督教的蓄意迫害和直接歧視，這在太原警察對李文習弟兄當面所說的一句話中表明了出來。

據李文習的妻子李彩虹在其微博上指出，警察曾非常囂張地對李弟兄說：“你敢把基督教帶來山西！”。此話露骨地反映出山西當局對普世信仰基督教的敵意和仇恨，其態度之惡劣、動機之野蠻，堪比“拳匪之亂”時的山西巡撫毓賢。毓賢是山西當時成千上萬基督徒蒙難的罪魁禍首，他還在巡撫衙門前親自督導，殺害天主教宣教士 12 位、基督教宣教士 34 位。

正如約翰福音 1:5：“光照在黑暗裏、黑暗卻不接受光”。在基督教已成世界最大宗教、全世界都使用耶穌紀年（即公元紀年）、基督教的文明成果被全世界共享、基督教的價值觀成為普世價值的今天，愚頑的山西當局，卻歧視、排斥基督教，並欲斬草除根而後快，其反文明、反人類的行徑是非常荒謬的。荒謬背後，當然是

把基督教還看作“人民的鴉片”“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西方和平演變意識形態的武器”的思維作祟。

本著這種敵意和仇視，山西當局早已對傳道人任拉成弟兄、李文習弟兄傳福音忌恨已久。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今次以非法經營的名義，開始實施迫害。而這個非法經營罪的罪名，也明顯是對山西基督徒的選擇性執法。

眾所周知，中國的出版、印刷行業都被政府全面控制。民間要出版圖書、音響制品，必須到政府出版社申請所謂的“書號”“光盤號”，除支付高昂的書號費外，書稿和音響內容要經過出版社的三次審查，一切政府出版機構認為不適合的內容要全部刪除。此種毫無出版自由的情形，導致“非法出版”在中國社會成為正常狀況。在首都北京、在各省省會，都有非法出版物集散地，這些出版物大多數是黃色、民間迷信、盜版書，政府“掃黃打非辦”對這些非法出版物並不嚴厲、採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政策。如今年4月，經人舉報後，發現在著名的中國亞馬遜網站上集中銷售盜版書，涉及賣家36家、盜版書目20個。中國亞馬遜如此，更何況其他成千上萬的書店呢？

山西當局對上述的非法出版物網開一面，卻對恩雨書房的書籍和光盤嚴厲查禁、對兩位弟兄嚴加重判，如此選擇性執法更加說明了他們對基督信仰的險惡用心。在沒有出版自由的中國，基督教出版物的出版是非常困難的，最近幾年，一些以學術、婚姻、親子、商業倫理、勵誌等面目遮蓋的基督教書籍，經過嚴格審查後，可以在官方出版社出版，而那些真正有信仰深度、敬拜服事中的常用書，如讚美詩歌集、釋經查經書、系統神學書等等，很難獲得出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們，不得不自行進行印刷，以滿足正常的信仰生活的需要，這樣的動機和行徑，除了在中國和少數幾個國家外，在當今世界的大部分國家，都是合法、合理的（如在美國，在當地圖書館登記個書號就可自行出版）。但在中國，很多基督徒卻因此而被判刑入獄，飽受逼迫。遠的如2005年的蔡卓華案，近的就是恩雨書房教案。

耶穌說：“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約翰福音15:18）這個世界上不公不義之人，對公義慈愛的耶穌，早就充滿怨恨了。山西當局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抱著對基督信仰和普世價值的仇視和歧視，蓄意迫害基督徒任拉成、李文習弟兄，他們的行徑，必然招致天怒人怨。懸崖勒馬、停止迫害，應該是他們唯一的正確選擇。

五、逼迫北京晨光基督教書店為那般？

2013年10月1日，國內目前最大的基督教書店北京晨光書店（五道口店，天通苑店，3927店）連續受到多個相關部門無端的稽查，並找一些牽強的理由進行罰款。據主內肢體確認，當時稽查局的人對晨光書店說這次來辦理的已經不是市裏的部門了，而是直接由國家部門來查，稽查局人員並讓晨光書店自己關店，免得他們直接查封。

在毫無法律依據的情況下，無法無天地直接威脅和恐嚇一個正常、合法經營的書店關門，這在一個現代文明國家的確是駭人聽聞的。到底北京晨光書店做了什麼事情，值得中央國家機關如此興師動眾、聲色俱厲呢？

表面來看，這是與山西太原恩雨書房教案有聯系。恩雨書房教案中被判刑兩年的李文習弟兄就曾任北京晨光書店副總經理，在教案發生後，有關機關多次刁難、騷擾北京晨光書店，但晨光在這件事上不向他們妥協。作為一個在現行法律下合法運營的書店，有什麼必要向有關機關妥協、甚至獻媚呢？

但從根本上來看，逼迫晨光關門，卻與目前中國意識形態“向左轉”大有關係。君不見習近平一上臺，就拿起毛澤東的多種極左方法，否定普世價值，拒絕文化思想的對外開放，實行“沒有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儼然要退回到“文化大革命”或者“拳匪之亂”時代，而在向“毛左”倒退的趨勢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基督教及其文化傳播。

9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拿起不講法治的毛澤東時代的人治法寶——“批評與自我批評”，到河北全程參加並指導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於是全國各地開始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活動。網友和專家們都認為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是以批評代替監督，以黨紀代替國法，是踐踏法治、維護特權的花招，是“文革”的復辟。

10月初，習近平又撿起被國人遺忘多年的毛澤東的“楓橋經驗”，對其高調作了指示，楓橋經驗很快成為中央力推的群眾路線口號。習近平及其官僚集團重走毛

澤東老路已成定局。

10月11日左派理論家周新城在《紅旗文稿》發布文章，指出：“世界上沒有普世價值”，否定私有產權、人權、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

10月12日，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浙江出席紀念毛澤東“楓橋經驗”50周年大會，政法委帶頭引領法治倒退到毛時代。

10月14日，社科院副院長李捷撰稿批駁《晚年周恩來》一書，認為該書對毛澤東醜化嚴重，書中“多處罔顧歷史事實”“用個人想象代替客觀描述”“用斷章取義代替理性分析”。粉飾毛僵屍、企圖借屍還魂。

總之，目前中國政治生活、意識形態領域的“文革化”已形成聲勢，這聲勢應該引起基督徒的關注和警惕。文革”到底對基督徒意味著什麼？文化大革命不僅意味著政治上的階級鬥爭、“砸爛公檢法”、大字報、抄家、遊街，更意味著在宗教信仰上的野蠻荒謬，對基督教的殘酷無情，對西方文化的排斥和滅絕。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6月3日，在北大學生的帶領下，各地學生紛紛起來造反，紅衛兵組織在各地湧現。8月，在“反帝”、“反修”的口號下，北京紅衛兵關閉、搗毀北京市各地教會，焚燒聖經和基督教書籍，侮辱、毆打信徒，此舉迅速蔓延全國。紅衛兵極端仇視基督教，指其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必須斬草除根而後快。

在文革最鼎盛時期，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了“消滅宗教”的口號，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摧毀了國內幾乎所有的教堂和福音機構，家庭教會傳道人大部分判刑坐牢、信徒被批鬥關押。就連中共自建的三自教會都被勒令關閉、解散和停止。大部分三自牧師也坐牢改造，全國除了極少數宗教官員沒受到迫害外，其他一切都被抄家、勞改。

紅衛兵的始祖就是清末的義和團，他們共同的特征就是仇視基督教、仇視西方文明，義和團斷鐵路炸郵局毀電桿，紅衛兵不學數理化砸爛任何來自西方的產品。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大規模屠殺在華傳教士及中國基督徒，據記載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被屠殺。

從歷史看今天，在目前中國“文革”復辟、極左回流、毛僵屍似乎要重新占據意識形態陣地的情形下，基督教及其文化傳播肯定會引起毛左們的仇視。作為近年來對基督教文化傳播作出過卓越貢獻的北京晨光書店，引起毛左宣傳等部門的不滿也在所難免，這些部門威脅晨光書店關門，他們極端狹隘、反文明、反文化的心態，與文革紅衛兵、清末義和團有什麼區別呢？

然而，“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詩篇：29:10）。神的步伐任何逆流都無法阻擋，正如螳臂當車的“清末義和團”“文革紅衛兵”都被掃進歷史垃圾堆一樣，無論是誰，如果再效法“義和團”“紅衛兵”，等待他們的，同樣是歷史的罵名和上帝公義的審判。

2013年10月18日

六、必須將毆打守望教會信徒的惡警繩之以法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2013年7月28日周日上午，北京守望教會的基督徒金韶華和其他信徒在中關村進行戶外敬拜時，慘遭多名國保和便衣人員採取卡脖子、拳打腳踢、擰胳膊、踢胸口等手段暴力毆打，在金韶華及眾信徒被拘禁在派出所及鐵籠內期間，金韶華曾多次要求到醫院就診，救護車兩度到派出所，但都被警方驅離。金韶華在遭迫害過程中多次呼喊：“公安打人”“宗教自由”，警察置若罔聞。這起事件是守望教會自戶外敬拜以來，警察表現極為惡劣和野蠻的一次，應該遭到中國所有基督徒和公義人士的譴責。

北京守望教會因被當局剝奪教產無法舉行室內正常敬拜的情況下，不得不於2011年4月10日開始進行戶外敬拜，唱詩讀經、敬拜上帝，每周堅持不歇，至今已逾兩年四個多月。兩年多來，北京公安部門仍然扣押守望教會已經付款幾千萬的房產不予交付使用，其實質已形同搶劫；而每次的戶外聚會，守望教會信徒都被警察圍追堵截，凡去中關村平臺敬拜的信徒一律被強行抓到派出所，審問後釋放，期間夾有暴力對待。守望教會基督徒因為堅持戶外聚會而被公司、單位解聘，被房東解除租約，被談話、騷擾者的非常之多；兩年來，守望教會的金天明牧師、李小白牧師、曉峰牧師等幾位牧師，24小時被軟禁在家，住家門口都有保安、警察監控。

從以上的逼迫殘害中可以確知，與信徒的理性抗爭、溫和爭取信仰自由權利的言行相反，北京警察迫害守望教會的一切舉動都是無任何法律依據、無任何人的理性可言的，其踐踏法律、驕橫狂妄、無法無天確實讓文明人無法想象。

守望教會基督徒金韶華今次被毆打，不是偶然的，是北京警察知法犯法、暴力執法的一貫表現，再次露出他們無視憲法規定的公民信仰自由權利、無視警察文明執法的各項規定的真實面目。如此的暴行，放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嚴重的違反犯罪行為。因此我們對北京當局強烈呼籲，要查明、追究毆打金韶華等基督徒的兇手，並對其繩之以法；警察打人犯法，絕不能網開一面，必須要進行法律的嚴懲。

羅馬書 12:15：“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我們也希望中國基督徒，尤其是北京的基督徒們，能與正在忍受逼迫患難的守望教會信徒們同甘苦、共命運，為他們禱告、為他們奉獻，如果有聖靈的感動，也可以與他們一起去中關村平臺進行戶外敬拜，來感受為主至死忠心也在所不惜的殉道者精神。

七、南樂教案与晚清教案

2014年7月4日，河南濮陽市南樂教案中的關鍵人物張少傑牧師被南樂縣法院一審以詐騙罪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如此重判，舉世震驚。7月7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莎琪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就中國基督教牧師張少傑被捕一事表示嚴重關切，呼籲中國當局釋放張少傑，並敦促中國停止滋擾張少傑的家人和教友。美國政府的呼籲，似乎對張少傑案二審能夠被輕判或改判帶來了希望。跟其他侵犯人權的案子一樣，當“內政”轉為“外交”，有外國政府（尤其是美國）來呼籲改善中國人權、甚至把中國人權案件上升為外交事宜時，受迫害者也許才有從輕或者免受迫害的可能。

內政轉外交，教案才有公平解決的可能，這一特征，跟100多年前晚清時期教案非常類似。當時很多被地方官吏、士紳殺害的宣教士或信徒，在外國公使和政府給清政府巨大壓力時，才能得到較為公正的解決。除了這個特征，張少傑牧師教案，跟晚清教案還有眾多相似的地方。

根據史料記載，晚清教案始於1842年北京教案，結束於1911年陝西長武教案，連綿70年，與整個晚清相始終，其持續時間之久，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望塵莫及的，其產生的外交糾紛數量，也是同期其他事件所無法比擬的。引發晚清教案的原因很多，有東西文化的沖突、基督教天主教與中國本土宗教的沖突、對西方人的仇視和謠言等等。但有一個原因，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原因在雲南大學學者方慧和胡興東所寫《清末民初基督教對西南民族法律文化的影響》論文中提及：

“很多教案的出現，都是教徒與非教徒，特別是非教徒中漢民士紳，少數民族中土官、土目對自身權力下降的一種反抗，或說是一種不正常手段的結果”。“各少數民族信教後，改變了當地不同民族、家族、階層的權力結構，導致不同群體間出現沖突，同時也產生官方與教民權力上的沖突。如在教民內部產生糾紛時，不再通過家族、宗族、士紳來解決，而是通過教會來解決，導致教民與家族、宗教、士紳和本民族勢力脫離，進而引起這些人的不滿。這從清末教案中可以看出，很多教案都是地方士紳煽動起來的”。（《清末民初基督教對西南民族法律文化的影響》雲

南大學方慧、胡興東著)

可見，引發國際關注的晚清教案的原因之一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教牧人員、信徒觸犯了當地官紳的權力結構和政治特權，引起這些當權者、既得利益者的不滿而引發教案的。這一特征跟張少傑案非常相似，張少傑牧師在腐敗黑暗的河南當地，為捍衛地方的公義，為教會眾多信徒維權，與大企業、各種官僚機構甚至公檢法機關去談判、講理，由於他牧師和政協委員等身份，很多維權個案都獲得了成功，但是，對當地當權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大權旁落、利益受損。張少傑牧師在被抓後，當地官員就傳出要判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恐嚇，足見當權者對作為信徒領袖的牧師的痛恨。

騰訊網轉型中國第 08 期《晚清教案：勿輕言鄉民非理性》一文也指出：“教會對傳統鄉村社會秩序的沖擊體現在諸多方面。譬如：這些既無功名，亦無地位的教民，只要拿著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見地方長官，而地方官懼予教會的影響，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見。1862 年，川督駱秉章曾致函總理衙門說，習教之人，‘恃法國為其教主，常有赴衙門求見，幹預公事。拒之則在外喧嚷，接見則日不暇給’。”可見，晚清時代這些作為社會底層、弱勢群體的信徒們，本來是任官僚劣紳魚肉和欺辱的賤民、屁民，但一旦有教會的支持，就可以成為公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敢於與官府叫板，本來這是公民正當權利的行使，但在蹂躪人民習慣了的當權者來看，的確大逆不道、非要報復不可。

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合編的《清末教案》一書指出：“19 世紀末，西方傳教士被準許在中國傳教和建立教會。由於西人很難接受中國舊式的監獄管理、衛生條件、拷打酷刑，以及凌遲處死等野蠻殘酷的刑罰（當時就有傳教士如文乃爾被地方官判凌遲處死），因此西方的領事被授予處理所有與本國公民有關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權利，即領事裁判權。在治外法權之下，教會的西方傳教士便不受清政府管轄，導致官員感覺到‘官權’受損。此外，當時的中國信徒往往受到清朝各級官員的嫉恨，如易貞美等人因拒絕繳納建醮迎神的攤錢捐份，便被地方官員判處死刑，遭受虐殺；所以傳教士出於人權考慮，要求審判程序正義、禁止私下用刑和刑訊逼供、同等抗辯機會等，正如傳教士自己表白的那樣：‘當我們看到這些受到極不公正的汙辱、由破產性的訴訟而貧窮化或為了獲得和平而被迫背教的新信徒時，那該是多麼令人悲痛欲絕啊！’”（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合編，《清末教案》第四冊，中華書局，2000 年，241 頁）可見，跟中共多年宣傳的相反，所謂治外法權和“教民”與官府的叫板，只不過是當時的宣教士們要求清政府司法公正和人道、能逐漸實現普世價值而已。

目前中國各教會組織固然沒有治外法權，也不在西方基督教占主流的國家的法定保護之下，西方國家頂多能對中國目前發生的教案進行口頭呼籲、媒體報道而已。除非是在滿清時代，南樂這樣的教案才能上升為外交事件。但是，由於張少傑牧師要求司法公正、為信徒維權的所作所為與晚清時代的宣教士的所作所為有很多相似性，所以南樂教案與晚清一些教案很有可比性。

生活在腐敗專制之下的基督徒信眾，在自身遇到眾多不公平事件時，上訪、申訴卻無門，而在這時張少傑牧師就成為這些弱勢群體的救命稻草。作為地方人數不少的教會的領袖、又敢於為信徒維權，而且有著河南南樂縣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兼基督教協會會長、南樂縣第九屆政協委員等特殊身份，所以張少傑牧師的眾多維權活動取得了成功，如南樂縣人趙軍領、陳丁根、張雨晴、嶽麗娜等多人都在張牧師的維權下從官僚機構、當權者手中贏回來公義。這些成功的案例，使張牧師在信徒中威望也越來越高。（參加對華援助新聞網對華評論文章《從張少傑牧師案看社會公義的擔當》）

張牧師維權勝利時的狀況，跟晚清時期宣教士某些時期的狀況非常相似。根據貴州地方史料記載：1903年宣教士黨居仁進入威寧苗族、彝族地區傳教。一開始就接待張雅各、張約翰、潘流便和楊西門四位苗民，並幫助他們把自己獵到的野豬從當地權勢者手中要了回來。這四人信主後又與他人一起進行了一系列與當地官員、地主士紳、土目的鬥爭，教民在教會支持下，連連獲勝。導致當地少數民族大量加入基督教，以致出現“男男女女，從一百裏、二百多裏的遙遠山寨，星夜兼程，雲集昭通”，“他們成群結隊，背著一袋袋幹糧，到村邊泉水飲水、歇腳就走”。（見《民族誌資料匯編》（第五集），貴州省誌民族誌編委會出版，1987年版，第265頁）

但是，正義越得勝，邪惡就越不滿；教會越興旺，官府就越焦慮，無論晚清還是當今中國，都是如此。這是因為渴慕正義的人們終於找到了一個當地的公義象征，一個新的公義中心出現了，人們肯定會擁戴這個中心。但是對於邪惡腐敗的舊權力中心來說，這個新中心對他們威脅巨大，不僅影響聲譽，而且會影響到他們的地位和政權的安全。

正如晚清宣教士們為信徒維權、主持地方正義的行徑遭到地方官吏和士紳的痛恨，官紳們就大肆造謠，煽動非信徒對信徒的仇恨、中國人對洋人的仇恨，終於製造出一個又一個震驚中外的教案一樣，張少傑牧師主持地方正義的一系列舉措和基督教會越來越擴大的發展狀況，引起當地官僚的嫉恨和仇視，他們終於惱羞成怒、羅織罪名，以莫須有的“詐騙罪”“擾亂社會秩序罪”重判張牧師（所謂的受騙者竟然被公安從張牧師家非法綁架走至今被關押在黑監獄中）。中共地方當局之狠毒，

與晚清貪瀆殘暴的地方官吏有過之而無不及。

正如諸多學者拿當今中國比作晚清一樣，從張少傑牧師的教案中，我們更加看清了當今中國社會的確與教案頻發的晚清時代非常相似：朝廷落後頑固、一群反西方反普世價值的義和團或紅衛兵占據中樞；地方官員腐敗專橫、無法無天；而老百姓的各項權利被踐踏、上告卻無門；而一些出於上帝的大愛、伸張社會公義的教會領袖、維權英雄，雖深受民眾的愛戴，但被官府劣紳嫉恨、欲斬草除根而後快。更加不幸的是，當今中國不像晚清時期，西方國家還沒有直接的權力作為外交事件來幹預教案，所以，當一個個中國牧師被判重刑後，能上升到外交層面的鳳毛麟角，大多數只能忍辱負重、背起“十字架”在監獄中渡過漫長的煎熬。

但上帝是公義的，張少傑們在患難中必更加受到上帝的祝福和獎賞，正如馬太福音 5:10：“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而那些貪贓枉法、仇視基督教的各級官吏們，也必然會受到上帝公義的審判。中國社會已經非常相似於晚清，“黑夜已深、白晝將至”，正如辛亥革命的正義江河曾以摧古拉朽之勢埋葬了晚清王朝一樣，上帝公義的滔滔江河、滾滾大水也必將潔淨這個國家、更新這個民族。

2014/7/8

八、關注宗教當局對基層三自會的迫害

在引起眾多媒體和海內外基督徒肢體關注的河南南樂張少傑牧師一案中，人們發現被中共政權非法綁架、至今不能見律師的張少傑牧師不僅是三自會所屬教堂的牧師，而且也是河南南樂縣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兼基督教協會會長，同時還是南樂縣第九屆政協委員。這些較高的位置和職務連同三自會的正統身份，本應該成為張牧師的保護傘，如今卻毫無作用。最近的局勢一再表明，當局迫害張牧師的殘酷手段，與迫害家庭教會牧師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聯想到最近幾年來，中共宗教當局對浙江溫州白象教會、山東濟南長春裏教會、河南安陽教會等基層三自會的侵害，讓我們不得不思考中共宗教當局與三自會的真實關係。

所謂中共宗教當局，主要指的是屬於共產黨組織的統戰部和屬於行政部門的國家宗教局，二者中統戰部起主導作用，二者的大部分幹部都是共產黨員。這兩個共產黨員組成的國家機器管控、監視著中國各類宗教。就基督教而言，統戰部和宗教局不僅管控著所謂非法的家庭教會，也管控著所謂合法的各級三自會。管控的手段一是威逼利誘各地三自會的牧師們順服統戰部和宗教局的絕對領導，一是直接派共產黨員偽裝成牧師把持三自會的重要職位。如此的管控措施使大多數三自會成為對中共俯首帖耳、為其所用的基督教團體。

不過，由於三自會的牧師和信徒，並不都是共產黨員，裏面也不乏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中共宗教當局與三自會之間，既有相互利用和勾結的一面，也一直存在著矛盾、衝突，前者對後者的迫害、鎮壓乃至消滅也在所難免。

三自會創始人吳耀宗之子吳宗素，在2010年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吳耀宗與中國基督教學術研討會”上發布《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我所知道的父親吳耀宗》（以下簡稱《落》）一文，該文在國內被封殺，原因是它揭示了三自會與中共宗教當局間既相互利用又終被後者管控、操縱和鎮壓的關係。《落》揭示在中共取得政權前周恩來至少接見過吳耀宗3次，都許諾中共會保障宗教自由，基督教在“三自”路線下可以合法發展。

但在 1949 年中共掌握政權後，在中共扶植的三自會與宗教當局一起整肅、鎮壓了不參加三自的中國家庭教會先輩們之後不久，中共宗教當局就將整肅和鎮壓的矛頭指向了三自會。據《落》披露，中共宗教當局為徹底控制三自會，一方面對有社會影響力的三自領袖如陸誌章（燕京大學校長）、趙紫宸（燕京宗教學院院長）、塗羽卿（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博士、聖約翰大學校長）採取各種方法加以迫害、驅離權力中樞，一方面派共產黨員全面掌握了三自會實權。《落》作者認為其父親吳耀宗在三自開始運作不久就被架空，而實權落在三自的秘書長李儲文、辦公室主任章潤媛（李的夫人）手中。這兩個人正是世人皆知的共產黨員（李儲文在文化大革命被紅衛兵毆打時暴露了共產黨員身份，後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而具有社會影響的基督教青年會也被對教會毫無感情、極左派打手李壽葆及其夫人施如璋所把持。

可見，三自會也只不過是中共把玩的政治道具，玩弄的目的在於國內管控信教群眾、海外進行宗教統戰。三自會的後臺操縱者完完全全是一批共產黨黨棍。那些對這群黨棍百依百順的牧師們，可以換來名利以苟且偷生，而一旦有牧師不諳三自本質、悖逆這批黨棍旨意，那麼無論你在三自會多高位置，都會引來迫害、打壓甚至殺身之禍。

《落》指出在“反右”前的“大鳴大放”期間，三自會眾多高層牧師出於維護信仰權利和發展基督教的熱心，對宗教當局提了些建議。但這些建議不久就成為罪證。1957 年 3 月 8 日，三自領袖吳耀宗根據全國視察調查結果，在全國政協作了《關於貫徹宗教政策的一些問題》發言，指出若幹地區還未恢復禮拜，起因可追溯到土改：教會的房產被侵佔，宗教生活受到干涉，幹部對信徒的宗教感情不尊重，採取粗暴或侮辱的態度。結果這些建議成為“反右”和“文革”期間共產黨組織整肅吳耀宗的主要罪證。

陳崇桂是重慶神學院院長，三自副主席。受到吳耀宗發言的啟發，陳也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參加了 1957 年政協的鳴放，發言題為“保護宗教信仰，尊重宗教信仰”，結果成為基督教內的大右派，以 73 歲高齡送去勞改六年，等於是死刑的宣判。1963 年宣布摘帽，同年去世。中共宗教當局對待三自高層牧師都是如此無情、毫不手軟，更何況地方上眾多沒有地位的牧師們呢？

雖然改革開放後宗教政策有所寬松，但共產黨要絕對控制宗教的政策本質絲毫沒有改變。眾所周知，由中共黨棍把持的宗教當局，時刻鎮壓、管制著所謂非法的家庭教會，但有不多人知道，三自會也在中共黨棍們的時刻監督和全面控制之中。三自會中如果稍有不順黨意者，中共就會露出猙獰的面目。如 2008 年浙江省溫州

市樂清白象三自教會的“民主選舉事件”，當地三自會的廣大信徒合法、民主選舉出來的教堂管理委員會，卻得不到當地統戰部、宗教局的同意，後者要讓他們的代理人直接操控該教會。後來中共宗教當局竟然動用黑社會和公安國保，抓捕、威脅、毆打多名民選委員。當該教會被肢解、宗教當局的代理人得逞後，當局才滿意。而近年來發生的眾多三自會教堂用地被占用、被強拆教案中，宗教局、統戰部並沒有站在保護宗教的立場上維護三自會權益，反而與當地政權和房產利益集團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管控三自會信眾、迫使他們就範。

跟吳耀宗時代差不多，目前中國的宗教當局——宗教局和統戰部，也都是由清一色的黨員和黨棍所構成的。在他們控制的三自會中，其中不少高層教牧人員肯定是共產黨員，是黨派到基督教界工作的地下黨員。這些地下黨員時刻以牧師的身份欺騙著信徒、忠實地執行著中共宗教當局的政策和旨意。但是，全國三自會裏、尤其是基層三自會的教牧人員中，卻有不少不僅不是共產黨，而且的確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的一舉一動就與黨棍把持的宗教當局產生沖突。在基層三自會裏，也有著不少類似張少傑牧師一樣的教牧人員，他們堅持基督徒的純正信仰、擔當所在地區的社會公義，不理會宗教當局黨棍們的各種無理要求，他們的命運雖然肯定是為主受苦，但也因此能蒙神的喜悅。

總之，通過對三自會與中共宗教當局複雜關係的認識，我們呼籲主內肢體在關注家庭教會被逼迫的同時，也要關注那些因為堅持真理、不與宗教當局同流合汙而遭受逼迫的基層三自會教牧及信徒們，他們也是受迫害者，他們同樣需要我們的幫助和代禱。另一方面，我們也奉勸那些為中共宗教當局賣力賣命的三自會教牧人員，在宗教當局眼裏，你們只不過是他們的工具和玩物，說拋棄就拋棄、說鎮壓就鎮壓，連吳耀宗、陳崇桂等三自最高層都被中共整肅得下場悲慘，更何況你們呢？而你們的唯一選擇，就是盡快棄暗投明、脫離捆綁、拋棄三自、來到家庭教會的懷抱中獲得真正的自由。這正如以賽亞書 61:1-2：“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九、從張少傑牧師案看社會公義的擔當

雲南大學學者方慧和胡興東在其《清末民初基督教對西南民族法律文化的影響》一文中，向國人揭示了一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皈依基督教的鮮為人知的動機，那就是基督教教會及牧師們（尤其是外國牧師）能夠幫助飽受壓迫和欺凌的少數民族維護自身的法律權益，謀求到正常的社會地位。該文也揭示出著名的英國宣教牧師柏格裏、黨居仁不僅在當地布道傳福音，而且幫助信徒維護權益、幫打官司、主持公平、成為社會公義的擔當者。正因為牧師和教會能成為當地的“山上之城”，才為成千上萬的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歸向耶穌基督預備了土壤。

一百年之後，目前中國的局勢跟晚清時期非常相似，貪官汙吏橫行、社會道德墮落、底層老百姓受盡盤剝和欺辱，訴訟、上訪卻無門。在這個“黑夜已深、白晝將至”的最黑暗時期，的確需要基督教會牧師們能出來充當社會公義的維護者和守望者。最近被當局非法逮捕、至今渺無音訊並且不準會見律師的河南濮陽南樂教會牧師張少傑就是這樣的牧師。

根據對華援助協會新聞網最近的連續報道，2013年11月16日，張少傑牧師在南樂縣基督教會和政府部門的人交談，突然進來十幾個警察，把張少傑牧師強行綁走，至今沒有下落。事發後，夏鈞等著名維權律師前往當地，但受到當地政府部門的無理阻撓和騷擾，至今無法與張牧師見面。

張少傑牧師究竟做了什麼，導致當局如此兇狠、野蠻地對待呢？表面來看，這是為報復三中全會期間，張牧師所在教會信徒們因征地問題去北京上訪，實際上是為了摧垮和打消掉張牧師在這一地區的正義形象和地位。張牧師為人正直，經常為弱勢群體說話，為權益受侵犯的人維權，而這一切跟當地政府發生了很大的矛盾。近幾年發生的很多事件，證實了這個判斷：

2009年春節，南樂縣韓張鎮南郭村村民趙軍領，突然發現存折裏的一萬元人民幣不翼而飛，經查，原來在21天前，韓張鎮政府夥同法院私下將趙軍領的錢取走，原因是趙軍領違背了計劃生育。張少傑牧師為此義憤填膺，組織弟兄姐妹去銀行討回公道，最後韓張鎮黨委書記趙君寶（音）將趙軍領的一萬元人民幣完璧歸趙。

陳丁根在南樂縣韓張鎮街頭開了一家電腦維修門市部，因為經濟瓜葛，曾惹怒了政府官員石建國，一天，石建國夥同無業人員，醉酒後撞入陳丁根的門市部無理取鬧，對陳丁根的女朋友大打出手。事後石建國蠻橫不理。後來因著張少傑的出面調解，使雙方達成了私了協議。

張雨晴為南樂縣基督教會孤兒院兒童，她在縣城麗敏牙科矯正牙齒，大夫將一橡皮筋忘在牙齦裏，等發現的時候牙齒高度變形。孤兒院多次找衛生局理論此事無果。後來，張少傑牧師與幾名愛心媽媽聯合一起去衛生局討說法，結果被政府定位無事生非。又說張少傑管教不嚴，嚴重失職。

嶽麗娜是南樂縣寺莊鄉人，因政府處理事件不公，造成嶽麗娜多次上訪、被二年勞教。嶽麗娜仍然堅持上訪，被送精神病院，還被打了毒針，張少傑牧師帶領同工到精神病院，一陣激烈的口戰，終於把嶽麗娜解救出來。

由以上的不勝枚舉的事例我們可以看到：在貪官汙吏橫行、老百姓被欺男霸女而上告無門的情況下，基層教會牧師，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某些地區、社區，公義的象征和正義的化身。在社會日益墮落和不義的情況下，基督教牧師能成為黑暗中的光亮、老百姓的仗義執言者，這實在是榮神益人的一件事。這與當年雲南、貴州英國牧師柏格裏、黨居仁等人成為苗族、傈僳族等少數民族的保護者、維權者是同一個道理。這個事實也鼓勵更多的中國牧師們，能在當地、所在社區“行公義、好憐憫”，成為當地的燈塔和民眾的守望者。

而在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現在的政府連當年清政府都不如，當年清政府對牧師尤其是外國牧師還是非常尊敬的，他們提出的訴訟基本上能公平解決。而今天的中共當局，對主持公義的牧師不僅不尊重，反而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欲斬草除根而後快。根據《清末民初基督教對西南民族法律文化的影響》一文，凡柏格裏、黨居仁牧師出面的案子，政府都非常謹慎，對教會信徒，更是依法維護權利。“在1904年威寧州羊街的團總兼鄉紳李士林(此人是秀才)為阻止當地苗民前往昭通求學、入教，對苗民進行非法拘禁、拴鎖、吊打。案伺發生後，教士柏格裏出面幹預，親自到威寧州見地方官，在地方政府和教會的壓力下，李士林只好認錯賠罪”。

還如相同文章記載：“民國初年織金縣毛草寨苗民王文秀的土地被當地漢族地主黃國成無故強占，按過去的權力結構，王文秀勝訴的可能很小。所以在此事件發生後，王文秀不選擇到官府上訴訟，而是選擇到安順向黨居仁訴說，黨居仁聽後派教民楊慶安持他的名信片到毛草寨處理此案。楊慶安到後，問清原由，責令黃國成退出他所占的土地，黃國成只好認錯退還土地”。

可見，清末民初，起碼西南地區對牧師擔當社會公義的角色，各級政府還是認同的。但是今天，牧師的擔當卻成為對不義政權的威脅，因為踐踏公義的，恰恰就是當局自己。面對如此險惡的局勢，我們一方面呼籲中國政府不要倒行逆施，繼續犯下連清王朝都不犯的罪錯，另一方面，我們鼓勵更多中國教會牧師，效法張少傑牧師，成為所在地區社會公義的擔當者，當成百上千的張少傑牧師出現後，邪惡者也就會被擊退。

十、就南樂教案致國家宗教局與全國兩會的公開信

中國國家宗教局局長及全國兩會（中國基督教協會、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負責人：

鑒於你們是目前主管中國三自會的直接主管機構，有必要將最近發生在河南濮陽南樂縣三自會牧師及信徒被抓捕、律師被毆打和圍攻一事，向你們說明，以維護基督徒的憲法權利、制止迫害並能追究肇事者相關的法律責任。

2013年11月16日早上9點半，河南南樂縣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兼基督教協會會長、南樂縣第九屆政協委員張少傑牧師在南樂縣基督教會和政府部門的人交談時突然被10多位警察綁架、至今下落不明。同時，張牧師教會20多名信徒也在當天被捕、眾多信徒被毆打、教會正常信仰活動因遭受嚴重騷擾幾乎陷入停頓。事發後，多名南樂附近三自會的牧師前往探視卻反遭野蠻毆打，而張牧師的律師夏鈞等律師在長達20天的時間裏受地方當局幹擾不能依法會見當事人。從被捕的12月12日開始，南樂縣公安局等政府機構組織大規模不明身份人員對律師們進行數次群體攻擊、謾罵、毆打，有的律師被磚頭砸到腦部出血，有的律師西服全部被扯爛，有的被強奪手機等等。律師們報警，警察卻遲不出警，15名律師前往南樂縣檢察院控訴，又遭不明身份人士圍攻。南樂當局肆意侵權、無法無天、舉世震驚，神人共憤！

中國國家歷屆領導人都說過：宗教事無小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章第36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宗教事務條例》第1章第3條規定：國家依法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維護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權益。南樂三自會正常的宗教活動被無理破壞、教會牧師和眾多信徒的合法權益被肆意踐踏、周邊三自會和海內外基督徒的呼籲被置若罔聞，一切的跡象似乎回到了要“消滅宗教”的“文化大革命”時代。

眾所周知，對所謂非法的家庭教會的迫害由來已久，但南樂教案讓海內外基督徒看到所謂合法的三自會牧師和信徒，也難以保障其信仰權利。南樂一案，不僅使家庭教會信徒，也使三自會信徒失去對中國宗教自由的信心和盼望；張少傑牧師遭

迫害，不能不使全國數萬名三自會牧師膽戰心驚、人人自危。海內外人士不禁要問：對三自會尚且如此，更何況家庭教會呢？

我們作為海內外的華人牧者、基督徒，雖然不能苟同三自會依附政權的政教關係模式，但三自會尤其是基層三自會中不乏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和教牧人員，類似張少傑牧師一樣敢於“行公義、好憐憫”、擔當所在地區社會公義的牧師是應該受到尊重的，出於同感一靈的肢體關係，我們對南樂三自會教牧及信徒受到的不公義對待表示強烈關注。

既然中國國家宗教局的主要職責之一是依法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動，維護宗教界的合法權益，促進宗教關係和諧；既然全國兩會（中國基督教協會、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作為全國三自會的“行業總會”，其宗旨在於服務和建設中國的教會、保護三自會教牧和會眾的基本人權，那麼，就請你們履行國家職責，切實保護南樂教會牧師和信徒的信仰權利、人身安全權利、依法訴訟權利，尤其作為燃眉之急的，請你們立即制止南樂地方當局踐踏法律的各種暴行、立即讓律師與被捕牧師和信徒會面、立即恢復南樂三自會正常的宗教信仰活動，最關鍵的，請在你們的幹預下，請立即釋放張少傑牧師！

在這聖誕節的喜慶時期，我們最後以這句預言耶穌基督的聖經經文來作為結束，願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使命能夠感化你們。以賽亞書 61:1-2：“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以馬內利

2013 年聖誕前

發起人

傅希秋 牧師 美國

T. S. WU 三自會歷史學者 美國

郭寶勝 牧師 美國

An open letter to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about the Nanle church case

To the direct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of China and the responsible members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Peace be with you.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you are currentl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rganizations directly in charge of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of China and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ights of Christians, to put an end to the shocking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and so as to be able to investigate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perpetrator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provide you with an explanation of the incident in Nanle County, Puyang City, in Henan Province, in which a pastor and the members of a Three-Self church were arrested and their lawyers beaten and mobbed.

At about 9:30 on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16, 2013, as Pastor Zhang Shaojie, president Nanle County's Christian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and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a member of the 9th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f Nanle County, Henan province, was at the Christian Church of Nanle County talking with people from som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more than 10 police officers suddenly abducted him. To date his whereabouts are unknown. Meanwhile, more than 20 believers from Pastor Zhang's church were also taken into custody the same day and many other Christians were beaten, causing serious disruption to the church's normal worship activities, which have almost come to a standstill.

Following this incident, many pastors from Three-Self churches in the vicinity of Nanle County who went to visit the detainees were instead brutally beaten. Also, due to as many as 20 days of interference from local authorities, Pastor Zhang's lawyer Xia Jun and other lawyers have not been able to meet with their clients as required by law. Beginning on Dec. 12, when the detentions occurred, the Nanle County Public Security Bureau and other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have organized a large number of unidentified people to assault, verbally abuse and beat the lawyers. Some lawyers were

hit with bricks until their heads bled, others had their suits completely ripped up, and still others were robbed of their cell phones. When the lawyers called the police to report this, the police were slow in sending officers [to the scene]. When the 15 lawyers went to lodge a complaint with the Nanle County Procuratorate, they were mobbed and assaulted by unidentified people. The world is shocked by the Nanle authorities' lawlessness and wonton violation of rights; the anger of both God and man has been aroused!

Successive Chinese leaders have all said: there are no small matters in religious affair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ipulates in Chapter 2, Article 36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religion. The state protects normal religious activities; the Regulations on Religious Affairs, in Chapter 1, Article 3 stipulates that: the state protects normal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safeguards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sites for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religious believers. Sabotaging without justification the normal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the Three-Self Church in Nanle, willfully trampling on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the church's pastor and believers, and turning a deaf ear to the appeals from Three-Self churches in the vicinity and from Christians worldwide all seem to indicate a return to the "destroy religion" [polic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ra.

As is known to all,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persecution of the so-called illegal house churches. However, the Nanle church case has shown Christians worldwide how difficult it is even for legal and government-sanctioned Three-Self pastors and believers to protect their right to freedom of religion. The Nanle church case has caused not only house church Christians but also believers from the Three-Self churches to lose confidence in and hope for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The persecution of Pastor Zhang Shaojie cannot but cause tens of thousands of Three-Self pastors to tremble in fear and fear for themselves. People worldwide cannot help but ask: If even a Three-Self church is treated this way, how much worse is it for house churches?

Although we, as Chinese pastors and Christian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cannot endorse the state-church relationship model in which Three-Self churches are attached to the government, nonetheless, there are many truly born-again Christians and pastors in the Three-Self churches, especially in grassroots Three-Self churches such as Pastor Zhang Shaojie's, who dare to "act justly and love mercy." These pastors who practice social justice in their localities deserve our respect, and as fellow members of the body of

Christ, we are greatly concerned about the unjust treatment of the Nanle Three-Self church's pastor and believers.

Since one of the main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of China is to protect citizens' religious freedom and normal religious activities, to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religious people and to promote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religions, and since the goals of the CCC/TSPM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are to serve and build churches in China and to protect the basic human rights of pastors and congregations, then, we ask you to carry out the functions of the state and conscientiously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Nanle Church pastor and believers to freedom of religion, to personal safety and to file suit in accordance with law. We especially ask, as an urgently pressing need, for the immediate cessation of the various violent acts of the Nanle local authorities in trampling the law, for the lawyers to be allowed to meet with the arrested pastor and believers immediately, and for an immediate restoration of normal religious worship at the Nanle Three-Self Church. Most critically, we ask for your intervention to bring about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Pastor Zhang Shaojie!

In this festive period of the Christmas holiday, we close with a passage from the Holy Scriptures, in hopes that the prophesy of the coming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mission of Jesus Christ incarnate might move you. Isaiah 61:1-2: "The Spirit of the Sovereign Lord is on me, because the Lord has anointed me to proclaim good news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bind up the brokenhearted, to proclaim freedom for the captives and release from darkness for the prisoners, to proclaim the year of the Lord's favor and the day of vengeance of our God, to comfort all who mourn."

Emanuel!

Organizers of the open letter:

Pastor Bob Fu, president of China Aid Association, U.S.A.

T.S. Wu, academic specializing in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U.S.A.

Baosheng Guo, minister in Chinese church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S.A.

十一、“反邪教協會”是踐踏宗教自由的工具

最近以來，一個叫“中國反邪教協會”的組織引起海內外華人基督教界的強烈憤慨。臺北召會及臺灣基督教界部分人士、福建地方召會、北美召會、中國福音會研究人員等基督教界人士，都對中國反邪教協會於 6 月 3 日頒布的所謂邪教名單表達了反對意見。中國反邪教協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為什麼中共當局要叫它出面頒布邪教名單呢？如何應對中國反邪教協會踐踏宗教自由的各種行為呢？

中國反邪教協會成立於 2000 年 11 月，由所謂中國科技界、社科界、醫學界、法律界、宗教界和新聞界等著名人士組成。這些人有莊逢甘、龔育之、潘家錚、傅鐵山、王家福、聖輝、何祚庥、郭正誼、王渝生等依附於中共當局的社會名流。該協會自命是“弘揚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維護法律尊嚴，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公益性、非營利性法人社會團體。實際上，該協會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為 1999 年開始的鎮壓“法輪功”運動鳴鑼開道、提供學術和宣傳等的支持。短短 10 來年，它在全國幾乎所有省、直轄市、自治區和大中型城市都成立了分會。不僅法輪功，它成立之後，也對與基督教有聯系的信仰團體和眾多基督教教派，以邪教之名進行攻擊，並積極協助當局踐踏宗教信仰自由。

舉國關注的山東招遠“5 28”慘案發生後，6 月 3 日，該協會突然發布 20 種邪教名單，並對主要的 11 種所謂活躍邪教進行了詳細說明。為什麼官方在公安部、國務院等公布的 14 種邪教名單之後，又要由反邪教協會公布這份名單呢？由公安部或其他政權機關頒布名單不是更有法律效果嗎？協會只是民間機構沒有法律效力，由它來發布有何意圖呢？

其中主要的原因可以從《環球時報》記者採訪協會秘書長李安平的文字中得知，根據《環球時報》文章，李安平說：“官方此前從未正式發布過邪教組織名單”，至於早前發布的 14 種邪教名單，只不過是“來自公檢法部門在歷年打擊行動中使用的手冊，用於內部參考”。而這個最新的 20 種邪教名單，是“由協會內來自科技界、法律界、宗教界的反邪教人士共同制定，20 個組織都是當前對社會危害特別嚴重的”。（見環球時報《反邪教協會批駁中國打擊邪教干涉宗教自由說法》文章）

以上可以看到，中共政府已經開始矢口否認它曾經發布過邪教組織名單，所謂的 14 種邪教名單只不過是內部參考的行動手冊。從這一否認可以看出中共當局對自己頒布邪教名單有所忌諱。究其緣由，這是為了避開政權裁判宗教、政權掌控宗教的嫌疑。而由表面上是民間協會的反邪教協會發布，似乎可以讓當局避開由政權來裁定宗教正邪而帶來的政教合一、政教不分的嫌疑，封住西方國家對中共政權干涉宗教的指斥和批評。當然，這也說明中共政權開始意識到由政權來宣布邪教名單對於現代政治來說是非常不妥甚至荒唐的。

由反邪教協會來說“官方此前從未正式發布過邪教組織名單”，這顯然是為中共政權的政控制教行為在洗白，由“民間協會”來認定邪教名單，似乎符合宗教正邪問題不由國家政府，而應由宗教界、宗教和教派之間來界定的國際慣例和普世規則。

中共當局費盡心機成立反邪教協會，並由它來發布名單，主要是為了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但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國反邪教協會顯然不是民間協會，在中共嚴密管制社會團體的今天，類似反邪教協會這樣的組織一定是中共完全操控的工具（法輪功媒體報道其記者費力查詢北京各部門，都找不到這個協會的電話和人員），而所謂最新的 20 種邪教名單，無疑也是中共當局一手炮制的。可見，中國反邪教協會及其名單，實際上是中共當局玩弄世人和蒙蔽西方國家的新花樣，具有很大的欺騙性。

眾所周知，西方民主國家自 17 世紀奠定現代國家以來，就確立了政府不得幹預宗教事務、宗教事務由宗教界自己裁判的原則。著名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在其書《論宗教寬容》中指出了政府官長無權干涉宗教事務的三個原因：

一．誰也沒有責成官長比他人更多地掌管靈魂的事。

二．掌管靈魂的事不可能屬於民事官長，因為他的權力僅限於外部力量，而純真的和救世的宗教則存在於心靈內部的信仰。

三．靈魂拯救的事不可能屬於官長掌管，因為即令法律和刑罰的威力能夠說服和改變人的思想，卻全然無助於拯救靈魂。（見商務印書館 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論宗教寬容》一書）

2014 年 5 月 14 日由中美等國宗教學者、牧師、律師在普度大學發布的《宗教自由普度共識》的第 4 條、第 5 條也指出：“宗教自由意味著對國家權力範圍的一種限制，即國家不能判斷任何宗教或非宗教思想體系在教義和道德上的對錯和正邪，更不能以此作為處罰公民的依據”。“宗教自由意味著國家無權或沒有道德上

的正當性，在‘合法宗教’與‘封建迷信’、‘正教’與‘邪教’或‘正統’與‘極端’之間進行區分和判斷”。

以上可見，作為地球村的普世價值，政權無權界定宗教之正邪。在舉世共識前自知理虧的中共當局明白政府赤裸裸地宣布邪教名單並進行鎮壓肯定會遭致全世界反對，所以它才老謀深算地成立反邪教協會並公布所謂邪教名單。其實這一舉動無非是它踐踏宗教自由、敵對普世價值的新花樣而已。

如何應對中國反邪教協會公布所謂邪教名單及其他踐踏宗教自由的各種行為呢？首先，在所謂邪教名單中涉及到的所有宗教團體，都應該發布聲明，指明自己不是當局認定的邪教。自反邪教協會名單公布後，除其他宗教外，基督教界已經有眾多教派發布聲明：

一. 6月10日臺灣臺北市召會通過媒體對於中國反邪教協會將召會視為“邪教”之一“呼喊派”的錯誤與印象提出三點聲明，指出“地方召會”絕對不是“呼喊派”，無任何資料顯示李常受在1962年成立過“呼喊派”。

二. 6月16日，中國福州地區眾地方召會代表林子隆、陳立、李美全、陳信光等信徒，通過屬靈人網發布聲明，對中國反邪教協會指控“地方召會”是“邪教”提出嚴正抗議，稱這一指控已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三. 6月23日，臺北靈糧堂牧師周神助牧師等臺灣基督教主要教會領袖齊聚一堂，就“地方召會”和“臺灣福音書房”日前遭受中國反邪教協會不當指控為“呼喊派”，發出反對聲音，共同發表對召會的支持，並聲明要到北京去申訴。

四. 北美眾召會聲明自己並非中國官方及其中國反邪教協會指控的邪教，北美眾召會於6月22日，在洛杉磯、紐約、舊金山、多倫多、溫哥華等地區周末發行的《世界周刊》刊登兩頁的通啟，抗議反邪教協會的錯誤指控、證明自己的清白。

五. 中國福音會在其內部通信中指出，被中國反邪教協會列為11種活躍邪教的全範圍教會和反邪教協會的邪教名單中涉及的華南教會，均不是邪教。全範圍教會又名重生派(B. A. M.)，由徐永澤創立於1968年。重生派是一個以河南省為基地的家庭教會網路，成員有數百萬之多。著名家庭教會傳道人李天恩、中國福音會牧師趙天恩、知名中國農村教會史專家張義南等認為重生派不是異端，只是某些地區某些同工在教導方面有所偏差。而華南教會的信條——“華南教會十三條”都是歷代正統教會傳留古老的信仰內容，華南教會也是正統的基督教教派。

當然，發布聲明要作到完美的話，在聲明中最好不僅要為自己教派捍衛宗教自由權利，也應該為其他被反邪教協會定為邪教的教派捍衛法律權利；不僅要將反對

的矛頭指向中國反邪教協會，也應該指向幕後的真正元兇——中共當局。如此的聲明，才算是比較完美的聲明。

除了發聲明外，也應該組織眾多非暴力抗爭活動，如到中國駐各國領事館前遊行、示威、靜坐等，還可以組織論壇、研討會，就此一話題進行深入研究並擴大影響。也可以主動要求中國當局的宗教、統戰或其他部門官員進行對話，甚至直接到北京，進行上訪和申訴。

總之，中國反邪教協會是中共操控的、欺騙全世界的、踐踏宗教自由的工具而已，對其的種種惡行，基督教界不應該沈默。切實採取行動，對邪惡者說不，應該是神的兒女的本色。而邪惡者在整個基督教界的抗爭下，肯定會原形畢露、一敗塗地。這正如聖經 哥林多後書 11:14-15：“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們的結局，必然照著他們的行為”。

十二、正教和所謂“邪教”的法律權利都要維護

中國政府繼山東招遠“5 28”慘案後，不僅認定此案為全能神邪教所為，展開全國性的打壓全能神運動，而且在 6 月 3 日，連續公布兩份邪教名單，將打壓全能神運動擴展到更多的宗教和基督教教派之中。這兩份名單，第一份是以前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和公安部認定的十四種所謂邪教，第二份名單是以中國反邪教協會頒布的 20 多種邪教名單。兩份名單公布後，在海內外宗教界、基督教界掀起了軒然大波，不少信仰團體發布聲明、闡明立場。如法輪功團體指責反邪教協會名單的非法性；臺灣臺北召會、福州地區眾地方召會都發布聲明，嚴正要求中國反邪教協會就非法指控地方召會是“邪教”進行更正道歉；趙天恩牧師創辦的中國福音會，也有成員就“三化異像”（中國福音會、文化基督化、教會國度化）被指控為邪教理念提出反對；更多的中國內地的基督徒在網上發聲，指出只有扶持而不是打壓正教，才能遏制邪教。

如何看待宗教界尤其是基督教界對這兩份名單的各種反應呢？基督教各教派如何對待被中國政府認定為邪教的如“全能神”等宗教團體呢？如何在當局新的打壓邪教運動中，既能保護自己，也能為其他信仰團體說公道話呢？什麼是邪教問題上的正確立場呢？

首先，在中國政府罔顧政教分立、政權無權干涉宗教事務的普世原則，悍然由政府公布和打壓所謂邪教的目前局面下，地方召會和其他一些信仰團體勇敢地表白自己不是國家法律意義上的邪教，也不是宗教界認定的邪教，這是非常有意義的。這是闡明自己信仰、維護自己信仰權利和地位的必要方式，其他被公安部等政府部門和被政府操縱的偽民間組織——反邪教協會所認定為“邪教”的各信仰團體，都應該站出來辨別、告白自己，向世人宣告自己絕不是中國政府法律意義上的邪教。

其次，世界上只有中國政府才頒布邪教名單，這是與現代政治文明完全悖逆的舉動，國家無權界定宗教的正邪、國家沒有邪教罪，這已經是當代法治國家的共識。當局近日頒布的兩份名單，不僅是反法治、反文明、反普世價值的，而且在宗教界也毫無參考價值。中國各宗教、教派絕不要以這兩份名單來判別、界定其他宗教和

教派的正邪，在指出政府無權定自己教派為邪教的同時，也不要認同政府將其他信仰團體定為邪教的舉動。如果認同政府定其他宗教團體為邪教，那等於默認了政府的濫權。而政府濫權的災難會很快臨到自己頭上。

我們看到，無論是臺北還是福建地方召會，在聲明自己不是中國官方及其反邪教協會所認定的邪教的時候，都要在聲明前寫明支持政府打擊邪教全能神。如福建召會的聲明寫到：“2014年5月28日，山東省招遠市發生“全能神”邪教分子毆打無辜群眾致死事件，我們代表福州地區地方召會表示強烈譴責，並支持政府依法打擊邪教的舉措”。如臺北召會的聲明：“‘地方召會’支持政府依法取締邪教行動，包括取締呼喊派及其衍生變異之擾亂社會秩序的邪教團體”。

這樣一種聲明措辭是欠妥的。因為眾所周知，中國政府沒有權力去界定任何宗教和教派是邪教，所以它定“全能神”等是邪教的作法也是非常荒唐的，它以邪教的名義打壓“全能神”也是非常野蠻的。全能神信徒犯殺人罪的，就以殺人罪來處理，沒必要以邪教罪來處理。鑒於沒有任何法律和政府意義上的邪教概念，所以兩個召會的聲明中，認同政府以邪教罪來打壓其他宗教團體，非常不妥當，這只能引火上身、苦害自己。

臺北召會自身的近期經歷就說明了這一點。臺北召會受親共親三自的歐陽家立等人影響，近年來積極與中國三自會發展關係，積極參與舉辦統戰意味十足的“兩岸基督教論壇”，並積極在全臺灣開展抵制和打擊“全能神”等中共認為邪教的宗教團體，臺北市召會還費財費力贊助支持“臺灣基督徒信仰研究學會”的成立，這個組織就是來反對和抵制中共認定的邪教的。但是如此的賣力，最後的結局竟然是吃力不討好，自己卻被列入了中共當局最新的邪教名單中。實際上這一結局也不是偶然的，因為如果默認、贊同甚至支持中共政權有認定和打擊邪教的權柄，那麼濫權者完全有可能肆意妄為、坑害一切宗教信仰團體。

因此，在臺北、福建地方召會的聲明中，不應該贊同中國政府認定任何宗教團體為邪教的舉動，更不應該對當局所謂的“邪教”的宗教自由法律權利被踐踏的局面無動於衷；相反地，在聲明中應該指出，中國政府絕沒有權力去界定任何一個宗教和教派是邪教，政教應分立，政府無權染指宗教事務，更不該有邪教罪。

另一方面，當局兩個邪教名單公布出來後，不少宗教團體以第一個名單中沒有自己，而第二個名單中有自己非常困惑，並認為第二個名單是由民間協會制定的，所以沒有法律效力，言下之意，似乎第一個名單有法律效力。實際上這也是間接承認中共政權有宗教權柄、政府可以判定宗教正邪，所以這也是不對的。

的確，如法輪功、全能神、地方召會等宗教團體並沒有出現在由公安部、國務院辦公廳等頒布的 14 種邪教名單中，但這不能說明什麼，只能說明中共當局認定邪教的隨意性。只要當局安全部門認定某個宗教團體對其有一定威脅，它就可以隨意來定為邪教，並開始打壓。例如中功，在這兩次的名單中都沒有，但當局早就將中功當做邪教來對待。又例如中共對待很多家庭教會，都以邪教來對待，有維權律師親自看到某地區公安部門繪制的邪教分布圖中，幾乎所有的家庭教會都被列為邪教之中。

不僅中共操控的中國反邪教協會（它在宗教界也毫無公信力）公布的所謂邪教名單是反現代文明、反法治、反人權的產物，就是公安部等公布的 14 種邪教名單，也是政權專制、獨裁、政幹涉教的產物，兩個名單都不能作為宗教間、教派之間判斷正邪、異端或極端的依據。宗教和教派的正邪、極端與異端問題，只能交給宗教之間、教派之間，通過文明、溝通、辨別的方式，來最終確定。就是被宗教間、教派間由具有公信力的方式認定的邪教、異端、極端，在國家法律上仍然要保護他們的法律權利，他們同樣有保持自己信仰、傳教、敬拜的自由。

政教分立的另外一層含義是，宗教教派也不能依靠政治權力來扶持自己，更不應該依靠政治權力來打壓其他宗教或教派。就是宗教界公認的正教，也絕不能依靠國家政權、政府權力來打壓宗教內部公認的異端、極端或邪教。例如在美國，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等都被大多數基督教派公認為異端，但他們同樣在美國享有法律賦予的信仰自由權利。大多數基督教派，也只是在講道、訓導中向會眾指明摩門教、耶和華見證人等教義違背聖經，是異端，但絕沒有依賴警察、法院等政府權力機構，來攔阻、排斥甚至打壓異端。

所以，作為宗教團體，不能看到 14 種名單沒有自己名字，就暗自高興、甚至幸災樂禍，繼而與政府聯手，打壓名單上的所謂“邪教”。而當政府名單中出現宗教界公認的“異端”“極端”時，也不要附和政府、依靠政府力量來遏制和打壓宗教界公認的異端或極端。

總之，作為政府，無權判定宗教的正邪、更無權頒布所謂的邪教名單。作為宗教團體，要明白宗教之正邪只是宗教內部的事務，政府的任何名單和界定，都不能作為判定宗教團體的依據。宗教團體也不應該依靠、借助政治權力，來打壓和遏制宗教界內部認定的異端、極端或邪教。宗教團體如果認同政治權力有界定宗教正邪並實施打擊的權柄，那麼不僅違背現代文明，而且最終會禍及自身。對一個在宗教界濫權、越權的政權，如果人們對它稍有姑息，它肯定會肆意妄為、無法無天的。就連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這些舉世公認、宗教界認可的正教，在一些當局培

植的“五毛”論壇上，已經被汙蔑為邪教了，更何況其他的新興宗教和少數人的宗教團體呢？所以，高度警惕中共當局以“邪教”名義打壓諸宗教、諸教派的運動，共同維護諸宗教和諸教派、甚至被當局認定的諸多所謂“邪教”的法律權利，實在是當前中國宗教界共同面臨的當務之急。

2014年6月17日

十三、警惕以“邪教”名義大規模迫害基督教

作為現代社會中的普世價值，國家政府不能界定宗教的正邪、國家不能出臺邪教罪，已經成為大多數現代國家的共識。但中共政權基於其政教合一的本性、謀求宗教領域和屬靈界的霸權，所以一直與國家不得設立邪教罪的此一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並在中國刑法 300 條中設立邪教罪，還多次公布邪教名單。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當局有意通過打壓所謂的邪教“全能神”，來進一步加強對地下教會乃至整個基督教的迫害。

眾所周知，自今年以來，當局以溫州、浙江為試點，以拆除教堂、拆移十字架、關閉聚會點為特征，正在開展全國性地對基督教（無論三自會還是家庭教會）的迫害。全國教會大有風聲鶴唳、大逼迫即將來臨的趨勢。恰在此時，5 月 28 日晚，在山東於招遠市一麥當勞餐廳兩男四女對周圍食客挨個索要電話號碼，當問到一位受害女子時，她拒絕提供，結果遭嫌犯圍毆，最終不治身亡。事隔兩天後的 5 月 31 日，遠離山東的北京公安部突然宣布招遠慘案 6 名嫌犯是邪教組織“全能神”成員。緊接著，一場全國性的打擊“全能神”、打擊邪教的運動開始展開。

6 月 3 日，中國各大媒體發布一篇《中國已明確認定呼喊派等 14 個邪教組織》的文章，將以前公安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所公布的邪教名單再次公布出來，這一舉動一下地將民眾關注“全能神”的眼光擴大為其他 14 種所謂邪教。而且，有心人也發現，這 14 種所謂邪教中，與基督教有聯系的就有一半以上，如呼喊派、全範圍教會、新約教會、被立王、同一教、三班仆人派等等。將“邪教”與基督教聯系起來，看來是當局繼招遠慘案後更進一步的謀劃。

同日，中國反邪教協會在其網站上公布 20 種邪教名單，比黨政機關公布的 14 種所謂邪教又多了全能神、法輪功、門徒會、中華大陸行政執事站、血水聖靈、華南教會等多種。中國反邪教網站再次補充公布邪教名單，一是補充上次公布時沒有“法輪功”“全能神”的缺陷，另外也是為了堵住西方關注宗教自由人士的口，以民間協會、專家、學者名義，而非政府名義來定邪教罪名，似乎更易於讓世人認可。當然，有心人發現，在補充名單中，有與基督教有聯系的門徒會、中華大陸行政執

事站、血水聖靈、華南教會等教派，並且非常詳細地從教義上介紹了所謂的諸“邪教”。

在介紹所謂邪教“全範圍教會”時指出其提出“實現中國文化基督化、全國福音化、教會基督化的國度，與主一同掌權”。在此將華人教會聲望很高的趙天恩牧師提出、被大多數正統基督教會認可的“三化”異像，也與邪教聯繫起來，甚至移花接木地指斥“三化”異像是邪教產物。如此不僅讓持守和傳播“三化”異像的弟兄姐妹心有余悸，而且也為打壓大多數認同“三化”異像的主流教會埋下了伏筆。

而且我們看到，最近這兩次公布的名單中，一直在中國家庭教會占有很大影響的、與倪柝聲、李常受有關係的教派也成為在劫難逃的邪教。當局反邪教網站指出：“呼喊派”自稱“地方召會”、“主的恢復”，是美籍華人李常受於1962年在美國創立。逐漸發展成以美國“水流職事站”為中心，以臺灣“福音書房”、香港“聖經研習中心”為據點，以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的教會為輔助基地，向世界各地發展蔓延，重點向中國大陸滲透的邪教組織。基督教界人士知道，當局所指的這一教派，在北美和東南亞、港臺都被基督教界所認可，而且數量和影響巨大，如果將此一教派繼續定為邪教，那麼中國家庭教會中受影響的教派就會繼續擴大。其他所謂的邪教如全範圍教會、華南教會，都是中共打壓基督教家庭教會、地下教會的產物。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當局兩次公布的邪教名單，顯然有意將所謂邪教與基督教家庭教會聯繫起來。如此的操作，使公眾面對正教時，也以為是邪教；而基督徒傳福音時的福音對象，也因害怕邪教而不肯與基督徒產生聯繫。至於各級公安機關、專政機關，由於缺乏起碼的宗教知識、基督教知識，肯定會正邪不分、亂抓一起（這些專政機器，一看到你拿著《聖經》聚會，就以為你是全能神、全範圍或者三班仆人），各級專政機器缺乏分辨力的狀況會進一步強化當局打壓基督教家庭教會的謀劃和險惡目的。

據對華援助協會6月5日的一則新聞報道：廣東省陽江市陽西縣縣城一家庭教會的聚會場所，6月3日突然接房東通知要他們搬遷。房東受到公安部門的壓力，指他們非法聚會，須在本月底之前搬走。據信徒稱，陽西縣有不少被官方定性為邪教組織的“全能神”及“東方閃電”成員，屬於所謂邪教活躍地區之一。該教會一陳姓基督徒告訴記者，警方指他們是非法宗教：“說我們是非法宗教，公安要求他叫我們退房，是因為‘東方閃電’的問題，最近不是網上轉載山東招遠那件事，連累到我們這裏，國家在調查這件事情。反正是公安局叫房東不要租房給我們，叫我們搬走”。

在最近官方環球網上有位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呂德文在其文《打擊邪教刻不容緩》指出：“筆者所在團隊在近些年的田野調研中，發現地下教會和邪教傳播極為迅速，尤其是在華北和中部地區，形勢極為嚴峻。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既與邪教傳播的特征有關，也與清理邪教的偏差有關”。該文從頭到尾將地下教會與邪教並列起來論述，幾乎將二者混同。作者認為家庭教會為邪教準備了土壤：“未備案的‘非三自’教會在鄉村廣泛存在，地方宗教部門一般不會採取強力措施給予清除，使得事實上的地下教會在地上公開活動。這無疑給那些極端宗教思想和邪教的傳播提供了生存土壤”。作者認為不應忌諱西方國家對宗教自由的批評，應該在打擊邪教的同時打擊非三自的家庭教會。

基督教是世界公認的正教，當局如果發動一場類似打壓法輪功一樣的打壓邪教基督教的運動，顯然是力不從心的。但是，自一來中國就發動“非基督教運動”的共產主義者（參《中國正在開展新的“非基督教運動”》），為了維護其世俗政權和屬靈宗教界的霸權、為了抵禦基督教背後的西方文明及其普世價值，不惜瞞天過海、移花接木，借助打壓所謂的邪教“全能神”和最近兩次公布的名單中的邪教，來展開對方興未艾、增長迅速的基督教的整體逼迫，並且官方理論家還得出了非三自的家庭教會為邪教準備了土壤的結論。顯然，這次以招遠慘案為導火索的所謂打壓邪教運動，也是自今年以來，在浙江進行的拆毀教堂、拆移十架為特征的迫害基督教運動的延續。

面對這場迫害運動，作為基督徒首要的要認清當局的險惡目的，第一要做的不是和當局一起來打擊當局認定的邪教，而是要指出國家政府界定、打壓邪教罪，是非常荒唐的。邪教的辨別，是宗教和教派之間的事情，政府不得介入，政府的介入，只能導致踐踏和迫害宗教信仰自由。基督徒在講明自己教派的純正性的同時，一定要維護宗教自由的神聖權利。最後，在面對越來越有可能擴大的逼迫面前，讓我們謹記雅各書 1:2-4：“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十四、教會教產權利的聖經依據

教會教產是中國基督徒最應該關注的一個話題。最近幾年來，北京守望、伊春友好、海南海口三亞、廣州廣福等家庭教會以及鄭州孫莊、開封教會等教案中，一個顯著的共同點就是教會教產權利被侵犯，或強制拆遷、或禁止購買、或中斷租賃、或拒不歸還。當局對教產的侵犯成為侵犯信仰自由的主要切入點，他們在對靈魂無法禁錮的情況下，就開始對信仰活動的物質形式加以禁錮，他們以為控制了空間就會除滅信仰、剝奪了教產就能消滅教會。

概括而言，當前侵犯教產權利的形式主要有五種：1. 租賃房屋，威脅房東停止租賃；2. 已購房屋，斷水斷電；3. 已付款準備交付房產，威脅房產商不予交付；4. 信徒自家房產，搜查、騷擾，通過居委會或單位施壓；5. 固有教產，不協商就強制拆遷。可見，當前中國教會教產主要分為個人已購教產和租賃財產，租賃財產最容易被侵犯；以個人名義已購房產也遭受到多種迫害辦法。

一方面，國內家庭教會弟兄姐妹為教會教產憂心忡忡、擔驚受怕，另一方面，很多海外基督徒並不理解國內肢體為教產抗爭的苦衷，甚至有海外基督徒說：教會不是建築，爭取整體敬拜的場所有什麼意義！？有的引用約翰福音 4:24：“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認為只要心靈敬拜就足夠了，要場地、要教產幹什麼？

實際上這是一種“飽漢不知餓漢饑”——海外華人基督徒可能不知道，當你在寬敞舒適的教堂裏敬拜的時候，大多數中國家庭教會沒有如此的空間來敬拜，就是有房間，也有隨時被剝奪的可能。空間和物質形式在海外教會根本不是問題，但在中國是頭等憂心的事。

從聖經上來看，以上海外基督徒對教產問題的指責，是典型的現代“諾斯替主義”。就是把信仰單單抽象化、屬靈化，而忘記了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中肉身的重要性、忘記了信仰的形式性和物理性，更忘記了聖經中對財產權利一直以來的肯定。

首先，聖經對財產權的一直持肯定態度，這裏就包括教會的財產。如在出埃及

記 20: 15, 17 有關十誡：不可偷盜；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仆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不可侵犯他人財產，就包含著對私有產權的肯定。在新約馬太福音 20: 15: “我的東西難道不可隨我的意思嗎”？使徒行傳 5: 4: “田地還沒有被賣，不是你自己的嗎”？這些經文都反映財產權的重要性。

就是在使徒行傳所描寫的凡物公用時期，也不是沒有財產權的。馬可母親馬利亞就保留下自家房子（使徒行傳 12: 12），西門就用自己的房子招待了彼得（使徒行傳 10: 32）。聖經凡物公用是自願的，政府強制的公有制只會使所有財產都歸政府，也只會剝奪民眾的私有產權，包括教會教產權利。中國已經頒布物權法，確定了私產權利，而當局任意踐踏家庭教會的教產權利是與物權法精神背道而馳的。

其次，教會不僅是屬靈的、普世的、信徒的聚集，也是有物質形式、地方性、物理性的。教會 *ekklesia*，本意是呼召出來的人的聚集。但人的聚集不是靈的聚集，它是需要物理空間的。這個空間在舊約中是曠野、聖殿和會堂等。在新約裏起初是在耶路撒冷聖殿（使徒行傳 2:46）和會堂（使徒行傳 22:19），後來就在家中（使徒行傳 1:13）。大概在公元 2 世紀，就有了教堂建築。可見，歷史中的教會不是抽象的人的聚集，而是有肉體的信徒在一定三維空間中的聚集。

就教會是耶穌基督為元首、普世信徒聚集而言，教會表現了它的宇宙性、屬靈性和合一性（彼得前書 1:2、啟示錄 7:4-9）。但這個無形教會在人類歷史上一定要以各個具體的地方教會表現出來，如使徒時代的安提阿教會、以弗所教會、加拉太教會等等。因為在主耶穌基督再來之前，人類歷史上的存在物必然要以時間、空間的形式出現。

最後，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意義之一，就是屬靈的神進入到人類時空中，而且以肉體的形態出現。在這裏，道成肉身徹底否定了聖俗、靈肉二元論，不僅為耶穌基督的人性，也為教會的物質形式作出了肯定和辯護。相反地，諾斯替主義卻否定耶穌基督的人性，將基督定為抽象的靈，這種異端，實際上是否定地上教會物質形式的思想根源。

諾斯替主義的錯誤被約翰二書 7 節所揭示：“因為世上有很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這就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不認耶穌為基督”——那個活在具體時空中、有血有肉、有生有死的木匠之子，毫無基督和彌撒亞的資格，他不是基督、不是彌撒亞。諾斯替主義實質是否定“道成肉身”的真理，就是不信耶穌，顯然是異端。

正如當代神學家白基在《約翰一、二、三書》著作中寫道：“希臘化的基督徒傾向接受某種形式的二元論，將神的範疇和人的範疇嚴格分開。他們接受基督教理論的每一點，唯獨這一點是例外。希臘人主張神的神性是不可能與塵世事物混為一談的，靈與肉體是分割的”（見《約翰一、二、三書》第 118 頁 白基 著 張君娣 譯 漢語聖經協會 2003 年 10 月版）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知道，正如耶穌基督有肉身一樣，地上教會要有物質形式；屬靈界的宇宙性教會，那不需教產，但地上教會必在三維空間中，擁有教產是必需的；無論在舊約還是在新約中，聖經對財產權都給予了肯定。因此，中國基督徒應該關注教會教產，謀求教會教產權利的合法化，並積極維權，制止中國政府對教產權利的迫害和侵犯行為。

十五、教產權利是信仰自由的必備內涵

從 2006 年發生的著名的杭州蕭山教案、2009 年山西臨汾金燈堂教會教案、2011 年北京守望教會戶外敬拜教案，到近期的伊春友好教會、海南眾多家庭教會、廣州廣福教會教案以及河南鄭州孫莊、開封等基層三自教會教案中，都可以看到引發原因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當局對教會教產權利的粗暴踐踏，這是近幾年對基督徒信仰權利迫害的新動向。

尤其對家庭教會，當局在無法定為“邪教”、無法徹底取締教會、無法改變人的靈魂的情況下，開始對信仰活動的物質形式、對信仰活動場所進行逼迫和打壓。當局的如意算盤肯定會落空，但他們從教產出發的逼迫也使我們認識到教會教產的重要性。

中國《宗教事務條例》第 30 條第一款對宗教財產的範圍作了規定：“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構築物、設施，以及其他合法財產、收益，受法律保護。”教會繼承、購買、租賃的敬拜房產，是主要的教產。屬靈的教會不需要教產，但只要是地上的教會，就都需要教產。信仰不僅是屬靈的，信仰更需要物質形式來支撐。沒有教產就無法舉行敬拜、聚會，尤其是人數日益增多的中國家庭教會，對教產的需求幾乎與對福音的渴望成正比。一個不僅不保護教產反而處心積慮剝奪教產的國家，是沒有信仰自由的。

如同財產權是基本人權一樣，教產權利是信仰權利的必然構成。英國政治哲學在約翰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論》中指出：財產權是最基本的人權，沒有財產權就很難維護其它的人權。人擁有了不可剝奪的財產權就擁有了最基本的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都是由“財產權”這個“自由”衍生的。儘管財產權不是生命存活的充分條件，卻是必要條件，要存活就必須擁有財產和財產權。“人們聯合成為國家並受制於政府的一個主要的重大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

財產權這個普世權利也得到中國政府的認可，雖然遲至 2004 年 3 月才在憲法修正案將“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文字寫入憲法。除了個人財產，中國法律也宣告保護社會團體的財產。如 1986 年《民法通則》第 77 條規定：

“社會團體包括宗教團體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2007年生效的《物權法》第69條規定“社會團體依法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受法律保護”。

教產屬於社會團體的財產權利，在中國的《宗教事務條例》第30條規定：“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構築物、設施，以及其他合法財產、收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哄搶、私分、損毀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凍結、沒收、處分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的合法財產，不得損毀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占有、使用的文物。”

雖然有憲法和法律的明文規定，但在實踐中各級官員踐踏憲法和法律的行為比比皆是。如守望教會按照合同法購買了合法房產作為教產，但當局就是阻止此財產的交付，剝奪守望教會社會團體的財產購買、處分權利；廣州廣福教會依法租賃房屋為教產，其租賃財產也當受保護，相反卻被當局斷水斷電，強行中斷使用房產；再如開封六家三自教會教產，依法繼承了教會教產，卻被國營企業占用長達40年、今年部分土地又被道路建設占用，不得不動員700人上街維權；又列如河南省，鄭州市，孫莊基督教會，村委會在沒有征求教會會眾的意見下就準備野蠻強拆，視教產權利為無有。

諸如此類的教案也引起當局關注，2013年7月20日，由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等聯合舉辦的“宗教與法治學術研討會——關於宗教財產的立法問題”在北京舉行。與會者從立法與法律的角度，圍繞“宗教財產的歸屬、宗教教產的退還、宗教團體的免稅待遇、宗教團體的財務監督”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與會者有人認為教產保護的難點在於只有政策依據，沒有法律依據，因此呼籲盡快出臺《宗教法》，有人認為宗教團體法律地位不明是教產問題突出的重要原因，呼籲通過立法為宗教團體確立法律地位，解決“主人”的身份問題，才能物有所歸。

這些討論是有益的，我們看到就家庭教會而言，教產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是家庭教會本身沒有合法的法律地位，家庭教會的合法化是保障教產權利的最根本前提。而對於基層三自會而言，真正具有獨立社會團體地位，不隸屬於當局的黨政領導，也才能切實保證其財產權。

宗教學者楊凱樂在其相關文章中對教產問題提出了自己看法：“就家庭教會聚會場所問題而言，如果無法立即承認其合法地位，可以嘗試先就其聚會場所進行備案”。備案的教會活動場所也是合法財產，當受保護而非逼迫。對教堂而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商業房地產開發一般不得拆遷教產，除非是宗教組織與開發公司自願達成協議；如果是由於列入城市規劃的公共設施建設項目需要拆遷教產，則應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在規劃過程中關於教產拆遷事項，征得教產所有人或使用人的

同意；二是通過拆遷前置換或拆遷後重建等方式，保證正常信仰宗教活動”。如此善意的、折衷的建議，當局不應該聽而不聞吧？

“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曉諭我說，那以公義治理人民的，敬畏神執掌權柄”（撒母耳記下 23:3），民眾建立政府、給政府納稅的目的，是期望政府能履行公義、保障民眾的財產、信仰、政治等自由，而一個不能保護民眾財產權的政府，喪失了自己的天職，必然會受到懲罰。我們希望中國當局能真正履行一個政府所應當履行的職責，保護而非踐踏每個公民和每個教會的教產權利。

十六、耶穌在逼迫中誕生

——聖誕節紀念受迫害的中國信徒

又是一年的聖誕佳節，在西方各國甚至在中國的都市中，都洋溢著濃濃的節日氣氛。五顏六色的彩燈發出絢麗耀眼的光彩、一個比一個美麗挺拔的聖誕樹上掛滿了金光閃閃的各種禮物，笑容可掬的聖誕老人隨處可現，那紅色的襪子裏裝滿小孩子們最喜歡的禮物，而各大商場的聖誕促銷活動令人眼花繚亂、商業氣氛籠罩著整個聖誕新年假期，各種休閒娛樂場合以極度的吃喝玩樂來吸引你的光顧。在耳目之樂、物質享受和歡歌笑語中渡過的當今聖誕節，無疑早已把聖誕——耶穌基督降生的本來光景拋到了九霄雲外。

而事實上，第一個聖誕節，耶穌降臨在伯利恒的情景與今天大城市的聖誕節有著天壤之別。根據福音書，我們可以想到，由於瑪利亞是童女懷孕（未婚先孕），她和丈夫約瑟，少不了當時人們的道德指謫和精神刁難，這種精神和心理上的逼迫從瑪利亞一懷孕實際上就開始了；而當他們正準備在家中順利產子，但政府的逼迫隨之而來，人口登記的強制力不得不使身懷六甲的孕婦要起身到另外地方；當他們極其辛苦輾轉到伯利恒時，卻找不到旅館房間休息和準備臨產，在天寒地凍、缺衣少食的寒夜，他們忍受著環境的逼迫不得不到一個馬廄中休息，裏面還有一匹沒套韁繩的馬（或驢），也有學者認為是在山邊的洞穴中，因為當地人就是在山邊洞穴裏飼養家畜的。無論如何，馬廄的環境與酒店、住家有巨大差異，裏面極臭極臟，一點兒不適合做產房。耶穌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誕生了，精神的逼迫、環境的逼迫甚至政策的逼迫。他誕生不久，羅馬統治者就下令殺死所有與他同齡的孩子，在這種專制慘無人道的逼迫下，瑪利亞和約瑟帶著耶穌又不得不前往埃及、亡命天涯。。。。。

與今日商業化的喜慶聖誕相反，耶穌誕生的情景其實是一幕逼迫的場景，是以人類由於自己的罪釀成的苦難活劇為背景的。耶穌誕生時有極度的榮耀，如路加福音 2:14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 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耶穌誕生時，

其實也在極度的逼迫中。這種逼迫，也一直延續在效法耶穌的基督徒身上，從初代教會身受羅馬帝國的逼迫、到中世紀堅持聖經真理的信徒遭宗教裁判所迫害、到清教徒長期遭受國教和專制王權的迫害，再到今天中國家庭教會遭受到共產無神論政權的迫害，都承繼了聖誕時一貫的氛圍和信仰內核。每當聖誕來臨，我們就會想起耶穌就是在逼迫中誕生的；每次的聖誕，我們首要紀念的，就是那些因聖誕而遭受更加劇烈逼迫的信徒和教會。

根據媒體報道，今年聖誕臨近時期，中國基督教會正受到越來越大的逼迫。近日成都一家庭教會舉行聖誕聚會，被警方動用催淚瓦斯強行驅散；山東青州市一家庭教會本來已經租用賓館計劃 12 月 21 日舉行聖誕慶祝晚會，教會已經發出去 3000 多邀請信，但當地國保和宗教局向賓館施壓強迫要求取消聚會。廣州廣福家庭教會牧師被當地警方多次騷擾，並詢問是否有聖誕節活動。12 月 15 日，陝西省子洲縣何家集鎮子洲教會信徒封天棟、姜毛、張寶林等近四十人，到當地老君殿派出所查詢警方為何通緝封天棟，第二天，警方出動十多人，將包括封天棟、姜毛、張寶林在內的四名信徒抓走，並拒絕家屬委托的律師見當事人。同時，河南內黃教會、四川閬中教會等教會都受到當地警方威脅，要求在聖誕期間取消或者縮小聖誕慶祝活動。

在今年聖誕之際最讓世人關注的河南南樂教案，根據最新的報道，當局對基督徒的逼迫繼續升級，除綁架張少傑牧師及 20 多位當地信徒並不讓見律師外，當局的抓捕行動不僅沒有停止，而且對前來參加聚會和聲援的信徒也進行抓捕和毆打。12 月 22 日是主日，但當日教堂外有近三百警察、官員等阻止信徒進入教堂。政府組織了大量警力、政府官員和群眾蹲守去往教堂的各個路口，盤查所有準備去教堂的人員。見到外地來的基督徒就抓，見到本地的基督徒就強行送回家。張少傑牧師家被幾十位政府雇傭群眾和便衣包圍著，不準人進出。23 日當天有近百名基督徒被抓，前去南樂的深圳傳道人曹楠遭遇警方酷刑。政府雇傭的眾多男女流氓圍攻毆打維權律師，並非法軟禁律師和其他基督徒。逼迫正在繼續。。。。。

這是一幕與第一個聖誕節何等相似的情景，中國基督徒正效法耶穌基督，在逼迫中渡過聖誕，而南樂縣縣委書記黃守璽及其黨羽正扮演著慘無人道、欲把幼小耶穌基督扼殺在繃襪中的羅馬執政者角色，黃書記等南樂當局踐踏法律、囂張狂妄，他們還竟然效法慈禧太後，雇傭南樂當地的義和拳匪——一批批男女流氓，毫無法紀地野蠻對待基督徒，正如慈禧太後一樣，他們以“刁民對付教民”，自以為得計，沒想到接下來就是全國的動亂、全世界的反對和自己的倉皇逃竄、身首異處！

在聖誕之際，南樂當地的信徒和基督徒維權律師們還在逼迫和苦難之中；眾多

的中國家庭教會的信徒們，也正忍受著無神論政權的逼迫和鎮壓。讓我們每一個華人基督徒，在平安夜、在聖誕期間，默想耶穌誕生時的原本景況，默想耶穌基督及瑪利亞一家所受到的逼迫和患難，默想耶穌以承受人類的逼迫、患難和罪的方式，來拯救我們脫離罪。

羅馬書 12:15：“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今天，我們基督徒要恢復聖誕的本意，我們要過一個體驗逼迫、體驗苦難，為被迫害者禱告的聖誕，我們要為南樂教會、守望教會、陝西子洲教會禱告，為中國家庭教會禱告。求神保守他們、祝福他們。這一切正如以賽亞書 9：2-7：“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第三篇 剖析三自會及其基督教統戰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他們都屈身仆倒,我們卻起來,立得正直。”

——詩篇 20:7-8:

一、警惕中共對美國的基督教統戰

美國一直是中共的戰略敵人，所以中共千方百計對美國進行汙蔑、滲透和破壞。中共利用基督教對美國進行滲透和統戰由來已久，但不僅沒有引起美國政府和美國基督教界的足夠重視，反而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基督教界人物與中共三自會（TSPM）、基督教協會（CCC）握手言歡、與狼共舞。為捍衛美國的宗教自由等普世價值觀，為遏制共產主義勢力通過各種方式對美國的滲透和破壞，有必要全面了解中共對美國的基督教統戰，並采取措施予以應對。

眾所周知，由中國共產黨控制的政府教會被稱為“兩會”，兩會由中共核心部門——中共統一戰線工作部（簡稱統戰部）直接管轄。而統戰部是中共建國後總結對國民黨的特務滲透、隱蔽戰爭經驗，將其規範化、制度化的特務部門。兩會對中國內部稱為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Three Self Patriotic Movement），對國外稱為中國基督教協會（China Christian Council），是一個組織兩塊牌子。兩會對內的功能是控制基督教信徒、使信徒順服共產黨的領導，與政府部門一起打壓家庭教會和其他所謂的非法宗教；對外的功能是利用基督教的普世性，對外國基督徒拉攏收買、化敵為友、化友為同誌，扶持美國基督教界的中共代理人，並進行一系列旨在塑造中國宗教自由假象、掩蓋中國迫害家庭教會真相、打壓促進中國自由的在美人士的活動。

哥林多後書 11:14-15：“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奇。他們的結局、必然照著他們的行為”。中共控制的三自會及基督教協會是披著基督教外衣的統戰、特務組織，他們用偽裝將共產黨特務的真實身份包裹起來。自 1950 年開始就一直擔任上海國際禮拜堂主任牧師的李儲文，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遭紅衛兵毆打時，為了證明自己其實不是基督徒，主動暴露出他的共產黨員身份。他在 1983-1988 年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這顯然是個特務機構。另如北京三自會副主席趙復三，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總之，兩會（TSPM 和 CCC）的本質是披著宗教外衣的特務組織，兩會在美國的任何活動，理應引起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關注，

但是美國各界並沒有認識到這個組織的本質，以為僅僅是民間的宗教組織，所以導致“兩會”在美國的活動猖獗。

中共對美國的基督教統戰分為兩方面，一是對美國白人教會的統戰和滲透，另一是對美國華人教會的統戰和滲透。我們將用上、下兩篇分別對這兩部分進行闡述。

上部：中共對美國白人教會的統戰和滲透

約翰福音 10:10：“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早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隨著統戰部、宗教局和兩會恢復工作，對美國白人基督教界的統戰就提上日程。“擒賊先擒王”，中共宗教當局最擅長統戰有影響的基督教界人物，在臺灣是周聯華（此人曾為蔣介石的牧師）、周神助（全球華人靈恩界的領袖），在美國是葛培理 Billy Graham。對美國的基督教統戰，一直跟 Billy Graham 的名字聯系在一起。我們根據時間順序，大致上將美國白人基督教界與中共兩會（TSPM\CCC）的交往，列舉如下：

1. 1988 年，葛培理夫婦 Billy Graham and Ruth McCue Bell 訪問中國，並接受中共兩會邀請在北京和上海三自教會、南京神學院講道。從那時開始，葛培理就不斷到中國。他並創立東門國際事工(East Gates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主要從事支持“三自會”印刷聖經的工作。到目前為止，中國聖經的唯一印刷、出版、銷售單位就是三自教會，其他的所有書店和機構都不能進行聖經銷售。聖經的印刷、出版、銷售嚴重受限，如此違反宗教自由的尷尬處境實際上跟 Billy Graham 大有關係。

2. 自 2004 年起，中國基督教兩會先後在香港、美國及德國舉辦聖經展，企圖給當地基督徒和普通民眾以中國基督教自由發展、聖經自由印刷和銷售的假象，借機掩蓋中國迫害家庭教會和宗教不自由的真實現狀。這些聖經展得到了美國一些教會和基督教機構的支持，包括葛培理的布道團和東門國際事工。

3. 2006 年 4 月 27 日晚，中國教會聖經事工展在洛杉磯水晶大教堂舉行盛大的開幕式，籌備近兩年的中國教會聖經事工美國巡回展也正式拉開帷幕。中國基督教兩會代表團、國家宗教事務局代表團、聖經事工展當地籌委會、當地政要、教會領袖和南加州地區教會代表等 300 余人參加。紐約、科羅拉多和明尼蘇達州等美國其它地區和城市以及香港特區、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的友人遠道而來。開幕式由中國中央電視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新華社洛杉磯分社、中國新聞社、人民日報、環球時

報、城市雜誌、東森電視臺、鳳凰衛視、翡翠電視臺等眾多中文媒體以及洛杉磯時報等英文媒體採訪報道。在開幕式上，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蔣堅永副局長、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曹聖潔牧師、水晶大教堂創辦人舒樂牧師、葛培理布道團代表、馬鞍背教會瑞克·華倫牧師的代表、當地地方行政長官及周邊城市代表（帕撒締納市和蒙特利公園市市長）、太平洋大學校長、富樂神學院代表、聖經事工展洛杉磯籌委會代表金伍德牧師、司徒卓正博士、余國良牧師等紛紛發表了講話。這次活動是中共對美國基督教統戰的升級，它大大地掩蓋了中國宗教不自由的現狀，並且引狼入室，把本質是“撒旦”的兩會作為光明的天使被塑造、推廣開來。TSPM 和 CCC 開始在美國大行其道。

4. 2009 年 9 月 10 日在訪問了中國基督教兩會上海總部和陝西教會之後，美國聯合基督教會代表團一行人訪問了北京的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此次代表團一行人包括美國基督會世界事工部主席、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美國基督會全球事工部總幹事大衛·阿斯德魯瓦爾 (David Asdrubal Vargas)，美國聯合基督教會世界事工部總幹事、美國聯合基督教會兼美國基督會全球事工部聯席總幹事安·加爾文·羅傑斯·威特 (Ann Calvin Rogers-Witte)，美國基督會和美國聯合基督會東亞太平洋地區負責人朱曉陵博士等。據國家宗教事務局的報導，王作安副局長會見並宴請了代表團一行。顯然，這些美國基督教界人士被統戰和欺騙，他們不知道中國的兩會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教會，而中國國家宗教局，卻恰恰是控制宗教自由、迫害各類信徒的中共政權機關。

5. 2010 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美國葛培理布道團全球事務副總裁湯姆·菲利普斯 (Tom Phillips) 及亞洲事務總裁亨利·賀裏 (Henry Holley) 牧師等一行 3 人訪問了江蘇教會。他們的到來受到了江蘇省基督教兩會、淮安市宗教局及淮安市基督教兩會領導的熱情接待，賓主雙方就感興趣的話題進行了座談。恰逢主日，亨利·賀裏牧師應邀在當地教會證道。邀請美國牧師到官方教會講道，是中共統戰海外基督教界領袖人物的常用手法，滿足他們的心理，給他們以宗教自由的假象。

6. 2011 年 9 月 27 日，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這是中美兩國基督教會首次聯合舉辦高層次論壇。本次論壇由兩會 (TSPM\CCC)、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美國葛培理布道會共同舉辦。值得註意的是，這次論壇沒有一位中國家庭教會的成員參與，沒有任何關於中國宗教自由的議題被提出。這次論壇稱為“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名不副實、毫無代表性。這次論壇的目的就是中共企圖滲透、控制美國基督教界。

7. 2011年10月17日，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高峰牧師帶領“兩會”官員在芝加哥市中心的第一聯合衛理公會教堂舉辦“中國教會聖經事工展”，自12日到16日在芝加哥展出。這次展出被標榜為“讓美國民眾認識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和現狀”。實際上此次展出的目的是欺騙美國民眾中國有基督教自由，並進一步拉攏收買美國基督教界。

這次展出期間，在美國的自由亞洲電臺採訪了傅希秋牧師和洪予健牧師，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牧師指出：“這個聖經展覽本質很明顯，是由中國政府導演組織、中國官方控制的基督教全國兩會，來美國向全世界進行欺騙的宣傳之旅。這種官方禦用的所謂‘教會團體’，完全是黨的一個統戰工具。我們同時對部分的美國福音派領袖、教會領袖，以及像達拉斯神學院這樣的神學院充當了中國政府欺騙世界輿論、欺騙國際基督教會界的工具深感不安和不滿。我們也按照對基督徒的教導，事先透過寫信方式，給葛培理國際布道團、達拉斯神學院、國際福音派聯盟，都寫了私人信件，敦促他們能改弦易張，改變錯誤的做法。因為是中國政府出資在美國這裏辦這個聖經展覽，完全是一種不合宜的舉動，也是欺騙宣傳舉動。”

傅希秋牧師談到中國大陸近年因為印刷和傳播聖經而獲罪的案例。他說：“因為聖經被抓捕、被關押、被判刑，我想起來的至少有四例。2004年蔡卓華案，也是因為印刷聖經，被以‘非法經營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洪予健牧師認為：“這個所謂聖經展完全是作假。因為大家都知道在中國聖經在公開場合是被禁止出售的。這完完全全是作假。如果你真的是這麼熱心，政府這麼願意贊助聖經的話，很簡單，在國內只要撤銷一個禁令就是了。如果說真的要展覽，先在國內展覽。”

8. 2011年10月20日上午，美國葛培理布道團中國事務副總裁亨利·賀裏(Henry Holley)牧師等一行2人訪問了兩會下屬的廣東協和神學院。並與本科四年級同學們分享了有關葛培理布道團的創立及歷年來在全球特別是在中國內地的相關事工。

9. 中國官方主辦的“聖經事工展”從2011年9月到11月先後在美國馬裏蘭州、芝加哥、達拉斯和北夏洛特巡回進行。

10. 2012年10月16日，應中國基督教兩會邀請，聖經展達拉斯地方委員會成員拜會中國國家宗教局。蔣堅永副局長宴請、外事司郭偉司長會見了美國西北聖經教會執行牧師布蘭特·萊特和美國國際研經團契區域負責人尼塔斯·沃納女士等一行。

10. 2013 年 9 月 22 日，應基督教全國兩會邀請，美國葛培理布道會撒瑪利亞救援會執行副總裁蓋裏·倫德斯姆先生一行到國家宗教局訪問。外事司肖虹副司長接待了代表團，雙方就第二屆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事宜交換了意見。

11. 2013 年 10 月 15 日，蔣堅永副局長會見了來訪的世界福音派聯盟秘書長傑夫·杜尼克利夫一行。蔣副局長對該組織在 2011 年中國基督教兩會在美舉辦聖經事工展提供的支持和幫助表示感謝

以上僅僅是媒體報道了的中共對美國基督教統戰事例，也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事實還沒有進行披露。“兩會”來到美國，以基督教的普世性拉攏收買美國基督教界人士作為其代理人，美化共產主義、美化其宗教政策，掩蓋其打壓、迫害基督教自由、尤其是家庭教會的事實。顯然，中共的基督教統戰已經威脅到美國賴以立國的宗教自由價值觀，對國家安全也構成事實威脅。為此，我們對美國政府和美國基督教界有關人士發出以下呼籲：

一．迫在眉睫的是，美國基督教界有關人士應該立即停止“第二屆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籌備事宜，因為此論壇既名不副實，也不是民間交流，而是中共利用基督教進行的特務滲透、統戰活動。更加讓人憤慨的是，此論壇毫無家庭教會的成員參與，再繼續舉辦此類論壇，就是對中國家庭教會的侮辱和宗教自由普世價值觀的踐踏。希望美國政府關注此事，也希望有關的美國基督教機構能懸崖勒馬、悔改歸正。

二．美國政府應該禁止中國國家宗教局官員、中國兩會高層教牧人員前來美國。他們來美國不是民間宗教組織與民間宗教組織的交流，而完全是中共政權機關對美國基督教機構的統戰、滲透和轉化。中共的兩會，對內是迫害中國宗教自由、打壓家庭教會的專制機器，對外是進行宗教特務滲透和統戰、威脅美國宗教自由的間諜組織；每次來美國的中共宗教人士，很多人是迫害各類信徒、危害宗教自由的罪魁禍首。

三．美國政府應該調查與中共兩會等宗教特務組織有密切往來的美國基督教界人士，教會人士、福音機構、神學院，是否有收受中共利益、替共產主義塗脂抹粉、危害美國宗教自由、出賣國家利益的行為。美國政府及國會，應該邀請中國家庭教會有關人士，向美國各界揭露中共對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進行基督教統戰的真相和家庭教會受迫害、中國宗教不自由的現狀。

四．美國基督教界人士，教會牧師、信徒、福音機構、各神學院，應該停止與中共兩會的任何交往。出於上帝的公義和愛，美國基督教界應該單單與中國家庭教

會聯系並提供幫助。

五．美國著名牧師葛培理及其東門國際事工(East Gates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應該停止單單資助中國三自教會(TSPM)印刷聖經的錯誤作法。因為這一作法，儘管有美好的動機，但如今卻是導致中國所有書店買不到聖經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只能在政府的三自教會購買到聖經，也導致眾多邊遠地區信徒買不到聖經、或者買聖經時暴露家庭教會聚會點。東門國際事工最好應該資助除三自會以外的出版社、家庭教會印刷聖經，如果無法資助家庭教會等組織，就應該立即停止單單資助三自會印刷聖經的錯誤做法。東門國際事工應該敦促中國政府實施對聖經的出版自由，促使中國能像自由國家一樣各出版社都能夠印刷聖經、各書店都能買到聖經。

下部：中共對美國華人教會的統戰與滲透

詩篇 20:7-8：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他們都屈身仆倒，我們卻起來，立得正直。

引言

2011年4月10日，北京守望教會因被當局剝奪教產無法舉行室內正常敬拜的情況下，不得不進行戶外敬拜，並因此而遭受逼迫，至今已逾兩年多。期間由海外華人牧者王誌勇牧師、洪予健牧師等人發起聲援北京守望教會的簽名，並在網絡和各種媒體上征集基督徒的簽名。到2013年，有470人簽署了中文聲援，有4751人簽署了英文聲援。也就是說，大約有4000多西方人簽名，而相比只有零頭的400多華人基督徒簽名聲援守望教會。海外華人基督徒的人數數10萬人不止，但為何只有區區400人簽名支持受逼迫中的家庭教會呢？這裏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共長期以來對北美尤其是美國華人教會有組織、有計劃的統戰、滲透和收買，而中共基督教統戰的目的之一，就是讓海外華人教會切斷和國內家庭教會的聯系、全力與中共三自會搞好關係，掩蓋迫害家庭教會的真相、營造中國宗教自由的假象。

在家庭教會基督徒作家曼德的微博中，他寫了有關海外某些華人教會狀況的五條微博：

如果我說海外華人教會大都害怕你講國內家庭教會所受的逼迫，你們相信嗎？如果我說基督信仰已成為麻醉信徒正義勇氣的腐蝕劑了，你們相信嗎？如果我說大

多數基督徒都沒有對提升華人人品人格起到應有作用，你們相信嗎？如果我說不少教會成為只叫人信主而不渴慕神的公義、真理的傳銷組織了，你們相信嗎？

如果我說海內外華人中不少所謂基督徒名人、作家，在與當權者苟合，成為妓女、男妓了，你們相信嗎？如果我說一個基督徒僅僅因為敢於說真話，就遭到大部分華人教會的排斥，你們相信嗎？如果有一天，中國開始了翻轉社會的進步革新時，基督徒不僅不參與反而大力地阻礙，你們相信嗎？

如果我說很多持美國護照的華人教牧、基督徒，只一味譴責美國的不是，對中國卻不敢說半個不字，還滿嘴的中央政府、合法教會，你們相信嗎？如果我說不少中國基督徒正成為自私自利、可以關心鄰舍但從不關心國家、民族、社會的另類自動隔離者，你們相信嗎？

如果我說很多海外華人牧者、主內刊物不畏懼上帝的震怒卻畏懼太平洋另一側的中央政府，膽小如鼠到可笑地步，你們相信嗎？如果我說不少牧師講道、主內刊物的內容，故意與當下社會、與中國人的真實處境拉開距離，對華人毫無警醒與提升，你們相信嗎？

如果我說海外不少華人教會基督徒的政治觀點還處在文化大革命的水平，你們相信嗎？如果我說不少基督徒的社會正義感和良知都給狗吃了，你們同意嗎？如果我說不少基督徒對政治社會和時事的無知、遲鈍達到了智障的程度，你們相信嗎？

這五條微博雖然言辭過激，但的確反映了目前海外不少華人教會的真實現狀：毫無公義、不關心受迫害的家庭教會，與中共尤其是三自會握手言歡。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眾多，但中共對海外華人教會的基督教統戰是重要原因。

無獨有偶，網上有篇作者是庇哩亞的著名文章《海外華人中的“紅色基督徒”現象》，寫到：“紅色基督徒有如下幾個特征。第一、他們是世界上最虛偽的愛國主義者。一方面，國家取代上帝，成為他們的迷信偶像。另一方面，他們根本不順服所在國家的掌權者，只是順服中國的掌權者。他們中有一些移民，已經宣示入籍，宣示忠於所在地的國家。這等於卻公開說謊；因為他們只是忠於中國當局。信仰不真與政治欺詐，這是愛國基督徒的本色。

第二、紅色基督徒是喪盡天良的麻木看客。對中國所有的苦難視而不見，只會歌功頌德。所以他們總是為西方社會發生的苦難‘禱告’，卻對中國每天發生的礦難絕對閉口不提。查看一些海外基督徒辦的網站，中國大旱、礦難等等，完全沒有人注意。相反，為海地難民禱告與大量的插科打諢成了他們“屬靈”的全部表現。

第三、紅色基督徒是兇惡至極的幫兇。任何人敢於直面中國的苦難，他們都會起來圍攻，說你搞政治，或者攻擊“你的神學有問題”。他們對“搞政治”的敏感永遠超過對苦難之中的受害者的關切。他們對中國受害者唯一的關心就是——美國也有受害者。而他們從來對‘美國受害者’毫無同情之心，甚至一向幸災樂禍。紅色基督徒也是一群不學有術的人，他們是紅衛兵精神在教會裏的殘余”。

的確，“紅色基督徒”“紅色牧師”在海外泛濫成災，基本上已成為華人教會主流。這種現象導致海外華人教會總體上在推進中國基督教信仰自由和社會進步進程中作用微小，這也導致堅持家庭教會立場、關注中國社會公義的基督徒及教牧在海外處境艱難、四面楚歌、到處受壓。“紅色基督徒”“紅色牧師”也是中共對海外華人教會統戰的累累碩果，是他們的戰利品，這值得海內外基督徒和正義人士認真反思中共對海外華人教會的有計劃、有步驟的統戰、滲透甚至策反。

1、最初對海外華人教會的統戰

自中國改革開放後，隨著中共統戰部、宗教局恢復工作，它們的觸覺就開始伸到了港臺和美國華人教會。由於美國華人教會的教牧人員大部分是港臺背景的，而這些美國港臺背景的教牧人員也在看港臺本地教牧人員的政治態度，所以，對港臺的基督教統戰，也就延續到對美國華人教會的統戰。基督教統戰工作的方法之一，就是拉攏、收買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教派和教會。

根據舍禾弟兄《對三自的剖析》一書、陳鴿弟兄有關三自會的論述、臺灣某牧者《當代大陸教會大事略》一文，我們看到在初期，中共對寇世遠、滕近輝等名牧進行統戰，使他們表態支持三自會，從而影響了一大批教會、神學院及信徒。

寇世遠監督是臺灣著名牧者，本來是臺北靈糧堂第一位傳道人，牧會 10 多年後，另成立基督之家教會。1978 年寇監督赴美國成立舊金山基督之家第一家，至今已經發展到七家，在洛杉磯也有幾家基督之家。寇世遠監督的幾個兒子大都是牧師，所以基督之家及寇氏家族在美國和臺灣華人教會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1990 年左右，寇監督就開始與中共控制的三自會進行聯系。1992 年寇監督訪問中國大陸，受到統戰部、三自會及丁光訓的隆重接待，到多家官方教會、神學院講道，並到醫院看望丁光訓的太太，為其禱告。寇監督返回美國後在海外華人教會界替中共三自會大力宣傳、美化中共的宗教政策，而對家庭教會及宗教不自由現狀一字不提。儘管 1993 年寇監督突然因病歸了天家，但他對美國華人教會親三自、遠離家庭教會的路線，具有決定性影響。他訪問三自會後，美國華人信義會、浸信

會、宣道會、不少靈恩教會人物，開始了到北京的朝拜之路、從此絡繹不絕。

1995 年 6 月，中國基督教協會出版社出版二卷本的《寇世遠研經集選編（上、下）》，這可能是首位美國華人牧者的著作在國內被出版。而該書的序言就是三自會頭子丁光訓所寫，編者語是另一個頭目曹聖潔所寫。丁光訓在其序言中除了感激寇世遠對其太太探望並禱告外，不忘自己的政治老本行，又在序言中鼓吹兩岸統一一番。

寇監督的三自路線影響至今，2008 年 12 月 8 日，遠志明牧師等發起的舊金山特會通過的《舊金山共識》，因呼應中共的“和諧社會”、以“眾教會”遮蓋“家庭教會”、決口不提國內信徒受逼迫的慘狀，而被有識之士稱為是“和諧了中共、悖逆了基督”，而這次特會的實際操辦者中，就不乏基督之家教會人物的影子。如今，寇紹恩等寇監督的幾個兒子，已成為中共三自會教堂的座上客，他們憑借他們的影響力，使臺灣、美國的眾多信徒與中共三自會如漆似膠，而對受苦受難的中國家庭教會置若罔聞、有意漠視。

其實比寇監督更早接觸三自會的，是海外華人著名牧師滕近輝。早在 1984 年 9 月由國務院提名、訪問北京的香港基督教代表團中，就有滕近輝牧師。滕近輝牧師是著名的“雙軌路線”的鼓吹手，即一手要抓“家庭教會”，另一手也不放開“三自”，即兩手一起抓。在“雙軌路線”影響下，1990 年代前後香港主流教會倒向三自，他們與三自而非家庭教會交流合作頻繁，這就如亞伯拉罕的侄子羅得漸漸地遷往南地，不知不覺間陷入在蛾摩拉、索多瑪等罪惡之城中（見創世記 13 章）。

1997 年 7 月 5 日滕近輝牧師在紐約基督徒靈命進深會進行題為《一半的真理》（即“真理的兩面”）的講道，其第 3 講第 11 項中，論到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他說：“在中國大陸神用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家庭教會，我希望將來如果福音在中國大陸更廣的傳開，更大的接受，更多的人信主，那個時候也沒有壓力了，家庭教會的方式應該繼續下去。神已經藉著家庭教會的方式路線恩待中國的教會。。。。將來公開禮拜堂的聚會和家庭的聚會還是應該繼續的並行，讓神在不同的場合，賜下不同恩典的方式，都蒙恩。我們常常聽到家庭教會蒙恩的消息，也聽到公開的禮拜堂教會蒙恩的消息，兩方的好消息都有。也有些弟兄姐妹傳來的消息，公開禮拜堂裏面的會友參加聚會，也在家庭禮拜參加聚會，兩面都參加，也成了一種溝通的渠道。

感謝神！今天（神）還是保守了三自的信仰，你看原來三自的領袖是新派的神學，但經過了這幾十年的情況，他們很明顯的主流信仰成了福音的信仰，聖經的信仰，很多人都體會到神的作為，神的恩典兩邊都有。

神在那裏工作，聖靈在那裏工作，我們也在那裏工作，也在那裏事奉，我們最重要的是認定信仰純正不純正？傳福音的自由如何也很重要！用這兩個標準，純正信仰就是聖經的信仰，和傳福音自由不自由這個原則兩樣來考慮”。

既是用滕近輝牧師的兩個標準，信仰純正與否、傳福音自由與否，三自會恰恰是最有問題的。但是，他執意要走雙軌路線，這不僅影響了香港教會，而且也極大地影響了美國華人教會。滕近輝曾在香港宣道會最大的教會宣道會北角堂當過牧師，1987年赴美任職華人宣道會神學院。他曾先後出任建道神學院及中國神學研究院義務院長，並曾擔任宣道會香港區聯會、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宣道出版社等十多間機構的董事會主席，世界華福會國際會榮譽主席等。由於他的巨大影響力，也就造成了雙軌路線在華人教會中泛濫，導致不少華人教牧、信徒在三自會問題上一直迷惑不清。

1998年紐約的《世界日報》在五月十日刊出一個有四分之一版大的廣告，題目是“何康生脫離建道神學院重要啟事”。何康生當時住在美國加州，他回顧了建道神學院當年因為逃避共產黨而從廣西梧州遷往香港的歷史。據何先生說，面對九七中共收回香港，為了避免赤化，他曾向高層建議遷院，但如石沈大海沒有反應。1999是建道成立一百周年，會有慶祝活動，但何康生認為那是“三自”的勝利儀式，因為從109期的《建道通訊》來看，建道已淪入“三自”手中。廣告裏還提到神學院的榮譽會長滕近輝牧師，何康生寫到：“但是他的錯誤乃是在他有權力抑製三自的時候改為與三自合作，致鑄成大錯。”何康生又認為建道現任（1998）院長張慕皚與三自合作是“與死亡立約，跟陰間結盟”……

2007年2月9日記者於嘉豪在《基督日報》（香港）網站報道：2007年度的神學生日，今日（2月9日）上午9時半於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正式舉行。來自香港13所神院校合共約800名學生們相聚一起，同心以詩歌敬拜上主，聆聽大會宣教信息。“眾人意料不到的是，敬拜時段有來自中國兩會和神學院領袖出席，他們包括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季劍虹長老、中國基督教協會副總幹事及培訓部主任包佳源牧師，以及來自6所神學院（中南、金陵、東北、燕京、華東和四川）的院長和教授等”。季劍虹長老並致辭。如此大規模的“兩會”人員統戰香港眾多神學生，的確少見。但這一切又是誰來安排的呢？

美國華人教會幾乎一半的牧者都是出自香港，尤其是粵語教會，香港牧師少有不受滕近輝影響的。這些直接或間接被統戰了的教牧人員又影響著成千上萬的信徒，他們對中國國內信仰不自由、家庭教會受逼迫的現狀毫不關心，對中國政治腐敗、中共專制獨裁的更噤若寒蟬、退避三舍。而那些為這些中國問題而奔忙的基督徒公

義人士，卻累次受到他們的群起圍剿、打壓誤解和隔離。

2、目前對海外華人教會的統戰

經過對有影響力的華人教會人物和教派成功統戰後，美國華人教會大半江山已經淪陷，不僅如此，中共更變本加厲，從以下幾個方面，加緊扶持自己的代理人，並統戰滲透美國華人基督教界：

- (1) 統戰、滲透華人教會、神學院、教派聯會、機構、團契及論壇、大會。
- (2) 統戰、影響海外華人基督教媒體
- (3) 對在美國的家庭教會背景公義人士及機構進行攻擊、隔離和排擠。

(1) 統戰、滲透華人教會、神學院、教派聯會、機構及論壇、大會

中共三自會對海外華人教會等組織的統戰分兩種方法，一種是直接扶持代理人，另一種是讓對方表態支持三自會(在海外華人教會界被曲稱為註冊教會、合法教會、公開教會)。根據網上一些在美國的家庭教會人士揭露，三自會扶持了一個叫“基督教人士交流機構”(Christian Leadership Exchange)的福音機構。該組織的負責人是余國良博士(Dr. Danny Yu)和彭永寧博士(Dr. Wing-ning Pang)。余博士出身香港，1966年移民美國，在富勒神學院獲神學博士。

這個組織是在美國註冊的一個專門針對大陸事工的福音機構。這個組織在大陸的絕大部分活動都是透過“三自會”進行的。幾年來，該組織資助在北美免費分發三自會機關刊物《天風》雜誌；從1999年起，每年定期邀請、贊助三自會領導訪問美國，並為三自會舉辦籌款會。該組織也參與在所謂“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的活動中。

據有關人士透露，這個組織每年為三自會籌款達百萬美元，主要用於幫助三自會蓋教堂、慈善活動等等。例如，2000年，該機構邀請了以三自會副主席鄧福村為團長的三自代表團，在美國的西部與美國許多教會代表見面，在這次研討會上，三自會向美國教會提交了一份要求援助方案，共有44個項目，從建堂到英語訓練等等，每個三自會神學院的援建在15000美元左右。這幾年每年都有這樣的活動舉行。顯然，該機構無疑是三自會在美國的代理機構之一。

自改革開放後，三自會就有計劃地派教牧人員到美國神學院讀書留學並留在美國華人教會牧會，當他們成為主任牧師後，該教會就成為三自會在美國的代理教會。在洛杉磯、紐約不乏這樣的教會。

除扶持代理人外，大多數情況是影響、滲透改變華人教會、機構。除上文提到的基督之家和大部分受滕近輝牧師影響的香港教會明顯地親三自會外，不少教會、教會聯會也被三自會統戰。一位在美國的流亡家庭教會人士對筆者說，他在洛杉磯期間去過很多教會，如信義會、衛理公會、其他獨立教會，問他們到中國與那些教會聯會時，不少教會回答是：註冊教會或合法教會。顯然是指三自教會。有一個信義會，與三自會聯會一直樂此不疲，當他知道流亡家庭教會人士的身份後，立即劃清界限，再也不聯絡了。

海外華人教會界有很多教派聯會，他們的負責人是中共三自會影響的重點對象。一個擁有近百名成員（教會）、名叫美國加拿大華人浸信會聯會的組織，其最近的負責人在公開場合多次宣稱，他們在中國的合作教會是公開教會、合法教會、註冊教會。儘管聯會負責人的傾向並不是每個參與牧者的傾向，但作為總負責人，具有無可估量的影響力。

對各類福音機構、神學院的統戰也是顯而易見的。目前在美國華人教會界，亮出旗幟支持家庭教會的機構，也就只有“中國福音會”、“對華援助協會”少數幾個機構了。其他的福音機構，中共宗教統戰部門及其三自會對他們經常進行訪問，並邀請到大陸三自會、大學、學術機構進行講座、講道。一來二去，就成為三自會心領神會的朋友了。神學院方面，受親三自的美國神學院福勒（FULLER）傾向影響，洛杉磯的不少華人神學院，也都實行雙軌路線，從不強調家庭教會，對當代中國教會史有關家庭教會部分毫不作講解。其他舊金山、紐約的幾個華人神學院，也沒有一個特別堅持要走家庭教會路線的。

全福會等基督徒商人團契，一直是中共海外基督教統戰的重要項目。在香港、深圳很活躍的香港全福會，其負責人也經常出入中共統戰部門。而美國加州的幾個全福會負責人，也是中共統戰部的座上客。尤其是很有規模和實力的洛杉磯全福會，其負責人據傳本來就是中國外事系統的官員。該全福會經常舉辦中國主題的活動，在聖誕節、中國春節等重大活動中，經常邀請中國大使館官員蒞臨現場，形成中共官員統戰美國華人基督徒的局面。

中共三自會對海外華人基督徒的各種大會也非常敏感，經常派人進行滲透和統戰工作。2008年12月的海內外華人教會“一代人的見證”特會，儘管有美好的動機，但由於三自會有關勢力的介入和滲透，最後出臺的《舊金山共識》並沒有提及

中國家庭教會，因此在受到各方詬病後難以為繼。

對華援助協會網站曾經發布過一家庭教會牧者的文章《從中國家庭教會現實處境談“華福”與〈生命季刊〉家庭教會立場之轉變》該文指出了三自會一直在影響、滲透著華福大會及《生命季刊》主辦的中國福音大會。該文指出：“2011年9月12日——16日，世界華福中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第八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取消了之前安排的中國家庭教會領袖‘工作坊’分享，更沒有公開邀請中國家庭教會領袖參加會議。時任華福總幹事李秀全牧師解釋此事說：‘有人認為：我們在這種情形中不需要，給日後帶來一個沒有辦法處理的後果。’而這只為‘能避開一些敏感的東西’。如是，整個巴厘島華福大會，沒有中國家庭教會的聲音，沒有為中國家庭教會禱告主題，也沒有中國家庭教會的字眼出現”。

該文也認為《生命季刊》對家庭教會立場趨向軟化：“2011年11月24日——27日，《生命季刊》在香港舉辦中國福音大會，來自中國內地教會逾5000弟兄弟姐妹赴港參加會議。然而，這次福音大會與2007年香港中國福音大會有著巨大的不同：一是參會人員並不明確要求必須是家庭教會肢體，有許多官方三自教會成員報名參加；二是所有大會講員鮮有提及‘中國家庭教會’這一詞匯，對家庭教會敏感問題徹底回避，三是大會沒有安排為遭受逼迫患難的家庭教會禱告（包括北京守望教會）主題。2007年在香港舉行的中國福音大會上，洪予健牧師、劉同蘇牧師等為家庭教會慷慨激昂的呼籲聲音，與會家庭教會同工在基督裏攜手共振的場景，已經成為過去”。

該文指出：“華福”和《生命季刊》在家庭教會立場上的轉變與軟化，並不能給自身利益帶來多大好處，反而迎合了中共官方的意圖，必會帶來對家庭教會的巨大傷害。當然，“華福”和《生命季刊》之轉變，跟三自會通過各種勢力來影響、滲透前二者有極大的關係。

(2) 統戰、影響海外華人基督教媒體

海外這幾年湧現出眾多基督教媒體，如《生命季刊》《海外校園》《中信》《恩福》《舉目》《傳揚》《傳》等期刊，也有很多網絡媒體，如《基督日報》系列網站、OC（海外校園）系列的愛看網等網站。這些媒體對中國大陸基督教界也有足夠大的影響。

但是在守望事件發生後，除了美國“對華援助新聞網”、香港“時代論壇”網站大幅度報道、基督日報系列網站偶爾報道外，幾乎不見其他基督教媒體的報道。

反而海外的人權網站如博訊、參與、RFA 網站倒是大規模報道。基督教媒體不關心家庭教會尤其是國內基督徒被迫害事件，已經成為不少海外華人基督教媒體的常態。

控制了媒體就控制了信徒對事物的看法，除了一些神學觀念影響外，中共無孔不入的基督教統戰，深深地影響著海外基督教媒體對待逼迫事件的態度。從硬的手段講，如果媒體報道逼迫事件，那麼網站就有可能被中共封鎖、電視被關閉信號，而且主編、編輯回中國就有麻煩。筆者曾到臺灣參觀好消息電視臺（GOODTV），負責人明確地告訴我，本臺對凡是有大陸背景的傳道人的講道和節目一律不播，因為擔心會惹麻煩並被掐斷在大陸的電視信號。有一位基督教雜誌主編曾坦承，為了能進到中國傳福音，所以平時非常在意文章的敏感度。

而從軟的手段，中共統戰部門也不時邀請一些海外基督教媒體的負責人到中國大陸，講道、召開學術會議，邀請參與有三自會背景的眾多論壇、為其出書等等不一而足。通過這些統戰手段，海外基督教媒體大都不談敏感的逼迫事件，對社會公義、基督徒與政治、人權民主等話題，也退避三舍，當然，他們為這些“非政治化”的編輯政策包裝了眾多美麗的神學、聖經註腳，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3）對在美國的家庭教會背景公義人士及機構進行攻擊、隔離和排擠

中共在美國的基督教統戰的另一個目的，就是對在美國的家庭教會背景公義人士及機構進行打壓，使他們揭露國內逼迫、為家庭教會呼籲的聲音在海外華人教會界“消音”。

如在海外一直為家庭教會呼籲、為受迫害的信徒施以援手的對華援助協會，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海外華人中的眾多“紅色牧師”、“紅色基督徒”們排擠、抵制和攻擊，汗蔑本協會“搞政治”、“利用基督教”、“搞解放神學”，許多重大的美國華人基督教論壇、會議，都拒絕和排斥本協會參與。多年以來，本協會所募集的對國內家庭教會的愛心奉獻，幾乎全部來自白人教會，僅有少數的華人教會參與到本協會的事工中。本協會長期在華人教會界被孤立和打壓的狀況，最真實地說明了中共對美國華人基督教統戰的手段是何等的毒辣和兇狠！

除了對機構外，對在美的流亡家庭教會傳道人也極盡打壓之能事。很多家庭教會背景的流亡傳道人深深感到：在中國我們受到逼迫，到美國了，沒想到我們還是受到逼迫，而且這裏不是政府在逼迫，而是華人教會自己。據前段時間在臺灣立法院揭露中共迫害家庭教會、統戰臺灣教會的中國家庭教會傳道人郭寶勝介紹，他

2008 年流亡美國在加州讀神學院期間，由於參與有關中國人權和宗教自由的活動，竟被很多當地華人信徒給神學院施加壓力，要求他不再參與此類活動。

郭傳道在加州某華人教會實習期間，主任牧師多次接到電話，要求他們教會不再接納郭作為教會實習傳道。在此壓力之下，郭傳道不得不離開該教會。此後，在他不斷實習或牧會的教會，此類事情還不斷發生，某個勢力一直在這些華人教會散布“他是危險分子”、“他跟法輪功搞在一起”、“跟他就回不了中國”等的攻擊和謠言。

據郭介紹，2011 年他到休斯頓參加某基督教論壇，本來要帶一些中國福音會有關家庭教會被逼迫的文字資料到會場，結果被會議主辦者得知後禁止帶入會場。就在這次會議上，一個從上海來的自稱是基督徒企業家的人士對郭傳道當面威脅說：“在美國做事要小心點”，此人並在多人面前說不要買郭傳道的書，買了之後進不了中國雲雲。

一葉知秋，從中國家庭教會傳道人郭寶勝的身上我們就可以看出在美國的流亡家庭教會人士是何等地艱難，到美國了，還受到中共統戰的攻擊和打壓。所以很多家庭教會背景的傳道人到美國後，或者絕口不提自己出自家庭教會，或者只在白人教會發展。因為華人教會都已經被中共勢力滲透、統戰得差不多了。

結語

彼得前書 4: 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美國華人教會，這個不少成員與中國家庭教會有意無意地隔離起來的教會，在聖潔、公義的上帝面前，應該到了省察反思、悔改歸正的時候了。由於自身的軟弱，也由於扮作“光明天使”的魔鬼撒旦的狡詐和兇狠，致使不少美國華人教會被敵基督的中共政權及其幫兇三自會所統戰、滲透甚至收買，替邪惡說話，讓良善者寒心。而如果任由這種局面發展下去，不僅華人教會自身的公義聖潔受到玷汙、符合聖經原則的神學難以建立、中國社會公義無海外華人基督徒關懷，而且美國賴以立國的宗教自由原則會受到侵犯，美國的國家安全也會處於危機當中。

最後，我們以基督徒的良知謹向美國政府和在美國的眾多華人教會信徒及教牧，發出以下三點呼籲和勸告：

1. 美國華人教會中的某些教會應該自行了斷與中共三自會的任何聯系，因為後者根本不是教會，而是共產黨的部門。同時，美國華人教會整體上應該單單與中國

家庭教會聯系和搭配事工，扶持家庭教會在中國的長足發展；美國華人教會應該邀請受迫害的中國家庭教會信徒在美國華人教會界講解逼迫真相、揭露中共暴行；

2. 美國政府應該禁止中國國家宗教局官員、中國三自會高層教牧人員前來美國。因為這些組織對內是迫害中國宗教自由、打壓家庭教會的專制機器，對外是進行宗教特務滲透和統戰、威脅美國宗教自由的間諜組織；美國政府也應該調查與中共三自會等宗教特務組織有密切往來的某些美國華人基督教界人士，是否有收受中共利益、危害美國宗教自由、出賣國家利益的行為；

3. 美國政府及國會應該邀請受迫害的中國家庭教會信徒，以各種方式揭露中共逼迫家庭教會、迫害宗教自由的真相，並與家庭教會有識之士商量對策、共同防範中共對美國無孔不入的基督教統戰。

二、評所謂“第二屆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

根據中國基督教兩會網站快訊：“2013年11月18日，由中國基督教兩會、美國葛培理布道團共同主辦的‘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在上海舉行。此次論壇是繼2011年9月27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勝利舉辦的首次論壇之後，第二屆由雙方共同舉辦的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

與今年8月底在臺灣召開的“兩岸基督教論壇”一樣，這是中共統戰部與官辦教會又一次的統戰盛會，只不過對象從臺灣轉移到美國基督教界。眾所周知，諸如此類的論壇，是中共利用基督教的普世性的紐帶進行統戰和傳播、向國際社會營造中國宗教自由的虛假表象、掩蓋家庭教會受逼迫的真實狀況的工具而已。國際社會也有不多的基督教界人士被其蒙蔽、利用，也著實讓人惋惜。

與“兩岸基督教論壇”一樣，這次代表所謂中國基督教界的人物，清一色全是官方教會人士，而毫無中國家庭教會的人士出席。統戰部、宗教局及兩會官員們還打腫臉充胖子，自稱是“中國基督教界領袖”。而人數上多三自會三、四倍的家庭教會，卻被中共宗教當局隔離在這個論壇之外。眾多信仰堅定、社會影響大、得到國際社會贊譽的家庭教會領袖，也無緣參加這次大會。事實上，沒有家庭教會領袖的參與，就構不成所謂的“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這次論壇，再次證明了中國宗教當局徹底否定家庭教會事實存在、繼續要讓家庭教會“非法化、隱蔽化”的愚蠢行徑。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有家庭教會（House Church）的今天，上海的該次論壇純粹是掩耳盜鈴、欺世盜名之舉。

與“兩岸基督教論壇”一樣，這次論壇毫無有關中國宗教自由和基督徒受逼迫的議題，高唱和諧與所謂的“和好”又成為該次論壇的高調。正如兩會網站新聞報道：“開幕式致辭後，高峰牧師、葛福臨牧師圍繞‘和好·福音’的主題作了主旨發言。高峰牧師通過闡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和諧’的概念，表示崇尚和諧是中西文化的共性。基督救恩的核心信息也是和好、和諧，中國基督徒會本著和諧的精神，將基督的福音發揚光大”。

我們要質問與會的官方教會人士，你們為什麼不跟家庭教會和好呢？你們為什麼至今還聯合國家機器來逼迫家庭教會成員呢？你們所謂的和好、和諧難道以踐踏神的公義為代價嗎？就在你們高唱和諧的同時，河南濮陽的張少傑牧師剛剛被捕，至今毫無下落；而真正的中國基督教界領袖之一，已經被軟禁兩年多的金天明牧師還在多名看守的非法家庭軟禁中；太原恩雨書房兩位熱心傳播福音的基督徒，仍然在冤獄之中；而剛剛二審的河南葉縣教案中家庭教會信徒，也還在監牢裏盼望自由！這些層出不窮的迫害事件，實際上是對所謂的“和好”的最大諷刺。

海內外弟兄姊妹，我們除了抵制中共兩會這次名不副實、“假和好、真統戰”的論壇外，也要奉勸這次參加“第二屆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的美方代表葛培理布道團，你們與三自會的親密交往應該到此為止了！據主內陳鴿弟兄網絡文章《一個妥協派的標本：葛培理》中指出：葛培理及其布道團多次接受中共三自會邀請前往中國大陸，並在海外宣揚三自會及中國所謂的宗教自由。對於家庭教會，他或者幾乎不提，或者極力撮合家庭教會無原則地跟三自會“和好”，據說他今生的一個目的，就是要促成三自會和家庭教會的“合一”。

《聖經》哥林多後書 6：14：“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上帝是忌邪的神，不僅堅持純正信仰的家庭教會與中共為元首的三自會不能合一、混同，而且以清教徒精神為根基的美國教會，也沒有必要與三自會“和好”“合一”。中共政權壓制宗教自由、打壓家庭教會舉世皆知，作為基督徒、尤其是牧者，是不應該與他們媾和，更不應該為其唱贊歌的。在神的真理面前、在聖經面前，再有影響、再有勢力的美國牧師，也應該服膺神的真理。在神的公義上，一個受逼迫的中國農村基督徒，與葛培理是具有同等地位的。

總之，作為中國家庭教會的成員，我們希望海內外基督徒（華人、美國人等等）能認清這次的所謂“第二屆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的本質，我們也期待，不久將來，有家庭教會領袖及真正能代表中美兩國基督教界的領袖們，召開名副其實、榮神益人的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這正如詩篇 11：7：“因為耶和華是公義的。他喜愛公義。正直人必得見他的面”。

三、誰是美國基督教界的羅德曼？

新年伊始，美國著名退役籃球明星羅德曼 Dennis Rodman 率領一批前 NBA 球星趕赴朝鮮平壤，為剛剛弒殺掉自己親姑父的朝鮮領導人金正恩進行慶生表演。羅德曼稱朝鮮之行是籃球外交，他把這次 NBA 球星同朝鮮國家籃球隊的比賽，獻給他“最好的朋友”金正恩。

金正恩攜夫人觀看了這次籃球表演賽。比賽之前，羅德曼在這個容納了 1 萬 4 千名觀眾的平壤體育館中央向金正恩高唱生日愉快歌，並向其鞠躬行禮。羅德曼說，他很榮幸能在平壤打這次表演賽，並稱其具有“歷史意義”。

在訪問之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記者克裏斯·庫莫(Chris Cuomo)問到羅德曼是否打算在訪問期間與朝鮮領導人討論美籍韓裔宣教士裴俊浩 Kenneth Bae 被判刑 15 年的問題時，羅德曼不僅不對裴俊浩表示同情，反而情緒激動、支支吾吾半天，“肯尼斯·裴做了一件事，”羅德曼在採訪時說。“如果你了解他做了什麼……你明白他在這個國家做了什麼嗎？不，不，不。你告訴我，你告訴我，他為什麼被這個國家關押呢，為什麼呢？……我想說的是這個。”顯然，羅德曼的回答似乎隱射出裴俊浩做了一些該被監禁的事。

羅德曼的這番違背美國公民良知的談話和他為獨裁者祝壽、唱歌的荒唐舉動，招致了全世界公義人士的強烈憤慨。裴俊浩的妹妹泰瑞(Terri Chung)告訴福克斯新聞，她曾經希望 NBA 巨星訪問朝鮮時，能夠呼籲特赦哥哥，但羅德曼發出“離譜的指控”來反對，令人吃驚。

與羅德曼一同前往朝鮮的前 NBA 球員查爾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告訴美聯社記者，他後悔去平壤參加比賽。NBA 總裁大衛·斯特恩(David Stern)及美國籃球退役球員協會也發表聲明澄清和羅德曼及他的團隊的關係。

自詡為“籃球外交”的蹩腳外交家羅德曼不僅與嗜血恐怖的獨裁者與狼共舞，而且對為了宣教而身陷囹圄、飽受摧殘的美國公民嗤之以鼻；不僅對北韓獨裁政權罄竹難書的反人類暴行置若罔聞，反而獻媚暴君、粉飾獨裁者、詆毀正義者，他的

所作所為，顯然徹底地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了。羅德曼到底是美國公民還是北韓金氏王朝的臣民、到底是專制社會的寵兒還是自由社會的明星呢？

像羅德曼這樣的人，在美國大有人在，他們有意鉆民主國家言論自由的空子，與美國價值觀的敵對者眉來眼去、如膠似漆。在美國基督教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布道家、教會領袖葛培理 Billy Graham，他在美國基督教界的地位，比羅德曼在美國籃球界的地位還要高，但他從 1988 年開始就頻頻訪問共產中國、與共產黨控制下的三自教會相交甚歡，而對中國家庭教會受逼迫的現狀從來不發一言。說他是美國基督教界的羅德曼，並不為過。

與羅德曼屢次去北韓一樣，葛培理屢次去中國，並且一直自我感覺良好，以為在進行“基督教外交”，促進美國與共產中國的和諧。實際上他所做的“基督教外交”單單是與中國專制者的外交、與中國人民的對立面的外交，不僅完全是片面的，而且也完全踐踏公義和良知、混淆是非和正義。他所做的，只能使邪惡者更加有恃無恐，美國價值觀更加受到巨大的威脅。

與羅德曼無視北韓人權現狀和詆毀美國韓裔宣教士裴俊浩一樣，在葛培理與共產中國宗教當局的交往中，一直無視中國駭人聽聞的宗教不自由現狀，對受迫害的家庭教會置若罔聞。本來憑著葛培理的影響力，他在與中共宗教當局交往時，應該提出給予中國宗教自由和給予家庭教會更多自由的正式要求，但是從來沒有聽說他對中共政權提出過這種要求。就像羅德曼無視金氏王朝餓死千百萬朝鮮人民、整個朝鮮就是一個集中營的事實一樣，葛培理也昧著良心，對中共當局踐踏宗教自由、打壓家庭教會的醜惡行徑視而不見，不僅不批評專制者，反而與專制者媾和。

與羅德曼來去北韓多次粉飾北韓形象、贊美金正恩，並給世人造成美國有人贊同金正恩政權一樣，葛培理在與中共宗教當局的各種接觸和活動中，也多次為中共宗教政策辯護、粉飾宗教自由的假象，欺騙世人認可中共，也使世人以為美國教會在支持中共三自會，美國認可中國目前的宗教自由狀況。2011 年 9 月 27 日和 2013 年 11 月 18 日，美國葛培理布道團與中國基督教兩會（CCC\TSPM）、共同主辦了兩屆‘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一次在美國，一次在中國。自 2004 年起，葛培理所在機構與中國基督教兩會先後在美國及世界各地舉辦聖經展，企圖給海內外基督徒和普通民眾以中國基督教自由發展、聖經自由印刷和銷售的假象。葛培理與中共宗教當局屢次合謀欺騙中國人和美國人，難道不良心有愧嗎？

與羅德曼去北韓討好、取悅、祝壽金正恩一樣，葛培理每次去中國，大都是只去官方三自會和中共宗教當局，到三自會神學院和教堂講道，大批資金資助三自會，獻媚和討好宗教當局。葛培理的兒子創立東門國際事工(East Gates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主要從事支持中共三自會印刷聖經的工作。到目前為止，中國聖經的唯一印刷、出版、銷售單位就是三自教會，其他的所有書店和機構都不能進行聖經銷售。由於只能在政府的三自教會購買到聖經，也導致眾多邊遠地區信徒買不到聖經、或者買聖經時暴露家庭教會聚會點的情況。聖經的印刷、出版、銷售嚴重受限，如此違反宗教自由的尷尬處境實際上跟葛培理大有關係。葛培理如果明智就應該資助除三自外的中國家庭教會、多家出版社出版聖經，而不是單單資助三自。現在三自壟斷聖經印刷，出版社無法出版聖經、書店買不到聖經，主要原因當然是中共政權宗教和出版不自由的政策造成的，但葛培理的作法鼓勵了這種不自由和壟斷，這是顯而易見的。

與羅德曼一樣，由於葛培理在美國乃至世界基督教界的地位，他與中共宗教當局媾和的種種行徑已經造成了很壞的影響，蒙蔽了不少人。目前海外基督教普世性機構，也大多與中共官方教會聯系，大多海外華人教會，也受到葛培理的影響，單單與三自會交往，無視家庭教會的存在及其苦難。要想使中國家庭教會在普世國際化、公開化，要想徹底根除中共宗教當局對海內外的基督教統戰、滲透，要想使海外華人教會真正關心和援助中國家庭教會，葛培理及其機構的悔改轉變是至關重要的。

馬太福音 3:2：“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詩篇 51:17：“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在上帝眼裏，名聲如日中天的葛培理跟任何一個基督徒一樣，都是蒙恩的罪人，都需要歸天家後在主面前交賬。因此我們希望海內外弟兄姐妹，都能夠給葛培理及其機構，通過郵信、電話、電子郵件等方式發出善意的規勸和警告，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神對真心悔改的迷途羔羊，也是最為看重的，正如耶穌所說：“你們中間，誰有 100 只羊失去一只，不把這 99 只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路加福音 15:4）

四、對臺灣基督教統戰的險惡用心

“統一戰線”被中共列為奪取和鞏固政權的三大法寶之首，其他兩件是“黨的建設”和“武裝鬥爭”。統一戰線是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就是利用共同點來求同存異、化敵為友、化友為同誌。宗教統戰是統戰的重中之重，因為宗教具有普世性，不同國家、民族和政治立場，由於共同的宗教信仰，會發生聯系，趨於相同。所以，對臺灣的統戰中，先是佛教、道教，然後是基督教，都成為中共統戰的重頭戲。近年來，中共統戰部、宗教局，更是把對臺灣基督教的統戰看為重中之重。

據香港媒體報道，在 2008 年 6 月中共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令計劃對宗教統戰臺灣進行解釋時，說：“胡錦濤同志指示我們，‘道教、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和媽祖信仰的根都在大陸，臺灣信眾的宗教信仰的根也在大陸，進行宗教統戰工作要牢牢把握這個關鍵，使臺灣信眾心系大陸。情系大陸，魂歸大陸。在兩岸政治統一之前，要率先作到宗教統一。要廣泛建立兩岸宗教組織交往的紐帶，要特別註重臺南地區的媽祖信眾同福建之間的宗教文化聯系’。胡錦濤同志的這個指示，是我們擬定宗教統戰方案一直遵循的原則，它明確了宗教統戰工作的最終目標和方向。”

根據這樣的原則，中共列出佛教、道教、媽祖信仰在內的各臺灣宗教領袖性人物的名單，並作到“統籌安排，專人負責”。於是臺灣佛教界政治和尚星雲大師被統戰，開始倒扁挺馬、鼓吹統一、積極地充當中共在臺灣佛教界的代表。對佛教的統戰也包括對藏傳佛教的汙蔑、驅除達賴喇嘛在臺灣的影響。於是臺灣街頭出現“藏傳佛教不是佛教”的橫幅，在臺灣到處散布藏傳佛教喇嘛騙財騙色的故事。

針對“媽祖”信仰，中共有意促成媽祖的根在大陸的形象。2011 年 12 月 14 日來自中國福建莆田媽祖廟的翡翠媽祖像在 600 信眾護送下，清晨乘“中遠之星”客輪抵臺中。在臺中地區繞境 4 天。大陸海協會務副會長鄭立中在福建莆田說，兩岸要共同秉承媽祖精神、弘揚媽祖文化，媽祖護佑的內涵，一是平安，二是幸福。

但自 2010 年後，中共對臺的宗教統戰從佛、道明顯轉移到基督教上。2010 年 9 月 17 日，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一行到臺灣與蒲公英希望基金會等臺灣

基督教機構 100 余位牧師、長老等對談，從此兩岸教會間互訪不斷，直至大選和兩岸基督教論壇。比較大型的有幾起：

2010 年 11 月 14 日，中國基督教協會副總幹事、《天風》主編單渭祥等一行四人對臺灣教會進行了為期四天的訪問，接見了魏悌香、周神助等牧者。

2011 年 3 月 14 日，廈門市基督教兩會接待臺灣基督教長老會高雄中會一行 22 人。兩地教會還在竹樹堂舉行聯合聖餐禮拜。

2011 年 3 月 21 日至 25 日，魏悌香、夏忠堅等臺灣教牧代表團一行 19 人訪問了北京、南京和上海等地，並訪問統戰部、國家宗教局、全國兩會和金陵協和神學院。

2011 年 11 月 21 日至 26 日三自主席傅先偉在臺北接見王雪紅後對臺北、臺中諸多教會進行訪問。

在大選前的 2011 年 1 月 9 日到 11 日，兩岸教會頻繁交流的一些頭面人物如周神助牧師、夏忠堅牧師等在高雄舉辦所謂的第二屆「臺灣牧者國是論壇」，近 200 位來自各城市的牧者參與，為大選造勢。

2013 年 8 月 27 日，兩岸基督教論壇在臺北正式開幕。會議有中國、臺灣兩方面共 200 多位基督教界人士參與。中國方面，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傅先偉率領 90 多位宗教官員、三自會教牧人員前來參會；臺灣方面，有周神助牧師、魏悌香牧師等教牧人員 160 多位參與。

可見，對臺灣的基督教統戰愈演愈烈。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是基督教而非其他宗教被中共看重呢？有人說這是因為前宗教局長葉小文是研究佛教的，而王作安是研究基督教的。其實這不是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大致有以下 3 點：

首先，不僅臺灣，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中，基督教信眾都是當地社會的精英階層。與佛、道信眾主要是臺灣社會底層、基層不一樣的是，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很多都是基督徒。如在臺灣，由於蔣介石夫婦影響，國民黨高層中不少是基督徒，而民進黨等綠營中高層，由於受臺灣長老教會的影響，很多要員也是基督徒。在經濟方面，如宏達電子、威盛電子公司董事長王雪紅姊妹與丈夫陳文琦弟兄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在臺灣科技、醫療、學術方面起很大作用的海歸人士，也有不少是基督徒。所以，在對佛、道的統戰沒有產生預期的社會影響情況下，中共當局開始轉向，對基督教大規模統戰。影響牧者，就影響了成千上萬的會眾；影響了基督徒名人，就影響了社會各界的群眾。如大選前對王雪紅的基督教統戰（見三自會《天風》2012 年第一期第 34 頁），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

其次，對臺灣基督教的統戰直接影響到對歐美國家華人、白人的統戰。佛、道是中國本土宗教，在海外影響力很小，歐美國家大部分是基督教占主流的國家，基督徒比例非常之高，社會精英幾乎全部是基督徒。所以，對臺基督教統戰，直接影響到對西方國家的統戰。另外，海外華人教會牧者、長老、職事大部分都是臺灣人，他們在政治立場上都是看寶島內部牧者們的態度，如果改變了臺灣基督徒的政治立場，海外華人的也就輕而易舉。比如周神助牧師的靈糧堂系統，在海外有 300 多家，美國有近 100 多家，周對這個系統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周如果有何種政治立場、與三自或者家庭教會來往，就直接影響了全球靈糧堂 10 多萬的基督徒的選擇。

最後，對臺基督教統戰的矛頭直接指向被稱為“臺獨大本營”的基督長老教會。眾所周知，長老教會是提倡獨立建國的深綠團體，是臺獨意識形態的源發地。長老教會也庇護了眾多追求臺灣自由、民主、獨立的人權人士。極力促統、滅獨的中共當局，對長老教會欲斬草除根而後快，在不能馬上根除的情況下，只能在基督教界孤立其，並通過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滲透、改變、分化長老教會。自 2010 年以來，已有不少長老教會的牧者被中共邀請到大陸，長老教會有根基的原住民也被中共代理人採取各種手段進行拉攏、收買，有些長老教會的神學院院長，累次收到中國國家宗教局、統戰部的邀請電話。儘管長老教會總會在兩岸基督教論壇舉行前發布牧函，不提倡牧者信徒前往該論壇。但是，也有一些被統戰了牧者，參與此論壇。以上足見中共基督教統戰的老謀深算和險惡用心。

總之，中共統戰部門、宗教局、三自會早已拉開了對臺灣基督教統戰的軟戰爭，此戰爭其實比臺海導彈更具殺傷力。所以，臺灣基督教界要特別警惕、決不能掉以輕心。不僅如此，臺灣基督教界更應該聯手中國家庭教會，盡快制定出抵制基督教統戰的系統方法，並加以實施。如此，才能挽狂瀾於既倒，將扮作光明的天使的魔鬼趕出福音之地。

五、捍衛公義——評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牧函

馬太福音 5 章 37 節：「主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三自會統戰臺灣重頭戲——兩岸基督教論壇已經拉開帷幕，擾亂人心、混淆是非的局面已經開始。面對紛擾之局勢，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常置委員會於 7 月 9 日召開會議、做成決議，並發布牧函說明。此牧函原則之鮮明、立場之堅定、洞察之深刻，顯係秉承了長老教會一貫之傳統。讀後讓人清醒、讓人振奮。

正如總會牧函指出的，兩岸基督教論壇幕後操縱者是中共統戰部和宗教局，他們目的是「想要做大、做深，讓臺灣與中國的基督教表現出『一家親』的表象。」其根本的用意是分化瓦解臺灣基督教界，以宗教之統一達到政治之統一。如同那人反叛上帝的古蛇，用人「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驕傲」誘惑人一樣，不少臺灣牧者和教會已被其統戰和誘騙。兩岸基督教論壇很具迷惑性，但明察秋毫的總會牧函使信徒們開始抵制引誘、變得清醒。

讓人讚嘆的是，總會牧函基於普世信仰，對耶穌基督在中國的真正教會——家庭教會的支持和鼓勵。對不畏逼迫堅守信仰的中國家庭教會信徒的讚許、對中國宗教自由的期盼，在在都表達了長老教會一貫的公義和國度裡的相助。

黑和白不能同一、邪惡與公義也絕不能聯手。基督教界的普世性要建立在真信仰基礎上，絕不能建立在政治統戰陰謀之上。正如牧函最後所指出的：正義公道為根基的上帝國，才是臺灣與中國的基督徒應當共同追尋的。「禰的國是以正義公道為根基；禰所做一切都是信實慈愛。」（詩篇 89 篇 14 節）

附：7 月 9 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兩岸基督教論壇之牧函

由蒲公英基金會董事長魏悌香、其他教派牧長及中國基督教兩會（中國基督教協會、中國三自愛國運動促進會）共同舉辦的「兩岸基督教論壇」將在 8 月 27-31 日於臺北舉行。我教會之部份牧長已收到邀請函，在參加與否中難以決定。因此，

我們再次重申於今年1月7-9日於聖經學院所舉辦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宣教—對中國的政策」時對中國教會的理解所說的：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宣教理念為上帝的宣教，乃在普世教會脈絡中的整全宣教。

- 面對中國教會應該以對等及相互尊重的宣教倫理為基礎，承認並尊重所有既存的在地教會。因此，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在理解中國教會時，除了同為普世教協會員教會的中國基督教協會外，也不能漠視家庭教會的存在事實。

- 此外也了解被稱為中國基督教兩會的中國基督教協會與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乃自稱為「接受共產黨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是「愛國愛教的團體」；而家庭教會則有不同的屬性。

因此，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正積極了解中國教會的歷史與現況，並籌劃撰寫相關教材，讓牧長、信徒了解。

在相關研究及教材尚未完成之前，我們希望不以「急躁躍進」之態度來看待8月將在臺灣舉辦的「兩岸基督教論壇」，因此我們提醒：

- 中國基督教兩會目前仍具有濃厚的統戰意識，目前並不適宜私自與之接觸。若真的必要與之接觸，宜在普世教協的架構下與中國基督教兩會交流。

- 此次的兩岸基督教論壇乃為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及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的同意下，在臺灣舉辦的論壇，想要做大、做深，讓臺灣、中國的基督教表現出「一家親」的表象。因此，我教會不宜參加「兩岸基督教論壇」。

- 我們記念那些不畏懼中共政權，堅持信仰良心而受迫害的許多中國的基督徒；為中國的宗教自由祈禱，期待有一天中國的基督徒可以秉持信仰，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

我們懇求上帝，使臺灣與中國的基督徒可以有勇氣追尋「你的國是以正義公道為根基；你所做一切都是信實慈愛」（詩篇 89:14）的上帝國，讓上帝的名得榮耀，讓人民得著祝福。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總會議長 許榮豐

總幹事 林芳仲

主後二〇一三年七月九日

六、在臺灣立法院“防範宗教統戰”公聽會上的證詞

2013年9月12日上午，應臺灣立法院立法委員田秋堇女士和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先生的邀請，中國家庭教會傳道人郭寶勝就家庭教會在中國大陸受迫害、中共三自會對臺灣進行滲透、統戰的真相，向臺灣政府移民署、陸委會、國安局、外交部、內政部等部門高級官員進行了講解和聽證，以下是其全部證詞：

各位立法委員、政府官員及媒體記者

您們好！

我叫郭寶勝，1972年生，1990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2004年信仰基督教。2008年因不堪中國政府的逼迫和騷擾，到美國流亡。在2004年到2008年期間，我作為家庭教會傳道人，親身經歷了當局對家庭教會無休無止的迫害。

1、我的個人經歷和見證

2004年我信上帝後不久在北京受洗，我後來到一個叫北京天嗣教會的家庭教會聚會，我們這個教會沒有固定敬拜場所，起先在牧師家裏，後來被居委會舉報，逼迫到北京一小區租房敬拜，但很快這個地點又被舉報，後來我們教會到一個餐館包間聚會，唱詩講道後，大家吃完中午飯就離開。這種狀況在我離開中國後還在持續。

另一方面，由於上帝的眷顧，我信主不久就開始在國內家庭教會傳道，四年來，走遍大江南北。我主要宣講基督徒的“天職”觀和與中國當下經濟領域的“狼文化”和政治領域的“龍文化”相對的基督教價值觀的“羊文化”，羊文化實際上是基督教價值觀在中國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彰顯。2007年11月，我在東莞一家庭教會給70多信徒講課時，突然闖進來20多名身穿制服的東莞警察，扛著攝像機，包圍會場，我在警察林立的會場繼續講了半小時後，幾個弟兄上來告訴我趕快散會，於是我們禱告結束。其他會眾被遣散，我和幾個當地教會的骨幹被警察強行拉扯，帶到當地派出所審問。審問中說我不是政府指定的傳道人、且是跨地區傳道，是違

法。我據理辯解，最後我們幾人被釋放。

後來我在深圳、廣州、蘇州、天津等地的多次布道、講座都被提前取締。在北京我家，自 2007 年以來，當地派出所（北京朝陽區將臺派出所）累次來我家詢問、約談，尤其在奧運前後，前來 8 次之多，為“避運”我們全家在奧運期間去新加坡一教會。在新加坡時我們了解到有個新加坡基督教機構被廣東安全廳的女特務混進去，而且很虔誠的樣子，最後由於她匯報工作發錯電子郵件才被發現，這個特務通過半年的刺探使國內家庭教會蒙受了很大損失。

同時，由於我在家庭教會界的影響越來越大，我也成為三自會統戰的對象。有三自會高層牧師經常打電話邀我到他們的教堂講道，有了一定交往後，他們就提出一些統戰要求，被我拒絕。

在不堪忍受騷擾下，我後來到美國讀神學院，畢業後目前在華人教會當牧師。這次來臺灣，主要是聯合臺灣教會機構共同抵制中共宗教局和三自會在臺灣舉辦的“兩岸基督教論”。8 月 30 日，我們在立法院新聞發布室舉行了一個“假宗教、真統戰、批兩岸基督教論壇”的記者會。今天到立法院召開公聽會，除了繼續談兩岸基督教論壇外，主要談中共會借《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大舉對臺灣進行滲透、統戰和特務活動。

2、《服貿協議》和兩岸基督教論壇

2013 年 6 月 21 日簽署的《服貿協議》，是中共進行經濟統戰、準備大舉侵入臺灣的城下之盟。無論給臺灣多少的經濟利益和實惠，絲毫改變不了中共借此全面滲透臺灣的本質。如果協議實施，就會使更多的特務假借各種身份潛入臺灣，為中共提供情報，並統戰和收買臺灣民眾，切實威脅到臺灣的國家安全。而中共的官方教會三自會，也會借服務貿易協議在臺灣成立眾多屬於三自的教會，通過宗教進行收買和欺騙之能事。

實際上《服貿協議》還沒有簽署前就有大批特務滲透到臺灣，我舉一例。目前我也參與服事的臺灣一家專門向中國宣教的福音機構，在 2004 年左右就有此經歷。2004 年這個機構的一個負責人（引中共嫉恨的著名基督教人士）去世前後，這個機構長期受到中共特務的騷擾，中共特務多次向這個機構實施盯梢、跟蹤、照相和錄像。由於不堪忍受騷擾，這個機構成員取證後不得不向臺灣安全部門匯報，安全部門確認不是臺灣方面的，而確實是中共特務人員。據說安全部門官員當時親口對該機構負責人說：“象這樣的中共特務，目前在臺灣已經有近 3000 名了”。

中共是基督教的敵人，但卻利用基督教對臺灣進行統戰和特務滲透工作。它進行基督教統戰的目的是：掩蓋中國大陸迫害基督教的真相、打壓臺灣真正促進中國基督教發展的機構和人士、扶持臺灣基督教界的中共代理人、在臺灣進行宗教特務活動，威脅臺灣的宗教自由和國家安全。臺灣政府應該對中共的基督教統戰引起足夠重視。

例如這次 8 月 27 日到 29 日舉辦的“兩岸基督教論壇”，在臺灣政府來看，似乎是民間交流、是宗教界內部交流，但在中國政府看來，完全是政治任務的完成。你們應該注意到，這次論壇的新聞，首先是在中國的中央電視臺、新華網、統戰部網、宗教局網、共產黨員網出現的。今年年初，在中國國家宗教局《2013 年工作要點》中黑字白紙寫到：“今年對臺工作要點之一是，指導基督教全國兩會與臺灣基督教界共同在臺舉辦 2013 年兩岸基督教論壇”。中共竟把臺灣基督教界視為指導對象，統戰用意已昭然若揭。

此外，今年 4 月，中國宗教局副局長蔣堅永在會見“臺灣教牧團”時曾表示，希望“兩岸基督教論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更大貢獻。中共宗教局居然已把臺灣基督教，視為實現統戰的助力。可見，所謂兩岸基督教論壇，的確是中國官方、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而絕非民間之宗教交流。

3、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特務組織本質

臺灣政府應該明白，這次來參加論壇的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是中共直接控制的宗教特務組織，不是教會。類似的宗教組織還有官方的佛協、伊斯蘭教協會等。三自會是替共產黨工作的政治組織。1961 年第二次“三自全國會議”議決指出了三自的任務是：1. 高舉反帝愛國旗幟，2. 接受共產黨的領導，3. 積極參加勞動生產，4. 加強揭發所有非法的家庭教會活動。這 4 點任務到現在都沒有變。

三自會的高層牧師不少是共產黨員，他們之中有的還擔任了中共海外特務組織重要幹部。如 1983-1988 年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李儲文，自 1950 年開始就一直擔任上海國際禮拜堂主任牧師，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遭紅衛兵毆打時，自己暴露出共產黨員身份。

北京三自會副主席趙復三，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這次來臺灣的三自會主席傅先偉，在中國政府的介紹中根本找不到他信主、受洗和在那個教會牧會的經歷，顯然他是個高級政工幹部，空降到基督教界做領導工作的。

三自會在中國大陸一直聯合宗教局、公安局來打壓家庭教會，成為迫害宗教自由的幫兇。例如北京守望教會參與戶外敬拜的信徒被抓捕到公安局後，參與審問的人員一個是警察，一個就是三自會牧師。在海外，三自會的任務就是掩蓋中國迫害宗教自由的真相，營造中國宗教自由的假象。目前中共對基督教家庭教會迫害有增無減，如最近以來發生的北京守望教會、河南葉縣基督徒聚會處、山西太原恩雨書房等案件，但是，三自會對這些教案只字不提，只說現在福音如何促進社會和諧等等。

三自會的另一件海外任務，就是否認家庭教會的存在，汙名化、隱蔽化家庭教會。早在 2010 年 9 月，宗教局長王作安首次到臺灣與基督教牧師們對談時，當問到中國家庭教會問題時，他就矢口否認、答非所問。2011 年 11 月，王作安接受鳳凰衛視《問答神州》專訪時表示：“我本人就不承認什麼家庭教會，沒有這個問題”。

2011 年 11 月，中共三自會主席傅先偉在臺灣蒲公英希望基金會主辦的“基督教兩岸教牧及神學座談會”上與臺灣基督教界對談。據《基督教論壇報》報道，傅先偉回應臺灣牧者關於家庭教會的問題是說：“中國沒有家庭教會的概念，只有中國基督教教會”。

在 2013 年 8 月底召開的兩岸基督教論壇開幕式上，傅先偉致辭時說他代表大陸 2300 萬基督徒向臺灣基督徒問好。眾所周知，2300 萬這個數字僅僅是三自會信徒的數量，而家庭教會的人數是三自會的數倍。當傅先偉說他代表 2300 萬信徒時，顯然把 6 千多萬的家庭教會信徒，拋棄在“兩岸基督教論壇”之外，完全被忽視，被當做不存在。在《今日基督教報》網站的視頻中，當臺灣媒體採訪傅先偉、問目前大陸基督徒數量時，他竟然說：大陸基督徒不少，有 2300 多萬。

4、三自會對臺灣的統戰

三自會對臺灣的統戰，從 2010 年就開始了。2010 年 9 月 17 日，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一行到臺灣與蒲公英希望基金會等臺灣基督教機構 100 余位牧師、長老等對談，從此兩岸教會間互訪不斷，直至大選和兩岸基督教論壇。比較大型的有幾起：

2010 年 11 月 14 日，中國基督教協會副總幹事、《天風》主編單渭祥等一行四人對臺灣教會進行了為期四天的訪問，接見了魏悌香、周神助等牧者。

2011 年 3 月 14 日，廈門市基督教兩會接待臺灣基督教長老會高雄中會一行 22 人。兩地教會還在竹樹堂舉行聯合聖餐禮拜。

2011 年 3 月 21 日至 25 日，魏悌香、夏忠堅等臺灣教牧代表團一行 19 人訪問了北京、南京和上海等地，並訪問統戰部、國家宗教局、全國兩會和金陵協和神學院。

2011 年 11 月 21 日至 26 日三自主席傅先偉在臺北接見王雪紅後對臺北、臺中諸多教會進行訪問。中共控制的基督教界，對王雪紅進行了重點基督教統戰（見中國三自會《天風》2012 年第一期第 34 頁），導致她在臺灣大選前一天為中共的兩岸政策背書，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

2013 年 8 月 27 日，兩岸基督教論壇在臺北正式開幕。會議有中國、臺灣兩方面共 200 多位基督教界人士參與。

對臺灣的基督教統戰包括了對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分化工作。據本人了解，自 2010 年以來，已有不少長老教會的牧者被中共邀請到大陸，長老教會有根基的原住民也被中共代理人採取各種手段進行拉攏、收買，有些長老教會的神學院院長，累次收到中國國家宗教局、統戰部的邀請電話。有一位神學院院長親口對本人說，他上任第一天在辦公室收到的第一個電話就是中國國家宗教局打來的，祝賀他新任神學院院長。這次“兩岸基督教論壇”，儘管長老教會總會在論壇舉行前發布牧函，明言牧者信徒不得前往該論壇。但是，也有一些被統戰了牧者，參與此論壇。以上足見中共對臺基督教統戰的老謀深算和險惡用心。

5、中共在臺灣基督教界培植代理人

臺灣蒲公英希望基金會魏悌香是中共在臺灣培植的代理人之一，若幹次的兩岸宗教交流都是他組織的，他除了掌控蒲公英希望基金會外，掌控的媒體有：《蒲公英》雜誌一份，發行量巨大，免費贈送；蒲公英希望基金會全球資訊網（<http://www.dhf.org.tw>）；今日基督教報（<http://news.dhf.org.tw>）等媒體。這些媒體大量釋放有利於中共三自會的信息，成為迷惑臺灣人的窗口。值得疑問和調查的是，蒲公英基金會及其系列媒體的資金從何而來？

臺灣新北市基督教召會負責人歐陽家立，無疑是中共在臺灣基督教界的代理人。通過一些文件我們看到，中國國家宗教局 2013 年臺灣主要任務，一是舉辦兩岸基督教論壇，一是打壓“全能神”。歐陽家立既是兩岸基督教論壇最積極的組織者，也是打壓“全能神”最賣力者，他無疑是中共在臺宗教政策的忠實執行者。

近年來，歐陽家立頻繁去北京中共統戰部、宗教局報到，與中共宗教當局究竟談些什麼，雖然不為外人所知，但我們可從他近年來的一系列言行中，看出他們無非是在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歐陽家立一再否認自己所在教派召會在中國大陸被定為“邪教”受迫害的事實，他一會兒裝作不知，一會兒又說“召會”不是呼喊派。眾所周知，召會源於倪柝聲弟兄（Watchman Nee）在福州創立的中國原創教會，1949年倪柝聲為了教會免於全軍覆沒，派門徒李常受到臺灣宣教，李在臺灣和北美發展迅速，成為召會。

1983年，中央統戰部、公安部及宗教局向黨中央提出《關於處理所謂“呼喊派”問題的報告》，經中共中央批准執行。該報告認定“呼喊派”是流亡到國外的反動分子李常受製造，並滲透到國內，與基督教“小群”的一部分相結合發展起來的。2000年和2005年中國公安部先後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關於認定和取締邪教組織若干問題的通知》（公通字[2000]39號、公通字[2005]39號）。通知中的邪教共14種，其中“呼喊派”被列為首位。

2012年4月14日，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抓捕“呼喊派”邪教組織52人。之後，葉縣法院一審判決韓海等7人犯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並被判3年到7年6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在一審判決書（2012葉刑初字第203號）中，白紙黑字寫著：“經平頂山市國內安全保衛和反恐怖支隊認定，《晨興聖言》《倪柝聲文集》《恢復本聖經》屬於‘呼喊派’邪教組織宣傳書籍”。如果是有良知的臺灣召會長老，在中共政權還沒有解除對召會及其書籍的汙蔑和定罪時，就不宜與大陸官方教會接觸，就是有接觸，也應為召會辯護和申訴。但歐陽家立這樣做了嗎？他不僅不替受害的基督徒說話，反而與迫害召會的專制者們握手言歡。

歐陽家立汙蔑家庭教會是不合法、沒有註冊的教會。在國度網絡電視臺的專訪中，歐陽家立說：“讓大陸家庭裏聚會的弟兄姊妹理解大陸已進入法治化、依法治國的時代，要建立守法的觀念。在家裏聚會，13.6億人真的很難管理”。難道家庭教會的不合法狀態是家庭教會自己願意的嗎？究竟是誰將家庭教會處於非法化的狀態的呢？北京守望教會，是第一個主動去政府社團註冊部門註冊的家庭教會，但卻不僅吃了閉門羹，而且從此處於逼迫受害當中。不讓家庭教會合法化，是當局的政策，歐陽家立不僅不指斥當局，反而批判受害者，天理何在？

歐陽家立的教派在大陸被定為邪教，但他卻積極地執行中共在臺宗教政策，在臺灣全地累次召開會議、打壓被中國公安部定為邪教的新興宗教團體——全能神教。據多家媒體報道，2013年4月23日，國家宗教事務局蔣堅永副局長會見了所謂的“2013年臺灣基督教教牧參訪團”25人。會見交流中，蔣堅永副局長對臺灣基督

教界各宗派發表聯合聲明抵制邪教“全能神”的正義之舉表示贊賞。

可見，歐陽家立充當中共當局在臺宗教政策的執行者、成為中共在臺灣基督教界的代理人。對他是否有出賣國家利益、危害臺灣宗教自由的問題，臺灣有關部門應該進行調查，並切實要制止歐陽家立們下一步的可能行動。

6、對臺灣政府的建議

總之，隨著三自會對臺灣的統戰，臺灣的國家利益和宗教自由正受到威脅。如不制止，後果不堪設想。就我們的了解，三自會和歐陽家立等人，正密切商量下一步的行動——那就是第二次的“兩岸基督教論壇”的召開，以及中共三自會在臺灣成立教會和教堂計劃的實施。這一切都不是空穴來風，希望有關部門能引起高度重視。

最後，我作為中國家庭教會傳道人、作為一位宗教自由人權人士，特別向在座的各位臺灣政府官員及媒體，提出以下三點呼籲和建議：

1. 臺灣政府應該禁止中國國家宗教局官員、中國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高層教牧人員前來臺灣。因為這些組織對內是迫害中國宗教自由、打壓家庭教會的專制機器，對外是進行宗教特務滲透和統戰、威脅臺灣宗教自由的間諜組織；
2. 臺灣政府應該調查與中共三自會等宗教特務組織有密切往來的臺灣基督教界人士，是否有收受中共利益、危害臺灣宗教自由、出賣國家利益的行為；
3. 臺灣政府應該邀請受迫害的中國家庭教會信徒前來臺灣，揭露中共逼迫家庭教會、迫害宗教自由的真相，以共同防範中共對臺灣無孔不入的宗教統戰。

謝謝各位！

公元 2013 年 9 月 12 日

**Transcript of Chinese house church missionary's testimony
at Taiwanese public hearing released**

China Aid Association

On the morning of Sept. 12, at the invitation of Taiwanese Legislative Yuan legislator Ms. Chiu-chin Tien and Mr. Yang Hsien Hung, director of Taiwan's Association for China Human Rights, Chinese house church missionary Guo Baosheng testified at a hearing before Taiwanese senior officials from the Taiwan government's National Immigration Agency,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other departments about persecution of house churches in mainland China, the infiltration into Taiwa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and the truth about the United Front. Below is the complete transcript of his testimony:

Legislato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edia reporters, hello!

My name is Guo Baosheng and I was born in 1972. In 1990, I tested into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China People's University. I became a Christian in 2004. In 2008, I went into ex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could not end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secution and harassment. As a house church missionary from 2004 to 2008, I had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endless persecution of house churches.

I.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estimony

I was baptized in Beijing not long after I became a Christian in 2004, and later attended house church meetings at a house church in Beijing called Tiansi Church. Our church did not have a fixed worship site. Initially, the gatherings were held in the home

of the pastor. Then, th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reported us to the authorities and we were forced to hold our worship service in a rented home in a residential complex in Beijing. However, this meeting site was also reported, and our church went to meet in a small room in a restaurant where, after hymns and the sermon, we would all have lunch and then leave. This situation continued even after I left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God's grace, shortly after I put my faith in the Lord, I began to preach the Gospel in mainland house churches, and in four years, I travelled all over the country. I mainly preached on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heavenly vocation” and the Christian values of “lamb culture” as contrasted with the “wolf culture”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arena and the “dragon culture” of the political arena in China. In fact, the lamb cultur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Christian values in China'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renas.

One day in November 2007, as I was giving a lecture to more than 70 believers in a house church in Dongguan, more than 20 uniformed Dongguan police officers with video cameras suddenly burst in and surrounded the meeting site. After I had continued speaking for half an hour with the police officers standing around the venue, several brothers came up and told me to end the meeting quickly, so we prayed and finishe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were dismissed while I and several key members of the local church were forcibly dragged by the police to the local police station for interrogation. During the interrogation, they said that I was not a government-designated missionary and furthermore that I was engaged in cross-regional missionary work, which is illegal. I used logic to defend myself and, in the end, the several of us were released.

Thereafter, many of my evangelistic sermons and lectures in Shenzhen, Guangzhou, Suzhou, Tianjin and other places were pre-emptively banned. Beginning in 2007, police officers from the local police station (Jiangtai Police Station in Beijing's Chaoyang District) came to my home repeatedly to question me and to interview me, especially around the time of the Olympic Games, when they came to my home eight times. To get away from the Olympic Games, our whole family went to a church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time the Games were held. While we were in Singapore, we learned that a Christian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was infiltrated by a woman spy from the Guangdong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who appeared to be very devout. In the end, she was found out only because she sent a work report to the wrong email address. This special agent inflicted

great harm to China's house churches during her half-year infiltration.

Meanwhile, as my influence in the house churches grew ever larger, I also became a target of the Three-Self's United Front work [Editor's note: "United Front" is a loaded political term that goes back to the Communist Party's revolutionary beginnings when it used "persuasion" to achieve cooperation with non-Communist groups]. High-ranking Three-Self pastors often called me on the phone to invite me to give sermons in their churches. After we had a certain amount of contact, they began to ask me to do some United Front work, which I refused.

Fed up with the harassment, I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in a seminary, and after graduating, I am now a pastor in a Chinese church. The main purpose of my coming to Taiwan this time is to unite Taiwan church organizations to jointly boycott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o be held in Taiwa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the Three-Self. On August 30, we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in the press room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on "Fake Religion, Genuine United Front—A Criticism of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oday, in addition to continuing to discuss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my main purpose in holding this public hearing is to warn you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ll take advantage of the "Cross-Straits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o infiltrate Taiwan and to aggressively engage in United Front work and spy activities.

II.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and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he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signed on June 21, 2013 is a "treaty signed with the enemy at the gate" by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ll engage in economic United Front work and prepare for a large-scale invasion of Taiwan. No matter how much economic interests and actual benefits it will bring to Taiwan, it will not change in the least the true n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using this to infiltrate Taiwan. If the agreement is implemented, it will enable more spies to sneak into Taiwan under various guises to provide intelligence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engage in United Front work and buy off the people of Taiwan. This is a real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aiwan.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fficial churches, the Three-Self Church, will also use the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to establish in Taiwan many churches that

belong to the Three-Self, using religion to engage in their forte of deception and buying [people] off .

In fact, even before the 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 was signed, a large number of spies had already infiltrated Taiwan.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Right now, I participate in the ministry of an evangelistic organization in Taiwan that is dedicated to preaching the Gospel to China; I've been doing this since about 2004. In 2004, before and after the death of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is organization (a well-known Christian much h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is organization was harassed by Chinese Communists spies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pies tailed and stalked people from this organization on many occasions, taking photos and videos. Fed up with the harassment, the members of this organization collected evidence and had no choice but to report it to Taiwan's state security departments, which confirmed that [these people] were not from Taiwan and really were Chinese Communist spies. A state security official reportedly personally said to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organization: "Chinese Communist spies like this currently in Taiwan number nearly 3,000."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the enemy of Christianity, but they actually use Christianity to engage in United Front work and in infiltrating Taiwan. The purpose of using Christianity for their United Front work is: to cover up the truth of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on mainland China, to suppress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truly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to assis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gents in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and to engage in religious spy activities, [thus] threatening religious freedom in Taiwan and Taiwan's national securit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hould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Christian United Fro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r example, this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hat was held from August 27 to 29 was regarded b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s similar to a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or a dialogue within religious circl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this was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 entirely political task. You should have noticed that the news about this forum first appeared on China's CCTV and the websites for Xinhua, the Department of United Front Work,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Early this year,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Important Work in 2013" said as clear as black-and-white that: "The

key point in our work for Taiwan is guiding the two organizations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of China and the people in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in jointly holding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of 2013 in Taiwa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even see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as the object of their guidance; their United Front intention is obvious.

Furthermore, in April of this year, Jiang Jianyong,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said when he met the “Taiwan Pastors Delegation” that he hoped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would make an even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ctually already regards Christianity in Taiwan as helping the realization of a United Front. Clearly what was called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 Forum was indeed a political task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ertainly was not a religiou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II. The nature of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as a spy organizatio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hould know that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that cam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Forum is a religious spy organization directly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is not a church. Similar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re the government-sanctioned Buddhist Association, Islamic Association, etc. The Three-Self Committee is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resolution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Three-Self Conference” in 1961 points out that the Three-Self's mission is to: 1. raise high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patriotic banner; 2. accep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3.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roduction; 4. strengthen exposure of all illegal house church activities. To date, there have been no change to these four tasks.

Not a few high-ranking pastors in the Three-Self ar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among them are even some who serve as important cadr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verseas spy organizations. For example, Li Chuwen, who served as deputy director of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from 1983 to 1988, served as senior pastor of the 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 without break since he took up the post in 1950. His status as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came to light when he was

beaten by Red Guards in 1966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Zhao Fusan, vice president of the Beijing Three-Self, took up the post of party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the late 1980s. The official Chinese government biography of Fu Xianwei, the Three-Self Committee president who came to Taiwan this time, makes no mention of his experiences of becoming a believer or of baptism or pastoral service in any church. He is obviously a high-ranking political cadre who was dropped into the Christian circles from on high to head up leadership work.

The Three-Self Committee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has always work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 suppressing house churches, and it has become a henchman in persecuting religious freedom. For example, when believers from Beijing Shouwang Church who take part in outdoor worship are detained and taken to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one of the interrogators is a police officer and the other is a Three-Self pastor. The overseas task of the Three-Self Committee is to cover up the truth about persecution of religious freedom and to create the false appearance that there is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At present, the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 house churche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s growing, not diminishing. Recent examples are Beijing Shouwang Church, the Christian Assembly Hall in Ye County, Henan [province], Enyu Bookstore in Taiyuan, Shanxi [province] and others. The Three-Self however never mentions a word about these religious cases and only talks about how the Gospel is now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etc., etc.

Another overseas task of the Three-Self is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house churches, to blacken their name and to conceal them. As early as September 2010, on his first visit to Taiwan, Wang Zuoran, direct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house churches and gave irrelevant answers when he was asked about them during talks with Christian pastors. In November 2011, during an interview on the Phoenix TV program “Mainland Q&A”, he said: “I myself don’t recognize any such house churches. This issue does not exist.”

In November 2011, Fu Xianwei,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ree-Self Committee, spoke with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at the “Cross-Straits Pastoral and Theological Symposium” organized by the Taiwan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ristian Tribune, Fu Xianwei said in response to questions raised by some Taiwanese pastors about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house churches does not exist. There are onl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e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held at the end of August 2013, Fu Xianwei delivered an address in which he conveyed greetings to Taiwan's Christians on behalf of 23 million Christians in mainland China. As everyone knows, the number 23 million is only the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the Three-Self churches, while the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house churches is several times that of the Three-Self churches. When Fu Xianwei said he represented 23 million believers, he had obviously cast the more than 60 million house church Christians outside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otally ignoring these Christians and acting as if they don't exist. In the video clips on the Christian Daily website of Taiwan media interviewing Fu Xianwei, when he is asked the current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mainland China, he actually said: “There are many Christians in mainland China. There are 23 million.”

IV. The Three-Self's United Front work on Taiwan

The Three-Self's United Front work on Taiwan began in 2010. On September 17, 2010, Wang Zuonan, director of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his delegation came to Taiwan for talks with more than 100 pastors and elders from the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 and other Taiwanese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Ever since then, the mutual visits between the churches in Taiwan and China have continued without break, right up to the general elections and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There were several larger-scale ones:

On November 14, 2010, Shan Weixiang, associate general-secretary of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editor-in-chief of Heavenly Wind and his three-person delegation conducted a four-day visit of churches in Taiwan and met Wei Ti-hsiang, Chou Shen-chu and other pastors.

On March 14, 2011, the Xiamen Municipal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e Three-Self received a delegation of 22 people from the Kaohsiung Church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The churche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held a joint communion worship at Bamboo House.

From March 21 to 25, 2011, a delegation of Taiwanese pastors led by Wei Ti-hsiang and Hsia Chung-chien traveled to Beijing, Nanjing, Shanghai and other places and visited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and Nanji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From November 21 to 26, 2011, Three-Self president Fu Xianwei met in Taipei with Wang Hsüeh-hung and then visited many churches in Taipei and Taichung. The Christian circles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engaged in United Front work on Wang Hsüeh-hung (see the Three-Self publication Heavenly Wind Vol.1, 2012, p. 34). As a result, on the eve of Taiwan's general elections, she was reciting the cross-straits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hich had a huge political impact.

On August 27, 2013,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formally opened in Taipei. The forum was attended by more than 200 people from China and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The United Front [Work] of Christianity in Taiwan includes the splitting of Taiwan's Presbyterian churches. From what I know, quite a few pastors of Presbyterian churches have been invited to visit mainland China since 2010. The Taiwanese natives who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have been roped in and bought off through various means by ag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ome heads of Presbyterian seminaries have received numerous phone calls of invitation from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ne seminary head personally told me that the first phone call he received on the first day in office was from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The caller congratulated him on his new job as the head of the seminary. As for this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even though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published a pastoral letter before the forum clearly stating that pastors and believers must not attend the forum, some pastors were still bought off by the United Front work and attended this forum anyway. The above clearly show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les and ulterior motives in their United Front work on Taiwanese Christians.

V.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training agents within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Wei Ti-hsiang of the Taiwan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 is one of the agent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training in Taiwan. He has organized several religious cross-straits exchanges. In addition to controlling the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 he also controls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Dandelion, a free magazine with a huge circulation;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s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website (<http://www.dhf.org.tw>); and Christian Daily (<http://news.dhf.org.tw>). These media outlets release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beneficial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hree-Self Church and have become a window to confuse the Taiwanese people. It's worth inquiring about and investigating the source of the funds for the Dandelion Hope Foundation and its media outlets.

Ouyang Chiali, head of Taiwan's Christian Church of New Taipei City (台湾新北市基督教召会 [Editor's note: Guo, in his references below to Ouyang's church and denomination, uses a specific Chinese name 召会 that applies to churches established by Witness Lee; the term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other churches that also trace their roots to Watchman Nee's "Little Flock" and which are variously known as The Local Church or Assembly Hall Church.]), is without doubt an ag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ithin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We know from some documents that the main task of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in Taiwan for 2013 was to hold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and to suppress the "Almighty God." [Editor's note: this is a reference to the cult Eastern Lightning and its "Female Christ," also known as "the Almighty God."] Ouyang Chiali is both the most active organizer of the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and has worked the hardest in suppressing the "Almighty God." He is without doubt a loyal implementer in Taiwa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ligious policy.

In recent years, Ouyang Chiali has reported frequently to Beijing'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Though we outsiders are not in the know, but we can see from his words and deeds in recent years that they are colluding with each other and working hand-in-glove to nefarious ends. Ouyang Chiali has denied time and again the fact that The Church he belongs to is considered a "cult" in mainland China and is persecuted. Sometimes, he pretends to be

ignorant of the fact and sometimes he says The Church is not the Shouters. As everyone knows, The Church grew out of the indigenous Chinese church that Brother Watchman Nee founded in Fuzhou, China. In 1949, in order to avoid the church being totally annihilated, Watchman Nee sent his disciple Witness Lee to preach the Gospel in Taiwan. Witness Lee's [believers] grew rapidly in Taiwan and North America and became The Church.

In 1983,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Bureau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submitted their "Report on Handling the Problem of the so-called 'Shouters'" to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 was put into effect upon approval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e report determined that the Shouters were created by the reactionary Witness Lee, who fled overseas, and that they are infiltrating China where they have linked up some [members] of the "Little Flock" and are growing in numbers. In 2000 and 2005, China'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issued the "Notice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Various Issues Regarding Identifying and Banning Cult Organizations." (Gong Tong Zi [2000] No. 39, Gong Tong Zi [2005] No. 39). The notice lists 14 cults and the Shouters is at the top of the list.

On April 14, 2012, authorities in Ye County in the city of Pingdingshan, Henan Province, arrested 52 people from the Shouters cult. After that, the Ye County Court in the trial of first instance convicted Han Hai and six other people for using a cult organization to undermine law enforcement. They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terms ranging from three years to seven years, six months. The verdict in the trial of the first instance (2012 Ye Xing Chu Zi No. 203) says in black-and-white, "The Pingdingshan Municipal Domestic Security Protection Squad and Anti-Terrorism Branch have determined that Morning Revival, The Selected Works of Watchman Nee and The Recovery Version of the Bible are propaganda books for the 'Shouters' cult."

If the elders of The Church of Taiwan were possessed of a conscience, they would consider it inappropriate to be in contact with mainland China's government-sanctioned churches at a time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yet to stop vilifying The Church and its books and to lift the conviction [of its members], and if there is contact, it should be to defend The Church and appeal on its behalf. Yet, has Ouyang Chiali done this? He not only fails to speak out on behalf of the persecuted Christians, but he also shakes

hands in joy with the dictators who persecute The Church.

Ouyang Chiali vilifies the house churches in China as illegal and unregistered churches. In an exclusive interview in Guodu Web TV, Ouyang Chiali said: “Let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mainland China who meet in their homes understand that mainland China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era of rule of law and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so they] should establish a law-abiding mindset. It would be very difficult to manage 1.36 billion people meeting in homes.” Was the illegal status of the house churches something the house churches themselves wanted? Who exactly is it who has made the house churches illegal?

Beijing Shouwang Church was the first house church to take the initiative in going to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for registering community groups to register, but what they got was the cold shoulder, and from then on, they've been under persecution. The policy of the authorities is not to let house churches become legal. Not only does Ouyang Chiali fail to criticize the authorities, but instead he denounces the victims. Where is the justice in this?

The denomination that Ouyang Chiali belongs to is regarded as a cult in mainland China, but he enthusiastically implements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n Taiwan, convening conferences again and again all across Taiwan to suppress the newly emerging religious group—The Almighty God—that China's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has designated a cult. According to many media reports, on April 23, 2013, Jiang Jianyo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met 25 people from what was called the “2013 Delegation of Taiwanese Christian Pastors.” In their meeting and exchanges, deputy director Jiang Jianyong praised the joint declaration made by various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in Taiwan to reject the “Almighty God” cult.

It's clear from this that Ouyang Chiali serves as the implement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ligious policy on Taiwan and has become the manager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f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As for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he betraye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jeopardized religious freedom in Taiwan,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Taiwan should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people like Ouyang Chiali from their next likely move.

VI. Suggestions for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n a word, in the wake of the Three-Self's United Front work in Taiwan, Taiwan'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are under threat. If unchecked, the consequences are unimaginable. According to what we know, the Three-Self, Ouyang Chiali and others are closely discussing their next move—and that is the convening of the second “Cross-Straits Christianity Forum”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ree-Self to establish churches in Taiwan. None of this is groundless and I hope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can pay close attention.

Finally, as a missionary of China's house churches and a person fighting for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I especially make the following appeal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edia here:

1.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hould deny officials from China's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Religious Affairs and high-ranking pastors from China's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Committee entry to Taiwan. This is because in China these organizations persecute [people for exercising] religious freedom and serve as the machine of the dictatorship in suppressing house churches. Overseas, they are spy organizations that engage in religious infiltration and United Front work and threaten religious freedom in Taiwan.

2.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igate those people in Taiwan's Christian circles who have close contacts with Chinese Communists' Three-Self Committee and other religious spy organizations to see whether they receive fund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whether their actions endanger religious freedom in Taiwan and betray national interests.

3. The Taiwanese should invite persecuted believers from China's house churches to visit Taiwan and expose the truth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re persecuting house churches and suppressing religious freedom so as to jointly guard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ervasive religious United Front work in Taiwan.

Thank you, everyone!

September 12, 2013

七、家庭教會信徒不是基督徒嗎？

否認中國家庭教會的存在事實、在國際舞臺上隱蔽化家庭教會、汙名化家庭教會，是中共宗教當局及其三自會的既定政策。這個政策另一面就是將三自會作為唯一的信眾群體，在國內，三自會是唯一合法的；在國外，它是中國基督教的唯一代表。在這次臺灣所謂的“兩岸基督教論壇”上，這個既定政策更是得到了徹底的貫徹。

在兩岸基督教論壇開幕式上，傅先偉致辭時說他代表大陸 2300 萬基督徒向臺灣基督徒問好。眾所周知，2300 萬這個數字僅僅是三自會信徒的數量，而家庭教會的人數是三自會的數倍，如在北京，三自會教堂只有 10 個左右，但家庭教會卻有近萬家，案最保守的估計，家庭教會人數也是三自會的 3 倍多。所以當傅先偉說他代表 2300 萬信徒是，顯然把 6 千多萬的家庭教會信徒，拋棄在“兩岸基督教論壇”之外，完全被忽視，被當做不存在。在《今日基督新報》網站的視頻中，當臺灣媒體採訪傅先偉、問目前大陸基督徒數量時，他竟然說：大陸基督徒不少，有 2300 多萬。

總上所述，在傅先偉等眼裏，三自會的信徒才是基督徒，而家庭教會的信徒根本不算做是基督徒，家庭教會信徒不是基督徒！如此的論斷，實在是褻瀆上帝，因為一個人是否是基督徒，唯有上帝清楚，而傅先偉等人冒充上帝，論斷某些群體是、某些不是，完全自比為神、狂妄至極。

中國宗教當局和三自會的這些言論，反應了他們對基督教家庭教會一直以來企圖“隱蔽化”的政策。家庭教會作為事實的存在，是當局無法鏟除的，它越想鏟除，福音就越復興。在當局無法徹底根除家庭教會的情況下，它就只能採取隱藏的策略對付家庭教會。在國內媒體報道中，絕對不能出現家庭教會的字樣，例如在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災中，家庭教會信徒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但都沒有被官方媒體報道，媒體報道的，僅僅是官方的愛德基金會等等。

而在國際舞臺上，絕不讓家庭教會浮出水面。2010 年 10 月在南非開普敦舉行第三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有來自 198 個國家的信徒參加。當時國內家庭教會的牧

者們，無論是年長還是年輕的，都認為應該去參加這次論壇，因為幾十年了，家庭教會都沒有整體參與國際性的基督徒聚會。而洛桑會議也為中國家庭教會準備了 200 個座位。但是這些座位最後成了空座位，因為大部分與會代表，有的被軟禁不讓出門，有的被扣留在機場、毆打、遣返回家，有的被海關扣留。極力阻止家庭教會參與洛桑會議，從中也可見當局對家庭教會在國際舞臺上亮相的害怕和恐懼。

總之，停止倒行逆施、掩耳盜鈴，承認家庭教會的事實存在、肯定家庭教會信徒是信仰純正的基督徒、並允許家庭教會公開地、合法地在海內外亮相，已經是大勢所趨。最後正告中共當局，不再欺騙天下、自欺欺人，而要順應歷史的潮流和神的公義，恢復中國家庭教會基督徒被剝奪的信仰自由權利，還中國人以信仰自由，才真正是正確的歷史抉擇。

八、玷汙信仰的兩岸基督教論壇

據新華網、人民網、鳳凰網等中共海內外喉舌大規模報道，所謂“兩岸基督教論壇”於8月27日在臺灣臺北正式開幕。會議有中國、臺灣兩方面共200多位所謂基督教界人士參與。中國方面，中國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傅先偉率領90多位宗教官員、三自會教牧人員參會；臺灣方面，有周神助、周聯華、魏悌香等親中共教牧人員160多位參與。這次論壇表面風光、熱鬧一時，實質上卻是中共當局對臺實施基督教統戰的重頭戲。它不僅名不副實，而且完全是實現中共“宗教統一達到政治統一”的戰略工具，更加具有危害性的是，它無視幾千萬中國家庭教會信徒的存在事實，官辦三自會擅自代表中國教會，實在有汙信仰之純潔、必然遭到人神之共憤。

「兩岸基督教論壇」，顧名思義，應該是兩岸——臺灣和中國最有代表性的教會和信徒參與的大會，只有兩岸有代表性的教會、信徒等參與的論壇，才配稱為兩岸論壇。但該論壇有這種代表性嗎？中國方面，參加論壇的大都是中共統戰部、宗教局官員，還有部分三自會教牧人員而已，而真正能代表中國基督教會，在人數、影響諸方面遠遠超過三自會的中國家庭教會代表，沒有出現在該“論壇”上的。不讓家庭教會“合法化”“公開化”，尤其不能讓家庭教會在國際舞臺上浮出水面是中共的既定政策。他們是不會邀請家庭教會信徒參與的。

而實際上，家庭教會僅就人數而言，至少是三自會人數的二三倍。2010年8月，中國官方發布《宗教藍皮書》指出，中國現有基督徒總體估計為2305萬人，但這個數字被認為僅僅是三自會成員。前《時代》周刊駐北京記者部主任戴維·艾克曼早在2003年就聲稱在中國，基督徒與天主教徒合計有8千萬之多。而美國《今日基督教》的估計更是高達1.3億。另據家庭教會研究的學者於建嶸在2008年指出“三自教會人數在1800萬至3000萬之間，家庭教會人數在4500萬至6000萬之間”。可見，無家庭教會代表的所謂“兩岸論壇”是毫無代表性的。

所謂“兩岸基督教論壇”中方代表，中國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實際上不是教會，是對內馴化和禁錮信徒、對外滲透和統戰的中共統一戰線組織，也是中共特務情報、

政治軍事的外圍組織。三自會是在中共授意、扶植和暴力維護下起家的。1949 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政權後，對基督教採取控制、利用並最終消滅的政策，1950 年，周恩來三次召見吳耀宗等積極親共的牧者，發表《三自革新運動宣言》，提出基督教會應該反帝、愛國和實行三自（自治、自養、自傳）。1954 年，中共將全中國基督教各宗派通過威脅利誘、暴力鎮壓的手段合併為全國一統的“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於是三自會開始了全面控制教會的漫長歷史。

三自會的本質就是協助中共控制基督教的“愛國宗教團體”，是政府統戰部門的“延伸”，是隱蔽的官方組織機構。1982 年中共中央 19 號文件中說明了愛國宗教團體的基本任務：“協助黨和政府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幫助廣大信教群體和宗教界人士不斷提高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覺悟。”對內，使信徒順服凱撒，曲解聖經；對外，利用基督教的普世性進行拉關係、意識形態滲透的統戰工作。

約翰福音 10:10 中說的：“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2010 年底以來，三自會開始對臺灣進行了統戰。在臺灣大選期間，被三自收買的基督徒名人王雪紅公開為中共的兩岸政策背書。大選後，若幹名臺灣教牧人員多次被請到中國談笑言歡、蠅營狗苟。而此次蓄謀已久的「兩岸基督教論壇」，是中共分化瓦解臺灣基督教界、拉攏收買親共動搖分子、打擊孤立堅持原則的教會的最狠毒的一招。此一褻瀆神的公義的所謂論壇，必將釘在臺灣歷史的恥辱柱上。

臺灣方面配合統戰、運作所謂“兩岸基督教論壇”的，主要是由蒲公英希望基金會組織的一些教牧人員，雖然他們也是臺灣教界成員，但只能說是教界的一小部分，無廣泛代表性。而有 1000 多個堂會，數十萬會眾的基督教長老教會是臺灣歷史最悠久、成員最多的教會，但是，長老教會居然被該論壇排斥在外，而那些長期堅持不與中共三自會來往的其他傳統教會，也被排斥。這個將大多數臺灣信徒、教會排斥在外的所謂“兩岸論壇”，到底有無代表性，不是一目了然嗎？

正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針對此次兩岸基督教論壇的牧函所指出的：“正義公道為根基的上帝國，才是臺灣與中國的基督徒應當共同追尋的。「你的國是以正義公道為根基；你所做一切都是信實慈愛」（詩篇 89:14）”。兩岸基督徒的交流要建立在純正信仰的根基上，而非政治陰謀上；不是三自會，而是敬拜唯一真神的中國家庭教會，才應該是臺灣教會交往的主內肢體！中國家庭教會應該發出聲音，譴責這次玷汙信仰的所謂兩岸論壇，也應該與長老教會一起，共同抵制三自會對臺灣信徒的統戰和欺騙。

九、《服貿協議》與臺灣信仰自由的危機

2014年3月18日起臺灣學生們占領中華民國立法院的抗議運動，引起舉世關注。事件肇始於當日立法院國民黨立委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問題上未依照先前朝野協商的逐條審查的共識、企圖強行通過《服貿協議》的行為。這次被命名為太陽花學生運動的核心訴求也是“退回服貿，重啟談判”和“兩岸協議 立法監督”。在學運期間，行政院長江宜樺和總統馬英九都回應了學生訴求，但學生和民眾並不認為訴求被政府接納，朝野雙方僵持不下的焦點也在《服貿協議》的簽訂合法性和是否退回上。

為何《服貿協議》成為臺灣學運和朝野僵持的焦點？為何臺灣大多數學生和民眾對《服貿協議》極力排斥呢？而《服貿協議》又與臺灣基督教的信仰自由前景有何關係呢？

《服貿協議》（全稱〈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馬英九政府不通知立法院和民眾，行政部門單方與中國大陸簽署的眾多協議之一。也是2010年馬英九政府與中國大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即ECFA）》後ECFA框架下的延續協議。是臺灣和大陸相互大幅度開放市場，讓對方投資的協議。

臺灣民眾之所以反對《服貿協議》，一是因為它的簽訂違反程序正義，在沒有國會監督審查和諮詢各行業情況下，就草率簽訂並想強行實施；二是《服貿協議》在經濟利益上對臺灣中小企業尤其是服務業傷害很大，大陸的巨型國企登陸臺灣，將會掏空臺灣經濟利益；三是中共會借著投資臺灣服務貿易，派遣大量間諜和統戰人員滲透臺灣，為統一臺灣做準備。此即為“假服貿、真滲透”“假服貿、真統戰”。

正如2月19日美國世界論壇網文章《北京“買下”臺灣的戰略：不發一槍裹挾統一》中指出：“在經濟上，大陸試圖通過服貿協定推動兩岸融合。從北京的觀點看，這個協定意在發揮一種至關重要的政治和統戰作用。從香港的經歷看，協定將為大陸情報人員在臺灣生活和工作提供合法掩護，便利他們積聚資源，影響和左

右臺灣的政治進程和政策，朝不放一槍的和平統一前進”。

所以《服貿協議》表面上似乎是經濟問題，但實際上卻是政治問題、是民主體制如何抵制專制侵入的問題。這種情況也非常類似前不久烏克蘭民眾占領獨立廣場的運動，其導火索也是一個貿易協定。跟臺灣有區別的是，是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在 2013 年 11 月 21 日宣布暫停準備簽署同歐盟的同盟協定，這使烏克蘭民眾擔心亞努科維奇將擺脫歐盟、單單與俄羅斯握手言歡、引狼入室，於是幾乎在同時他們就發動了占領獨立廣場運動。

顯然，《服貿協議》的“假服貿、真滲透”、“假服貿、真統戰”性質會危及到臺灣的信仰自由。假設《服貿協議》簽訂，中共會以服務業投資的名義，派出大量官方控制的宗教組織，在臺灣開設機構或公司，甚至建立教堂、教會和其他宗教團體。他們就會在臺灣宗教界拉攏收買各種人物為中共在臺政策背書、積極地擁共親共，而對堅持真理和公義的宗教團體，他們就會行汙蔑、打擊之能事。這些都會嚴重地影響臺灣的宗教自由。

正如香港在 1997 年回歸後，三自會大肆統戰香港基督教界，培植了眾多代理人，使香港的宗教自由大受侵害。如著名的滕近輝牧師成為了“雙軌路線”的鼓吹手，即一手要抓“家庭教會”，另一手也不放開“三自”，兩手一起抓。在“雙軌路線”影響下，1990 年代前後香港主流教會倒向三自，他們與三自而非家庭教會交流合作頻繁，根本不為中國大陸的信仰自由和家庭教會權利呼籲。在去年港人發起“占領中環”運動後，眾多教堂牧師反對“占中”，甚至恐嚇信徒如果參加“占中”，就不必來教會聚會。香港基督教界大面積的“淪陷”，對臺灣基督教界無疑是前車之鑒。

《服貿協議》會直接促成臺灣的香港化，因此這次就有香港人到臺灣支持太陽花學運，並呼籲“香港已經什麼也沒有了，臺灣不能成為下一個香港”。其實《服貿協議》還沒有簽署，中共就已經通過其代理人威脅到臺灣的宗教自由。例如中共通過其代理人，在臺灣街頭張貼“藏傳佛教不是佛教”、汙蔑和威脅藏傳佛教在臺灣的發展；臺灣交通旅遊局一度還明令整頓在旅遊區張貼的法輪功宣傳標語，後在民眾和立法委員的抗議下才收回命令。

而對臺灣基督教的滲透和統戰一直是中共宗教統戰的重中之重。例如去年 8 月底舉辦的所謂“兩岸基督教論壇”，排斥中國家庭教會成員和臺灣長老教會成員的參與，拉攏收買臺灣基督教界重要人士、孤立打擊臺灣長老教會、通過宗教之統一達到政治統一。去年開完所謂“兩岸基督教論壇”後，中共即策劃在大陸召開“第二屆兩岸基督教論壇”，並策劃三自會在臺灣成立教會事宜。如果《服貿協議》實

施，肯定會加速中共三自會在臺灣建堂、成立教會的進程。

實際上，在《服貿協議》還沒有簽署實施的很久之前，就有大批宗教特務滲透到臺灣。根據去年9月中國家庭教會傳道人郭寶勝在臺灣立法院公聽會上的發言指出：他兼職服事的一家臺灣向中國宣教機構，在2004年左右就遭遇中國宗教特務。2004年這個機構的一個負責人（引中共嫉恨的著名基督教人士）去世前後，這個在臺灣的機構受到中共特務的騷擾，中共特務多次向位於臺北市的該機構人士實施盯梢、跟蹤、照相和錄像。由於不堪忍受騷擾，該機構成員取證後向臺灣安全部門匯報，安全部門確認不是臺灣方面的，而確實是中共特務人員。據說安全官員當時親口對該機構負責人說“象這樣的中共特務，目前在臺灣已經有近3000名了”。2004年就有3千多名中共特務，那麼現在有多少？將來如果簽了《服貿協議》不知還要增加多少？到那時真是“白天貿易、晚上發展黨組織”，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總之，這次太陽花學運的導火索——馬政府與中共在2013年6月21日簽署的《兩岸服貿協議》，的確是中共進行經濟、文化和宗教統戰、準備大舉侵入臺灣的城下之盟。無論給臺灣多少的經濟利益和實惠，絲毫改變不了中共借此全面滲透臺灣、專制者來威脅民主自由的本質。如果協議實施，就會使更多的特務假借各種身份潛入臺灣，為中共提供情報，並統戰和收買臺灣民眾，切實威脅到臺灣的國家安全和宗教自由等普世價值。而中共的官方教會三自會，也會借服務貿易協議在臺灣成立眾多屬於三自的教會，通過宗教進行收買和欺騙之能事。對此，善良的人們，不得不高度警惕，並應發出自己的聲音。

十、評中共官方教會在 WCC 大會上的表演

從今年 10 月 28 日到 11 月 8 日，被譽為“教會界的聯合國”的世界上最大普世教會組織——普世教協(WCC)第 10 屆大會在韓國釜山召開。這次大會的主題是：“生命的上帝，帶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WCC 目前在 110 個以上的國家及地區有 345 位會員，包括正教會、聖公會、浸信會、路德會、衛理公會、改革宗教會，以及許多聯合教會跟獨立教會，包括超過 5 億的基督徒。眾多國家和地區的教會以加入 WCC 為榮。然而，擁有 6000 萬信徒的中國家庭教會成員，自始至終無緣參與這次大會，更無法加入 WCC。

相反，WCC 是中共官方教會唯一參加的普世教會機構。中共官方教會的對外機構中國基督教協會(CCC)一直自封為中國基督教唯一國際代表、唯一 WCC 中國成員，竭力阻止真正的中國教會——中國家庭教會進入國際舞臺。CCC 也利用 WCC 等國際舞臺，竭力營造中國宗教自由的假象、打壓國際上為家庭教會仗義執言的公義教會，左右甚至企圖操縱普世教會機構聽任中共及其宗教當局的擺布。

今次大會，CCC 代表團 11 人，包括：CCC 會長高峰牧師、副會長、總幹事(代)關保平牧師、CCC 副會長高英牧師等 8 人，以及顧問、觀察員各 1 位。這次大會上 CCC 的地位有顯著上升，不僅維持 WCC 中央委員會 2 名席次外，這 2 名中的關保平(中國第 11 屆全國政協委員)更第一次成為 WCC 執行委員。顯然，這是中共宗教當局仗著經濟的強勢和專制的高效率，進行的國際統戰和擴張的又一次得手。正如最近以踐踏人權臭名昭著的中共當局再次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理事一樣，CCC 地位在 WCC 中的上升，是邪惡勢力在全世界滲透的一部分，這不僅應該引起中國家庭教會，也應該引起所有普世教會齊來警覺和反省。

據《臺灣教會公報》3221 期〈官方強硬——中國內外皆不手軟〉新聞報導中寫到：“11 月 4 日 CCC 舉行 Madang 工作坊座談，有代表詢問 CCC 如何面對非官方的教會？關保平回答，中國沒有所謂‘地下’或‘家庭’教會，只有合法的基督教‘兩會’，信徒在家中聚會本來就很正常，但不是教會。座談後，關保平和與會者談話表示，有些外國教會沒有向‘兩會’報備，私自到中國設立教會，CCC 深表不

滿。他說，最近的‘東方閃電’問題，‘這是與法輪功一樣的邪教性質組織，應當消滅’。他說，CCC 與臺灣的教會是地區內‘教會與教會’關係，絕對不是臺灣長老會宣稱的‘國與國關係’”。

從以上關保平在 WCC 中的言論可以看出：否定家庭教會的事實存在、掩蓋宗教不自由的真相、粉飾宗教自由、打擊教會界異己，並以基督教的普世性進行國際統戰和擴張，這才是 CCC 在普世教會機構中活躍的根本目的。

不僅如此，根據中共基督教‘兩會’網站報導：“2013 年 11 月 7 日出版的 WCC 大會會刊上刊登了中國基督教協會代表團的文章‘WCC：與中國基督教協會加強更加緊密的合作’（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ork more closely with the China Christian Council）：“文章介紹了中國教會的發展，中國基督教協會對 WCC 的參與，並駁斥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汙蔑和‘臺獨’鼓噪。中國基督教協會注意到，在本次大會上，有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代表公開無端指責中國基督教協會‘阻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普世參與的正當性’，是‘中國政府打壓和迫害人權的幫兇’等等。但是，中國大陸教會近 30 餘年來發展的事實證明，臺灣長老會的這一說法是毫無根據的不實之詞和汙蔑。我們對在強調公義與和平的大會上，出現這種擾亂視聽、挑起紛爭的做法深感遺憾”。

從該報導中可看出，CCC 已經把 WCC 作為宣揚共產黨政策的場合，也把臺灣長老教會等教會對中國真相的揭露、對中國家庭教會的仗義執言、對原則的堅守視為非剿滅不可的靶子。CCC 在普世基督教機構大會上的囂張表現，令人聯想起當年蘇聯派眾多親蘇共東正教人士在 WCC 中收集情報、打壓異類的往事；也讓人聯想到由於中共及其盟友的搗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及其他聯合國機構，早已喪失了起初建立的目的，不能揚善懲惡，從而使不少機構喪失了功能、處於癱瘓狀態。

面對如此險惡的局面，我們除了要呼籲普世教會齊來警醒中共的宗教擴張和統戰，免得為其所用、為其所害，也要呼籲中國家庭教會的信徒、牧者要有國際眼光，關注家庭教會在國際普世基督教機構中的角色，謀求中國家庭教會在海內外的合法化、公開化。

總之，面對 CCC 在這次 WCC 大會上的醜陋表演，中國家庭教會要勇敢起來，揭露 CCC 及中共宗教當局踐踏宗教自由的真相、實現宗教統戰的險惡用心。中國家庭教會也應該挺身而出，力爭在普世教會機構或國際場合亮相、發聲、成為角色、伸張公義、改變局面。也願不少堅守信仰的普世教會與中國家庭教會在面對中共宗教當局氣勢洶洶的國際擴張和統戰中，互為肢體、共擔患難，在耶穌基督裡打那美好的勝仗。

十一、認識一個全面的吳耀宗

——評《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書

由香港著名基督教學者邢福增 (Fuk-tsang Ying) 主編、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於 2011 年出版的《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吳耀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以下簡稱本書）一書是研究吳耀宗、中國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現代中國政教關係不可多得的好書。該書主體其實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及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於 2010 年 6 月 22 日到 23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合辦的“吳耀宗與中國基督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名家薈萃、研究精深。除了邢福增和吳耀宗之子吳宗素外，還有各方學者如王艾明、羅偉虹、吳梓明、宋軍、段琦、張化、許開明、郭偉聯、陳廣培、劉建平、嚴錫禹等的十多篇很有份量的研究論文。

正如邢福增的編者序中指出的，本書“反映出吳氏身處 20 世紀的大時代中，在不同層面的反省與實踐。全書分四部分：新思想與非基運動、神學思想、學生運動與救亡運動、三自運動，不僅凸顯了吳氏本人的思想與實踐，也襯托出 20 世紀中國基督教的重要歷史場景”（見本書編者序）。的確，該書對把握、評價一個全面的吳耀宗具有巨大的參考價值，也對當今眾多關懷中國命運的基督徒，有很大的啟示和警醒。

正如邢福增所言：“翻開近百年的中國基督教歷史，吳耀宗（1893-1979）絕對是個最具爭議的人物”（見本書編者序）。他的爭議性在於基督教神學與政治兩方面，神學上他“自始便烙上鮮明的自由主義及現代主義神學印記”，與主流“基要派”壁壘分明；政治上他與共產主義者攜手，建立國家教會（State Church），“質言之，吳耀宗被視為‘政治投機者’、徹頭徹尾的‘叛教者’”（見本書編者序）。也如吳宗素先生所言：“在國內，他是基督教會的先知，是三自愛國的旗手；在國外，他是不信派，是出賣教會的猶大，雙手沾滿了基督徒的鮮血。”（見本書 509 頁）

顯然，不同的立場造成了對吳的不同評價。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吳耀宗的評價也是要站在今天中國家庭教會的立場上進行評價。從此立場出發，吳耀宗無疑是與中共相互勾結迫害中國家庭教會、踐踏中國基督教信仰自由的基督教內的罪魁禍首。這個歷史定論是我們把握吳耀宗時的一個基本原則和準繩。但是，以這個歷史定論為基礎，更加豐富、全面地認識吳耀宗，揭示他對當今時代中國基督徒的意義，也是很有必要的。《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書，就給我們提供了更加豐富、全面認識吳耀宗的素材和角度。

跟一些人認為吳耀宗是中共內部轄制基督教的高級黨員的看法不同的是，本書告訴我們吳耀宗早年信主的確是真誠的、他與眾多進入基督教內部的共產黨黨員是不同的，他不是共產黨的黨棍和宗教特務，他與共產黨的合作，就他個人而言也是真誠的、積極主動的。對中國基督教迫害的首惡，當然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政權高層，而吳耀宗等宗教人士只不過是基督教內部被中共利用者、相互勾結者。就是在三自會裏面，吳耀宗也與那些專門來壓制、破壞基督教並掌握三自會實權的共產黨員三自高官也是有區別的，吳畢竟還是基督教界人士，但後者卻是偽裝成基督徒的黨棍和中共高幹。

這些吳耀宗的定性，表現在他起初抵制非基督教運動上，也表現在他對唯物主義有所保留的態度上，表現在他主動熱情單純地與中共合作上，更表現在三自會成立後他對三自會信徒信仰自由的一定程度的維護上，他也因此而在晚年飽受宗教官員和黨棍們的批鬥。

本書很多論文指出，1918年吳耀宗在一個美國朋友家讀聖經中耶穌的登山寶訓時相信耶穌的，信主後不久就辭了海關工資豐厚的工作，到清苦的北京青年會工作。從這些經歷可以看到，吳耀宗與那些中共悉心栽培、專門派到基督教界作工作的地下黨員是不同的。在本書的張化所寫的《吳耀宗與非基督教運動》一文中，揭示了吳耀宗一開始就以基督教的立場抵制非基督教運動，他為非基運動及共產主義者專門與基督教作對表示憤慨，也盡量運用當時的“新文化”“科學與民主”為基督教辯護，寫就《沒有人看見過上帝》一書。他積極與“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思潮領袖們對話、並為基督教辯解；他發起基督教學生運動，來應對非基運動；他也積極參與本色教會運動，使中國基督教能夠擺脫非基運動所指責的“帝國主義工具”之把柄。

只可惜他當時不知，非基督教運動完全由蘇聯共產國際所操縱和發動，在本書中披露：“1922年5月20日，共產國際在華全權代表利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報告說：整個非基督教運動……的基本力量確實是我們的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

義青年團……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 7 人組成的專門委員會，來對這場運動進行實際領導，它制定了詳細的運動計劃……所有運動都是根據遠東書記處總的指示和我的指示共同開展的”（見本書 23-24 頁）。在非基運動有計劃有組織的強大攻勢下，吳耀宗為基督教辯護的很多抵抗行動歸於失敗，而且他本人也逐漸被中共統戰了過去。非基運動使基督教內一大批信徒開始傾向共產主義。可以說吳耀宗就是非基督教運動的產物。

吳耀宗被中共統戰，但他並非全部放棄自己作為基督徒的原則。他的錯誤在於將唯物論與有神論、共產主義與基督教進行調和，如他說：“基督教需要唯物論的長處，也可以補足唯物論的短處。同樣的，唯物論需要基督教的長處，也可以補足基督教的短處”（見本書 477 頁）“雖然共產主義和基督教這二者的宇宙觀是不同的，出發點是不同的，但是它們要解放人類，使人類追求真理服從真理，這個目標是一致的”（見書 486 頁）。吳耀宗認為自己與共產黨及共產主義還是有區別的，雖然這個區別的解釋中共一直不接受。吳宗素先生在他的回憶文字中寫到吳耀宗與周恩來第三次會面：“父親表示，馬列主義和基督教有 99% 的共同點，盡管在有些根本問題上有分歧，但無關緊要，最後是可以一致的”。“99 與 1，不是絕對的數字，只是形象地表達大同和小異。20 多年後的 1960 年，父親對當時的統戰部長李維漢和副部長張執一也講過同樣的話”。“最後那 1% 的分歧，父親認為無關緊要，最後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周卻委婉地反對這種提法，意識形態世界觀絕無妥協調和余地。中共這個立場倒是始終如一，一直延續到今日”（見書 526-527 頁）。

可見，吳耀宗盡管與中共妥協調和，但由於他還堅持一些小差別，也就不能徹底全面地取信於中共。正如本書的《比較吳耀宗和趙紫宸對‘宗教反科學’的回應》的一文中指出：“1958 年之後，吳耀宗受冷落與他的這一思想有直接關係，因為隨著越來越左的形勢，宗教已被認定是要被消滅的對象，但吳耀宗卻認為宗教有其真理，是不可能消滅的，這就直接與左的思潮構成了對抗，因此他也就被入了另冊”（見本書 40 頁）。縱觀吳耀宗的一生，他既不是堅持原則不與中共媾和的家庭教會的領袖，也不是堅持唯物論、要管控和消滅的共產黨宗教幹部，他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可以算是一個被共產黨員統戰的基督教界人士。

對吳耀宗是個統戰人士而非中共黨員的看法，也從他積極主動而非被動接受命令開展三自革新運動中可以看出來。邢福增認為：“吳氏並非被動地參與發起三自運動，而是帶有相當的主動及積極性在其中”“現任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长王作安曾說：‘中國基督教走上三自愛國道路，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順應時代發展的自主選擇，有沒有吳耀宗先生都會發生。但歷史總是垂青有準備的人，時代選擇了他，他

也選擇了時代’。這個說法，實際上沒有準確說明吳氏的角色……吳氏基督教革新的思想，並非完全受中共的影響，也有他個人的期許與願景在內”。作為基督教內的“新派”“社會福音派”和“三自革新派”，吳耀宗主動與中共合作、共渡蜜月不短的時間，他是想借用中共政治權力實現他的宗教理想、改造中國基督教、打造基督教地上天國。當然這些也完全被中共所利用。

本書的《吳耀宗與中國三自運動的再思》一文揭示了純正的三自運動其實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後就在中西牧者、宣教士的推動下開始了，如中華耶穌教自立會、基督徒會堂、小群教會、耶穌家庭等。但這些與外國脫離關係的純正的“三自”教會並不符合中共的三自標準——完全屈服在中共的控制下，所以後來都被中共鏟除。吳耀宗的三自革新理想，起初與上述教會是一致的，但後來與中共合作後，主動迎合中共的宗教政策。故本書中吳梓明先生所說：“吳耀宗所領導的三自運動，實質上是將三自放入中國政治改革的範疇內，嘗試以政治的方法去處理中國基督教的三自問題。明顯地，吳耀宗所主導的三自運動，是一種政治運動，他對三自的詮釋也必然充滿著政治的色彩，掩蓋了甚至否定了過往中國教會對三自的基本理解”。可見，吳耀宗在主動與中共合作並想達成自己理想的過程中，也為了迎合中共而被中共給扭曲、改變了。

一方面吳耀宗不斷迎合中共的想法，另一方面他畢竟是基督教界人士，所以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也為基督教的信仰自由說過話。邢福增在本書的《‘愛國’與‘愛教’》一文中針對上海市檔案館的一份檔案指出：“文件指出吳耀宗經過7年緊隨黨的路線後，也出現‘基督教是不是有發展的可能，甚至是有無維持現狀的可能’的疑問，甚至對宗教政策作出負面的評價。當然，不論是吳氏的立場，或是文件表現的開放程度，事實上也是在1956年到1957年反右鬥爭前中共較寬松的政治環境下促成的。這也解釋了吳氏在1956年提出中國教會的‘三大見證、十項任務’主張以及1957年3月在全國政協2屆3次會議上就宗教政策落實問題所作的發言。遺憾的是，當中央發動反右派鬥爭後，面對極‘左’的政治路線，吳耀宗的主張又再次被革命洪流覆沒”（本書503-506）。這一切，正應了吳宗素先生所說的“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話。吳耀宗的這些經歷，尤其對目前海內外被中共宗教當局所統戰的基督教界人物，有整聾發聵的警醒作用。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書也幫助我們認識到“社會福音”對於中國當下的意義。本書中嚴錫禹的《社會福音與個人福音》一文，揭示出吳耀宗面對當時基督教主流基要派不關心社會、不關注中國命運，而極力在基督教界推廣社會福音，他說“基督教在今日的中國，應當有它的使命；這個使命就是本著耶穌唯愛的精神，結

合同誌，改造社會，以解放民眾，實現天國”（見本書 111 頁），“他對神學合理性判斷標準只有一條，是否有理於他尋找一條解決基督教信仰與中國現實社會問題和諧統一的途徑”（見書 107）吳耀宗力圖使中國信徒和中國神學關注中國的政治命運，這並沒有錯，甚至也切中了當今中國基督教界同樣的毛病——不聞世事、“專修來世”。

但吳耀宗的錯誤是他在強調社會福音的時候忘記了耶穌基督個人救贖在我們信仰中的核心地位；忘記了人是全然敗壞、企圖建立地上天國是永遠不可能的；也忘記了在履行基督徒改造社會的使命時也決不能與反基督、敵基督的勢力攜手。

對於今天的中國教會來說，一方面我們反對吳耀宗這種沒有了耶穌基督和人的罪性的社會福音，另一方面，我們在堅持信仰核心內容的同時也要強調基督徒承擔更新社會文化使命的重要性，“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改革宗神學主導下的社會使命的擔當的確是當前中國教會的急需。當然，文化使命的履行，也一定要以人不能建立地上天國、基督救恩是信仰核心、基督徒不能與共產主義等敵基督勢力聯手為原則。吳耀宗一腔愛國愛民族的熱心和改造社會、翻轉世界的雄心，最終卻被共產黨所利用和欺騙，這個教訓對當下中國基督徒、尤其是有文化使命負擔的基督徒的確是“前車之鑒”。

掩卷《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一書，的確加深了吳耀宗的全面認識。吳耀宗和中國三自會一樣，都具有很大的復雜性，他們與中共之間關係，既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也有一些矛盾和差別。在三自會裏面，掌握實權的往往是黨放心的地下黨員，他們是聽命於中共政權、操控三自、實施宗教迫害的主要打手。

對吳耀宗的全面認識，有助於我們認識到迫害基督教的元兇乃是中國共產黨政權，三自會只不過是幫兇。目前在中國家庭教會界，有些信徒“只反州官不反皇帝”，把一切的指責都放到三自會頭上，從來不敢抨擊三自會的真正主人、踐踏中國宗教自由的元兇——中國共產黨政權，這種狀況不利於了解中國基督教信仰受迫害的實質，不利於真正把握推進中國信仰自由的要害。不僅要批判三自會的為虎作倀、違背真理，更要批判中共宗教當局控制、利用及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的詭詐與兇狠。而對於基層三自會裏的真信徒、真牧師，尤其是經受著中共宗教當局的迫害者，海內外主內肢體也應給予支持。

《大時代的宗教信仰》在中國大陸無法出版，這也更加說明了它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較全面、較為真實地把握中共宗教政策、三自會及吳耀宗的好書。但願中國家庭教會的牧者和信徒們，都能一睹為快。

2014 年 3 月 7 日

十二、吳耀宗之子講真話的特別意義

在2014年1月28日由美國對華援助協會主辦的“2014年中國宗教自由和法治研討會”上，中國三自會發起人和創辦人吳耀宗的兒子吳宗素老先生首次在公眾前公開亮相、無畏言說，徹底揭露三自會的本質、批評中共宗教政策、揭示當前信仰不自由的真實狀況，其言論猶如核彈、也如春雷，石破天驚、振聾發聵，必將對整個海內外基督教界、中國各宗教界產生深遠的影響、意義特別重大。

首先，自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誕生之日以來，對它的批判就不絕於耳，近年來更有教會內外的諸多學者專家，撰寫出眾多有份量的文章揭露和批判三自會。但是與這些專家學者不同的是，這次出面揭露三自會本質、指斥中共宗教政策的，恰恰是三自會創始人、領導者、三自會的象征性人物——吳耀宗的兒子。很明顯，這是最接近三自會核心圈的關鍵人物在批判三自會，是被外界認為是三自會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的親屬在批判三自會，作為重量級的中國基督教歷史見證人的吳宗素先生，的確是從“敵人的營壘”的核心地帶殺出來的人士，其“回馬槍”必然更具有殺傷力。他的見證和結論，將以其身份地位、見證的真實性和親歷性，對海內外基督教界，具有平地驚雷般的震撼啟示作用，尤其對海內外受三自會迷惑、統戰、控制的基督教界人士更加具有當頭棒喝般的教育意義。

今年已84歲高齡的吳宗素先生在會上說：“我已84歲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是人之將死其言也真。我今天要說真話！”吳先生自1980年到美國已經在美30多年了，美國信仰自由和尊重人權的價值觀已經融入他的全身心，他已經徹底地改變了他的父親所持的立場，對三自會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毫不留情地批判，而對國內受迫害的家庭教會和人權人士，他抱有深刻的同情和積極地支持。吳宗素先生在2004年基督教兩會常委會議上，提出對王明道先生的打擊有擴大化現象，政府應該進行改正和補救工作。當時曾為吳耀宗的秘書、三自會中共黨棍曹聖潔無禮打斷發言，質問道：“你在那裏聚會禮拜？”，言外之意，吳宗素先生受了美國人的影響，為王明道張目。吳宗素先生完全站在信仰自由、政教分立等普世價值立場上，支持不受共產黨控制的家庭教會，而對被中共控制、操縱和利用的三自會採取徹底批判

的立場。他在會上語重心長的說：直到現在，包括葛培理等著名美國牧師在內，不少海外牧師、教會被三自會所欺騙，以為三自會是中國的基督教會，實質上它是共產黨控制的統戰工具而已。而海外真正應該關心和支持的基督教會，是不受中共控制的¹家庭教會。

吳宗素在會上指出了三自會的本質：“它的‘自治’——自己管理自己，裏面的管理人員全部要經過共產黨審查，包括神學院的畢業生分配工作。‘自養’——大概基層教會是自養的，但是三自的人員是國家工作人員，是按照行政級別付工資的，派到國外訪問全部是中共出錢，而且裏面一定有統戰部的人陪同。‘自傳’——每個教會共產黨都安插了自己的人，了解講道的內容，完全控制。”（見自由亞洲電臺對本次研討會的報道）

吳宗素先生在會上還指出了大量中共黨員占據全國三自兩會各主要職務的事實，指出三自會高層牧師及幹部，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是黨中央信得過、委以重任、在基督教界作工作的共產黨幹部。全國三自秘書長、中國基督教協會總幹事這些實權職位，一定是共產黨員在擔任。如李儲文、徐曉鴻、闕保平等都是共產黨員。吳先生還披露很長一段時間三自會就被中共黨員李儲文及其夫人、三自辦公室主任章潤媛全面把持。而基督教青年會也被對教會毫無感情的極左派黨棍李壽葆及其夫人施如璋控制。還有基督教青年會的劉良模、韓文藻、沈德溶等人，都是貨真價實的中共黨員。這些中共黨員監督監控三自內的非黨員，在歷次運動中整黑材料批鬥三自會中的牧師們，他們破壞教會到一個程度，甚至帶頭燒聖經。在 1966 年 8 月 23 日吳耀宗的日記這樣記載：“紅衛兵進入國際禮拜堂，搗毀與宗教有關的用具。男女青年會同工自動在青年會大門口焚燒聖經。夜九時在青年會開群眾大會，揪出牛鬼蛇神七人。要我向群眾低頭認罪”。（見《大時代的宗教信仰》，邢福增主編，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出版，589 頁）

可見，中國兩會（TSPM/CCC）實際上是被這批仇視基督教、欲鏟除基督教的黨棍所把持的政治工具，兩會對內成為控制信徒的“集中營”，對外成為通過宗教紐帶統戰、滲透海外基督教界的特務機構。兩會在今天雖然不斷有新人出現在領導崗位上，但它被無神論的共產黨所控制的本質沒有絲毫改變。這一鐵的事實經吳耀宗之子講出來，就更具有可信性，而兩會到海外冒充中國基督教唯一代表的謊言也就不攻自破。那些多年來受兩會欺騙，以為兩會人物都是基督徒、兩會是基督教會聯合機構的香港、臺灣、美國等海外教會和牧師們，應該反思悔悟、大夢初醒了！而某些普世基督教機構，將中國基督協會 CCC 作為中國基督教唯一代表機構的作法，也十分荒唐、應該立即休止了。

吳耀宗之子講真話也對目前仍在中共兩會體系中為中共賣命的宗教幹部和部分牧師一個重大警醒。吳宗素先生特別提到他父親由於神學觀念、民族情感等原因積極參與到中共領導的“三自運動”中，為中共效勞不遺余力，這是“落花有意”，但吳耀宗的真誠賣命和基督教界的社會地位，沒有換來中共的信任和承諾，卻反而招致背信棄義、監控迫害，這是“流水無情”。在吳宗素先生《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著名文章中，記載了中共利用完三自會後，就馬上背叛宗教自由的承諾開始消滅基督教：“父親 60 年 3 月 12 日的日記提到和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及副部長張執一見面。李指出：宗教起源於對自然的無知及社會的壓迫。此兩條件若不存在，宗教亦消滅；現在宗教影響日益減少，宗教工作者要有心理準備，適應目前的環境和形勢。” 1964 年 12 月召開三屆人大，毛澤東與前排的常務委員逐一握手。當時毛對吳耀宗語重心長地說：“你的那個上帝現在不太靈了”。（見《大時代的宗教信仰》，邢福增主編，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出版，584、591 頁）

1966 年“文革”爆發，中共開始徹底消滅基督教。吳耀宗“當時 73 歲，以前上下班有車接送，現在每日要走一段路去擠公車。原有的工資停發，銀行存款遭到凍結，每月只發生活費幾十元。我在學校也是牛鬼蛇神，飽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每月生活費僅有 12 元，一家的生活非常困難。父親的健康本來就欠佳，眼看天天惡化。1967 年 6 月 10 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因上下午寫檢查，久坐木凳，又要用腦，甚感疲勞’。兩年多內，先是在隔離室昏厥，被訓斥一頓後，勉強支持認罪，不久又一連昏倒兩次”。（見《大時代的宗教信仰》，邢福增主編，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出版，589 頁）吳耀宗去世後，他的日記也被中共從家人手中騙走，至今沒有歸還。

從曾是中共宗教界首席代表的吳耀宗的悲慘下場中，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共與吳耀宗們的關係只是利用與被利用、控制與被控制的作用，有利用價值給你高官厚祿，沒有利用價值，棄之如敝屣，甚至斬草除根。中共之無情無義，在吳耀宗的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那些目前在兩會工作的宗教官員和中國三自會中高層牧師們、那些海內外被統戰的如梁燕城之類的統戰明星們、那些海外與中共兩會與狼共舞、如膠似漆的歐陽家立、葛培理們，的確應該從吳耀宗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未來、自己的下場。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棄暗投明、拋棄三自道路，進入家庭教會的懷抱，是你們正確的抉擇。正如聖經詩篇 51：17：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總之，吳耀宗之子吳宗素先生在 2014 宗教自由與法治研討會上的此次講真話是彌足珍貴的、影響極其深遠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講話的歷史意義會更加巨大。

由於傳播手段的有限性，大多數海內外基督教界人士目前並沒有獲得他講話的信息，因此需要我們共同來推廣吳先生這次的講話。也希望吳先生“老驥伏櫪、誌在千裏”，在有生之年能爭取每一個機會去“講真話”、說真理。

十三、中國宗教政策會轉向開禁嗎？

——兼議華人基督教界的統戰明星

最近有部美國電影《饑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非常流行，它講述的是：在一個未來科技非常發達的專制國家中，暴力統治者每年從被統治者中抽出若幹名青年參加“饑餓遊戲”，遊戲獲勝者將與統治者一樣獲得自由、榮譽和財富。電影開始時這個遊戲已經舉辦了七十四屆。這個被統治者稍有反抗即遭迫害、統治者窮奢極欲的專制國家的總統說出了舉辦饑餓遊戲的目的，他對助手說：“統治人民，除了警察和暴力外，還要給他們希望(Hope)”。這句話真是道出了歷代獨裁者們專制術的精髓所在。

與《饑餓遊戲》中的 Hope 非常類似，最近兩位海內外華人基督教界著名學者，給所有基督徒也拋出了一個巨大誘人的 Hope。這篇由“基督徒共產黨員”、經濟學家趙曉點評推薦、海外特邀全國政協委員、基督徒學者梁燕城博士撰寫的題為《重大消息：國家宗教政策轉向開禁》文章，以歡天喜地、“謝主隆恩”的口吻，給華人基督徒宣告了這樣一個好消息：十八大對宗教功能作出正面定性，預示著宗教政策也將從“負面”走向“積極”；繼而停止了“暴力維穩”，也因此停止了對家庭教會以往的暴力作法。中國的宗教政策轉向，將走向越來越開放、開明，基督教在中國也正面臨新的機會(趙曉語)。挖掘宗教的和諧理論，基督教要成為正能量。。。中國政府可考慮從國家戰略高度，不是以防範角度看教會，卻正面引導中國基督徒投入參與建立中國夢，培養基督教會成為中國的精神文化資源之一，是中華文化共同體一部份(梁燕城語)。

無疑，這篇文章為中國基督徒們描畫了一個美好藍圖，給信仰自由度日益縮小的家庭教會信徒們帶來了希望、帶來了盼頭。使那些不懂宗教當局統戰政策的基督徒誤以為，基督教的春天就要來臨了！然而，就在這篇文章發布之際，據中國官方新華網 1 月 27 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26 日下午邀請全國性宗教團體負責人座談時強調：廣大宗教界人士要牢固樹立國家意識、法律意識和公民意識，引導信教群眾自覺在法律法規和政策範圍內開展宗教活動。他

還要求宗教界領袖確保信徒的宗教活動不會演變成非法行為，要加強對宗教活動的管理。新年伊始，中共管控宗教的最高人士口出此言，毫無宗教政策鬆動的跡象。

也在學者趙曉、梁燕城先生拋出“基督教的春天來了”之際，對華援助協會發布了 2013 年中國基督教十大受迫害教案，如黑龍江伊春孫文先牧師被毆打、教會受逼迫、海南眾多家庭教會遭政府取締、山西太原恩雨書房兩基督徒以非法經營罪被判重刑等海內外聞名的教案，其中的守望教會受迫害教案、河南南樂教案、陝西子洲家庭教會教案在 2014 年肯定會持續下去、對基督徒的迫害只會加劇卻毫無鬆懈的可能。這些教案的頻發，毫無跡象表明當局的宗教政策會轉向開禁、也無跡象表明對基督教不使用監禁等國家暴力方法。

實際上，這種“基督教的春天來了”的消息每隔一段時間，當局就會通過統戰人物釋放出來，目的是給基督徒們希望，讓他們繼續順服掌權者。如果一點希望也沒有，每個基督徒都起來造反，那是宗教當局最不願意看到的。宗教當局除了用暴力打壓基督教外，也常用統戰、散布希望來管控、軟化基督教。這一手硬一手軟的方法，當局屢試不爽。

在臺灣，一個靈恩界的著名牧師最近幾年被中共三自會統戰，屢次在三自主辦的聚會上發言、亮相。他之所以落入圈套，一是因為他太太到中國時就被公安抓捕過，這就是“硬”的一手，後來宗教當局動員很多教牧人員做他的思想工作，給他很多好處，這是“軟”的一手。軟硬兼施下他很快成為三自會在臺灣的代理人之一。

對待國內基督教界也是如此，各種教案中的抓人判刑是當局“硬”的一手，而不斷培植統戰人物、不斷釋放好消息則是“軟”的一手。中國宗教當局對待基督教，不敢像對待法輪功那樣宣布是邪教然後暴力鎮壓了事，面對人數日益眾多的普世正教基督教，當局採取“統戰為主、鎮壓為輔”“又拉又打”的政策。也即對待法輪功可以單單使用“硬”的手段，但是對待基督教還要加上“軟”的手法。

扶持三自會就是宗教當局一直以來“軟”政策，這樣一個愛黨教會的存在，可以把大部分的基督徒管控到順服掌權者的“集中營”裏。除了三自，也培養眾多基督徒名人、基督教界名人，替政府說話、給信眾釋放 Hope。2008 年底左右，以官方與家庭教會同時參與“基督教與社會和諧研討會：中國家庭教會問題專題討論”為標誌，不少人預言家庭教會要“脫敏”，要“合法化”，很多人陷在此幻夢中不能自拔。但是緊接著的洛桑會議家庭教會牧者被禁止前往事件、北京守望教會事件，很快就擊碎了眾人的迷夢。

時隔不到 5 年，新一輪的 Hope 又被著名人物趙曉和梁燕城釋放了出來。趙曉曾提出“有教堂的市場經濟”，這為彰顯基督教的經濟倫理、中央政府正視基督教的有益社會功能、向工商界、企業家傳福音有不可抹殺的好作用。但同時他從不諱言自己也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希望中國湧現更多共產黨員基督徒。面對國內家庭教會被迫害事件，他幾乎不發言。針對北京守望教會教案，他甚至說“不是政府在逼迫守望教會，而是守望教會在逼迫政府”。他後來提出的“有十字架的變革”，也一直語焉不詳、太過籠統。到底是一場以基督教價值觀為原則的社會變革，還是一場基督徒參與其中的社會變革，他沒有講清。綜合他的言論，“有十字架的變革”似乎是一群具有基督精神的共產黨員，進入變革主導地位，帶領中國實現“黨主立憲”的共產黨立憲，並在這些共產黨員基督徒的英明指導下實現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他以“國師”自居，期待共產黨採納他這個“未來政協委員”的建議。可見，替黨著想、為黨謀劃和效力，是他的跟基督信仰同樣重要的使命。

作為海外特邀全國政協委員的梁燕城博士，精通儒釋道，又有特別的信主經歷。他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對話、為基督教對中國的跨文化宣教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他也曾在 1989 年左右積極參加海外人權民運活動，是當時基督教界活躍的抗議中共人士，他也曾顯身著名民運人士、基督徒政治學者王策博士《中國重生之路—基督民主主義與中國文化》一書的研討會上。但是不久，隨著中國的日益強大，梁燕城博士率先回中國發展，不僅到多所大學作客座教授，而且多次在黨的宗教會議上為黨獻計獻策。西藏僧人連續自焚期間，他在公開場合多次指責西藏自焚是“消極恐怖主義”。他如此配合黨的宣傳，連普世的人權價值和同情心都沒有了。這次他出面散布黨的基督教政策就要更新了，顯然是繼續配合我黨的基督教統戰政策、軟化各地信徒。

總之，基督徒學者趙曉、梁燕城先生拋出“基督教的春天來了”的誘人美夢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中國基督教的自由也不是靠“凱撒”賜予的，只有信徒及公民們的抗爭，才能一步步推進信仰自由度的擴大。沒有抗爭，宗教政策的開放肯定會遙遙無期。

而需要我們從趙曉、梁燕城先生言論中學到的，倒是中國當局對待基督教的統戰手法，這一手法與電影《饑餓遊戲》中獨裁國家的專制術如出一轍，警察與遊戲、暴力和希望，同時使用，長期有效。這正如哥林多後書 11:13-14：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的模樣。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第四篇 基督教界時評與時政評論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耶利米書 17: 9

一、2013 年中國基督教界十大事件

1. **中國家庭教會簽署首爾承諾。**2013 年 6 月 25 日至 29 日，亞洲教會領袖論壇（Asian Church Leader Forum）在韓國首爾舉行，逾百位中國家庭教會領袖出席，與 300 位亞洲與全球福音派領袖聚集。國際洛桑認為，這是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再度連接的重要時刻，是“教會歷史上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時刻”（a symbolic moment in church history）。在此次論壇最後環節，來自中國的家庭教會領袖包括北京錫安教會主任牧師金明日牧師、北京城市復興教會李聖風牧師等百多位中國教會的領袖們共同簽署了《首爾承諾》（Seoul Commitment），這是對 2010 年《開普敦承諾》做出的回應，也是中國家庭教會邁向國際化、公開化的里程碑式的一步。

2. **中國家庭教會抵制三自會在臺灣的所謂“兩岸基督教論壇”。**2013 年 8 月 27 日中國、臺灣兩方面共 200 多位所謂基督教界人士參與的“兩岸基督教論壇”在臺北開幕。中國方面，中國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傅先偉率領 90 多位宗教官員、三自會教牧人員參會；臺灣方面，有歐陽家立、魏悌香等親中共教牧人員 160 多位參與。這次論壇沒有家庭教會成員的參與，名不副實。實質上卻是中共當局對臺實施基督教統戰的重頭戲。該論壇開幕前，對華援助協會會長傅希秋在臺灣就指出該論壇的虛假和統戰的實質。該論壇閉幕之際，中國家庭教會傳道人郭寶勝與中國福音會、臺灣長老教會總會等機構在臺灣召開“假宗教真統戰”記者招待會，並於 9 月 12 日在臺灣立法院召開“防範宗教統戰公聽會”，揭露三自會對內迫害家庭教會、對外進行特務滲透的真相，這也是中國家庭教會成員首次在臺灣立法院作證。

3. **中國家庭教會持續受到逼迫，引世界關注。**在 2013 年，除北京守望教會仍然在持續地受到當局的迫害外，從黑龍江伊春友好教會孫文先牧師被毆打、河南葉縣教案、山西太原恩雨書房到廣州、山東、新疆等地方家庭教會遭逼迫、陝西子洲家庭教會信徒與政府講理反遭嚴酷迫害、海南眾多家庭教會遭政府取締的無數教案中，可以看到家庭教會在中國的狀況不容樂觀。中國家庭教會聯合會也在艱難中成長，而基督徒法律界人士在今年給眾多家庭教會舉辦了法治維權講座。

4. 2013年8月3日，中國家庭教會老前輩林獻羔牧師在廣州安息主懷，榮歸天家，享年89周歲。林獻羔牧師是文革結束後雖被囚多年仍不走三自道路、堅持家庭教會路線的領袖之一，他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引起國際關注的家庭教會領袖，2013年8月16日，林獻羔牧師追思禮拜在廣州舉行，成千上萬基督徒從全國各地、甚至港臺、海外湧向廣州銀河園林伯告別會。據多方證實，有3萬多人前去追思、紀念林獻羔牧師，這還不包括8月16日以後，在榮桂裏教會絡繹不絕前去追思的人們。在此追思會期間，廣州國保如臨大敵，提前打招呼、當日扣押、現場帶走多名教會牧者、維權律師，阻止他們參加追思會。基督徒維權律師唐荊陵夫婦被國保從現場強行帶到派出所，他的太太還被拷上手銬。

5. 中國基督徒律師、人權活動人士受世界關注。越來越多的基督徒參與到中國的維權運動和推進中國民主的運動中。江天勇等基督徒維權律師發起成立中國民間的人權律師團，為各地維權案例進行法律援助。基督徒維權律師也積極援助一系列的宗教維權案件，如夏鈞、李貴生、張凱、李柏光等中國基督徒律師在南樂教案、葉縣教案等多個教案中大量湧現，為信徒的信仰權利和宗教自由積極維權，也因此遭到當局肆無忌憚的打壓。今年中國知名的基督徒人權活動人士趙常青、李化平、劉萍等因積極參與人權活動遭到拘捕和判刑，而剛剛釋放出獄的基督徒人權人士倪玉蘭，於2013年10月29日在北京基督教家庭教會訪民團契受洗。

6. 基督徒機構對華援助協會在全世界國會展開“緊急救援中國18名政治犯行動”記者會暨聽證會。2013年12月2日下午兩點，針對中國大陸持續惡化的人權狀況和法治環境，與歐洲議會、美國國會同步，臺灣中華民國立法院召開“緊急救援中國政治犯行動”記者會暨公聽會。幾十家島內外媒體來到公聽會現場。中華民國立法院多名議員、有關行政當局代表和人權團體代表等參加聽證。公聽會由立法委員田秋堇女士主持。傅希秋牧師帶領政治犯家屬代表：王炳章先生女兒王天安、彭明先生女兒彭佳音出席公聽會並作證。高智晟先生女兒耿格、劉賢斌先生女兒陳橋和陳克貴先生的父親陳光福用錄像形式作證。該活動也同時在歐洲議會和美國國會進行。

對華援助協會也因支持2012年5月來美的著名人權人士陳光誠到美國後的自由發聲，被紐約大學指責為“基督教右翼陰謀”，甚至被汙蔑“間諜軟件門”。但是上帝是公義的，事實真相最終促紐約大學和汙名者正式道歉。2013年12月9日傅希秋牧師、蔡伯春女士、對華援助協會、科恩教授和紐約大學發布聯合聲明：他們已經解決了關於在2012年5月成功地將中國盲人人權活動家陳光誠帶到美國的相關事宜上所發生的誤解。孔傑榮教授以及紐約大學已經確認：事實與媒體報導的

正好相反，對華援助協會給陳光誠的 iPad 和 iPhone 裏沒有用來監視通訊或窺探陳光誠的軟件。孔傑榮教授以及紐約大學對於因媒體報導而對傅希秋、他太太蔡伯春和對華援助協會可能已經產生的任何負面影響深感歉意。

7. 香港基督徒積極參與占中活動。2013 年香港公民為表達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和捍衛香港市民公民權利，發起「和平占中」運動。由於發起人多位是基督徒，於是成為教內外熱題。這場由基督徒法律學者戴耀庭、朱耀明牧師等發起的爭取全民普選運動，不僅引起政界廣泛迴響，甚至激發基督教從神學角度思考公民抗命和非暴力抗爭。目前香港基督徒參與社會運動形成聲勢，如基督徒黃之鋒，作為學民思潮召集人經常進行社會運動。

8. 三自會基層教會信仰權利及其它權利受侵害受到關注。今年以來，河南省安陽三自會、鄭州孫莊三自會，開封三自會等三自會因為教產權益侵害，紛紛進行抗議活動。2013 年 11 月 16 日早上 9 點半，河南南樂三自會主席張少傑牧師在南樂縣基督教會和政府部門的人交談，突然進來十幾個警察，把張少傑牧師強行綁走，至今沒有下落。他教會的 20 多名信徒也在當天被抓，張牧師的辦公室和家庭被查封。事發後，夏鈞等著名維權律師前往當地，但受到當地政府部門的毆打、圍困和騷擾，至今無法與張牧師等被害人見面。南樂教案受到全世界關注，對華援助協會也發布《就南樂教案致國家宗教局與全國兩會的公開信》，呼籲中國宗教當局正視三自會基層教會權益被侵害事實。

9. 所謂第二屆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在上海舉辦，葛培理布道團親三自受到批評。2013 年 11 月 18 日，由中國基督教兩會、美國葛培理布道團共同主辦的‘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在上海舉行。此次論壇是繼 2011 年 9 月 27 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勝利舉辦的首次論壇之後，第二屆由雙方共同舉辦的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這次代表所謂中國基督教界的人物，清一色全是官方教會人士，而毫無中國家庭教會的人士出席。統戰部、宗教局及兩會官員們自稱是“中國基督教界領袖”。而人數上多三自會三、四倍的家庭教會，卻被中共宗教當局隔離在這個論壇之外。眾多信仰堅定、社會影響大、得到國際社會贊譽的家庭教會領袖，也無緣參加這次大會。葛培理布道團與三自會與狼共舞的事實受到中國家庭教會人士的批判，相信對其的揭露在新的一年里會更加增多。

10. 普世教協（WCC）第 10 屆大會在韓國釜山召開，中國基督教協會（CCC）進行拙劣表演。2013 年 10 月 28 日到 11 月 8 日，被譽為“教會界的聯合國”的世界上最大普世教會組織——普世教協（WCC）第 10 屆大會在韓國釜山召開。這次大會的主題是：“生命的上帝，帶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WCC 是中共官方教會唯

一參加的普世教會機構。中共官方教會的對外機構中國基督教協會（CCC）一直自封為中國基督教的唯一國際代表，竭力阻止真正的中國教會——中國家庭教會進入國際舞臺。CCC 也利用 WCC 等國際舞臺，竭力營造中國宗教自由的假象、打壓國際上為家庭教會仗義執言的公義教會，左右甚至企圖操縱普世教會機構聽任中共及其宗教當局的擺布。

二、六四 25 周年與中國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25 前年的六四，在北京和全中國，追求社會公義和民主自由的中國公民，面對暴力鎮壓和專制淫威，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撼動山河的壯美歌曲。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第一次，數以千百萬計的民眾走向街頭和廣場，公開呼籲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面對專制者的戒嚴和軍隊，千百萬民眾和學生不畏暴力、誓死抵抗法西斯的惡行，他們的鬥爭精神、赴死的決心，至今激勵著更多的中國公民為中國的社會公義作出前赴後繼的努力。1989 年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雖然因為專制者的瘋狂暴力而被鎮壓，但 89 六四，卻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成為人類追求自由和反抗暴政的豐碑。在六四 25 周年之際，我們除了以淚水來祈求上帝安慰死難者的亡靈、天安門母親們的傷慟外，我們更應該以百般的勇氣和信心，繼承六四英烈們的遺誌、將中國公民們追求公義與自由的事業進行到底。

聖經彌迦書 6: 8: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作為基督徒，投入人類公義事業，並將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上帝所喜悅的行為。25 前的六四，香港、臺灣眾多教會、牧者和信徒，發布宣言、舉辦禱告會甚至走上街頭，抗議暴政、支持民主，成為海外基督教界令人振奮的風景。1989 年 5 月 17 日，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等 11 個基督教團體發表《致中國領導人的公開信》，5 月 20 日，成立“香港基督徒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愛民會」）成為基督徒六四民主運動的核心組織。6 月 4 日鎮壓後，“愛民會”和香港基督徒譴責北京鎮壓、聲援學生。1989 年後，香港每年六四紀念，均有教會和基督徒的身影。1989 年 6 月，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發布對北京天安門事件的聲明，指出：“我們喚起所屬各教會為死傷的中國人民迫切祈禱及追念。我們要與全世界教會共同呼籲，堅決反對任何政權以暴力鎮壓人民。中國政府應立即停止罔顧生命和人權的殺戮行為，中止一切後續的搜捕行動，並給予死傷者最優厚的賠償”。

相比港臺基督徒，在 25 年前的民主運動中，中國大陸基督徒並沒有成為一個角色、似乎毫無影響。中國大陸只有為數很少的基督徒（如北京缸瓦寺教堂楊毓東牧師所牧養的青年團契中的基督徒），參與到八九民運中。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基

督徒數量本身就不多，另一方面當時基督徒大都深受不要關心社會政治的極端基要派思想影響，對民主運動諱莫如深、不敢介入。一位坐牢 20 多年、在國際社會也有影響的著名家庭教會領袖，在他多次的談話中，還以沒有參加八九民運為榮。25 年前，基督徒整體在民主運動中的失語，的確成為一個歷史的缺憾。

但上帝自有美意，1989 年的六四，卻為 20 多年來的信仰復興鋪墊了某種基石。中國人在坦克機槍制造的鮮血中震驚惶惑，在民族的浩劫和個人的厄運中與冥冥之中的上帝開始親密接觸。很多學生、知識分子開始走進了教會、成為基督徒、成為牧師。八九學運的領袖們如張伯笠、遠志明、柴玲等先後成為基督徒甚至傳道人，國內目前家庭教會的領袖，不少就是八九一代的學生。中共當局在六四後一度忽視對民間信仰的控制，這一切都使基督教會在中國迅猛增長。

六四發生後的 25 年，有人估計基督徒數量已經接近一億，單從數量講，中國基督徒的確應該在社會政治領域產生某種影響力，這也是為什麼當局從今年以來，發動以拆毀教堂及十字架為特征的新的“非基督教運動”的原因。但是，數量不等於質量，不僅承擔社會責任的使命對當今中國基督徒還有一定距離，就是維護自己信仰權利的舉動，也並不多見。除了北京守望教會、廣州良人教會、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等少數教會外，大多數教會在宗教迫害來臨時，並不懂得抗爭和維權。例如在這次溫州拆教堂和十字架的迫害中，除了三江堂被拆前有成千上萬的基督徒持續抗爭了近 1 個月外，其他的教會和教堂，在迫害來臨時，基本上都噤若寒蟬、忍氣吞聲。而且，就全國而言，諸教會也不合一，因為派別、神學觀念、對屬靈十架和實體十架的看法不同，導致大多數教會沒有聯起手來，甚至互相拆臺，導致當局對教會各個擊破。

然而值得慶幸的是，眾多基督徒維權律師、維權人士紛紛湧現了出來，高智晟、鄭恩寵、倪玉蘭、趙常青、唐荊陵、李和平、李化平、江天勇。。。。。。他們即使身陷牢獄，也矢志不渝，敢於背著這個民族的“十字架”承擔公義；同時，一批敢於言說社會話題的基督徒名人出現了，他們就社會熱點從基督徒立場發表觀點，在公共空間占據一席之地，他們已經開始在承擔基督徒“山上之城”的社會責任。

而且，高揚上帝主權、鼓勵信徒履行管家天職、積極入世、行上帝公義於地上的改革宗神學，已經逐漸成為中國家庭教會的神學主流。而趙天恩牧師的三化異像：“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已經成為大多數家庭教會領袖和青年基督徒的共識。改造世界、承擔社會文化使命，進而推動社會政治之變革，也已經得到更多基督徒的認同。雖然還缺乏行動的勇氣和意志，但在神學觀念上，已經與 25 年前大不相同了。

感謝上帝對中國教會 25 年來的祝福，相信中國家庭教會會逐漸剛強和成熟，來積極應對應該擔當的社會責任。在六四 25 周年之際，求神再大大添加力量和智慧給中國基督教會，賜給中國基督徒勇敢的心，承擔起“管理、治理”的管家使命、敢於為上帝的公義與邪惡爭戰、敢於成為黑暗中的光、空虛中的鹽。一切正如中國家庭教會海外牧者聯禱會在六四 25 周年之際發布的禱告詞中所寫的：

“求神安慰失去兒女的天安門母親們，也求神看顧前赴後繼、為中國的公義仍在奮戰不息的同胞們、弟兄姊妹們；神必定會審判六四屠殺的劊子手，神也必定會帶給中國人真正的自由。每年六四，要成為這個國家的禁食禱告日；每年六四，我們要默想民族的未來和神的公義。罪惡者受到審判、受害者得到撫慰、公義被彰顯、正義被高舉，神您給我們盼望，您給我們信靠。”

願上帝祝福中國、願上帝的公義行在中國如同行在天上。

三、《宗教自由普度共識》的重大意義

宗教自由是人類的第一自由，這對匱乏人權自由的中國人來說尤為重要；而中國問題的核心根源之一就是宗教自由：無論新疆、西藏問題還是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基督教、天主教、新興宗教與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矛盾沖突，都與中國宗教自由問題息息相關。今年年初以來，當局以侵犯教產、拆教堂和十字架的形式對浙江和全國各地的基督教、天主教的迫害日趨嚴重、舉世關注。在這些形勢下，由中國民間發布一份正式的《宗教自由共識》的確是勢在必行、眾心所盼。

2014年5月5-7日，美國普度大學舉行“宗教自由與中國社會：典型案例學術研討會”，參加者包括眾多華人律師、牧師和學者。經過三天的熱烈研討，對於宗教自由問題形成很多共識，會議最後發布了《宗教自由普度共識》(Purdue Consensus on Religious Freedom)並且聯署簽名。該共識的發表立即引起海內外媒體的關注、反響熱烈。

這份共識可能是多年以來第一份由民間發布的有關宗教自由的共識。就共識的內容而言，首先闡明了之所以發布共識的原因，那就是中國公民及中國憲法和法律對宗教自由缺乏正確的界定和認識，中國社會還存在大量踐踏宗教自由的現象，因此有必要闡明宗教自由的基本內容及其重要性。

緊接著，共識通過五條條文闡明了宗教自由的內容、價值及其在中國的針對性：

第一條闡明了宗教教育權的重要性，也闡明了敬拜自由、教產（主要是敬拜場所）權利、運用宗教標誌、出版宗教書籍等的自由。宗教教育權在中國被抹殺，因為在現行憲法 36 條有關宗教自由的條文中，其中就有：“不得利用宗教妨礙國家教育制度”。這就將成立私立宗教學校的可能性給摒除了。然而在宗教自由國家，儘管公立學校強調不能有任何宗教傾向，但私立學校的宗教特色，政府從來不干涉。該條文對由於信徒日益增長、已生成好幾代而產生的宗教教育需求，發出了非常及時的呼聲。信徒及其子女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已經成為新形勢下中國信徒的強烈要求。本條對教產、宗教出版、集會等權利雖著墨不多，但也闡明了它們的重要性。

第二條闡明了宗教自由在人權自由中的核心地位。沒有宗教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等會成為空中樓閣。在基督教占主流的西方民主自由國家，宗教自由一直是各國爭取人權民主的主線和導火索，如荷蘭、英國等等。但由於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和人權人士大都受無神論影響，是非信徒，所以他們在為人權自由呼籲時，往往對宗教自由並不強調。也由於自身沒有宗教體驗，所以對新疆、西藏、基督教家庭教會、法輪功等中國每天發生的眾多問題缺乏從宗教自由的角度來審視的習慣。所以對宗教自由在中國社會重要性的強調，對人權人士和整個社會來說都是非常及時和有意義的。

第三條主要闡明諸宗教在法律權利上都是平等的理念。這是呼籲中國政府對待各類宗教及某些思想體系時不能有厚此薄彼、不平等對待的情況發生。也提醒中國各類宗教信徒，在法律權利上以平等的態度相互看待。教義可以不同，但法律權利上是平等的。

第四條主要闡明國家不能設立國教，在中國就是不能把馬列主義上升到國家宗教的位置。顯然，這是針對中國現行憲法序言中，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等列為國家意識形態和準國家宗教而言的，當然，該共識的表達是一種委婉的正面表達方式。

第五條繼續闡明國家不能設立邪教罪，任何國家政權都沒有宗教上的權柄（屬靈的、教義上的判斷能力和權力）來判定各宗教的正邪。這主要是針對現行《刑法》300 條及其眾多司法解釋而言的。中國是目前全世界為數不多還存在邪教罪的國家，這是嚴重違背政治現代化重要標誌——政教分離原則的。政府定邪教罪，就是宣稱世俗政權具有裁判宗教的屬靈權柄。事實上，教義的正邪，只能交給宗教本身和宗教間處理。1688 年，英國憲政文本《權利法案》第 3 條就規定了政教分離：“為教會事務近來建立審判法庭的權力，以及其他一切類似的權力和法庭，都是非法和致命的”。1789 年，美國《權利法案》（即憲法修正案）第 1 條就是有關政教分離及信仰自由：“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中國要成為一個保障宗教自由的現代國家，取消邪教罪是第一要務。

共識最後呼籲：“無論相信任何宗教、教派或非宗教思想體系的中國公民，都有責任在法律上和公共生活中尊重、保護和爭取上述宗教自由的原則和價值”。

可見，《宗教自由普度共識》是多年以來民間社會專門就宗教自由問題首次發布的立足於普世價值、具有國際水準聲明，也是多年以來首次比較清晰闡明宗教自由的內容及其價值的文本。該共識對中國的基督教界和其他宗教界，都具有深遠的啟迪作用；對保障中國人基本人權、促進中國宗教自由，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起

到越來越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實在要吹毛求疵的話，該共識還有兩個方面應該強化。首先，該共識沒有對宗教教產權利給予足夠的強調。眾所周知，近年來，對基督教界（無論是家庭教會、還是基層三自會）最為嚴重的逼迫就是對教產的迫害，無論對北京守望教會還是對溫州三江教堂，踐踏教產權利成為踐踏宗教自由的主要形式：或強制拆遷、或禁止購買、或中斷租賃、或拒不歸還。當局對教產的侵犯成為侵犯宗教自由的主要切入點，他們在對靈魂無法禁錮的情況下，就開始對信仰活動的物質形式加以禁錮，他們以為控制了空間就會除滅信仰、剝奪了教產就能消滅宗教。所以，當下的宗教自由共識，應該特別強調宗教活動的場所及其它物質形式是宗教發展的內在要素，宗教財產權利是宗教自由的必備要件。宗教財產權利與公民及法人的財產權一樣應該受到國家的法律保護，不得被國家和其他社團侵犯。

其次，目前中國民間，對宗教自由的一個很大誤區就是各宗教、教派不能在宗教自由這個法律權利上聯手互動。各宗教、教派都有為自己爭取宗教自由的主動性，但在與其他宗教和教派聯手爭取宗教自由權利方面幾乎是空白。其實宗教自由是個法律概念，無涉各宗教教義，不同教義的宗教及教派，在捍衛宗教自由法律權利上是一致的、共同的。各宗教及教派儘管互不認同各自的教義，但在互相維護各自的宗教自由權利上應該聯起手來。這些合理的觀點應該成為當下的共識。所以，《宗教自由普度共識》應該在此點上做些強調，以矯正中國公民和各信徒對宗教自由的某些誤解，形成各宗教及教派一起呼籲及維護宗教自由權利的合力。

瑕不掩瑜，《宗教自由普度共識》無疑是多年以來中國人關於宗教自由的最好的表達，是最為清晰和最為切中弊端的宣告。而且，共識發表在當今宗教自由被踐踏越來越嚴重的今天，及時應對時勢，對當政者具有整聳發聵的警示效應，對中國公民和各類信徒，具有巨大的啟發和引導作用。我們都應該真摯地感謝“宗教自由與中國社會：典型案例學術研討會”的主辦者和《宗教自由共識》的發起者們。願上帝祝福他們。

四、林獻羔牧師留給我們什麼？

2013年8月3日下午2時，神的老仆人、中國家庭教會老前輩林獻羔牧師在廣州安息主懷，榮歸天家，享年89周歲。海內外基督教界無不為之動容、緬懷他對中國基督教會的貢獻。林獻羔牧師是文革結束後雖被囚多年仍不走三自道路、堅持家庭教會路線的領袖之一，他是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引起國際關注的家庭教會領袖，他的教會也成為第一個具有國際影響、雖歷經逼迫仍堅貞不屈、官方無法取締的家庭教會。他與王明道、倪柝聲、袁相忱、以巴弗、謝默善、楊心斐等牧者的名字都已刻在了家庭教會的歷史豐碑上。除了牧會、講道、神學等巨大貢獻外，林牧師捍衛信仰自由權利、“順從神而不順從人”的精神及實踐，是留給家庭教會最大的屬靈遺產。

正如即將離世的保羅寫在提摩太後書4:7：“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林獻羔牧師一生打過的美好的仗主要是兩次，這兩次成為他身上最為閃光和榮耀的部分。一次是在1950年代初三自運動開始，當局威逼利誘、以國家暴力威脅林牧師加入三自會時，林牧師毫不妥協，堅持純正的教會路線，也因此被捕兩次，被判刑坐牢整整20年。另外一次就是他出獄後，從1980年代開始，堅持在自己家中聚會，雖經過多次的傳訊、談話、查抄甚至取締，也不畏強暴、剛強不屈，堅持家庭教會的自由敬拜，終於使當局不得不默認林牧師所在教會的事實存在，也使大馬站及後來的榮桂裏成為南中國的一盞明燈，成為中國家庭教會公開化的最早標誌。

在《林獻羔見證》一書中寫到：“1958年5月30日，神讓一些事情發生。那天晚上10時許，當獻羔完全沒有心理準備時，竟然有幾位不速之客來到，直入獻羔的臥室，出示逮捕證，說：‘你被捕了’。”“11月20日，判決書來了，獻羔被判刑20年，還有5年剝奪政治權利。他的罪名是‘反革命、親帝、反蘇、王明道的爪牙’等。判決書上沒有提及那些與事實不符合的錄音。獻羔上訴，但沒有果效”。在那個“黑雲壓城城欲摧”的黑暗掌權的時代，捍衛真理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

與王明道先生一樣，林牧師至死都認為三自愛國會不是真教會，它的元首是政治領袖而非主耶穌基督。正如林獻羔後來說的：“堅持不加入愛國教會，是因為愛國教會講聖經是有選擇的，有真理不能說”。為了純正的信仰、為了顯明的真理，林獻羔牧師付出了 20 年牢獄的代價。在監獄裏猶如漫漫長夜、苦不堪言，但是神與他同在，“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直到今天，還有太多的基督徒在三自會問題上是非不分、混淆黑白，看看林獻羔一代牧師的堅守和付出，如今不講原則的基督徒能不為之羞愧、汗顏嗎？

林獻羔牧師出獄後，更大的磨難和使命在他的肩上。獲釋後他就開始家裏的聚會，在《林獻羔見證》書中寫到：“至於 1982 年 12 月 6 日，當局勒令他們停止聚會，理由是獻羔自出牢後，接著的 5 年被剝奪政治權利，沒有集會的自由！1983 年 5 月 29 日，獻羔恢復公民權，有集會自由後，他們的聚會，一直沒有停止”。聚會雖沒有停止，但伴隨的是當局宗教部門、公安部門無休無止的騷擾和逼迫。問話、抄沒書籍、累次威脅在三自處登記，成為家常便飯。

在《林獻羔見證》中寫到：“8 月 20 日上午 9 時至 10 時半，宗教事務處 4 人與我談話。他們問我對《廣州宗教事務管理條例》有什麼看法。我仍然說：‘我寧可坐監也不登記，因為這些條例是限制我們的信仰。公民既有‘信仰自由’（不只是‘信教自由’，‘信仰’應是包括聖經全部教義的），我們就照聖經而行。’‘羅馬逼害基督教最甚，也沒有登記條例’。”

最嚴重的一次逼迫就是 1990 年 2 月 23 日林獻羔牧師被拘傳 21 小時，大馬站被當局取締。在大馬站聚會點的門上，赫然貼上了通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政府通告

越府字（一九九零）七號

查林獻羔長期在大馬站 35 號 2、3 樓進行違法宗教活動，一九八八年五月，廣東省人民政府頒布《廣東省宗教活動場所行政管理規定》後，經政府有關部門多次對林獻羔進行教育，但林置若罔聞，仍不按規定向政府宗教部門申請登記，繼續進行違法宗教活動，違反政府法規，現根據《廣東省宗教活動場所行政管理規定》，堅決予以取締，特此通告。

一九九零年二月二十二日

就是面對如此的兇險，林伯也沒有妥協，堅持聚會和敬拜，“頭可斷、血可流，就是不登記”。林獻羔牧師不向凱撒低頭，不向官方教會妥協和登記，堅持獨立聚會的立場和勇氣，是當代家庭教會信徒效法的楷模。

林獻羔牧師的勇氣和信仰之純正，引來了國際的關注。每次的逼迫騷擾都引來海外媒體的廣泛報道。美國著名牧師葛培理（Billy Graham）將裏根總統送給林獻羔的一本聖經和總統半身照帶給他。美國太空人歐文（Irwin）等許多美國朋友先後到訪並參加林獻羔主持的聚會。國際上因林獻羔牧師而越加關注中國的基督教信仰自由。

林獻羔牧師所牧養的大馬站教會及後來的榮桂裏教會，在逼迫中反而越來越興旺，人數一直持續上升，每周都有數千人次去聚會、禱告、敬拜，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受洗。林牧師也栽培了一代一代門徒，他們成為廣州、廣東乃至南中國眾多家庭教會的領袖，孕育著成千上萬的家庭教會。

林牧師息了他時代的工。正如啟示錄 14:13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做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林牧師留給我們的，是他信仰的純正，是他絕不與三自同流合汙的自潔、是他不畏強暴、不與這個撒旦世界妥協、堅守信仰自由的勇氣。而我們這些後來者所要面對的，也許是更為復雜的問題：如家庭教會的教產、政教關係、合法化公開化問題等等。無論如何，有了林牧師的屬靈資源，我們就肯定會剛強壯膽、打那美好的勝仗。

提摩太後書 4:8：“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我們相信，在天國，神必將公義的冠冕為林獻羔牧師存留。

五、追思林伯，將真理的旌旗揚起來

2013年8月16日，林獻羔牧師追思禮拜在廣州舉行，成千上萬基督徒從全國各地、甚至港臺、海外湧向廣州銀河園，湧向林伯告別會。人山人海、場面宏大、悲情濃重。據多方證實，有3萬多人前去追思、紀念林獻羔牧師，這還不包括8月16日以後，在榮桂裏教會絡繹不絕前去追思的人們。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感，使如此眾多的中國人自發地去懷念這個沒權沒勢、被當局定為“反革命”、至今還被定為非法的家庭教會牧師呢？如此無畏無懼的人流，如此真摯動人的追思，受到震撼的、感到不可思議的首先應該是黨國自己。

在此追思會期間，廣州國保如臨大敵，提前打招呼、當日扣押、現場帶走多名教會牧者、維權律師，阻止他們參加追思會；歸正福音布道團曾弟兄等一批教會牧者，或被國保堵在家裏、或被攔截，不準參加追思會；著名維權律師唐荊陵夫婦被國保從現場強行帶到派出所，他的太太還被拷上手銬；會場中遍滿警察和便衣，監視器、攝像機也監控著每一個人。正如一位參加了追思會的姊妹寫到的：“昨天，有很多臺錄影機對準追思人群。有一排工作人員，三位，表情談不上友好甚至是肅煞，眼神飽含恨意，像極了饑渴難耐、尋覓食物、盤旋低吼的獅子”。這些“野獸”，他們仇恨的是什麼呢？他們恐懼的是什麼呢？

無疑，使這些國家機器們氣憤和仇恨的是，成千上萬的人追思、瞻仰的人居然是被他們定為“非法的”“敵對的”“反政府”的家庭教會的代表人物；人們紀念的，恰恰是他們試圖要抹殺的；他們仇恨的，恰恰是人民愛戴的；他們認為非法的、敵對的，恰恰在人民心中是合法的、符合永恒真理和正義的。他們惱怒至極——原來與他們作對的，是如此眾多的民眾汪洋大海。

使這些國家機器們恐懼的是，他們已經明顯感到他們自己，已經站在了真理和人民的對立面。他們不代表民眾、不代表真理。他們已經成為謬誤、已經成為邪惡，他們必將被拋到歷史的垃圾堆裏，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不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而是，歷史已經被人民所書寫！誰是誰非？誰代表真理、誰代表邪惡？誰是歷史的進步推動者，誰是歷史的罪人？已經通過8月16日的追思會昭昭

然於天下，並且永遠地書寫在中國歷史上了。

詩篇 60：4：“你把旌旗賜給敬畏你的人，可以為真理揚起來”。林獻羔牧師的一生，就是堅持真理的一生，耶穌基督的教會，怎麼能向凱撒為元首的國家機器投降呢？家庭教會的合法性，在天國已經被認定，任何地上的政權，有什麼資格取締呢？家庭教會的旗幟，也就是真理的旗幟，不懼逼迫和威脅，高揚這面真理旗幟的，必將得勝，而且已經得勝！

六、中國家庭教會簽署《首爾承諾》的重大意義

據基督教網絡媒體報道，2013年6月25日至29日，亞洲教會領袖論壇(Asian Church Leader Forum)在韓國首爾舉行，逾百位中國家庭教會領袖出席，與300位亞洲與全球福音派領袖聚集。國際洛桑認為，這是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再度連接的重要時刻，是“教會歷史上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時刻”(a symbolic moment in church history)。在此次論壇最後環節，來自中國的家庭教會領袖包括北京錫安教會主任牧師金明日牧師、北京城市復興教會李聖風牧師等百多位中國教會的領袖們共同簽署了《首爾承諾》(Seoul Commitment)，這是對2010年《開普敦承諾》做出的回應。

《首爾承諾》標誌中國家庭教會在國際舞臺上的整體性首次亮相。眾所周知，中國當局對家庭教會一直採取“非法化、隱蔽化”的對策。不讓家庭教會在基督教普世機構、論壇出現，不讓家庭教會在國際舞臺上整體發聲、亮相，是當局的既定宗教政策。而官方的三自會(TSPM)或基督教協會(CCC)，霸道地成為國際場合的唯一中國代表，蒙蔽國際基督教界以為中國只有官方的三自會一家。如在著名的普世教會協會WCC(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中，官方的基督教協會(CCC)一直自命為中國教會的唯一代表，並為中國當局的各種政策背書。

1974年，在福音派領袖葛培理、斯托得等的召集下，首屆洛桑大會在瑞士召開並通過《洛桑信約》，對全球福音運動以及宣教發展產生深遠意義。2010年，國際洛桑會議開普敦大會邀請了中國家庭教會200多名代表，並且專門為這些代表留下200多個椅子，可惜這些椅子在這次會上成為了空椅子。因為原計劃前來參會的大多數代表幾乎全部被攔阻，有的被軟禁在家，有的在機場被毆打、扣押，強制遣返回家。

2011年，國際洛桑決定將為中國家庭教會的領袖舉行一次特別的聚會。於是在開普敦洛桑會議事件事隔三年後，家庭教會領袖們終於沖破當局的限制和逼迫，參加國際洛桑會議在首爾的大會。顯然，首爾會議是家庭教會沖破當局“非法化、隱蔽化”政策的一次勝利，是家庭教會在普世性基督教機構的首次整體性亮相，對家

庭教會在國內的公開化、合法化運動具有重大的意義。

簽署的《首爾承諾》中寫到：“我們承諾，領受福音的精神。我們立誌謙卑學習洛桑的福音遠象，行在福音的光中，在中國社會宣揚福音，在中國教會推動福音運動。。。。我們承諾，攜手邁入普世宣教。我們立誌領受洛桑的宣教異象，忠心為普世宣教禱告，展開宣教動員，推動宣教教育，差派宣教士”。這些承諾標誌著家庭教會已經融入到普世宣教運動、也從而融入到普世教會當中。教會是普世性的，無論“猶太人、外邦人、聰明人、愚拙人”，教會都可以在那裏建立起來；教會也是合一的，各個國家、民族、種族的教會，在聖靈中、在以基督為元首中是合一的。中國家庭教會願意成為普世合一教會的一員，而且已經成為普世合一教會的一員，這是任何阻力也阻擋不了的。

相反地，中國當局培植的三自會，卻與普世合一精神背道而馳。所謂“三自”——自治、自養、自傳原則，實質上是違反聖經的自我獨立原則，是典型的排外原則、義和團原則，完全違背基督教的普世性、合一性。中國當局成立三自會，旨在建立馬列主義統領下、以黨魁為元首的所謂基督教獨立王國。中國教會要走向世界、成為普世教會和普世宣教運動的一員，靠三自會的確是緣木求魚。而唯有持守純真信仰的家庭教會，才能實現中國教會的普世合一異向和特征。

最後，家庭教會領袖簽署《首爾承諾》也給家庭教會在國內的合法化、公開化進程啟迪了一條新思路。目前國內由於政治的不民主、結社的不自由，由於家庭教會的合法化牽涉到其他社團甚至政黨的合法化問題，所以家庭教會的合法化、公開化道路還有著種種不可克服的阻力。在國內一時難以突破的情況下，不妨可以先從國外著手，在國際社會中謀求合法化、公開化。而國際社會中的合法化、公開化繼而會帶動家庭教會在國內的合法化。《首爾承諾》的簽署，就啟示了這一明智的選擇：國內暫不能合法化的，我們先在國際基督教機構中形成合法化，有了國際社會公認的合法成員角色，那麼中國國內的合法化、公開化也就為期不遠了。

因此，在這次洛桑首爾大會及簽署《首爾承諾》之後，中國家庭教會應該繼續展開在國外的公開化、合法化活動，繼續謀求國際基督教普世機構內合法成員的資格、繼續參與各種普世宣教運動，除了洛桑會議外，如普世教會協會 WCC 等國際機構，中國家庭教會也都應該積極參與並成為當然成員。這一切正如聖經馬太福音 5:14：“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成為這個世界的山巔之城，真是神交給中國家庭教會的時代使命和責任。

七、抵制反憲政逆流是基督徒的責任

最近以來，中國主流媒體掀起反對憲政、固守專政的逆流，而且非常之兇猛。先是當局組織的一批學者，比如楊曉青、鄭誌學、汪亭友、胡鞍鋼、劉小楓、曹錦清等，發表文章，抨擊西方憲政，維護極左意識形態。8月5日、6日、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布署名馬鐘成的3篇文章《“憲政”本質上是一種輿論戰武器》、《美國憲政的名不副實》以及《在中國搞所謂憲政只能是緣木求魚》，毫無理性地指責、謾罵憲政是專屬“資產階級”的舶來品，是西方國家顛覆中國的陰謀和陷阱。如此兇惡的局面，大有“文革”回潮的形勢。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箴言 14: 30）當局如此的倒行逆施，徹底地澆滅了各界對政治改革的盼望、暴露了共產專制企圖千秋萬代的頑固姿態。當權者無法無天、老百姓毫無權利的“人民民主專政”繼續延續，的確是中國人民的羞辱。不僅是羞辱，如果再任其發展，完全有可能使毫無制約的獨裁者成為法西斯，從而使中華民族陷入萬劫不復的浩劫中。與專政相對的，就是憲政。憲政是民主自由國家的普遍政體，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普世價值。根本而言，憲政是基於人是有罪的、“世間沒有一個義人”（詩篇 14:2-3）的人性考量的政治學說和實踐，憲政無疑是政治領域中上帝公義的體現。作為基督徒，應該站在上帝公義的一邊來支持憲政。

憲政是國家權力被憲法所約束、人民權利被憲法所保護、司法獨立、行政首腦選舉產生等等為特征的現代化政治模式，它最早出現在基督教文化地區，如荷蘭、英國、美國等國。基督教的價值觀、文化深刻地塑造了憲政，如中世紀教權和王權的制衡和鬥爭使歐洲避免了出現絕對專制主義，而宗教改革的“因信稱義”極大地提升了個人人權的神聖性、清教徒盟約神學使社會契約論、代議制等憲政觀念深入人心，而加爾文的預定論徹底摧毀了政權的神聖性、政教分離成為現代國家的基本特征，新教教會內的選舉尤其是長老教會的管理模式，也給憲政很大的啟示。正是基於以上因素，有基督徒提出“基督教憲政”命題，這個命題是值得當今基督徒支持和傳播的。

作為基督徒，不僅有傳福音、建教會的大使命（馬太福音 28:18-20），更有在地上作管家、治理管理的文化使命（創世記 1:28：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超然於這個世界的，不是遁入空門的異教，而是如耶穌所言：“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約翰福音 17:18）基督徒要積極入世，並將上帝的公義、聖潔、慈愛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馬太福音 6:10）。

社會的公義、政府的廉潔、人權的保障、憲法的真正實施，都是基督徒進行社會關懷的重點話題。每個基督徒，都應該成為所在國家和地區的“地上的鹽”、“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燈臺上的燈”（馬太福音 5:13-16）。如此，這個國家才會擁有公義，這個民族才能在盼望中走向進步，基督徒個人，也才能真正作到榮神益人。值此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願中國基督徒們，能齊來抵制反憲政逆流、共同倡導憲政民主理念。

八、愚昧的反基督教思維該休止

——評《較量無聲》及其他

最近以來，網絡上一部叫《較量無聲》紀錄片引起人們熱議，中國左派和民族主義者們熱捧此片，譽為“對付美國無聲戰爭的號角”“讓人看清美國顛覆中國的戰略真相”。該片煽動中國人仇視美國和西方文明，大有與整個西方國家決一死戰的姿態。

這部由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關係研究所聯合推出，由國防大學信息管理中心制作的政論片的真實目的，據說是要影響中共最高決策層。目前外界還不知道最高決策層是否採納了該片的觀點，如果真採納了，那中國就要回歸“文化大革命”的鬥私批修、閉關鎖國不可，也要效法北韓、伊朗，與美國和整個文明世界挑戰，成為地球村人人嫌棄的孤兒。

這部 2013 年 6 月制作的 90 多分鐘長、分上下兩集的宣傳片，主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試圖從 5 條戰線上顛覆中國，包括政治、文化、思想、社會和組織上的滲透以及政治干涉，該片指責美英駐香港領事館是半公開的反華基地，參與策劃香港的社會運動，指責美國政府邀請國內的學者、官員去美國訪問是滲透和洗腦，美國各種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看似進行慈善活動，實際上進行顛覆活動。該片甚至把中國學生留學美國、中共因缺乏民主法治而導致的腐敗、中國社會的道德墮落和人欲橫流，都歸為美國的陰謀和滲透。

該片在煽動中國注意和抵制美國文化滲透時，把基督教當做美國文化滲透中國的主要內容。該片在伴隨國內基督徒敬拜畫面的解說詞說道：“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滲透，在主流價值觀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逐漸形成蔓延之勢。相關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的基督教徒總量，已悄然逼近一億人。”

可見，在中國極左思維的軍方眼裏，基督教是美國在 5 條戰線上顛覆中國的重頭戲，而將近 1 億的基督徒成為顛覆中共的敵對勢力，軍方如臨大敵，大有徹底剿滅這 1 億基督徒的念頭。如此的對待普世宗教基督教，的確是義和團、紅衛兵們才

有的愚昧觀念。軍方大肆渲染、肆意指謫，只能暴露出他們害人害己的冷戰思維和準備孤立於整個人類文明的最後瘋狂。

無獨有偶，最近在網絡流行一篇作者為武漢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黃超的文章《美對華宗教滲透新模式及意識形態演變》，該文認為：“在中國國內形成奠基於‘新宗教治外法權’基礎上的‘國中之國’是美國對華宗教滲透的最新目標，推動沒有任何國際關係準則和倫理底線的‘新人權運動’將是實現該目標的突出標誌”。

該文把教會的普通查經班都當做敵對勢力：“‘將福音傳給中國未來的領導者’，‘為基督贏得這世代的華人知識分子’成為美國對華宣教機構的首要目標。據 2000 年一份調查統計，“至 2000 年 8 月止，美國至少有 216 個以上以中國學人為主體的團契和教會；若加上西人教會和信徒所組成的英語查經班，總數肯定在 300 個以上”。

該文對對華援助協會也極盡汗蔑之能事，該文寫到：“2002 年，‘對華援助協會’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成立。。。。。。首先，策劃、推動並直接參與中國國內的‘宗教事件’，並以這些所謂的‘宗教事件’為素材推動美國和其他國際機構對中國施壓。我們可以在國內絕大多數與宗教相關的群體事件中看到該機構活躍的身影。。。。。。2007 年，在“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的直接操控下，‘中國家庭教會聯合會’被拼湊出來。該組織組建各省分會，指定分會會長，開展全國性的事工拓展。在各種勢力操縱下，該組織很快淪為以“事工拓展為招牌的斂財工具”。2008 年 11 月，該非法組織被中國民政部依法取締。。。。。。‘對華援助協會’一方面覬覦中國家庭教會的領導權，嘗試建立“整合城鄉”的全國性宗教領導機構，完成在其掌控下的‘教會國度化’；另一方面，企圖以家庭教會為依托，超越宗教領域，“巧妙編輯中國社會的各種自由元素”，形成包括‘互聯網、政法系、家庭教會、媒體等力量’的維權政治組織體系”。

醜化、敵對化為中國信仰自由尤其是家庭教會信仰權利而服務和援助的對華援助協會，是中共近年來的主要戰略。中共在國內教會界大肆汗蔑本協會是搞政治、利用基督教在海外通過所控制的華人教會對本協會進行抵制和攻擊。他們的目的，就是讓中國人永遠陷入在信仰不自由的狀況中，而對本協會等力圖改變現狀的機構，必然恨之入骨、欲斬草除根而後快。他們無視中國人應該享有信仰自由的普世權利，他們無視基督教是不分種族、民族、國家的普世宗教，也無視宗教是人如呼吸空氣一樣自然而然的活動，他們的思路跟《較量無聲》樹立一億基督徒為敵人的想法如出一轍。

神的工作任何人無法攔阻，福音廣傳中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些狂妄無知、試圖攔阻神的工作、抵擋現代普世文明的敵基督們，等待他們的必是上帝和世人的唾棄。一切正如《聖經》以賽亞書 14:12-15：“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墜落陰間，到坑中極深之處。”

九、當下紅衛兵道歉信的信仰意義

馬太福音 3:2：“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承認自己不是神、是有原罪的人，並為自己的罪錯向神、向人進行認罪悔改和道歉，這是基督教文化的產物，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國家的人們經常將“Excuse me”“I am sorry”掛在嘴邊的原因。而在無神論、唯我主義盛行的中國，人們心中沒有神、或者自以為神，因此很少道歉和認罪，當毛澤東看到尼克松為“水門事件”向全美國民眾道歉時大為驚詫，在毛看來，國家元首就是神，那有向人民道歉的道理。

最近發生的一系列紅衛兵道歉事件，有力地改變著中國人的傳統，儘管無法得知他們是不是基督徒，但這種悔改認罪的精神，的確是基督教所鼓勵的：

2013年6月，當年的紅衛兵、退休前任濟南市文化局文物處處長的劉伯勤，在《炎黃春秋》上刊登廣告，向在“文革”中受到他批鬥、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和鄰裏道歉。61歲的劉伯勤說，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不對的事，就應該道歉。劉伯勤成為中國在媒體上公開反思文革，為在文革期間的惡行道歉的第一人。

8月，59歲的北京人張紅兵公開為自己1970年在老家安徽因告發母親，而導致母親被以現行反革命遭當局槍殺而公開懺悔，希望以他自己為反面教材，防止文革悲劇重演。之後，河北宋繼超、湖南溫慶福、山東盧嘉善、福建雷英郎等都在報紙上向受害者道歉。

最為媒體和民眾關注的是，10月7日，中共前創始人之一的陳毅之子陳小魯，會同當年的8名老師和同學，在其母校北京八中組織了一場文革道歉會。陳小魯為此次道歉會準備了一份文稿。文稿中寫到：

“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鬥，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今天我想借網絡向他們表達我真誠的道歉，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正在安排一次與老校領導和老師的聚會，我希望能代表曾經傷害過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的老三屆校友向他們鄭重道歉。。。。。。目前社會上出

現了一股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認為如何解讀文革是個人的自由，但是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否則談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強和中國夢！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從陳小魯的道歉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道歉是真誠的，深刻的，尤其是在當下中國有可能復辟到“文化大革命”的大趨勢下，以自己的認罪悔改來抵制整個民族向文化大革命倒退，意義非常重大。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不反思歷史就意味著重蹈覆轍。但“文革”過後這麼多年，當年的紅衛兵們，出來真誠道歉的鮮有幾人。原因在於我們這個民族缺乏基督教價值觀的熏陶，我們一向認為自己是完人、義人，甚至就是神。

中國傳統文化所謂的“人之初、性本善”，“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之趨善，如水之就下也”，傳統文化中對人向善、成為至善是非常自信的，這種自信，發展到極致，就是個人成聖後對神就可取而代之了。正如毛澤東在《倫理學批註》中寫到：“己即神也，除己之外，尚有神乎”。

而與之相反的基督教卻認為人人有罪，且要終身向神悔改認罪。聖經上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耶利米書 17：9）。“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詩篇 51：5）。羅馬書 3：10-12：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就連聖徒保羅，卻一直自稱是“罪人中的罪魁”（提摩太前書 1：15）。承認自己是罪人並不斷道歉、懺悔，才有一個不斷更新的自我，也進而帶來一個不斷更新的社會。

當下中國，當權者和很多“毛左”，不僅不對十年浩劫進行反思、對自己犯下的罪過向歷史和人民進行懺悔道歉，反而重拾毛澤東在文革中的種種劣行，反文明、反西方、反法治，如此下去，必將中華民族引入更加苦難的深淵之中。而陳小魯等當年紅衛兵，面對這“一股為文革翻案的思潮”“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的確，這個民族必須革故鼎新，必須進行靈魂的革命，必須接受充滿原罪、懺悔意識的基督教價值觀，才能不重蹈覆轍，才能有光明的未來。這一切正如聖經詩篇 51：17：“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十、必須保障被囚禁人員的信仰權利

2014年2月22日，基督徒作家咎愛宗寫信給中國司法部，申請公開信息：“請告知司法部及監獄管理局關於服刑人員當享有宗教信仰權利並保障其宗教信仰崇拜生活的規定及規範性文件；請告知在監獄服刑的犯人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權所享有的具體規定”。3月9日，咎愛宗收到中國司法部政府信息公開告知書（2014年第14號）：“關於保障監獄服刑人員宗教信仰權利等方面，我部及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等法律規定，沒有出臺限制或者剝奪服刑人員（包括外國籍服刑人員）未被依法剝奪或者限制權利的規範性文件”。

根據司法部的這個回復，可知司法部並沒有出臺剝奪服刑人員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規範性文件。既然法律沒有禁止，那麼實際上服刑人員應該享有他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因為監獄等國家囚禁場所，只是剝奪服刑人員的人身自由權利和政治權利等法律權利，它沒有權力去剝奪個人宗教信仰權利。

另外根據2014年2月24日中國新華網報道，2月23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第二次廉政工作會議上強調，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兩句名言出自歐洲建立民主憲政國家時期，意即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權利，公民都可自由擁有並行使，無論對錯都不違法；而國家機關的行動必須經過法律的授權，否則就不能去做，做了就是違法，做了就要被依法追究責任。李克強總理起碼在口頭上承認了西方法治國家的這條普世原則。本著這個普世原則，既然中國法律沒有明令剝奪和禁止服刑人員的宗教信仰權利，中國法律也從未明令司法機關有權剝奪服刑人員的宗教信仰權利，那麼，服刑人員擁有宗教信仰權利應該是鐵板釘釘的事實。

根據這個結論，給服刑人員送《聖經》甚至傳福音是理所應當的，而基督徒服刑人員也應該在監獄裏面有個人的宗教信仰行為，如閱讀聖經、飯前禱告、周日個人敬拜等等。中國司法部門不僅不應該禁止，而且應該按照西方法治國家慣例，保障服刑人員在監獄等囚禁場所實施個人信仰權利。

在如今的西方法治國家，監獄作為公共場所，裏面一定會有敬拜場所，《聖經》等經典也是常備。有些有條件的監獄，還有監獄牧師。這跟軍隊有軍隊牧師、醫院裏有醫院牧師一個道理。沒有特定監獄牧師的，當地教會牧師只要有牧師資格證明，就可以在拘留所、監獄等場合與願意見牧師的囚犯面談、祈禱，為他們舉辦宗教儀式。筆者在美國中部一教會作實習牧師時，就曾去過當地的拘留中心，與在押的幾個華人囚犯談心、禱告。拘留中心警察只要看到你的實習牧師證明，就讓你進去。當時我深感到美國司法部門對囚犯宗教信仰的尊重。後來本人牧會後，見到一廣東弟兄，他說他在美國移民監坐過3年牢房，但3年裏都有一些牧師每周來看他，讓他明白了聖經和福音。

眾所周知，美國福音派領袖、傳奇人物寇爾森（Charles Colson, 1931-2012）就是美國監獄事工著名領導者。1976年開始，寇爾森和他的團隊從美國的“監獄團契”到“國際監獄團契”，進入150個國家和地區的監獄，因著耶穌基督的恩典，幫助受刑人重新找到人生。在這個事工的框架下，他們與眾教會合作，開展了改革監獄的具體計劃，真正改變絕望中人的生命。他們的工作包括：“司法團契”，用“恢復式司法”補足“報應式司法”的不足；“天使樹”：給犯人的孩子買聖誕禮物；“內在改變自由行動”：這是個自發式的行動計劃，由基督徒來管理、教育受刑人，幫助受刑人尊重上帝的道德法則和他人的權益。在他們的幫助下，犯人出獄後的再犯率大大降低，有些只有一般監獄的十分之一。

這些堅守普世價值國家在監獄裏保障信仰權利、大興福音事工的圖景的確讓國人羨慕。與英美國家牧師自由出入監獄場所、囚犯自由閱讀聖經、自由在主日進行敬拜相反，目前的中國，雖然在法律和國家領導人的口頭上，囚犯有履行自己宗教信仰權利，但在實際上，這個權利被剝奪：《聖經》基本上不讓送進監獄、看守所等囚禁場所、沒有一個監獄有獄牧，也沒有一個監獄會允許牧師去看望囚犯，監獄裏面更沒有為信徒所設置的信仰活動場所。許多坐過監獄的維權人士、基督徒，都說《聖經》就是不讓送進來。這一切，與文首中國司法部政府信息公開告知書（2014年第14號）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也與李克強所說的“法無禁止即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精神是南轅北轍的。

權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在此，我們要鼓勵各地基督徒給在押犯人送聖經、鼓勵各地牧師到監獄裏傳福音，遇到攔阻，可以拿本文提到的中國司法部政府信息公開告知書（2014年第14號）文件作為依據。再攔阻，可以邀請基督徒律師們就此打官司維權。我們也希望中國弟兄姐妹們，為中國政府切實履行法律規定、有法必依而禱告！為監獄事工的大門早日開放而禱告！求主也在中國大陸興起獄牧，讓

受捆綁的人心靈得自由！受壓制的人心靈得安慰！願上帝拯救更多失喪的靈魂！
阿們！

十一、請收刀入鞘

——譴責中共暴力對待維權公民

國家必須要具有警察、軍隊等國家機器，這是常識，但此暴力機器是用來懲罰邪惡和對付外敵入侵的，絕不能運用國家暴力對待維護人權的公民和律師。這正如聖經羅馬書 13:4：“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申冤的，刑罰那作惡的”。國家“不是空空地佩劍”；但國家是用來“刑罰那作惡的”，而非鎮壓維護公義者的。在最近發生的黑龍江建三江拘禁律師事件和廣東茂名政府鎮壓抗議“PX”市民中，中國政府濫用暴力拘禁、殘害維權公民和律師，暴行令人發指，舉世都應來譴責。

2014年3月21日，王成、江天勇、唐吉田、張俊傑四位律師為解救建三江黑監獄（所謂的法制教育中心）的受害者，前往該黑監獄並要求依法放人、造成黑監獄責任方濫用職權抓捕四律師並對其施以酷刑。嗣後，諸多優秀律師、公民不辭勞苦不懼艱險依法會見、救助、聲援四律師，有親赴現場者也有後方援助者。但親赴現場維權律師和公民，幾乎都遭到中共當局的野蠻毆打、半夜非法綁架，有近20名律師和公民再被拘留。被拘留的大多數人幾乎都被戴黑頭套、遭到毆打。女律師王勝生半夜從床上被帶黑頭套、非法綁架，律師張俊傑在拘留所中被多次毆打，被打斷三根肋骨。有消息稱，唐吉田胸口受傷，王成可能傷得最重，生命垂危。同時，中共如臨大敵，在四公裏外各道口設哨卡路障，對經往建三江的司機，及各大車站行人盤查詰問，氣氛恐怖，目的是阻截、攔截更多的維權人士介入。

去年中國政府廢除了勞動教養這一違背普世人權原則的國家暴力手段，意味著起碼在表面上政府承認未經審判剝奪人身自由是非法的。另根據中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律師和被害人家屬有權會見被拘留的人員。所以前往建三江的所有律師和公民，只不過是敦促政府機關履行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而已。取消黑監獄、釋放被非法羈押的民眾、會見被拘留的律師和公民，都是中國法律賦予公民的正當權利。但是，當中國公民維護這些正當權利時，得到的卻是肆無忌憚的國家暴力的侵害。“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箴言 14: 30）中國共產黨政權靠暴力起

家（所謂槍桿子裏出政權），又靠暴力維護其統治，民眾稍有維護權利、伸張公義之舉，即遭暴力鎮壓。中共政權濫用公器、荼毒生靈，殘酷暴虐、人神共憤。

幾乎在建三江事件同時，中共政權的暴力機器在廣東茂名又大開殺戒、濫殺無辜。

3 月 30 日至 31 日，廣東茂名市成百上千的市民上街遊行，抗議政府上馬 PX 化工項目，持“PX 項目滾出茂名”、“抵制 PX 項目保市民健康”，“請求 PX 遠離市區”等各種標語和橫額，高呼口號遊行至茂名市政府，要求當局停建 PX 項目。

這顯然是茂名公民在依法維護自己權利、運用憲法賦予的集會、遊行權利在表達意見。政府在民眾遊行示威時，除了維護秩序外，理應不得有其他壓制措施。但是中共茂名政府卻濫施暴力，居然動用逾千名手持盾牌的武警、特警，不斷施放催淚彈、煙霧彈和高壓水炮鎮壓、暴力清場。據信 10 多人被警察開槍打死、逾百人受傷。據貼在社交媒體上的一些照片，數人倒在血泊裏，他們顯然失去了知覺。還有一些照片顯示身穿防暴服的警察在踢手無寸鐵的抗議者，並用警棍敲打抗議者的頭部。4 月 1 日，大約 300 人在廣州東風中路中山紀念堂附近進行了反 PX 遊行。期間示威者打出了更多維權抗爭的訴求橫幅和標語，反對茂名政府動用武力鎮壓平民百姓。廣州的抗議者也遭到政府的暴力對待，多名抗議者被政府抓捕。

上帝賦予政府的權力是保護人民，而不是濫殺無辜，“流無辜人的血”。我們譴責茂名市政府、廣州市政府鎮壓人民、踐踏民眾法律權利的暴行，他們所做的，是一個文明社會所不容的暴行，他們必將留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受人唾罵。正如人權觀察組織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說：“李克強總理誓言要發動一場反污染戰爭，可是當公民表達他們對環境的擔憂時，他們倒像成了禍害的一方。”中國政府靠暴力起家，在 1989 年六四後，更加強調以暴力對待人民，他們早已喪失一個合法政府所應具有的條件，早就應該被民眾所更疊。

同是海峽兩岸的華人，臺灣政府最近在對待占領立法院、攻進行政院太陽花學運上，基本上是維護秩序、對遊行示威群眾非常克制。雖在學生攻進行政院的活動中打傷多名學生，引起各界譴責，但在整體上與中國政府的表現有天壤之別。人們常說：“臺灣是民主多和少的問題、而大陸是民主有和無的問題”，這句話也應驗在最近兩岸政府對待遊行示威、維權民眾上，作為民選政府，一定要保護民眾民主權利，決不能用暴力對待民眾，而作為專制政府，一見到民眾的維權活動，即刻動用的就是子彈、裝甲車等暴力。專制政府是人類的禍患，必將隨著歷史的進步被民眾親手埋葬。

馬太福音 26:52: “耶穌對他說: ‘收刀入鞘吧! 凡動刀的, 必死在刀下’ ”。

根據聖經, 中共濫施暴力的唯一結局, 就是它自己也最終會被血腥的暴力所淹沒, 如果中共政權不懸崖勒馬, 這個結局也許很快就會來臨。我們只有祈求上帝能祝福中國、保守中國, 免除暴力的獨裁和血腥, 民主、自由、公義的“和平之君”能早日降臨中國。

十二、鎮壓網絡言論自由 再演重慶唱紅打黑

最近有兩件事情是世人最為關注的，一是審判薄熙來，另一件是北京當局所謂的整頓網絡、抓捕“秦火火”、薛蠻子等多名網絡推手及有影響力人士。這兩件事看似互相無關，其實有內在的聯系，那就是薄熙來最應該被審判的踐踏法治的“唱紅打黑”不僅沒有被審判，而且被當局沿用，如今正用在了禁錮網絡言論自由權利上。

濟南法院一審審判薄熙來已經結束，官方自詡此審判公開、公正並實現了司法正義，微博直播、被告人大膽翻供、多位重量級證人出庭等等現象，似乎顯示庭審實現了程序正義、中國的法制有了進步。但是拋開這些表面現象，當局故意隱藏、不予追究的卻是薄熙來在重慶通過“唱紅打黑”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對“唱紅打黑”路線不檢討，對重慶冤假錯案的罪魁禍首不實施審判，就沒有法律的正義可言。

眾所周知，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是文革式的法西斯恐怖，通過“唱紅”對民眾洗腦，並使毛魔頭僵屍復活，通過“打黑”對民營企業家的財產進行搶奪，並砸爛了整個公檢法系統。重慶的“打黑”與希特勒清洗猶太人有一比，王立軍扮演希姆萊（黨衛軍頭子）的角色。重慶“打黑”認定了 500 多個“黑社會組織”，其中大半是合法民營企業家，從中強行沒收了 1,000 多億的資產。刑訊逼供、羅織罪名、打擊報復司空見慣，就是政法系統不少高官也被逼自殺。據新加坡《聯合晚報》報導，打黑拘捕了五萬多人，英國《每日電訊報》引述重慶師大一位文學教授稱，當時重慶知識分子都感到自己被淹沒在一片紅海洋裏，不能說話，被卡住喉嚨。

薄熙來是重慶“唱紅打黑”的罪魁禍首，他的嚴重罪行，應該在國際法庭以“反人類罪”來審判。中共當局沒有膽量審判薄的大罪，卻以所謂的“貪污、受賄、濫用職權”來審判，徒增被告人的嘲笑。當局為什麼如此“抓小放大”呢？原因正如審判“四人幫”時不敢審判“文革”罪魁毛魔頭一樣，毛澤東是中共的生命，而“唱紅打黑”是中共一直以來奉為圭臬的鬥爭路線，過去如此、將來也如此。

君不見濟南在審判薄熙來，北京卻在上演一場網絡時代的“唱紅打黑”，各種做法與薄如出一轍：8月20日，北京警方宣布打掉一個在網上蓄意傳播制造謠言的

網絡推手公司，秦誌暉（網名“秦火火”）、楊秀宇（網名“立二拆四”）等被刑拘。秦火火等人參與“7·23”動車事件、郭美美事件、紅十字會事件、司馬南孔慶東事件、南周新年獻詞事件、羅援事件、戴旭事件等一連串網絡輿論事件，是重要的推手，他們也無非是在履行自己的網絡言論自由，可能有部分言論與事實有出入，但這也應該是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卻被官方以“網絡黑社會”為名打壓。

不僅北京，上海、蘇州等地也開始密集刑事拘留“造謠者”。包括曾參與爆料“表哥”楊達才的網絡爆料人周祿寶；曾實名舉報中國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的《新快報》記者劉虎；以及涉嫌編造“情婦舉報公安分局長”、“中石化非洲牛郎門”謠言的傅學勝。而有1千多萬粉絲、經常諷刺當局、微博大V薛蠻子23日卻因嫖娼被抓。《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稱，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過抓嫖娼“整”薛蠻子。通過性醜聞、偷漏稅等“整”政治對手，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潛規則”。當然這是當局的不打自招，它承認他們為了壓制民眾的自由，可以不講法律、可以羅織罪名、有罪推定，只要目的正確，無所謂手段的下作與卑劣了。無疑，他們的路線，與重慶的“唱紅打黑”完全相同、毫無二致。

正如著名維權人士胡佳在其推特所說：“中共這次是以中宣部和政法委兩家，從言論自由到人身自由兩方面集中鎮壓網絡異見者。公安部對公民組織化、街頭化行動的整肅初見效果，就進一步壓縮輿論空間。中共建政64周年要來了，意識形態和政法系統要為黨國營造和諧穩定的網絡和現實環境”。抓捕許誌永、郭飛雄後，當局開始整頓讓他們坐臥不安的網絡言論，他們的目的是使網絡淨化，一片歌功頌德，毫無揭露批判之聲。為此目的，他們正在主導一場沒有薄熙來的薄式“唱紅打黑”。真是“只把北京當重慶、網絡文革刮妖風”。似乎還可以說：法庭內，薄熙來輸了；法庭外，薄熙來勝了。

新浪網報道整頓網絡是新任公安部副部長傅政華的“一把火”，這位忠實履行網絡“打黑”的警察是否想到自己會同王立軍一樣最後落個身敗名裂、坐穿牢底的下場呢？而那些他的上級們，如今作威作福，但轉眼之間也會像薄熙來一樣如銀鐺入獄、臭名遠揚，在全世界的關注下接受法庭審判呢？應該說，這是毫無疑問的。那些想繼續以“唱紅打黑”興風作浪的文革余孽們，等待他們的必然是“四人幫”、薄熙來、王立軍的下場！

十三、郭飛雄陶醉於自己的勇敢嗎？

在著名維權人士郭飛雄、許誌永被捕之際，中共喉舌、陰陽怪氣的《環球時報》在 8 月 19 日發布社評《表達異見不能越過法律邊界》，其中指出：“郭、許等人在互聯網上的影響一般，不及當前活躍的一些大 V 們，但在‘維權’的特定圈子裏較為知名。與當局對抗似乎已成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也像是陶醉於自己的‘勇敢’裏，不太可能妥協”。“他們做事不是以合法不合法、對社會治理實際有益還是有害為出發點，而是只認自己的價值判斷，把與當局尖銳對抗看成道德上的高尚行為”。

在這篇時評看來，郭飛雄們的舉動是為了對抗而對抗、為了表現自己的道德勇氣和高風亮節的作秀，不僅無關社會公義，而且完全是一己私利行為。按照該時評的邏輯，對這些私人作秀行為，不應該讚賞和同情、更不應該支持和仿效，而應該唾棄並施以法律的嚴懲。無疑，這是在血口噴人、栽贓陷害，迫害郭飛雄還要詆毀他名譽。顯然，這是在為當局的野蠻打壓做辯解、做開脫。

郭飛雄的確很勇敢，但這種勇敢是為了社會公義、民族大義。他的一切行動和理論，都集中在一個焦點上，那就是如何推動中國的民主憲政進程。為了中國早日結束專制暴政、建立民主憲政，為了中國公民早日得享信仰、言論、政治自由和普世人權，郭飛雄們才不惜赴湯蹈火、冒險犯難，為此身體被囚禁毆打、家庭支離破碎也在所不惜。這樣一種犧牲精神、舍己為公義的道義，是人類人性中最為閃光的部分，值得所有人敬佩、仰慕和效法。

正如郭飛雄在《肩扛使命、為民主四次坐牢的趙常青》一文中寫到的：“它展示了一種擔當和受難的悲劇美學——我們的生命之樹，要深深地紮在這塊土地上，要在這塊土地上，開出我們的權利之花，結出憲政民主之果。煉獄的陶冶，不過是光和鹽的生命歷程，令受難者的擔當凝結為巨大的道德價值，煥發出壯烈的英雄美學之光”。這不僅是對維權人士趙常青的讚美，而且也正是郭飛雄自己的心靈告白。

郭飛雄是坐而論道、起而行道的理論家兼活動家，他用他的行動踐行了他的心靈告白，他不為自己，卻為中國公民權利、民族大義做出了巨大犧牲。根據他妻子張青寫給習近平的公開信，我們看到：自 2003 年投入維權運動以來，郭飛雄四次被非法拘捕，被判刑坐牢 5 年之久。期間的非法毆打和酷刑，更是家常便飯。他曾在廣州市第一看守所，被疲勞審訊 13 個日夜，不許他睡覺；被戴上腳鐐 100 多天；被手腳穿插固定銬在木板床上 42 天，全身不能彎曲；被警察拔頭發、搔癢侮辱達 20 多天；在沈陽被辦案警察暴打，被兇殘地反吊雙手懸空，靠雙手肩關節支撐全身重量；還被高壓電警棍電擊生殖器。

不僅如此，郭飛雄的家人也屢遭迫害，丟失工作和學業，不得不逃亡海外。這一切正如為偉大的殉道者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4 章中所說的：“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見聖經 哥林多後書 4:8-9 節）。在當局持續的嚴密監控和暴力威脅之下，在家人遠離自己的痛苦之下，郭飛雄依然以國內維權事業為重，5 年監禁後繼續從事抗爭活動，他的勇敢無畏、抗爭不息，引起當局的巨大恐懼和仇恨，最後對他施以“斬首行動”；他的不屈不撓、義無反顧，是所有關心中國進步人士的道義楷模，像他一樣勇敢，應該是民主鬥士們的個人訴求。

正如郭飛雄先生在《對南方報系大門口聲援南方周末的政治集會的簡要思考》一文中指出的：“比較而言，中國真正的文化中心，北京的知識界，似乎過於知識化，太知識化了。新京報抗爭，無人聲援，就是最好的說明。中國的未來，還是要靠草根，靠街頭，靠獨立的市民社會和中產社會”。中國結束專制、實現憲政民主早已是知識界、社會各界的共識，這從幾億網民的網絡發言中就可看出，但真正將這種共識付諸於行動、踐行於生活並付出代價者並不很多，大多數中國人還停留在朱學勤先生所說的“書齋裏的革命”階段。在這個意義上，郭飛雄先生的勇敢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時代意義。

正如聖經《雅各書 2:17-18》：“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必有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我便借著我的行為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儘管這段經文是在救恩論範疇談論的，但我們也可借用在中國的民主事業中——僅僅有民主憲政的知識和信心而沒有行動和實踐，其實是僵死的、沒有前途的，我們必須要用我們的行動，來證明對中國民主憲政的信心和知識。我們也可以套用青年馬克思關於實踐論的名言：知識界只是在解釋、分析民主憲政，而問題是如何改變中國、如何推進中國的民主憲政、如何結束專制、締造嶄新的憲政中國。

行動，是需要勇氣的；行動，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郭飛雄是勇敢的行動者，是為國家大義而非一己私利勇往直前的勇者和智者，值得每一個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人去學習，去效法。最後，謹以郭飛雄在《對南方報系大門口聲援南方周末的政治集會的簡要思考》中的一段話最為結尾：

“前行者多是鋪路者，犧牲者，南方的維權推動者和街頭維權力量，早已做好為全國民間沖擊邊界、支撐格局空間的準備。我們願做自由民主的炮灰。如果我們的這次民主實驗，能夠起到某些喚醒全國公民和網絡社會坐言起行的作用，那麼，我們的努力和擔當就沒有白費”。

十四、緊急呼籲溫州基督徒探訪錢雲會等受害者

維權村長錢雲會致死慘案發生的溫州是全國基督徒比例最高地區之一，據信有占人口 10%的基督徒，而事發的樂清市更可能是溫州基督徒比例最高地區，很多自然村全村都是基督徒。樂清教堂林立、家庭教會非常多，宗教政策相對寬松，讓人恍若進入異國的感覺。基督徒應該關心公義，聖經阿摩司書 5：24：“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因此我們呼籲溫州基督徒面對不義不要袖手旁觀、而要踐履上帝的公義在身邊，我們呼籲溫州基督徒出於上帝的愛和公義前往事發村去調查、圍觀、禱告，為受難者禱告、安慰。

根據維權網信息員孫雨報道：浙江樂清蒲岐鎮寨橋村維權村長錢雲會被工程車碾死，其頭部被碾壓在車輪下慘狀的圖片在網絡上瘋狂，目擊者及村民認為村長錢雲會是被預謀殺害，隨著目擊證人被抓，錢雲會慘死背後的征地補償款的去向不明，錢雲會致死案引發了媒體及網友的廣泛關注。

但溫州公安局副局長沈強在 29 日的發布會上說：結論是交通肇事，排除謀殺。交通肇事，排除謀殺！官方的結論一出，立即引起媒體和網友們的憤怒與質疑。在事發現場的記者無奈地表示，記者只是代表公眾提出疑點，並沒有下結論的權利。在死亡結論受到廣泛質疑、目擊證人被抓走的情況下，來自於官方的調查實難令人相信會有真相。民間開始組織獨立調查團前往溫州樂清調查真相。

目前，已經有三組公民獨立調查團陸續前往樂清，第一組由於建嶸領銜，包括笑蜀和趙曉（著名基督徒經濟學家）等，第二組由王小山帶領眾多網友，第三組是法學博士項宏峰律師和屠夫等人。調查團成員表示，希望溫州方面不要懷有敵意，更不要做蠢事。獨立調查基於公正的立場，希望能還原給死者親屬及社會一個站得住腳的真相。

可喜的是，已經有北京基督徒參與此次事件的公民獨立調查團工作，當地也有少數弟兄姐妹前去探訪受難者。正如使徒行傳 5：29：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耶穌的門徒們，無論是彼得、約翰、保羅還是司提反等諸信徒，沒有一個服從猶太傳統勢力和羅馬政府的禁規，積極為神作見證。神

讓溫州、樂清擁有如此眾多的基督徒，其美意也許就在於讓基督徒能成為鹽成為光，不畏強權、扶持公義。

溫州基督徒，請你積極行動起來，用上帝應許的方式去見證上帝的慈愛、公義和聖潔。哈利路亞！阿門！

十五、烏克蘭教會在國家劇變中的角色

近年來，烏克蘭基督教會（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和東正教）因積極參與社會公義行動而享譽全球。在 2004 年冬天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中，眾多教會及信徒走向街頭湧入獨立廣場，支持代表自由和正義的民選總統尤申科（Yushenko），並終於獲勝。在這些教會中，神國大使教會 The Embassy of God Church 及其牧師桑德·阿得拉加 Sunday Adelaja 因積極參與社會正義和國家轉化行動而聞名世界。桑德牧師並著書《國家轉化的先鋒 Spearheading A National Transformation》，詳細論述教會及信徒應該承擔的國家公義使命，非常令人振奮。

書中指出：“自 2001 年起，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會友走上基輔的克裏沙提克大道遊行。遊行結束前，眾人會一起為烏克蘭的復興禱告。四年後的 2004 年 5 月，烏克蘭全國 5 萬多名再也無法忍受不公不義之統治的信徒，聚集在同一個地方為國家禱告，他們的心聲達到天上。

2004 年 12 月 6 日到 17 日，神國大使教會舉行了一次牧者禁食退修會，求神在該國總統大選中成就他的旨意。神的百姓宣告該國一切屬靈上的問題都要結束，以及神慈愛和公義的得勝。

在市府大樓前的示威活動，演變成了一個屬靈的爭戰，以致屬靈的活動有機會在該國的社會中正式展開。神國大使教會會友在屬靈上的活動，以及他們積極的公民立場，為該國的橙色革命預備了一條道路。神親自與信徒們一同站在基輔的街道上”。（見《國家轉化的先鋒》一書導言 以琳書房 2008 年 9 月出版）

因為有著這樣光輝的傳統，所以在這次 2013 年底到 2014 年初爆發的、最終趕走親俄的獨裁者的獨立廣場和平抗議運動中，烏克蘭的教會扮演了非常活躍的角色。那些在網絡等媒體上傳播的一張張獨立廣場上神職人員的照片，最能說明在這次趕走親俄獨裁者亞努科維奇 Yanukovich 的和平抗議中，基督教會及信徒作用舉足輕重。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社論稱，烏克蘭反政府示威有著崇高的價值觀背景，抗議者們追求的是人類至高的普世價值。而且，在抗議活動中，烏克蘭神職人親臨衝突現場，調和政府與反對派的矛盾衝突、安撫抗議人群，並為抗議中受傷的人們提供醫療援助，可謂功不可沒。成千上萬的烏克蘭人民團結在誠實、正直、人人平等的普世價值周圍，和平地占據了獨立廣場。。。。。。這些普世價值幫助抗議者維持紀律與克制，哪怕是狙擊手在樓頂上朝他們射擊。最終，這些價值所蘊含的道德力量也讓警方不再聽從亞努科維奇的命令，權力並不源自槍炮——亞努科維奇已然知之恨晚。

網絡媒體《輔仁》發布的《烏克蘭的東西分裂與教會合一》一文中指出：“在眾多烏克蘭反政府示威浪潮的新聞照片中，不時能夠見到穿著黑色長衣，戴著金色聖帶的正教會(orthodox)神父，在示威者與防暴警察中肅然站立。不只是正教會；烏克蘭的天主教，甚至是部分新教(基督教)教會的神職人員，也經常出現在其中。欠缺宗教視野的華人傳媒卻竟然完全忽略基督宗教在此示威浪潮上扮演的角色”。

該文還指出：“2月19日，一名來自德國的烏克蘭信義會牧師韓望德(Andreas Hamburg)因參與示威而被支持政府人士毆打，引起國際信義宗聯會的關注。。。。。。即使烏克蘭在歷史上教會四分五裂，面對暴力鎮壓，教會卻團結起來。在獨立廣場上，教會建立起臨時的小聖堂，讓示威者禱告。UOC-KP、UOC-MP、UAOC及UGCC四大教會的神父經常在廣場上一同禱告；1月25日，她們更發表共同聲明，批評政府鎮壓示威，更引用聖雅各書2:13，指‘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的’。即使她們未有表明親歐還是親俄，她們的聲明顯然是批評政府：就是示威者的主張有何不對，也不應以暴力鎮壓。事實上，由政府出手鎮壓的開始，本身並非完全受制於政府的教會，為了顧及社會與人民的反應，選擇批評政府是非常合理的決定。這絕對有利教會在這世俗化的國度爭取民心”。

“他們的神職人員不斷穿梭在警察與示威者之間，以身體嘗試阻止雙方暴力衝突，並協助帶走傷者。安慰示威者，為示威者辦告解、施聖餐，也是他們在廣場日常的工作。近日他們還多了一職責：就是為臨終的示威者傅聖油，以及為死去的示威者主持喪禮”。

在林純如編譯的《烏克蘭抗議不止、屬靈之風趁勢刮起》新聞報道中指出：“修士在武裝警察前帶著十字架行走，或有幾名修士站在警察和抗議民眾之間，教會甚至搭起禱告棚，回覆民眾對於信仰的疑問，為他們代禱。在第三大城哈爾科夫自由廣場，可見禱告棚一個接一個長達近半英里。

教會機構也在現場發放福音單張、烹煮熱可可發放熱飲。某些民眾甚至主動索取烏克蘭語的新約聖經，俄羅斯事工團為此趕緊募款印刷 10 萬份約翰福音，在人群中發放。當地最具規模的福音派別烏克蘭浸信會聯盟，也發動成員為和平的解決方案禱告。

儘管面臨威脅，宣教領袖認為教會在烏克蘭需要度因此更高，能在動亂中提供穩定的力量，不僅願意在艱難的環境繼續事工，也希望增加更多同工團體，為遊行民眾禱告和其他實質的幫助”。

以上的報道和評論中可以看到，烏克蘭眾教會積極參與了這次的民主運動，並擔當了應有的角色，為主打了美好的勝仗，值得普世教會、尤其是中國教會的弟兄姐妹仿效、學習。

教會應該在促進國家邁向進步的運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是閉關自守、不問世事？還是依附權勢、助紂為虐呢？烏克蘭神國大使教會 The Embassy of God Church 牧師桑德·阿得拉加 Sunday Adelaja 在他的書《國家轉化的先鋒 Spearheading A National Transformation》中給我們明確的答案：

“作為神所揀選的人，我們必須在世界中擁有影響力，去拯救那些仍然按世界觀念和原則而行的人。我們不能僅僅當一個宗教的事奉者，而與世人的需要隔絕。社會的改造和屬靈的復興應當成為我們的目標。我們不能把自己關在教堂內，以致與周遭世界的真實情況隔絕了”（見《國家轉化的先鋒》 17 頁）

“為了被神所用，我們必須採取一個積極的公民立場——就是能建立神公義法則的立場。神期待我們站在地與天之間的破口上，因為神的旨意要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神期待你成為一位改革者，在你的國家中建立神的真理和公義”（見《國家轉化的先鋒》 21 頁）

“神不希望教會處於被動的狀態，他期待教會能夠成為社會的改革和轉化的發動者。神容許問題臨到，以至於教會能夠發現和宣告其立場。一個國家的救贖取決於教會的態度。如果教會不開始對抗腐敗，腐敗就會在國家中持續擴大；如果教會不反對色情和煙酒的廣告，那麼社會將日益向下沈淪。神要教會承擔權柄，為國家帶來秩序、公義和潔淨。教會絕不能同意神的秩序、原則和條例受到破壞；教會必須大聲地宣告她的立場”（見《國家轉化的先鋒》 34 頁）

“除非教會開始行動，否則國家將不會有任何的變化。未來世代的命運完全依靠我們今日的行動。除非我們站在社會的缺口上，否則將沒有人能夠拯救我們的國家。這是神吩咐我們的任務，我相信許多基督徒必將回應這個挑戰”（見《國家轉

化的先鋒》43 頁)

從桑德 Sunday 牧師先知般的話語中，我們就可以看到烏克蘭教會是一個多麼具有社會關懷特色的教會；這次烏克蘭民眾在抗議運動中的獲勝，完完全全與烏克蘭教會和基督徒的社會公義關懷、剛強壯膽的勇氣有關。但願中國家庭教會的弟兄姐妹能從烏克蘭這些教會及信徒身上學到上帝所賜的眼光、勇氣和能力，效法他們在國家轉化、民族進步的劇變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以讓整個中國“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引自阿摩司書 5：24）。

但願烏克蘭的今天就是我們中國的明天。“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你”（以賽亞書 60:1）弟兄姐妹們，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吧，願每個中國的基督徒，都能興起、發光，在中國實現公義的變局中承擔神所賜的使命！

